

自序

我在 20 世纪生活了 82 年,自认为可以算是一个世纪老人。

我出生在本世纪的初叶——1916 年,我的一生有如一只颠簸在大海浪涛中的小船,风和日丽、风平浪静的时候不多。可庆幸的是,我的身体还算健康,思维还算清楚,如果没有什么意外,跨入 21 世纪的愿望,肯定能够实现。

我是一个新闻工作者,我一生只干了这一行,就是报纸的编辑工作。从 20 岁到 68 岁,可以算是一个报人的一生。

从 1936 年到 1939 年,在成都三年多,主要是编辑《大声》周刊和主编《星芒报》。

从 1940 年起在延安九年半,从 1949 年起在西安三年半,负责主编《边区群众报》和《群众日报》,它们都是中共中央西北局的机关报。

从 1952 年 11 月调到中央党报《人民日报》任副总编辑,“文革”结束以后提升为总编辑、社长,直到 1983 年底,辞去社长职务为止,先后 31 年。

1984 年,我专任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教科文卫委员会副主任,

负责制订新闻法。同时,继续任全国新闻学会会长。1989年以后,虽然离开了新闻工作岗位,但仍然继续为一些报刊撰写了不少时评性和纪实性的文章。笔,是和我共同战斗了数十年的伙伴,写作成了我的生活习惯,丢了它似乎等于丢弃了生命。

我摆脱了繁忙的公务后,集中精力从事写作,主要是撰写我几十年新闻生涯的回忆性稿件。这两年又集中撰写我从出生到调进北京以前的36年的经历,就是这本《青春岁月》。承蒙《沧桑文丛》主编李辉先生的关心,交给了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这本《青春岁月》写得很艰难,主要是时间离得太远,很多事都记不清楚,甚至完全忘记了。在写作这部回忆录中,我确定的第一个信条就是真实可靠,绝不瞎说瞎编。两年来我边想边写边查边打问,写好以后,还得经过老伴仔细推敲,认真核对,经她一问一查,有时弄得啼笑皆非。真是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一些朋友称赞我记性好,事实证明,并非如此。我常想,如果不严格遵守真实性的信条,仅凭记忆写出来的“回忆录”,怎么有脸拿给读者去看!

尽管如此,但我仍然觉得难免有误差之处,希望了解情况的亲友向我指出,以便再版时予以改正。

我的第二个信条是实事求是,好就是好,不好就是不好,如实记载。我不同意把一个革命者从小就写成英雄神童,了不起的天才,一辈子都是过五关斩六将,非同寻常。什么时期对某些问题的认识还很肤浅,对什么事情的处理还有毛病,在什么问题上犯了错误,都应如实记载。我在写回忆录时,坚持一是一,二是二,决不拔高吹嘘,也不隐恶夸善。不管人世间、党内外对我的褒贬如何,我都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去写。

写完初稿以后,我重读了一遍,感觉似乎业务性太强,可说是

“三句话不离本行”的报人说报。可是我这个五十几年的报人，写回忆录不说报，就离开了报人的生活特点，就抛弃了我倾注一生心血的结晶。

进一步想，觉得这里面还是具有写的价值。一是我办的这张报纸是很有特点的。从国民党统治区到我们解放区，十几年中所办的这张小报，不仅在政治上是全心全意为人民办报，而且在文字上还要办得“识字不多的人看得懂，不识字的人听得懂”，的确堪称为“一张为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报纸。

再说，在这段时期中，办报的政治环境发生了很大变化，由此引起了我办的报纸在政治性质上的变化和我在政治信仰上的变化，都是值得一写的。

当我1936年初上笔阵，开始新闻生涯以来，在政治上我主张独立、自由、民主、富强，从崇敬三民主义进而信仰新民主主义，自认为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1937年底，我参加了中国共产党，这是甘冒坐牢、杀头风险的行为。我参加编辑的《大声》周刊和我主编的《星芒报》，政治主张是外争独立，内争民主。这张报并不是成都共产党的党报。但当时国民党硬说我们是“拿苏联卢布办的共产党党报”，一再加以查封。广大读者群众也认定它是共产党的报纸，热情地阅读它，传播它的主张，积极地为它宣传和写稿，千方百计地为它推销，扩大报纸订户，并且主动成立了很多读报小组，并向报纸捐赠了一些经费。

在成都办报，国民党政府把我们当成“赤党赤报”，施展了各种高压手段，限制发行，殴打报童，撕毁报纸，捣毁报社，还一再查封。我们的报纸被封后又办，办了又封。三年半中，我们先后办了11个报刊，受到11次查禁，这就促使我越来越觉悟到，要办一张人民

的报纸,使它立于不灭之地,只能在人民自己政府的统治下,在人民当家作主的天下,才做得到。于是在1939年底,我到了共产党领导的民主圣地——延安,开始了我在人民的天下继续编辑人民的报纸的报人生涯。这次才是真正办的党报。先是中共陕甘宁边区党委的机关报,后是中共中央西北局的机关报。在延安九年半,报纸的传播畅通无阻,就是在延安保卫战期间,报社在山沟沟转战的极为困难的条件下,用最简陋的办法(油印、石印、小小的脚踏机印)坚持出版。报纸由三日刊改为周刊,改为不定期、不定版,以后又恢复到三日刊,在光复延安之前又改为日报。在延安办报,被查封、被压制的危险根本不存在了。这种曲折的过程,恐怕是一般读者想象不到的。

从政治方面来看,在我从事新闻工作时起,我们党的路线方针已经由“打土豪分田地”的工农专政转变为“抗日民族民主统一战线”的新民主主义。我从思想上、理论上同意和拥护这一转变,因而我主持的报纸成为这一总方针的主动宣传者和积极鼓动者。当时,党报和党委在政治思想上没有发生过什么大的矛盾。

可惜,在全国解放以后比较长的一段时期中,我们党的主要领导在认识上发生了偏差,由新民主主义的路线、方针,逐步演变为以阶级斗争为纲、以“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为主旨的路线、方针。从1952年12月调我到人民日报任副总编辑起,报纸的政治方针经常有变,我在思想理论上对这种反复变化不完全合拍,处于时左时右、动动摇摇的矛盾之中。但总的来说,还是跟着犯了长期的严重的错误,一些办报的根本原则丢掉了,一些优良的传统违背了。从这个意义上来看,我在延安、西安时期办报的经验教训,就更加显得有价值,更值得回顾了。

写作中遇到的另一个困难是可读性问题。多年来,我只会写叙事性和评论性的文稿,不会写抒情性、文艺性的文章。我很喜欢读那些纪实文学类的回忆录,像看小说一样,生动感人,但我学不了。在取材、构思、行文上,我虽然一再琢磨、设计安排,但是写出来的初稿还是很不理想,文字枯燥,缺少华彩,可读性也差。好在我这人运气好,原来的老伴在1992年西去以后,1993年秋天,迎来了一个新的老伴狄沙,她是一位几十年的老编辑(中国青年报、中国大百科出版社、中华老年报),长期从事文艺宣传报道,写过很多文艺评论,文学修养比我高得多。从此以后,我的文稿都是我们这个“夫妻老婆店”的产品。这几年我写的文稿,经过她的编辑修改、润色,增光很多。这本回忆录中关于我的恋爱和婚姻两章,因为想写得更真切更生动些,就由我向她口述,由她执笔撰写的。我的初稿就是这样得到一些补救,乃新老伴之功也!

这本回忆录只写到我进京以前。此后的人民日报十四年,“文革”中的十年,“文革”后的二十余年,将陆续写下去。如果老天爷能照顾我,我当争取在自己的有生之年把回忆录写出来。尽管困难重重,日渐老迈,我相信“老天不负苦心人”和“有志者事竟成”这两句话,只要大脑不出问题,我会达到目的的。

胡绩伟

1997岁末

目 录

自 序/001

成都、威远部分(1916~1939)

一、我家出了两位国民党元老/003

二、富裕人家里的穷户/010

三、不平等意识的萌发/017

四、第一次远征的挫折/023

五、一场不战而胜的“家庭革命”/028

六、摆脱依赖“施舍”的痛苦/034

七、二十块钱买了一个“胡绩伟”/039

八、别了！我喜爱的数学/044

九、经常“逃学”的大学生/049

十、以笔为枪，冲上笔阵/059

十一、从黑夜唱到天明/066

十二、我成了职业革命者/072

十三、星芒社——反动派的肉中刺/082

十四、练就一身闹中取静的本领/093

十五、别了成都，别了四川/104

十六、新闻学徒的基础课/113

十七、思想上的来龙去脉/130

十八、叛逆的恋爱/142

延安、西安部分(1940—1952)

一、初识民主圣地的音容笑貌/155

二、瞭望民主中国的理想境界/163

三、办报的理想新天地/170

四、办一张群众喜闻乐见的报纸/177

1. 让群众一看就懂，一听就明白/177

2. 用群众喜爱的文字编写群众喜爱的内容/183

3. 党委、党报和群众的正确关系/191

4. 报纸—通讯员—读报组组成的新体系/199

五、热心大众化运动的领路人——周文/206

六、“座谈会”吹出的热风和冷风/214

七、整风的和风细雨和“抢救”的急风暴雨/224

八、经济封锁与大生产运动/232

九、我当了陕甘宁边区的特等文教模范/240

十、边区群众是怎样进行民主选举的/249

十一、在学习解放日报中引发的思考/259

十二、第一次经受战火锻炼/267

十三、用兵如神的彭老总/275

十四、民主的军队，民主的统帅/285

- 十五、啊！延安，我们回来了/292
- 十六、从编小报到编大报的转变/302
- 十七、延安九年半 报纸一千期/309
- 十八、为大西北新闻事业奠基/315
- 十九、第一次访苏，学习真理报的办报经验/322
- 二十、在办好人民报纸道路上的徘徊和前进/330
- 二十一、有情人终成眷属/343

成都、威远部分
(1916—1939)

一、我家出了两位国民党元老

我生于1916年阴历八月十八。这一天正好是每年钱塘江大潮的日子。这好像是一个征兆,预示着我的一生总是在中国社会大变革的狂涛怒浪中翻腾不息,劳累终生,永无宁日。

我的家,已经在中国民主革命史上记下了两笔,那就是我家在清末民初时出了两位国民党的元老。他俩都是国民党前身同盟会的会员,一位是我的叔祖父胡素民,一位是我的大伯父胡馭垓(又名胡良辅、胡御阶)。这两位先人在我家子孙后代中撒下了革命的种子。

曾祖父的情况,我知道的很少,连他叫什么名字我都不知道。只模模糊糊的记得,老辈人说曾祖父是从广东花县迁移到四川的。最初是靠打工做小贩谋生,肩担两个箩筐,走乡串户,卖一点日用百货。后来在川南的威远县界牌镇的一家糖食铺做伙计,由于他手脚勤快,人又聪明诚实,颇受店老板的信任和喜爱,就将自己的女儿嫁给了他,招赘入户。后来生意兴隆赚了钱,当了掌柜,扩大了营业范围,把糖食铺改为茶馆,日子过得兴旺起来。

曾祖父有两个儿子,老大就是我的祖父胡福全,他子承父业,

继续经营茶馆。在我的童年记忆里,对这个小茶馆的印象很深。茶馆设在界牌镇的十字街口,有六七十平米的房子,放有二十多张茶桌。茶馆的右侧摆放着柜台,柜台里的货架上陈列着各种糖食点心。茶馆的后面是我们一家人的起居室,再后面是菜地和竹林。这在当时的界牌镇上,算是数得着的富裕人家。我是祖父最小的孙子,乖巧伶俐,深受祖父的喜爱。我每天放学回家,一进茶馆的门,祖父总是迎上来,摸摸我的脸蛋,向我嘴里塞一块花生糖。吃饭时,一家人围坐在桌前,母亲每天都做一碗香喷喷的肉菜放在祖父的面前,单独供祖父一人享用,其他人的筷子从不伸向这碗菜。祖父总是笑眯眯地夹一些肉菜放在我的碗里。祖父给予我的优厚待遇,使我在全家人心目中处于一种特殊的地位,同时也培养了我的自尊心和任性。

我的叔祖父胡素民生于1868年(清同治七年)4月17日。自幼攻读诗书,勤奋好学,17岁时中秀才,1898年,受宋育仁、廖吉平、吴之英的影响,参与四川变法维新运动,接受了西方资产阶级政治学说,是四川提倡新学的一个先驱者。他当时写的文章就说:“泰西(指西方)立国之本,在于选举英才,参赞政务,共议国家大事……如嘉富以理财选,惠灵吞以治兵选、俾斯麦以长于外交选,格兰斯顿以精内政选,若斯之类,胥未桎梏于技艺之中,故能摆脱一切,专注维新之治。”1903年(清光绪二十九年),清廷开科(癸卯科)取士,胡素民中举人,在威远县创办新学堂,任校长。1910年(宣统二年)春,叔祖父进京会试,被授予天津长芦盐茶道道尹职。当时,清政府腐败无能,民主革命思想在京津地区广泛传播,叔祖父的思想日趋激进,并加入京津同盟会,协助孙炳文(京津同盟会文牍部部长)工作。1911年辛亥革命后,孙炳文主办京津同

盟会机关报《民国报》，胡素民和梁漱溟等任编辑。1913年，叔祖父由京回四川，先后当选为四川省一、二两届议会的议员。1915年袁世凯称帝，1917年张勋复辟，胡素民都参加了讨袁讨张的护法斗争。1924年国共合作期间，叔祖父衷心拥护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扶助工农”的三大政策，出任广州大元帅府秘书和中山大学教授，讲授经史。1926年，受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主任邓演达之邀，出任总政治部顾问，成为国民党左派。这一时期，叔祖父与邓演达、宋庆龄、郭沫若、吴玉章等人时有来往，与孙炳文成为至交好友。吴玉章曾用“素民”两字作了一副对联相赠：“悟礼教后兴，五色文章本乎素；到共和实现，群司奔走忠于民。”1927年，蒋介石背叛孙中山的主张，对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大肆屠杀，叔祖父参与了邓演达、宋庆龄、何香凝等组织的反蒋活动，极力营救被捕人员。1929年辞职回川，在家乡办学，服务桑梓。抗战爆发后，他竭力呼吁各党派联合抗日，保护了不少共产党员。1943年，他75岁时逝世，李筱亭（国民党左派，四川省党部主任委员，新中国成立后曾任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四川省副省长等职）曾写一挽联云：“一肚皮不合时宜，辞尊居卑，辞富居贫，秉性难移，公道屡遭人白眼；满腔子俱怀正义，不计其功，不降其志，盖棺论定，我来凭吊裹头青。”从此联可见他清廉公正的一生。

祖父有三个儿子，我父亲排行老三。大伯父胡馭垓（生于1883年），从小喜爱诗文，深得叔祖父的青睐，自幼就教他吟诗作赋，向他贯输革命思想。小学毕业后，叔祖父就带他到成都，考入当时四川最早的高等学校——成都优等师范学堂，同盟会会员张澜是教员。1907年（24岁）在师范学堂毕业时，由熊克武（辛亥革命时任蜀军政府第五师师长，川东讨袁总司令）介绍加入同盟会，

参与密谋在慈禧太后生日趁百官聚会祝寿时,投掷炸弹,企图一举歼灭驻成都的清军头目,实现成都起义。可惜机密泄露,事未成,险遭逮捕,只得逃回家乡,在威远县高级小学当教员,秘密从事川东的反满军事起义活动。

这时期,四川保路风潮兴起,人民怒火冲天。大伯父参加了同盟会发起的保路同志会,担任了四川保路同志军东路军的行军总参谋。

当时,同盟会从事反对满清封建专制统治的革命活动,一开始就同冲破“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的四川封闭落后状况结合起来,积极筹资建设成都到武汉的铁路,以促进四川经济的发展。这一战略设想,得到四川政界、军界和知识界有志之士的热烈赞许和多方支援。到宣统三年(1911年,辛亥革命前夕),川汉铁路公司已经筹集建路股金2400多万两白银。谁知,在这年的四月,清政府却宣布川汉粤汉铁路的筑路权收归国有,准备借英美德法四国银行贷款进行修建,而且不允许退回民间投入建路的股金,激起四川人民上下一致的激烈反抗。由四川省咨议局议员发起,成立四川保路同志会,全川142个州县成立保路分会,响亮提出:“卖路即是卖国,侵吞川人股金,犹如抢劫庶民。”

保路风潮的兴起,一方面是轰轰烈烈的群众抗议示威活动,游行和演讲队伍抬着反对德宗皇帝“圣谕”的标语牌,骂“儿皇帝”腐败无能,倒行逆施,祸国殃民;另一方面则是各地同志军的建立和扩大,准备武装起义。

胡驭垓回到家乡,立即投入以矿工武装队伍为主体的反清保路武装斗争。威远县是川南著名的煤铁区,这里早就孕育和壮大着一支苦大仇深、有战斗力的矿工队伍,也产生和锻炼着一批领袖

人物。新场陈家沟吉武煤窑的杨绍南就是比较杰出的一个。杨绍南自幼习文练武,喜读兵书,是哥老会首领。他疏财仗义,扶弱济贫,颇受群众的信任。大伯父是他的姻侄,在大伯父的影响下,杨绍南在新场地区组织了一支三百多人的保路同志军,把清廷的威远知县徐昭益率领的官兵打得屁滚尿流,狼狈逃窜。

清宣统三年农历五月二十一日(1911年6月17日)四川保路同志会成立,群众推举大伯父为嘉定府(今乐山)所属七县的评议长。九月,清政府派督办粤汉、川汉铁路的大臣端方率领湖北新军到四川镇压保路运动。四川总督赵尔丰将四川保路同志会的一些领导人诱捕入狱,大伯父也险遭逮捕,他星夜赶回威远,建立民军,带兵去进攻成都,与赵尔丰率领的清兵作战,终因兵力单薄和武器落后,未能取胜。进攻成都失败以后,大伯父同东路军的统领们(同盟会会员)商量,改变战略,将集中兵力攻打省城改为分兵进攻各州县的策略,这就同地方上的保路同志军结合起来,壮大了队伍,增强了战斗力。这时,同盟会会员吴玉章发动革命,同在威远西邻的荣县东路军里应外合,在1911年9月25日攻下荣县城,宣布独立。9月30日,大伯父同杨绍南率领的新场地区保路军,联合威远县其他几个地区的保路军,形成浩浩荡荡的上万大军,杀死知县徐昭益,攻下威远县城,成立军政府,在11月1日宣布威远独立,大伯父被推举为副军政长。威远县军政府成立的第二天,新任四川总督端方调驻资州巡防军来镇压,进驻威远县与自流井共管的界牌场,大伯父与杨绍南率军截击,与清兵展开激战。在强大的清廷反动势力的包围下,城外有清兵围攻,城内有叛贼谋反,新生的威远县政权仅仅坚持了12天。11月11日,叛徒董伯和以县军政长召集会议的名义,把大伯父从前线骗回县城,趁他熟睡的时候

候,将大伯父绑架到东街杜康庙内,捏造罪名,威逼大伯父承认。大伯父不畏强暴,置生死于度外,破口大骂叛徒,从夜半直骂到次日天明。叛徒将大伯父杀死后,割下双耳,派人送给了端方,又把大伯父的头割下来,悬挂在城门楼上。这一壮烈牺牲的英雄悲剧,在民间流传至今。

我是在大伯父殉国五年以后才来到人世间的。在我稍稍懂事时起,就从大伯母和两位堂姐口中,断断续续地听到关于叔祖父的革命历史和大伯父起义牺牲的英雄事迹。

大伯父还具有尊重女权的高贵品质。在本世纪初的封建皇权社会里,他的男女平等的思想是十分难能可贵的。他同大伯母陈凤章是经过自由恋爱结婚的。婚后,大伯父在成都读书,常寄书报给大伯母看,支持她离家到成都继续上学,鼓励她成为独立自主的新女性。他在写给大伯母的一封信中说:“盖无学、无品、无识之人做事糊涂,以嬉笑游戏为快乐,动曰:‘自由!自由!’试观东西女杰,恐无此莫礼之自由也。”大伯母在大伯父被害时才20岁,她背上背着两岁的女儿德如,怀里抱着几个月的小女儿德辉,化装逃出县城,投奔荣县王天杰家避难,受到保路同志军东路军统领王天杰的保护,孤儿寡母才得以幸存。

这时,叔祖父胡素民正在天津编辑《民国报》。噩耗传来,他悲痛万分,泣血成诗《在津哭犹子馭垓殉国》:

传闻碧血溅东楼,哭到无声泪尚流。
望告武成生未与,时穷节见死何求。
漫悬双眼看来寇,自有千秋是断头。
底事舌端缄不住,呼儿在口却难留。

他对我大伯父爱如亲子，一直由他抚养成人，特此称为“犹子”。叔祖父对我大伯母当然也爱之如媳，把她接到成都，供养她继续上学。

大伯母在成都女子师范学堂毕业以后，回到家乡，任县立女子师范学校校长。

我父亲是小学教员，在我不到一岁，积劳成疾，早早地离开了我们。母亲在家日夜操持家务，侍候祖父母。在我五岁的时候，大伯母说服祖父母，把母亲和我带到县城，帮助我母亲到师范学校学习，鼓励她走独立自强的道路。母亲上了蚕桑专业班，学习种桑养蚕，我在女师附近的小学里上学。这样我们母子同大伯母和两个堂姐十分亲密的住在一起，度过一段美好的童年时光。

和大伯母一家共同生活了一年左右。这段宁静温馨的幸福生活，在我的记忆里留下了难以泯灭的印象：母亲的抚爱，伯母的教诲，堂姐们带领弟弟的嬉戏玩闹，使这一双孤儿寡母的小家庭，也处处洋溢着亲情的温馨，这是我童年生活中最美好、最愉快的一段时光。

二、富裕人家里的穷户

辛亥革命成功，国民政府成立，万民欢腾。我们一家人也期待着国民政府对大伯父为国壮烈牺牲的英雄事迹能作出正式处理：一方面是惩治出卖大伯父的叛徒和杀人凶手；一方面是对烈士的追认、纪念和烈士家属的抚恤。这些都因为威远县政府的幼稚、软弱和动摇，迟迟没有进行。

民国3年(1914年)叔祖父由北京回到四川，当选为四川省议会议员，为大伯父死难昭雪事，奔走于成都与威远之间。由我大伯母和父亲胡良田具名，向管辖威远县的嘉定府提起诉讼，要求惩治杀人凶手，抚恤烈士遗孤。当时叛徒董伯和一家在威远县的势力还很大，县知事对叛徒和凶手多方包庇，反反复复，经过六七年的斗争，终于在民国7年(1918)惩办了杀人凶犯(叛徒董伯和已故)。民国10年(1921)，经四川省政府批准，在威远县修建了胡馭垓烈士塔墓，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各界人士和群众送了挽联，缅怀大伯父的英雄事迹和他的崇高品格。

这时，董伯和的儿子是威远县议会的议长。有一副很好的对联被扣压没有展挂出来，却在人民群众中流传开来，中学校里把它

作为语文教材来教。这副对联是：

父杀之，子悼之，俯仰随风千里草；
妻寡矣，儿孤矣，凄凉古月半轮秋。

这里，“千里草”指董字，指董家父子。“凄凉古月”是指胡家母女。可见，烈士英灵是永远为后人传颂的，叛徒败类永远为人民唾弃。

当时，对我家的抚恤，一是颁发了3000银元的抚恤金；二是由我家派一人去当官。谁去当官呢？只好由二伯父胡良佐（又名胡建勋）去，好像是到荣经县当了一年的厘金局长（即税务局长）。他在任上搜刮了不少民脂民膏。

在我六岁的时候，祖父去世。二伯父从此成为一家之长。从一般世道人情来说，祖父遗留下来的家产，应该由三兄弟三房来分，特别是那笔抚恤金，应当主要由大伯母一家人领用，这一切都被贪得无厌的二伯父一人独霸了。

当时，大伯母在县里当女子师范学校的校长，靠薪水收入足够维持母女三人的中等生活水平，一家人住在县城里。大伯母是位自尊自强的女性，她主张妇女要自立自强，不依靠男人生活，因此她不屑于与二伯父说理去争分财产，宁肯自食其力，独立谋生。我母亲在家里的地位最低。我们两兄弟，哥哥胡德承，我名胡德恕，比哥哥小两岁，因为大伯母只有两个女儿，哥哥就过继给她当儿子。我母亲和我，寡母孤儿，更没有力量去和二伯父讲道理，争财产。母亲常对我说：“猫不跟狼斗，弱不跟强斗。”她一辈子抱着忍气吞声、息事宁人的生活态度，侍奉公婆，操持家务，实际上和家里的佣人一样。

二伯父当了一年的厘金局长，靠搜刮老百姓发了财。任满回家后，他们一家搬到镇上最热闹的街上，把祖父的茶馆“福全斋”也搬了过去，扩大了经营；他还买了土地出租，放高利贷，成为当地一家财大势大的富户。

祖父去世后，母亲只好辍学带我离开大伯母家，由威远县回到界牌场，侍候祖母和八姑。一年后，二伯父又打起了算盘，认为祖母和我母子住在镇上花费太大，让我们搬到乡下老屋，离界牌场五里路的四合堡寨子上去住。从县城到集镇，从集镇到农村，生活环境在一步步地走下坡路。从此，我们母子怀着受压迫受欺侮的憎恨，离开了界牌场，我也从镇上的小学转到乡下的小学。虽然心情是抑郁的，然而，农村的自然环境却为我提供了一个自由而广阔的成长天地。

四合堡是一个风景优美的小寨子。城堡修筑在约百米高的小丘上，上下要走三四百个石头台阶，这是孩子们最喜欢比试本领高低的场所。寨子四周有两米高的用石头砌成的围墙，四周墙角处设有炮楼，南墙正中有寨门。站在寨门口望去，远山隐现在云雾弥漫之中，小河潺潺，绿竹幽幽，山花遍野，蜂舞鸟唱，煞是喜人。寨上有水田、水塘、竹林，住着十几户富裕的人家，这里是防止土匪骚扰的比較安全的地方。

搬到四合堡，对我来说，是进入一个新天地。除了家庭和学校之外，还有一个千变万化、五彩缤纷的大自然环境。在小河里游泳，钓鱼，摸虾；去水田里捉青蛙，勾黄鳝；在山上掏雀窝，摘野果；在树林里采蘑菇，捉笋子虫。大自然的奥秘深深地吸引着我，孕育了伴随我一生的好奇揭秘的探索进取精神。

我们家住在寨门的西边，是很普通的土坯房子，三间正房，四

间偏房。门前是一块菜地，菜地前边是一个公用的水塘。正房住着祖母和母亲，我住一间小偏房。我们在寨子上的一切费用，都由二伯父按月供给，送米送肉，菜是自己种。母亲是治家能手，饭菜做得很可口。她做了很多种好吃的咸菜。我有时回家晚了，将冷饭浇上热茶，就着泡菜和豆豉，也吃得很香。

生活过得不错，但内心总感到压抑。对二伯父霸占家产和把我们母子赶到乡下，总觉得不公平、不公道。有时，二伯父没有按时送肉来，初一、十五的“打牙祭”（吃一顿有肉的好饭菜）也“打”不成了，吃中饭时，母亲就低声向祖母和八姑解释：“昨天，场上（指二伯父）没有送肉来。”这样，一家人心里都憋着一肚子气，谁也不说一句话，吃了一顿堵心的闷饭。对于我来说，除了小孩子馋肉，吃的愿望不能满足之外，心里还受到一次刺激，又增加了一份对二伯父的不满。特别是我帮母亲在菜地干活时，看到母亲汗流浹背，累得直不起腰来的情景，我就感到阵阵心痛和愤愤不平：同是一家人，为什么二伯父一家人就住在镇上过舒服日子，而我们只能在乡下过受苦受累的生活？胡家在界牌镇上是数一数二的富裕人家，我们住在防土匪的寨子上，也是富家的架子，但在实际上，家庭生活水平已经沦落到贫困程度，我们这一户人，已经成为富裕家庭里的贫困户了。

四合堡小学，是新式学校，却仍然保留私塾的一些特点，照样要背诵古书，《幼学琼林》、《论语》、《孟子》等好几种古书，都要从头逐篇背诵。每天上课时，我都要拿着厚厚的一叠书放在老师面前，背过身去背诵。

我读书很勤奋，成绩很好，考试总得前三名。为了背诵那些古书，每天晚上我都要反反复复读到深夜。虽然将书背得烂熟，却不

完全懂得书中的意思,八九岁的孩子恐怕也只能“好读书不求甚解”了。

这个新学堂保留的另一种旧制度,就是打屁股。我曾被狠狠地打过30大板。现在想起来,虽然仍旧记得屁股被打得钻心一样疼痛的滋味,却也觉得是罪有应得,理当挨打。

我在学习上成绩好,聪明伶俐上很出名,在调皮捣蛋、淘气上也很有名。有一个星期天,我同三个小朋友,到河里去抓了一些小鱼、小虾和青蛙。我夸耀说,妈妈会做菜,做得特别好吃。又吹牛说,自己向妈妈学了几手,可以由我掌勺给大家做一顿美餐。小学学校的老师平常住在学校里,自己种菜自己做饭,星期六晚上回家,星期天晚上才回校。我们从老师的地里摘了一些茄子、辣椒,然后翻过学校的院墙,钻进老师的厨房,用老师的猪油和辣酱做了一小锅香喷喷的大烩菜,大家高高兴兴、痛痛快快地美餐了一顿。老师回来发现后,就进行追查。我憋不住,心想:好汉做事好汉当,就老实承认了,并把一切责任都承担下来,这就招来屁股上的30大板。老师的脸都气青了,命令我脱下裤子,俯卧在长条板凳上,用竹板把我的屁股打得又红又肿,痛得钻心。我紧咬牙关,没叫一声,回家也瞒过了祖母和母亲,把自己锁在房里,用石头砚台来冰敷那火辣辣的屁股。过了几天,屁股虽然不疼了,可是母亲知道了这件事,又打了我一顿手板。

死记硬背孔孟之道的古书,虽然枯燥无味,又不全懂,可对我还是很有好处的。在四合堡两三年的时间里,不仅记得一些修身、齐家、为人处世之道,而且还记得一些民为邦本、民贵君轻和天下为公的治国安邦之道。更为可贵的是,在叔祖父对我进行有关三民主义的教育下,更加深了对孔孟之道的理解。

搬到四合堡最使我高兴的事,是叔祖父胡素民也住在这里。他家住在寨子的东头,有一段弯弯的寨墙围绕着他的后院。他的房舍是依地形而建的,不方不圆,错落有致,虽然也是土坯瓦房,但比一般的房舍要宽大。房子的后院有一个菜园和花园,有很多梅花树和橘子树。特别是进大门之前,要走过一个小小的过街楼,楼上是叔祖父的书房,四壁摆放着各种各样的书籍。对我来说,叔祖父的书房真是一个神奇的童话世界。

叔祖父回四川,除任省议员、国民党省党部委员等职务外,还创办了成都大同公学,担任校长,他经常在成都,一年总要回家几次。每次回家,总要请我祖母和母亲到他家去,她们打麻将牌,我就到书房去找叔祖父。他不在家时,祖母也常去看望叔祖母,母亲和我都跟着去,我也常常跑到叔祖父的书房里东翻西翻。

叔祖父喜欢给我讲三皇五帝的历史故事,对我印象最深的是孙中山反清、建立民国和大伯父在威远起义、壮烈牺牲的事迹。对于孙大炮十次武装起义十次失败以后,终于在辛亥年武昌起义成功的历史,他像说水浒故事那样有声有色地讲给我听。这些英勇不屈,坚忍不拔,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革命精神,在我心里扎下了根,使我从少年时起就成了孙中山和大伯父的崇拜者。

我搬到四合堡那年,正逢孙中山逝世。记得叔祖父还像教我背古书一样背诵孙中山的遗嘱。老实说,我也是囫圇吞枣一样,死背下来了,很多内容并不理解。但是也正像背诵孔子的《礼运》篇和孟子的《告子下》篇一样,还是比较深的记得“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和“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等大段,而且有一点点理解。背诵孙中山的遗嘱,也是比较深的记得和理解“余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之经验,深知欲达到此目的,必须

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等主要之点。

这时，我不过是个十岁的孩子，模模糊糊地产生了一种愿望：自己也要像孙中山和胡馭垓那样，也应“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去追求美好的未来。

三、不平等意识的萌发

在四合堡的初级小学毕业以后，如果要读高级小学，就得到威远县城去，或者到自流井。自流井是四川最大的盐业城市，基督教会在哪里办的新式学校是远近闻名的。我的外婆家也在那里，母亲特别赞成我到自流井去升学。于是，在我10岁的那一年，就到了离家30里的自流井，考入了培德中学的高级小学班。从1926年到1929年三年，我在这里读了两年高小和一年初中。

培德中学在雨台山上，这里的自然环境很优美。这个教会学校教的全是新课程，用的是新编的课本。老师们讲授的课程内容，都是我过去闻所未闻的新鲜事物，立即把我引入一个新的未知世界，更加激发了我探索新事物的好奇心，使我最感兴趣的课程是生物、物理和化学。生物课中那些珍禽异兽、花鸟鱼虫、微生物和细菌，千姿百态，千奇百怪，使我这个小村镇长大的少年大开眼界。

当时，学校的教学试验设备虽然很简陋，但同农村学校相比，仍然差距悬殊。把氧气和氢气合成为水的试验，简直像神仙点石成金一样，令人惊喜雀跃。物理课中的电力、磁力，还有四

两拨千斤的杠杆作用，对一个十一二岁的孩子来说，更把这视为显现人类智慧的无穷奥妙。

在培德中学的各门课程中，数学课——代数和几何最使我入迷。鸡兔同笼之类的难题，用 X、Y 来代替，很快就算出来了。而方形、圆形和三角形，更是像魔术一样，对各种形态的物体，都可以加以计算。在这里，我要感谢数学老师张先福先生，他的教学才能实在是太高超了！数学课是一门逻辑性很强的课程，如果讲得不好，学生们只能死记公式，演算一些枯燥的都是符号的试题，但张老师讲数学讲得深入浅出，联系生活实际，生动活泼，引人入胜。当时，我没有那么多纸来作演算和画图，常常一个人蹲在地上，用瓦片和树枝在地上演算，画了抹，抹了又画，全神贯注，根本不理睬身边的人来人往。

张老师的启蒙教育，使我在初中和高中时期，越来越喜爱数学，以致几年后我升入大学时，选上了华西大学的数学系。

可是，完全没有料到，我并没有沿着这条路走下去，进入多年理想的数学王国，成为爱因斯坦式的学者。出乎几位很器重我的中学教师、特别是张先福先生的意料，我在华西大学数学系只读了一年，就毅然决然地抛弃了这一年的学业，重新考入了四川大学的政治经济系。这是由于我接触到一些进步青年，看到了社会的不平和黑暗，思想上受到了民主革命思想的启蒙，从教育救国的理想转入了政治救国的道路。这一段历史，我将在以后作详细的回述。

当我在年届八旬的今天，追忆起六七十年前在培德中学这一段学习时光，既想到了对学校培养的感谢，也想到以后由我的大转弯而感受到当时学校在课程设置和教学引导方面的缺点。当

时，我对新的科学知识的追求，如痴如醉。相形之下，对文学和历史的学习，尤其是对孔子、孟子等古书，几乎是束之高阁，放弃了对我国古文学和几千年历史的学习。当我在十年以后，一头扎进新闻界，变成一个同文字打交道的专业人员时，回过头来想到当年在培德中学时代那份偏爱自然科学，放弃对中国文学和中国历史的学习，才认识到自己的这一大失误。

再一个错误，是进入这个教会学校以后，我就改用铅笔和钢笔，认为这样书写比较方便，从此把毛笔抛掷一边，当时根本不懂得毛笔字是中国的书法艺术，是我国一种古老的文明。

这是一个从事新闻工作五六十年老人，在回忆少年时期的学习时，对自己的弱点和缺憾的反醒。多年来，自己并不是一个真正优秀的文字专业人员，绝大部分时间忙于编编改改，自己写的文章很少。而所写的稿件中，充满一副新闻腔调，缺乏中国历史的知识修养，缺乏中国文学的丰富的表达能力和绚丽色彩，记不得多少诗词歌赋，引不出多少成语典故，真是幼小太偏颇，老来徒伤悲！

在我两年高小毕业进入初中的时候，二伯父在同我母亲的谈话中表示，中学的学费和食杂费都增加，负担有困难，最后还是二伯母出面说情，二伯父才勉强同意我升入初中。母亲把这事告诉了我，我已经为此憋了一肚子气。也恰恰是这一年，二伯父的大儿子，也就是小我两岁的七弟，也到培德中学来读高小一年级。两兄弟相比，使我感到家庭中的不平等。我和七弟在一个学校吃住，但他的穿着比我好，零花钱比我多，吃穿用都比我阔气，特别是有的星期天，二伯父到自流井来玩，单独把七弟接出校门，看电影，下饭馆，而对我不理不睬，如同陌路人，这对我

这个没爹的孩子来说，是一个很大的刺激。在这种情况下，我只能关在学校里打闷球。那时皮球（足球）只有大孩子玩，低班的同学只能用破布和麻绳捆成小布团，你抢我夺地跑出一身臭汗。晚上，想着一家人却是两种不同的生活待遇，我感到愤愤不平，久久不能入睡，只好用被子蒙着头，悄悄地流泪。幸好外婆家也在自流井，有的星期天我就到外婆家去玩，或者恳求二舅带我去看一场电影。小小年纪的我，更进一步尝到了家庭亲疏、世态炎凉的滋味。

从四合堡到自流井 30 多里，我总是一个半天就走到了，除了寒暑假以外，双十节放假两天，我也赶回家一趟。当时，穿一双草鞋，走得很快。沿途东张西望，对一切都充满好奇心。大路两旁，大多是小土坯房和茅草房，很少有砖瓦房，路上常常遇到衣衫褴褛的乞丐。使我大吃一惊的是，在自流井的盐井上所看到的，也是成群的“乞丐”一样的盐工们。

自流井是盐业重镇，二舅在盐井上当管账先生，他带我到盐井上去看过两次。这里埋藏着丰富的盐卤水和天然气。千百年来，人们把盐卤从地下抽上来，然后用天然气把盐卤熬成雪白的盐晶。当时，生产技术落后，无论是打盐井，还是抽卤水，都是靠人力和牛力。盐工的劳动和生活十分艰难困苦，他们蓬头垢面，穿的是破衣烂衫，受的牛马苦，吃的猪狗食，和叫化子几乎一样。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看到这样一大群一大群的“乞丐”——受苦受难的盐工们。当时，我还不知道“无产阶级”和“劳动创造一切”的名词，却已经深深感受到人世间到处都有这样的苦难和不平。

家庭的不公平和社会的不公平折磨着我，多么向往天下为公

的大同世界啊!

寒暑假回家的路上，经过界牌场，只得先去看望一下二伯父。他爱理不理地说半句：“回来啦!”我就到后屋向二伯母问安，甚至连饭也不吃一口，就回到镇上那个老房子去，因为大伯母一家每逢假期也回到界牌场老屋，她和姐姐们疼我爱我，我总得在她家住两天才回到寨子上。

我把满肚子的不平和怨气向她们诉说，我表示不愿用二伯父的钱来继续升学，实在忍受不了这种窝囊气。二姐德辉劝我要忍耐，暂时忍辱负重，等待时机，等她工作以后一定资助我上学。她还劝我去自流井读完初中，然后到成都去上高级中学。在二姐的引导下，到成都去读高中，成为我当时日夜向往的理想目标。

每次回到四合堡，我沉浸在母亲的爱抚之中。每年都由她一针一线为我缝做冬夏衣裳和鞋袜（那时，都是穿长袍、马褂、布鞋、布袜子）。春节的腊肉总给我留一些到暑假，中秋的月饼放在用石灰铺底的坛子里，已经变成坚硬的糖饼了，还是给我留到寒假。她养鸡下的蛋，平时用来换针线、火柴，但也要给我留下一些，为我炒几次蛋炒饭。

读完初中一年级的那个暑假，母亲告诉我，她已求过二舅帮助。二舅也说花费太大，他一人负担不了。母亲劝我去恳求二伯父继续供我读完初中，我坚决表示不愿继续吃这碗受气饭。

当我把这种情况告诉叔祖父时，他也劝我再熬两年。几天以后，他把我母亲找到他家，把他的四女婿郭译清也找去了。郭姑父当时在雅安的上川南师范学校作教务长，那是一个公费学校，学费食宿费都由学校负担。叔祖父已经和郭姑父谈好，他愿意把我带到雅安去，说我的学业好，一定能够考上。我听了十分高

兴，满口答应。而母亲却不赞成，她放心不下，不愿让我在这般小小年纪就离家千里去求学，我们一再说服母亲，又当着叔祖父和姑父的面，母亲只好答应。但回到家里，她伤心地哭了好几次。因为我坚决不愿低声下气地去哀求二伯父，决心到雅安去进公费学校，母亲也只好依我，忙着为我准备行装。

一个新的天地等待我去闯荡，我心中充满了幻想和希望。

四、第一次远征的挫折

一个少年漂泊者,踏上了背井离乡的征途。

有生以来,我离家最远的就是到30里以外的自流井,如今突然要到六七百里外的雅安去,为什么?因为没有钱而又要上学!这对于13岁的我来说,是远离亲人的痛苦,也是憧憬未来的希望;是迫不得已的抉择,也是奋发图强的开始。

母亲十分忧心,认为我此去前途未卜,凶吉难测。她二十多岁就守寡,大儿子过继给大伯母,身边只有我一个亲人,她的一切安慰和希望,都凝聚在我身上。如今,爱子远行,她怎能舍得!同情她的亲友都说我此行太冒险,她们摇头咧嘴说:“你疯啦!这么小的孩子让他走那么远!”而叔祖父和二姐特别赞成,鼓励我要做人生道路上的强者,只有勇敢地去面对人生挑战,才能有理想的实现和事业的成功。

雅安在峨眉山的北面,处于四川南部的最上方,我去投考的学校叫上川南师范学校。

威远县在川南的中部。从威远到雅安,我们要先到峨眉山麓的嘉定府,然后沿着岷江支流的青衣江北上,才能到达雅安。

20年代末30年代初的四川,长途旅行只能靠人的两只脚走路,记得好像走了九天,才到达雅安,姑父坐滑竿,每天走七八十里。

我的学习成绩好,很容易就考上了上川南师范初中二年级。我深知到雅安来读书是来之不易的,我废寝忘食地努力学习,经过一个时期的埋头苦读,在班里成绩优异。我仍然钻进数理课程内,特别是数学仍然是我最大的兴趣所在。可是我毕竟不是“两耳不闻天下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人,窗外事不断引起我的注意,使我的学习增加了新的内容,课外读物从《三国演义》、《水浒传》、《红楼梦》等古典小说转到鲁迅、郭沫若、蒋光慈的新小说。鲁迅的小说虽然不如郭沫若的小说好懂,但是对于这个社会的苦难和不平的呐喊,倒是引起我的共鸣。

在我离开四合堡时,叔祖父曾对我说起过苏联和苏区,也说起过打富济贫的共产党和朱毛红军,并没有引起我的特别注意,觉得那些事情离我太远,和我没有什么关系;到了雅安以后,好些同学说,学校内外都有共产党的活动,院墙上经常出现标语和口号。我到图书室时,新来的成都和上海的报纸上,常有大字标题,报道关于“共产共妻”、“杀人放火”的“匪党”和天天打败仗的“匪军”,这同叔祖父说的完全不同,反而引起了我的注意,特别留意和打听共产党和红军的情况,也特别去找被骂为“共产党的吹鼓手”的鲁迅、郭沫若等人的书来看。据同学们说,上街不要到人多的地方去,不要去看热闹。一天晚上,我们正在上晚自习,学校里来了好多军队和警察,教室和寝室门口都站了哨兵,一律不准进出,有几个教室和寝室被搜查了,没有抓人,只抄去了一些书。

当时的新书有一些是毛边书,就是只装订,不裁剪不切边,是

新潮派的书。这种书放在书架上很显眼,很容易发现,我正在看的郭沫若的《女神》就是毛边书,放在我书桌上的小书架上。军队来的时候,在同学们众目睽睽之下,我也不敢去藏,也不知藏在哪里,只能干瞪眼,等待着大祸临头,幸亏这次检查是重点查,不是普遍查,算是逃过了这一关。但也相当深切地感受到白色恐怖的威胁。

在第二个学期中间,发生了一件不愉快的事情。学校有几个流氓式的学生,动不动就骂人打人。有一次骂到我们班的一个同学,我和几个人就去干涉,双方对骂起来,一个流氓就动手打了我几拳,把我打倒在地,痛得一时爬不起来。我们拉着其中之一去找老师,老师只是浮皮潦草地批评了几句:“打人是违反校规的,今后不许这样……”没有给他们任何处罚。他们更加嚣张,见了我们就骂,或者说一些脏话。我也曾向姑父哭诉过,姑父劝我忍让,说什么:“你惹不起,还躲不起吗?”这大大伤害了我的自尊心。可是他们又是几个身强力壮的大汉,蛮横无理,欺压同学,他们又有后台,学校当局不敢管,谁也不愿去招惹是非,我只得忍气吞声,有意识地躲开他们。这使我的心情压抑,情绪低沉,大大影响了我的学习热情,产生了消极悲观的心理和离开这个学校的念头。

在这种消极情绪支配下,我放松了对自己的要求。一个星期天,我们几个同学一起,到城外,沿着雅河走到远远无人的地方去玩,玩得误了学校的午饭。一个同学就请我们到附近的一个小饭馆去吃红油水饺。这个小饭馆的三楼小阁楼上,摆了一张麻将桌子,有的同学提议去玩一下。我想玩就玩,免得回到学校去生闷气。谁知玩了四圈又来一个四圈,到吃晚饭时才赶回学校。玩麻将也是违反校规的,反而增加了心理负担。没有不透风的墙,后来老师知道这件事后,就给了我一个警告处分。姑父为此又狠狠地批

评了我一顿。这就更加重了我离开这个学校的念头。

真是天无绝人之路。幸好在放暑假以前,母亲来信说,她实在舍不得让我远离家乡,为了这事,她专门回到自流井的娘家,对外祖母哭了几场,苦苦哀求二舅张超华出钱供我上学。恰好,由于二舅忠厚老实,干事卖力,老板给他加了薪水,他终于答应母亲帮助我回到自流井再读一年中学,读到初中毕业。

这个喜出望外的好消息,扭转了我的消极情绪,很快就到了暑假,我高兴地告别了雅安。

从雅安回家,先是沿青衣江坐竹筏顺流而下,到嘉定后才改为旱路。

坐竹筏是一次相当艰苦而冒险的旅行。我第一次坐竹筏,一切都非常有趣。江水清澈见底,江底的沙石水草,江中的大小游鱼,都在眼前闪过。用江水焖饭,香甜松软;用酸菜烧鱼,汤鲜味美。鱼是刚捞上来的活蹦乱跳的鱼,转眼之间就变成了餐桌上的美味佳肴。现在回想起来那鲜美的一顿饭,似乎仍在口中留有余香。

沿江几百里的水路,竹筏在碧波荡漾中缓缓前进,两岸山峦叠翠,清幽宁静。遥望远天,穹苍无限,在大自然的熏陶下,我的心也像一只小鸟一样,随着白云在蓝天上翻腾,随着竹筏在绿波上游荡。但是两岸不断出现的草棚茅屋,颓墙陋舍,穿着褴褛,蓬头垢面的人们,使这青山绿水的优美景色与穷苦贫困的人们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强烈地刺痛了我的心,欣赏山光水色的悠闲安逸的情绪,也被驱赶得一干二净。

从雅安到嘉定的水路,是由高向下的下坡路,有几处坡度较大的“下滩”,对于初坐竹筏的我,有着意想不到的惊险。下滩时,竹

筏要顺着急流,沿着六七十度的斜滩滑下去。这时,水流湍急,波涛汹涌,竹筏要钻进几丈高的波涛,整个竹筏和乘客都要埋在水雾里十几秒钟,待竹筏穿过波涛,才得以重见蓝天白云。

事先,乘客听艄公说明下滩的要领,告诉大家不要怕,抓紧扶手,闭紧眼睛,一刹那就闯过去了。果然,我横下一条心,咬紧牙关,一眨眼就从惊涛骇浪中穿过,眼前又是一片风平浪静。虽然全身上下都湿透了,因为天气热,气温高,反而觉得十分凉爽。我站在筏头,迎着轻风,晒着骄阳,感到一种胜利的喜悦。

竹筏下滩的体验,对于一个勇敢者来说,应该是增强敢于历险、敢于化险为夷的勇气。那时的我,并不是勇敢者,并没有勇气十足、信心百倍的精神状态,在第二次第三次下滩时,我还是心惊肉跳,以逃不脱、躲不过的心情,迎接那劈天盖地呼啸而来的汹涌波涛。

到达嘉定时,在青衣江和泯江合流处,远看峨眉山峦起伏,莽莽苍苍;近看乐山大佛,顶天立地,雄姿伟岸,这天下少有的奇观异景,我并没有心情去欣赏,还是怀着一肚子的不愉快:对于学校里白色恐怖的压力和蛮横无理的暴力,想起来还是心有余悸,对于即将来临的初中最后一年,毕业后的前途如何,仍然忧心忡忡,深感未来渺茫。

五、一场不战而胜的 “家庭革命”

回到自流井继续上学，一家老少都很高兴，最高兴的是母亲。

这时，祖母已经去世，母亲成了四合堡的一家之主。母亲是受到亲友邻里喜欢的人物。她为人忠厚，助人为乐，人缘很好。

二伯父还是每月给我们这一家（家里还有一个十几岁的八姑）供应粮肉。母亲悄悄对我说：“常常拖着不送来。好在你二伯母心好，总想到我们孤儿寡母，经常提醒二伯父送东西到寨子上。”

母亲是一个治家能手，她不仅能做一手好菜，还会精心搭配，用一斤肉做出八样香喷喷的美味佳肴。她还会做十几种咸菜，会裁剪、缝纫、刺绣，还会为邻里调解纠纷，是一个相当活跃的人物。她有两三位最相好的老姐妹经常在一起为自己或他人缝衣服，做鞋袜。

祖母去世以后，家里的日子不算好。现在她惟一的希望——远在千里的儿子回到她的身边，当然就更加高兴。母亲特地做了几样菜，请她的几位好友来为我“冲喜”。

我在雅安的情况和重新回到自流井上学的事，母亲早就告诉了二伯母。我从雅安回来后，母亲一再催促我到界牌场去看望二

伯父。从四合堡到界牌场五里路,半个小时就走到了。这时,二伯父在界牌场重新开设了一个比原来规模大的茶馆,他总是坐在茶馆通后屋的门边一张黑漆桌子旁边,凡是进后屋的人,都得经过他的身边。他见到我,问了几句关于雅安的情况,根本不提回自流井读书的事,我也不说一句,急忙去后屋找二伯母。这时,二伯父已讨了一个小老婆,二伯母显得更加瘦弱。她劝我“由二舅盘(供给之意)你读书,这就好了。你二伯父的脾气你知道,他就是那样一个人,不要生他的气,好好读你的书,毕了业就好了”。她留我吃中饭,我借口还要去看几个同学就告辞了。走时,二伯母把三块银元塞在我口袋里。

回到界牌场的老屋,见到了大伯母一家,情绪就完全不同了。我向大伯母和堂姐们滔滔不绝地诉说了我在雅安的情况,她们和我一同欢笑,一同气愤,相互间充满了亲情的友爱和温馨。我似乎感觉到大伯母家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吸引力强烈地吸引着我,使我得到了快乐和安慰。

回到培德中学上初中三年级,原来的老师和同学也都很高兴。我仍然喜爱数理课。我还从高中数学课本中找出一些难题来演算。我没有钱买练习本和纸张,总是找一个偏僻的角落,蹲在地上,用树枝和瓦片在地上演算,大地为纸,树枝为笔,我完全沉浸在渴求知识的愉悦里。

在培德中学读初中三年级的这一学年,是1931年的下半年到1932年的上半年,震惊世界的“九一八”和“一·二八”事变发生了,日本侵略者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就占领了东北三省,然后又向上海进攻,蒋介石实行不抵抗政策,将祖国大好河山拱手让给日本人。全国人民奋起抗战,掀起了抗日救国的浪潮。像自流井这样

的内地中等城市,也到处响彻着抗日救国的呼声。课堂里,老师们慷慨激昂地大讲抗日救国的道理,大讲近代帝国主义的侵华史,更加激起了青年学生抗日救国的热情。我参加了学校组织的抗日救亡宣传队,和同学们一起到繁华大街、桥头、公园,特别是茶馆等人多的地方去演讲。我人矮,就站在凳子上演讲。

在抗日救亡的宣传活动中,我被强烈的爱国热情所驱使,恨不得立即上前线拿枪去打日本鬼子,爱国报国之心,油然而生。这大概是我以后决心加入中国共产党,走上职业革命者道路的一个契机。在宣传活动中,从街头群众对我的演讲报以热烈掌声的感应中,我发现自己颇有演讲口才,我能以不同听众对象的身份、心理和情绪变化等方面,调整、增减我的演讲内容。我能说当地的方言土语,群众听得明白,听得亲切,听得入心。回想我的演讲本领,还是小时从祖父的茶馆里学来的。那时在祖父开的茶馆里,每晚都有说评书的,说的是《七侠五义》、《三国演义》、《水浒传》等等。那时,我总是拿着一个小板凳,坐在祖父的椅子旁边,听得入迷。

界牌镇三六九逢场赶集,也总有卖唱的,打金板、唱莲花落,还有武术表演、耍猴的,我都爱挤到跟前去看。在同小朋友玩耍时,我常学着唱一段,受到称赞,我也就越爱学,走起路来也边唱边走。

从小喜欢民间说唱,使我以后对从事通俗化大众化的宣传工作,产生了偏爱。从1937年以后,我热心从事和潜心研究大众化报纸工作达十年之久,其根源可以追溯到我的童年时代。

回到自流井,由二舅供给我学费和食宿费,我到外婆家的次数也多了,对二舅那个盐场的盐工们的苦难,我简单地归结为帝国主义侵略,那时我还不懂得封建官僚统治的祸害。

我对封建专制危害的认识,主要是从反对家庭专制开始的。

为了争取二伯父答应供我上学,我和二姐德辉一起酝酿过一场“家庭革命”。

这年(1932年—1933年)大伯母到自流井曙光中学教书,二姐也在紧靠自流井的贡井一个大盐商家作家庭教师。

星期天,二姐回到大伯母的学校,也把我叫去,她们带我逛公园、看电影、吃豆花饭加卤猪头肉。老实说,就是今天,家乡的豆花饭也是价廉味美的快餐。几十年来,我每次回到四川,总要去吃一顿民间的豆花饭。

当时,能在星期天逛公园、看电影、吃豆花饭,算是比较富裕的生活了。想起前两年,二伯父到自流井单独把七弟叫出去看电影、下饭馆,自己却在学校里生闷气、伤心落泪的滋味,更加珍惜大伯母和二姐对我的疼爱。这使我更深切地体验到了天伦之乐,也更深切地感受到封建家庭的不平等。

使我永远不能忘记的是那年春天,我到二姐教书的庄园里,议论我初中毕业后上成都继续读高中的事。

二姐教书的那户人家,是一个有点现代文化知识的大盐商。他家是一个幽静的富豪庄园,房子是当地十分罕见的砖瓦洋房,园里绿树参天,浓荫蔽日,花圃里繁花似锦,万紫千红。屋内陈设雅致,中西合璧,十分豪华气派,是我有生以来从未见过的。

我没见过男主人,他家太太、姨太太、丫环奴婢很多。二姐专门教管他家一个七岁的女孩和一个五岁的男孩。

那时,二姐刚从成都女子实业高中毕业回来,她最关心我初中毕业后的前途。在几次的亲密谈话中,她尖锐地提出我们家庭的严重问题。比如,祖父去世后,为什么二伯父一人霸占全家的财产?在祖父的财产中,大伯父的抚恤金是很重要的一部分,为什么

由二伯父一人继承？为什么要把祖母和我母亲迁出界牌？为什么不负担供我上初中的学费？我初中毕业后，为什么不供我上高中、上大学？怎样才能使二伯父答应出钱供我到成都升学？等等。

这些都是关系到我家庭里的大是大非问题，关系到我的前途和命运的大问题。这年，她 20 岁，我 15 岁。我们心里都承受着沉重的压力，我们多次反复议论着，讨论着，时而消沉悲观，唉声叹气；时而信心百倍，勇气十足；时而顾虑重重，忧心忡忡。二姐的勇敢、坚定、敢做敢当的豪气鼓舞着我，最后我们商定，在我快毕业的时候，向二伯父提出这些问题，争取得到他正式的承担供养我上成都升学的费用。

当时，我们向大伯母谈过自己的想法，她表示赞成，但她不同意我们提出霸占财产和抚恤金等问题。

每年寒暑假，大伯母一家都要回到界牌，住在祖父留下来的老屋里。每次大伯母回界牌，二伯母都要督促二伯父把全家人请到他家吃一顿饭，团聚一次，这是我们发动“家庭革命”的最好时机。

事先，我也向母亲透了口风，母亲主张用“请求”的办法，还一再关照我：“说话要讲礼貌，不能没大没小。”还说：“得罪了二伯，将来我在寨子上的日子更不好过了。”

这事，二姐事先也向二伯母通了气，希望她劝二伯父送我上成都升学，如果他不同意，我们就提出来评评理。二伯母也同意，她说：“这两年二伯父因为没有供你上学，心里也感到内疚。不过，他现在又讨了小妾，对我的话也越来越不答理了。”

二伯父的饭厅不大，平时摆一张方桌，人多的时候就换一张大圆桌。到吃中饭的时候，大家站着等候入座，二伯父也从小客厅来到饭厅。就在这时，二姐对二伯父说：“二叔，刚才我们正议论，三

弟初中毕业了,请二叔送三弟上成都升学。”没等二伯父答话,大伯母就说:“我们家几个男孩子,就是德恕读书用功,成绩最好,我们家是书香人家,二叔送德恕上成都,我家出一个大学生,也为我们家争光呀!”二伯父笑笑说:“不是我不愿供德恕读书,你们都不知道我的苦衷,要支撑这个家的门面,一大家人要花多少钱呀!你二婶早就给我说过德恕上成都的事,我们已经商量好了,家用再紧,也要供德恕上学。”接着,我母亲就说了一番感恩戴德的话,而我始终站在一旁,涨红着脸,一句话也说不出。

问题就这样顺利地解决了。原来打算提出的那些大问题都没有说,气氛也很温和,大家都很高兴,只是我心里还是闷气。以后,我对二姐说:“好像供我上学不是他的责任,而是对我的施恩和赏赐!”

一场预谋的“家庭革命”,就这样不战而胜了。

六、摆脱依赖“施舍”的痛苦

到成都去读书,是我人生道路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

威远离成都有四五百里,比到雅安还近二三百里。成都是四川的省会,来往的人很多,可以说那时的四川,条条大路通成都。一路上都是相当平坦的石板大道,比去雅安的路好走多了。

二姐德辉亲自送我去成都。她坐滑竿,我走路。古人说:“儿行千里母担忧。”行前,母亲为我打了好几双麻耳子草鞋,祝愿儿子一路平安到达成都。看到母亲那一双勤劳的粗糙的手,我心中暗想:我一定要用功读书,将来能找个好职业,挣钱奉养母亲。如今,这柔软合脚的草鞋,使我步履如飞,奔向理想的目标,心中充满了无限喜悦,和二姐有说有笑地赶路。走了两天,二姐见我脚上打起了水泡,要我坐一阵滑竿,歇歇脚。我不坐,坚持下来,一共走了九天。越走,脚下越来越来劲。

这一路,我心情越来越感到沉重的是遍布在四川大小城镇的鸦片烟馆。沿大路五里一小站,十里一大站,每站都有一个小店,店铺的门面房间摆放着两三张桌子,卖茶水,进到后面是一排铺板,卖鸦片烟。一盏小油灯,一杆长烟枪,人们躺在铺板上

喷云吐雾。这些抽鸦片上了瘾的人，都是以卖劳动力为生的苦力。他们面黄肌瘦，瘦骨嶙峋，人们都叫他们“乾肌子”。抬滑竿的就是这类“乾肌子”。他们抬二三十里路就犯了烟瘾，全身没劲了，于是，歇下来抽上两口鸦片烟。坐滑竿的人也只得坐二三十里就另换一班。那时，坐滑竿有钱人不多，抬滑竿的穷人却多，一到站都来争着抢着，为了挣几个钱去抽鸦片烟，互相压价兜抬，令人可气又十分可怜。这真是1840年以来那场鸦片战争遗留下来的历史活教材。

到了成都，我住在大姐德如家里，几年前她嫁到一个地主兼小官僚家。丈夫是国民政府铨叙部（主管政府公务人员考核升迁）的下级职员，家住在一座小花园洋房里。大姐结婚以后一连生了两个女儿，婆家就把“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罪名强加在大姐身上。大姐对丈夫贤惠，对公婆孝顺，对这种封建家庭的无理指责，采取了忍气吞声的态度。二姐劝她对不生儿子的指责进行申辩和抵制，可是大姐性格怯懦，缺乏勇气，只能逆来顺受。

我在大姐家住了几天，看见大姐的境遇，心里很不愉快，就更无心去欣赏成都的风光名胜，忙着准备考试。我顺利地考上了华西中学，就搬到学校的宿舍里去了。

华西高级中学和培德初级中学关系很密切，都是基督教浸礼会办的学校。在同乡当中，有几位都是从培德初中毕业上华西高中，然后由华西大学毕业后去华西中学教书的。

从1932年下半年到1933年上半年，我在华西中学读了一年。在功课方面，我还是专攻数学，真是“两耳不闻天下事，一心只读数理化”。当时教会学校除了上课和考试以外，好像很少管学生，学习可以自主，思想比较自由，学生的课外活动较多。

当时,学校从西方学来一些好的教学管理方法,学生可以自己组织学生会,学生会常常举办演讲会和辩论会,连国民党蒋介石的“先安内后攘外的政策对不对”,都可以自由辩论,十分激烈。那时,我最关心的是自己的前途和出路。但我对这种自由的治学精神很喜欢,我也去旁听过几次讲演和辩论会,听听而已,只是个旁观者,并没有参加进去。

这时,我思想上为之苦恼,为之反复考虑和进行思想斗争的有两个问题。

一个是“入教不入教”。几位比较亲近的同学劝我加入基督教,这样,就有可能得到学校公费补助,而且还可以公费进入华西大学,毕业后留洋当博士,回来后当教授。这是一条迷人的道路,好多同学对此是十分向往和十分热心的,而我却矛盾重重,下不了决心。

浸礼会是英国的教会,要留学就是去英国,而我对英帝国十分反感。在读孙中山的书和上初中历史课时,我对英帝国用鸦片毒害中国人民的事十分痛恨。三年前去雅安时,沿途也曾看到群众吸食鸦片的现象,但那时我年纪小,还不懂忧国忧民的大事。这次在上成都的路上,才从思想上受到了一次相当深刻的鸦片战争的生动教育。林则徐在禁烟奏折中的警世名言:“若犹泄泄视之,是使数十年后中原几无可以御敌之兵,且无可以充饷之银。”这句话,深深铭刻在我心里。我想,四川是内地省份,交通十分闭塞,尚且烟馆林立,烟民成群,想想全国将有多少受烟毒侵害的“乾肌子”!多么令人痛心。尽管当时已经发生“九一八”、“一·二八”的日本武装侵略,是抗日救国高潮的时候,但我对日本侵略者还缺乏切身的体会,当时,在我年轻的天真的心灵里,对英帝国主义的憎恨还是

超过了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憎恨。所以,加入英国教会,得英国助学金,到英国去留学的事,我的思想还不能接受。

另一个日夜缠绕在我脑海中的重要问题,仍然是我对二伯父的不满,不愿意靠他的接济来读书,心里总觉得是一种屈辱。这是我的老心病。

我曾经读过一年的公费师范学校,心里总是盘算着不如去读师范,一切都是公费,免得再为读书的事去乞求二伯父,看他的脸色。我注意打问成都的师范学校,几位朋友向我介绍四川省立第一高级师范学校的情况,学费和伙食费都是公费,而且还有些声望很高的老师。学校的教学质量好,毕业后学校还可以保送到中学去当教员,这些条件对我颇有吸引力。所以在华西中学读到第二学期的时候,我就产生了投考省立师范的意愿。但省师不收转学生,要读省师就得抛弃华西高中一年级的学业,重新报考省师的一年级。我一时拿不定主意,同几位最亲近的朋友反复商量,他们不同意我报考省师。

这时,我结交了四位感情真挚的大朋友。他们都是在培德初中或者华西高中的高班同学,他们很赞赏我勤奋苦学,成绩优异,主动同我亲近。他们对我学业上的帮助使我一生难忘。一位是杨升奎(后改名杨烈,上海复旦大学教授),我刚进培德初中的高小一年级时,他已是初中毕业班的学生了;我进入华西高中时,他已经从华西高中毕业,考入四川师范大学。一位是张先福,他与杨升奎同班,他在华西高中毕业以后,又回到培德初中教数学,成为我最钦佩的教员。我考进华西高中后,他又考进了成都四川大学。一位是廖树桃,他的家也住在四合堡,是我家的邻居,他也是从培德到华西高中毕业后升入华西大学。一位是杨仲清,他是杨升奎在

华西中学的同班同学，毕业后一起考进师范大学。

杨升奎鼓励我升学上进，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张先福引导我热爱数学，刻苦钻研学业；杨仲清像亲兄长一样关心我，教我为人处事，谦和礼让；廖树桃劝我入教留洋当博士最热心。他们四人都倾向于要我留在华西高中。

这时，叔祖父（胡素民）在国民党四川省党部工作，住在成都，又娶了一位二房的叔祖母，有了一个新家，我常去看他，征求他的意见。这时，二姐在丹棱县教书，我也写信征求她的意见。他们两人都赞成我自力更生、独立自主的精神，最后我决定报考省师。

我不走出国当博士、回国当教授的路，而选择上师范，毕业后当教员，靠薪水养活母亲，走独立生活的道路，说明我当时的理想并不远大，更倾向于务实。

七、二十块钱买了一个“胡绩伟”

1933年下半年到1935年上半年,我在省师只读了两年。实际上只读了一年,因为后一年基本上是在病床上度过的。在这生病的一年,我自学了省师二年级的全部课程和三年级的数学课,并提前一年考入了华西大学数学系。同时,在省师的两年,我开始阅读一些进步书刊,认识了中共地下党员车耀先。政治,开始进入我的生活领域。

同班同学周海文和涂万鹏,与我志趣相投,一见如故,我们成了十分要好的朋友,一起热心学习进步书刊,一起讨论发生在我们身边的各种事物现象,一起关心时局的发展变化,同学们戏称我们为“三学士”。

这时,我们同张显仪、彭为果等一些同学,团结了越来越多的同学,相互交换阅读生活书店出版的刊物和书籍。我们都比较穷,大家商量好,分工买。你买这本,我买那本,交换借阅,形成了一个自发的没有名字的读书会。我们在学习课业上也很努力,考试成绩优秀,在同学和老师中得到好评。

我进入二年级不久,我自幼就有的痔疮突然恶性发作,住进了

基督教会办的同济医院。

令人奇怪的是,医生说我的痔疮是遗传性的,是十分罕见的。记得母亲说过,在我呱呱落地、第一次为我洗澡时,就发现我肛门旁边有一颗红痣。开初还以为是什么吉祥之兆,不到一岁,那颗红痣就出现红肿、化脓、疼痛。脓水流出后,五六天就结痂,痂脱后又为好肉。就是这样,几个月发作一次。那时,都是靠民间的土办法来治,红肿时就摘一片“马兰子”的叶子贴上,一天换几次,能消炎止痛,促使它早些流脓、消肿、结痂。老百姓说这是“养身病”。十几年都是这样,坐板凳、走路困难一些。

这次恶性发作,内痔外痔串联起来,成为痔漏,天天流脓血,疼得钻心,难于忍受,进医院不几天就动了手术,伤口还没有愈合,又红肿化脓。第二次手术把肛门挖了一个大洞,按当时的医疗技术水平,用烧红的烙铁来烙,说这样才能消毒除根。这一来,伤口拖了三个月才愈合,而且在愈合后留下一个大硬疤,使得我几十年来右屁股不能坐,一坐就压着那块硬疤,引起疼痛。十几年后,在1947年的延安保卫战中,因长期骑马,转战陕北,这块硬疤又出现红肿,痔疮又大发作了一次。这一顽症一直纠缠了我整整一生,大大影响了我的健康。

那时,没有什么公费医疗和医疗保险等等。因为我是品学皆优的学生,几位老师对我十分关心,学校给我一些经济补助,使我得以在教会医院里进行治疗。

我考入公费的省师以后,不愁学费伙食费,心情特别舒畅。当时,我给二伯父写去过一封信,说我以后的学费伙食费再不必依靠他的供给,只求他继续供养我的母亲。这次住医院,经济发生了困难,同学们劝我还是给二伯父去信,他理应负担我的医药费,我虽

然心里不愿意去求二伯父,可是又没有其他办法。几经同学们的劝说,我终于硬着头皮给二伯父写了一封信,说明我的病况,希望他能给一些补助。二伯父收信以后,只给我寄来五元钱,使我更加感到二伯父的无情无义,增添了我对他的憎恨。当时大姐德如、二姐德辉都在外地工作,一个月的工资也不过三四十元,她们也寄钱来,都是一二十的。二伯父对我的这点施舍,大大伤害了我的自尊心,我把这五元钱的汇票撕得粉碎,偷偷地哭了一场。“为富不仁”,使我又有了又一次切身的体会。相比之下,我家邻居廖树桃的妹妹,还有一位姓杨的老乡,都在这个医院里当护士,她们见我生活节俭清苦,住了这么久的医院,从不买些好东西吃,就给我炒一点猪肝送来,说动了手术后要补补血,使我十分感激。可见,人间自有温情在!并不是人人像我二伯父那样,具有一副见死不救的黑心肠。

在省师的第三学期,大部分时间住了医院。到了第四学期的后半段,我又染上了疟疾,发高烧,又病了一个多月。真是屋漏又遭连夜雨,逆水行舟又遇顶头风。我的学习毅力是十分顽强的,即使躺在病床上,我还是勤学苦读,从来没有放松过课业,自立自强的信念支持着我。在省师两年中,虽然将近一年生病,我不仅把两年的课业学得很好,而且还把第三学年的数学课程也学完了。所有练习题也统统做完,同学和老师都很惊讶,称赞我坚忍不拔、刻苦奋斗的精神。

这时,我还是很喜爱数学。恰巧,教我们班的数学老师也令我十分崇拜。他教数学十几年,富有教学经验,对课本可以说是倒背如流。他上课时不拿课本,讲得头头是道。他还经常用日常生活中的实际事例来讲数学,讲得生动活泼,引人入胜。他一面讲,一

面在黑板上写。奇怪的是他擦黑板不用放在一旁的黑板刷,而是用自己的衣袖,右手拿着粉笔写,左手抓着袖子擦,边写边擦,一堂课讲完,他已经变成像是从面粉缸里钻出来的面人了。他的学识,他的怪癖,经常是同学们的议论话题。俗话说,师高弟子强,我对数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与这位老师有很大关系。

在我第四学期快要结束时,我的邻居廖树桃当时在华西大学教务处工作,他是我在培德中学时的高班同学,从培德中学考入华西大学,毕业后留校工作。他知道我的成绩特别好,两年就学完了三年的课程,他劝我不必再读省师的第三学年,买一张高中文凭,可以直接考入华西大学数学系。我说我没有钱,上不起大学。他说有办法,一个办法是加入教会,领取助学金,我当然不同意。另一个办法,就是考入大学以后,他介绍我到华大的附属中学——高琦中学去教数学课,每周只要教四小时课,得到两块钱的薪金,就可以维持我读大学的费用。当时学校的伙食费一周只要七角钱。我很赞成这种勤工俭学的办法,几位朋友都鼓励我直接升入大学。

到哪里去买文凭呢?当时,买卖文凭比较常见,只要花上十几二十块钱,就可以买到一张高中毕业文凭。考上大学还得交一年的学费十八元,哪里去找这笔钱呢?几位好朋友帮我想了一个很巧妙的穷办法:就是在放暑假的时候,他们回家时把自己的被子和好衣物拿到当铺去典当,等他们从家里回来时,每人总会带一些钱回来,到时再到当铺里去赎回来,这样凑够了买文凭的款子。

经过同学们的努力,终于找到买文凭的路子。那位卖文凭的同学叫“胡绩伟”。拿着这张文凭,我考入了华西大学数学系。从此,我就改了名,用二十元钱买了一个“胡绩伟”。从1935年下半

年到如今,胡绩伟这个名字伴随了我的四分之三的人生。胡德恕这个名字,除了填写在干部登记表上外,很少有人知道它了。

新中国成立后,我曾在同学故旧中打问过这位卖文凭的“胡绩伟”,但他不知去向。

八、别了！我喜爱的数学

华西大学是英国、美国、加拿大的几个基督教会在中国联合创办的教会大学，校址在成都的南关外，校舍全部是西式建筑，环境幽雅安静。无论从学校环境、科研设备、教学质量来说，当时都是国内一流的。宿舍也很宽敞明亮，两个人一间房。伙食七角钱一周，两荤两素，吃得很好。我快20岁了，还从来没有过过这样舒适的生活。

华西大学数学系的课本很多是英文的，教师上课也说英语，我的英语水平差，好在英文的数学课本还比较好懂，但我仍然要用很多时间来学英文。数学系除了专攻数学外，还得学习与数学有密切关系的物理、化学等课程。这里的物理、化学的实验室，对我来说，也是很新奇的，向我展示出应用数学的广阔天地。学习生活是特别紧张而忙碌的，我充分感受到古人所说的“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的乐趣。

我一面学大学数学系的课程，一面在华西大学附属中学——高琦中学教数学课，一周四小时，分两次去。我的数学学得比较好，教起来驾轻就熟，不觉得有什么难处，学生反应也不错。教完

两小时,在教员休息室喝茶时,校方就送来一个小红包,里面包着一块银元。我一个月挣八块大洋,伙食费还不到四元。我第一次挣钱养活自己和供给自己上大学,第一次感受到作为一个自立自主的人的快乐。读完第一学期,在寒假时,我托人给母亲带回八元钱,并在信中说,等我大学毕业以后,一定克尽人子之道,承担起奉养她老人家的责任,使她摆脱寄人篱下的处境。

就是在这种独立自主意识的推动下,我发愤求学,几乎没休息过一个星期天。星期天一吃过早饭,我就到皇城去找杨升奎、张先福补习英文和数学。杨升奎和杨仲清读的是师范大学,已经合并为四川大学,他们住在皇城里。升奎是我们这个小集体的核心。星期天,仲清、先福都到他那里。先福辅导我学解析几何和微积分,升奎先教我英文,以后又教我学法文。中午,我们每人一个“锅盔”(烧饼),咬一点咸菜,吃得很香,星期天过得又紧张又愉快。仲清最年长,他像慈父一样关怀我,见我鞋破了,就悄悄买一双新鞋送给我。有几次,我们也相约到华西坝(华西大学所在地)后面的树阴处去学习,仲清还给大家买一点卤牛肉和花生米,我们之间相处得比亲兄弟还亲。

星期日下午,我常常回到省师去找周海文、涂万鹏等同学。我们在这里互相交换新出版的书刊,谈抗日,也谈共产党。我们很反对国民党“先安内后攘外”的倒行逆施。

这时,国民党的势力已经深入四川。他们在大学里设军事教官,搞军事训练,抓思想政治工作。对此,同学们很反感,酝酿进行抵制。每天早晨正式上课前,军事教官主持升旗仪式,教官对站得不直,或者对不抬头目送国旗升起的同学,又叫又骂,使同学们更加厌恶。有一次升旗时,他动手打了一个同学一拳,大家都起哄,

嘘他，吼他。散场时，他说同学在升旗时东歪西扭、东张西望，是破坏升旗的严肃性，责备我们不尊重国旗，就是不尊重党，不尊重国家。我们也义正辞严地回敬他，说他在升旗时不立正，不敬礼，东走西逛，东溜西窜，说脏话骂人，动手打人，“难道这就是尊重国旗吗？这就是尊重党国吗？”我们还讽刺他：“你们对自己人那样凶狠，为什么对日本人那样软弱？”说得教官哑口无言，瞠目结舌。最后，还是由教务长出来圆场才算了事，这一来就大大刹了国民党教官的威风。

“一二·九”运动的爆发，正是我在华西大学第一学期快结束的时候。偌大一个中国已经容不下一张埋头读书的书桌了。当时，我还以为救国的道路很多，埋头读书将来作一个好教师，教出一批好学生，也是爱国。还是想走读书救国、教育救国、实业救国的道路。

在华大第二学期开始以后，随着“一二·九”运动的发展，我的思想矛盾越来越激烈。刚刚创刊的邹韬奋先生主办的《大众生活》，每来一期就如同给我心中的怒火加了一把柴。每个星期天，我先到祠堂街几个书店去转一圈，买几本上海新出的杂志，然后赶到省师同几位同学聚会，交换刊物，热烈地交流读书心得体会，各抒己见，讨论当前的局势。这时，中国共产党的“八一宣言”已经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停止内战，团结抗日，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受到青年学生的拥护。

在我和朋友们的议论中，一个尖锐的问题摆在我们面前：究竟是把谋求个人的出路放在第一位，还是把谋求国家民族的出路放在第一位？究竟是钻研数学，将来当一个好教师，当一个有名的学者，还是投身政治，作一个救国救民也救自己的政治活动分子？脑

子里的思想天平,慢慢地向后一种主张倾斜。我对七八年来热爱数学、钻研数学的痴情,开始产生了怀疑和动摇。

这时,我到皇城去的次数减少了,到盐道街(省师)次数增加。晚上到图书馆广泛涉猎国内外数学书刊的兴趣,很快转变为关在宿舍里阅读生活书店出版的进步书刊的喜好。

我们省师“三学士”终于下决心全力投入抗日救国的政治运动。到华大第二学期,就是1936年4月中旬,我决定由华西大学的数学系转到四川大学的政治经济系。周海文和涂万鹏也决定同我一道报考四川大学的政治经济系。

放弃华西大学的学业,理所当然的也得放弃高琦中学的教学,随之而来的问题就是读四川大学,哪里来钱?周海文说,他已经去车耀先先生家里做家庭教师,他可以介绍我也去找一个家庭教师的职务,或者到哪个补习学校去上课。当时,知识分子的劳动价值比后来高多了。当时,一个小学教员一个月可以得到二三十元月薪,养活一家老小,不成问题。一位大学教授,一个月一般是300大洋,住单门独户的小院子,雇一个保姆洗衣做饭,再雇一个洋车夫专门拉车送自己上下班,过的是上等社会的富裕生活。

放弃数学系,不能直接转学政治经济系,必须抛弃我在华大一年的学业,到川大重新考试入学,又从一年级开始。热心鼓励、支持和帮助我读华西大学的几位挚友虽然赞成我志趣的转变,但对我放弃攻读数学感到十分惋惜。

这时,二姐恰好从“一二·九”的策源地北平回到成都,她赞成我的决心。在四川大学新生发榜那天,她陪我到皇城坝去看榜,看见我们“三学士”都是“金榜题名”,真像是高中状元一样,大家欢喜万分。

放弃我从小就热爱的数学课，放弃对代数、几何、三角的探奇，虽然从感情上还恋恋不舍，但从理智上考虑问题，我终于横下一条心，毅然决然地踏上革命的征途。

从界牌场到福音堂小学到自流井培德中学，到成都的华西中学再到华西大学，前后几乎一两年就变换一次学校，变来变去，并没有改变读的是基督教会学校，也没有改变喜爱数学的兴趣。奇怪的是，几经动摇，我终于没有入教，没有领取教会津贴，走出国当洋博士的道路；更奇怪的是，我终于没有坚持钻研数学，走当教师养家糊口的道路。这是我人生道路上的逆反现象，使我母亲和一些亲友惊奇不解，母亲责骂我：“疯啦！”

很多年以后，在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有的朋友和我开玩笑地说：“你当年如果走出国留洋，当数学博士的路，也不会落得一个‘死不悔改的走资派’的下场！”我也风趣地对他说：如果当年当了洋博士，很可能在1957年的反右派斗争中，我早就当上了“反动学术权威”式的“右派”了！

九、经常“逃学”的大学生

四川大学设在当年蜀王官府里，四周有高大的院墙，人们将这个地方叫皇城，包括城外的市场，统称皇城坝。这里的环境幽雅安静，是一个兴办教育、培养人才、攻读诗文、研究学问的好地方。“文化大革命”时，“无产阶级革命派”们为“彻底打倒封、资、修”，把整个皇城都作为“封建老巢”给彻底平毁了。他们仿效北京天安门的模式，搞了一个可以容纳 10 万人的广场和检阅台。今日看来，这真是一个毁灭历史文化、毁灭老祖宗的愚蠢行为。

我和周海文、涂万鹏三人一同考进四川大学的政治经济系，住在一间宿舍里，“三学士”的绰号又传到了四川大学。我们的友情又深了一层，从一般的用功读书、正派做人发展到忧国忧民、关心时局的政治态度一致，使我们的友谊发生了质的变化，成为志同道合的同志关系。后来我们三人都加入了共产党。1943 年涂万鹏在担任地下党川东区党委书记时被国民党逮捕，关押在渣滓洞里，他忍受不了严刑拷打，当了叛徒，最后仍然死在渣滓洞里。周海文（现名周韧）已从云南省委统战部部长的岗位上退下来，彼此常常打个电话，我们的友谊保持了 60 多年，这在人生中是很难得的了。

当时,我们在川大学的是亚当斯密的经济学和亚里斯多德的政治学。显然,这些洋学者的洋理论同我们抗日救国的政治主张相距甚远。可是,我还是硬着头皮去“啃”了一阵子,希望能从中探索到一点对国家、对民族、对抗日救国有用的东西。遗憾的是,这种白天关在课堂里听讲,晚上关在图书馆里攻读的学院式的学习生活,只过了一两个月,就从我的生活日程表上逐渐被冷落、被淡漠了!成都政治形势的发展是催人奋进的,人在学校,心早已飞到皇城外去了。我很快就成了“逃学”的学生。上课时,把书本翻开,把墨盒打开,把笔放在墨盒上,伪装出人在课堂上的样子,十来分钟以后,同旁边的同学打个招呼,老师如果问,就说上厕所去了,并请他下课时把书和文具收在书桌里。于是,人就悄悄地溜之乎也。

当时,成都的政局随着全国政局的变化,出现了新的形势。1935年5月,红军北上进入四川,国民党中央军借口追剿红军也进入四川,蒋介石派他的“别动队”和“参谋团”(以后改为“委员长行辕”)深入四川,还举办“峨山军官训练团”,图谋从军事上政治上和思想上削弱以致吞并四川地方势力。

以四川省政府主席刘湘为代表的四川地方势力,一方面惧怕共产党和红军的军事威力和政治影响;一方面惧怕国民党势力的“政治中央化”和“川军国军化”的渗透和逼迫,特别是在红军很快(9月)离开四川继续北上以后,四川地方势力同趁机而入的国民党中央军的矛盾加重了。他们之间形成了既是相互勾结反对共产党,而又相互摩擦、争夺地盘的复杂关系。

急于摆脱蒋介石控制的刘湘,在1935年底就把四川省政府由重庆搬到成都,进一步联合四川西北的地方势力,以巩固自己的地盘。同时,刘湘还派出代表与西北的冯玉祥和广西的李宗仁联络,

共谋反抗蒋介石中央对各地方势力的鲸吞。

这时,共产党的政策,对国民党是“停止内战、团结抗日”;对地方势力是“团结抗蒋,促蒋抗日”。这样,在成都就形成了一种较为宽松的政治环境,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可以宣传,也可以联合地方势力对国民党“攘外必先安内”政策进行抵制。

这种宽松的政治空气,孕育了成都民族解放先锋队的诞生。

开学不久,我们先结识了从北平来的同班同学万骥和张希钦。经过他们的介绍,认识了同他们一起来的理学院的韩天石和王广义,他俩都是中共地下党员。韩天石是北京大学物理系二年级学生,“一二·九”运动的骨干,“平津学生南下扩大宣传团”第一团的团长,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18位筹备委员之一,因为参加反对国民党迫害爱国学生的示威游行,被学校开除。王广义是山东大学物理系学生,也因积极参与“一二·九”运动,被山东省政府“押解”出境,回到北平后担任北大附近沙滩街道的地下党支部书记。1936年暑假,四川大学在北平招考插班生,韩天石和王广义都考上了。离开北平时,北平市委把他们俩人找在一起,指示他们到成都以后在青年中开展抗日救亡活动,成立成都民先队。一道去四川大学的还有万骥、张希钦等十多人,他们到川大以后就注意结交思想进步的同学。

一个星期天,我们约请韩天石、王广义等几位北平来的同学到我们宿舍聚会,大家谈得十分热烈。他们向我们介绍了全国救亡运动的形势、共产党的政策和北平民先队的情况,讨论最热烈的是如何组织成都民先队的问题。

我们详细研究了民先队的《宣言》、《工作纲要》和《斗争纲领》,拟定了成都民先队的纲要,分析了成都当前的形势、任务和斗争策

略。

大家热情很高,又联络了省师、协进中学、建国中学里的一些相好的同学,由16人发起,在10月上旬正式建立了成都民先队(全名是“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成都部队”),选出韩天石、王广义、周海文、涂万鹏和我五人组成队委会,韩是队长,周和王分工管组织工作,涂万鹏和我负责宣传工作。

当时的四川大学,为什么能成为成都民族解放先锋队的创建地呢?为什么它能成为掀起成都抗日救亡运动的一个策源地呢?因为受到北京大学所发起的“一二·九”运动的震荡,又因为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的领导成员韩天石同志和一批“一二·九”的战士转学来到了四川大学。

这只是近因。更深远的原因是四川大学在五四运动时,就受到蔡元培先生在北京大学进行教育改革的深远影响。

北京大学是我国新文化运动和革命学生运动的发祥地,具有悠久的历史。1917年,蔡元培先生任校长,他是我国早期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和学者。他尊崇民主自由、平等、博爱。在他的思想中,具有鲜明的民主主义、自由主义、人道主义和空想社会主义的观点。在他主持北京大学时,就积极引进西方资产阶级先进的教育制度,提倡学术自由、思想自由,主张宽容和兼容并蓄,形成了风行全国和流芳后世的“科学、民主、宽容”的北大学风,人们称之为“北大精神”。

科学、民主、宽容的北大精神,对四川大学的教学改革产生了深远影响。

1922年,同孙中山先生一起闹革命的吴玉章,当了四川大学前身国立成都师范大学的校长。吴老在辛亥革命前,成功地领导

了四川荣县起义,早于武昌起义两个月。五四运动前,吴玉章在巴黎留学时,就同蔡元培一起成立过中华教育学会。他在主持川大时,积极提倡和推行蔡元培树造的北大精神,强调当时川大的任务就是推进新思潮和培养革命人才。他大胆聘用为反动政府所迫害的共产主义先驱于右木、恽代英等人为川大教员,允许他们在课堂上讲授共产主义理论。

1936年,杰出的人民教育家张澜出任四川大学(当时叫成都大学)的校长,公开宣布借鉴蔡元培办北大的经验,延聘学者名流,兼容并包,主张学术民主的思想自由,鼓励师生积极参加社会变革,追求真理,在川大形成了民主办校的学风。

1936年秋,我考入四川大学时,校长是任鸿隽,他曾任孙中山总统府的秘书(就是今天的顾问),是国内外有名的化学家和教育家。在他留学美国时,曾组织我国最早的科学学术团体——中华科学社,并任社长;李四光、杨杏佛、竺可桢等人都是社员。他又是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的董事长,曾经对四川大学作过很大的贡献。1932年,国民政府任命他为中央大学校长,他坚辞不就;而1935年,任命他作四川大学校长时,他却欣然赴任。

任鸿隽的观点同蔡元培一致,他的夙愿和办学理想是:“要建设西南的文化中心,要在黄河、扬子江两水的上游广大地方,建设一个能成为文化策源地的综合大学。”他力主输入世界先进知识,“要拿知识开通来补偿四川的地形闭塞”。他特别强调“在当今国难严重的情况下,要担负起民族复兴的责任”。

这是任鸿隽在就职演说时的宣言。我之所以放弃已在华西大学数学系学了一年的学业,特来报考四川大学,任校长的盛名和他的抱负吸引着我。

当时,国民党反动派已经加强对四川大学的控制。学校内建立了国民党和三青团组织,还暗中成立了复兴社和CC等特务组织,并派了军训教官对学生实行法西斯式的军事管制,这些都受到学校当局和广大师生的抵制。

国民政府教育部长和蒋介石侍从室主任等人向任鸿隽推荐的教员,他一口拒绝,却延聘了著名学者张颐、刘大杰、魏时珍、蒙文通等教授。我们政治经济系,在课堂上讲的是亚当斯密的经济学和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但进步教师彭迪先、黄宪章等人也可以讲马克思的经济学说和唯物史观的哲学。当时专家学者汇集川大,学校办得生气勃勃。

当时的四川大学继承“科学、民主、宽容”的北大精神,成为成都民先队诞生、成长的摇篮,成为掀起成都抗日救亡运动的一个策源地。

这时,我们同老地下党员车耀先先生的联系,一天比一天密切起来。我们把韩、王等人介绍给车先生,他对成立民先队的事积极支持,他的会客室成为我们这些民先队领导人和一些主张抗日救国人士经常议论国事、分析时局的地方。

当我闭目凝神,回眸走过60年的革命生涯时,车耀先先生的音容笑貌,依然那样清晰鲜明。车耀先是引我踏上革命征途的带路人,是扶助我这个进入新闻战线的新兵的指导员。

1935年秋天,我提前一年考入了华西大学数学系读一年级,仍在省师读三年级的周海文和涂万鹏告诉我,班上来了一位不同寻常的语文老师,他走路一瘸一拐,拄着手杖,据说是战争中受过伤的团长,他教汉语注音字母课,说这是减少和消灭中国文盲的一条捷径。周、涂二人还告诉我,这位车先生在课堂上和休息时间,

喜欢和同学们谈论时局,对国民党政府的“先安内后攘外”的卖国政策多有抨击。我通过周、涂的介绍,认识了车耀先。

车先生在成都闹市区祠堂街开设了一家餐馆,名字叫“努力餐”,生意红火,宾客盈门,车先生应接不暇,十分忙碌,而我们却是一些常到他家会客室里去清谈的穷学生,车先生对我们毫无厌烦和怠慢之意。他广闻博识,谈锋犀利,使我们听得津津有味。他对中国苏区红军的介绍,令我们神往。他还向我们介绍上海生活书店出版的书刊,引导我们阅读进步著作。

民先队成立后,我们除了出版一份《M. S》(民先的油印刊物)以外,还打算出版一份公开发行的刊物。这事曾向车先生谈过,他表示“谈何容易!”而我们这些年轻人却不管三七二十一,莽里莽撞地用我们三人的名义写了一份出版申请书交上去,也未等批准,就出版了《活路》旬刊。当我们把《活路》创刊号拿给车先生一看,他大为吃惊。他一方面称赞我们初生牛犊不怕虎,说干就干,把《活路》旬刊编出来,印出来,精神可嘉;一方面笑我们不懂得出版法令就贸然出版了刊物,真有点不知天高地厚!他哈哈大笑说:“你们三个书生,没尝过办刊物的苦头!看来,你们的《活路》是活不长的。”车先生又告诉我们,办刊物要有社会地位、有产业或者有铺保的人,才有资格申请创办,还要等政府批准以后才能注册登记,正式出版。最主要的是要经过政治上的审查,比婆婆审媳妇还要难得多。他幽默地比喻说:“你们想,一个思想反动的婆婆,要同意娶一个思想进步的媳妇,容易吗?”

《活路》旬刊,是民先队员自己凑钱、自己写稿、自己编辑、自己发行的宝贝,但是它没有登记证,没有社址,没有固定的经费。车先生认为这样不是活路,必须作长远的打算。果然《活路》第2期,

有些书店就不敢卖了,说人家一看就知道是共产党的刊物。在我们编辑第3期时,当局已经下达了查封令。从这三期的内容来看,的确使国民党反动派头痛。在这3期里,不仅刊登了我们自己写的文章,还转载了冯玉祥将军的《我们如何才能自主》和《全欧华侨抗日救国会代电》等重要稿件。在编辑终刊号(第3期)时,车耀先先生从一个邮检所那里弄来一篇《东北义勇军宣言》,这个《宣言》登出之后,引起读者争先抢购。国民党特务就找一批流氓来打报童,撕刊物。

《活路》被查封后,怎么办?我们三人愤愤不平,一筹莫展。这时,车先生对我们说:“我是努力餐的老板,就由我去努力吧!我们重打锣鼓另开张,再办一个刊物,一切申办手续、注册登记、纸张印刷的事,都由我负责,你们《活路》的编辑人员全班人马都到我这里来,我在楼上给你们腾出一间办公室,你们只管编辑的事就行了。”车先生的话,对我们来说,真是一场及时雨,就像久旱的心田受到清凉滋润,精神焕发,我们又可以为国为民大显身手了!

这年底,震惊中外的“双十二事变”发生了,中国局势走上了一个三岔路口。国民党严密封锁消息,车先生家和韩天石所在的川大理学院物理系试验室各有一台收音机。60年前,收音机还是一件很稀罕难得的宝贝,很多人都到努力餐来探听新闻,对于时局如何发展,国内各派政治力量何去何从,很多人都想来听听车先生的风云预测,这就更加感到办一个刊物是件众望所归、刻不容缓的大事了。车先生说,我们这个国家是一个睡狮,要大声疾呼才叫得醒,对那些头脑顽固的大官老爷们,也要大声疾呼才能引起他们的注意,我们就办一个《大声》周刊吧!凭着车先生在省政府和绥靖公署的关系,1937年1月17日,《大声》创刊号出版,在成都这个

历史悠久的文化古城，我们开始了大声疾呼。

《大声》周刊社的地址，设在努力餐馆内。车先生是社长，也是总编辑，每期内容的计划和重要稿件的约稿，都由他决策，每期社论几乎都由他亲自撰写，我们把每期稿件编好后，他都要从头到尾一一审阅。

《大声》创刊时，“双十二事变”已经过去一个月了，当时，国民党对新闻的控制很严，对于张学良、杨虎城兵谏蒋介石，中国共产党出面调解，主张释放老蒋；国民党内亲日派想趁机扩大内战，以便一箭双雕，消灭蒋介石和中共。最后，在各方面力量的周旋下，化险为夷，达成了联合抗日的协议，张学良释放老蒋，并亲送老蒋回南京；蒋介石背信弃义，囚禁张学良等重大事件，广大人民群众被蒙在鼓里，不明真相。《大声》周刊一出版，就将“双十二事变”的原原本本、前前后后，都巧妙地报道出来。在那反动乌云密布、内战阴霾笼罩祖国大地的时刻，《大声》有如一声声惊雷、一道道闪电，震动了蓉城父老，人们争相阅读，纷纷议论。

可以说，《大声》实际上是成都民先队的机关刊物。我们民先队的几位领导成员都是《大声》的编辑。韩天石他们都是政治活动分子，是忙人，我比较习惯于伏案工作。我这个人做事比较认真专一，负责编辑《活路》，就一心一意地干，要干就非干好不可，要干就非一直干下去不可，干什么，爱什么，钻研什么，这似乎是我的天性。虽然仅仅编辑了3期《活路》，但这却是我终生奋斗在新闻战线上的一个起跑点，从此，我爱上了编辑工作，同报刊结下了不解之缘，一干就是几十年，成为一个永远也放不下笔的老兵。

好在当时上大学，“逃学”干外活是相当自由的。只要在考试以前突击温习一下功课，能考一个较好的分数，就可以混下去。惟

独军训课,教官管得很严,不能缺课。这是国民党势力侵入教育界的一招棋。他们想从思想上来同共产党争夺青年,想用军事纪律来驯服知识分子。

记得一次上军事操,天正下着大雨。教官为了磨练我们,故意要我们冒雨跑步,还叫我们卧下、起立、起立又卧下,弄得同学们在泥地里滚来滚去,我们后排的几个同学嘀咕了几句,马上想出一个办法来对付教官。我们几个人卧倒在地下,腰故意扭着,腿故意弯着,教官马上气势汹汹地赶过来,要我们把腰腿伸直。我们做了几次,都做不好,教官就骂,我们也对骂,吼叫他做个样子给我们看。这样,他也不得不卧倒在烂泥浆里滚来滚去。这时,同学们都跟着起哄,后排同学让他卧倒做这样子,前排同学让他卧倒做那样子,他卧倒几次,才觉察到上了我们的当,气得嘴里嘟囔着,吼叫一声“解散”赶紧收场。

想当年,教官一说“蒋委员长”,他首先把两只皮靴一碰,“咔”的一声,挺胸凹肚,站得笔直,大家也得跟着立正。最讨厌的是在课堂上,他一说“蒋委员长”,同学们就得放下手中的书和笔,马上站起来,立正!为了治治他,我们约了几个同学,想了一些问题,到教官办公室向他求教。我们未进办公室,就喊“敬礼”,然后向他提出问题。我们故意在提问中总要说上几个“蒋委员长”,弄得他站起来后刚坐下,另一个同学提问中又说一个“蒋委员长”,他只得赶快又站起来。重复了几次之后,他意识到我们是故意去整治他,气得他把我们轰了出去。

我们就是用这样一些办法,大杀了国民党教官的那股嚣张气焰。从此以后,他对学生客气多了。

十、以笔为枪，冲上笔阵

1936年10月，成都民先队成立之初，大家积极开展救亡活动，欢欣鼓舞，热情高涨。当时，我们只看到地方势力对救亡活动比较宽容的一面，却忽视了国民党积极反共、消极抗日的一面。紧接着，连续遇到了特务的两次捣乱（当时我们把复兴社和CC分子都叫特务），才使我们的头脑清醒一些。

11月初，全国救国联合会号召援助傅作义部队在绥远东部抗击日军的侵略，民先和学联同志联络了十几个人，发起成立四川大学学生绥远抗战后援会，有近百人响应。正式成立时，有一些发起人竟临时退出，使这个后援会死在胎中。经调查，原来是特务分子从中捣鬼。再一次是11月23日，上海的全国救国会主席沈钧儒等七人被逮捕，发生了震动全国的“七君子事件”，民先队用“活路社”的名义，同海燕社、力文社等共同发起，在春熙路青年会礼堂召开“声援七君子、抗议国民党政府镇压抗日救亡运动”的集会，车耀先先生在会上慷慨陈词，谴责国民党反动派的倒行逆施。正在这时，复兴社的特务分子们动员了一帮人闯入会场，大喊大叫，把人轰散，会议只得半途而废。

这两次冲击是一帖清醒剂,使我们这些爱国热情高涨的年轻头脑,冷静下来。

当时,遭到大破坏的成都共产党组织还没有恢复,领导成都抗日救亡运动的只是个别地下党员,民先队就是在韩天石和车耀先领导下建立起来的。我们发展民先队员的标准和接纳队员的手续,都像吸收共产党员一样,比较严谨,而在发展民先队的外围组织时,却比较宽松。以后的事实证明,当时发展的民先队员,在恢复党组织时,绝大多数直接转为正式党员,而整个民先队确实如共产党组织一样,担负起成都抗日救亡运动的领导核心作用。这种又严又宽的原则,既保证了领导核心的政治质量,也保证了群众性的救亡团体的蓬勃发展,形成声势浩大的政治优势。11月18日各抗日救亡团体的代表50多人在青年会礼堂召开了联合大会,正式成立了“成都各界救亡联合会”,使抗日救亡的浪潮在蓉城大地兴起。民先队建队时,比较注意防止“惟我独革”的宗派主义作风。因为一扩大吸收队员,就发现在民先队成立的同时,还有海燕社、力文社、学联等抗日救亡组织,像海燕社还同民先队一样在宗旨上、成员标准上和组织建设上都是相当先进的。我们采取了承认他们,尊重他们,容纳成员的跨组织参加活动的方针,这就为半年后实现民先和海燕的顺利合并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当时,我虽是民先队的领导成员之一,但是我对民先队的组织发展,以及以民先为中心推动成都救亡运动所做的细致工作,以致由此而发展的上层统一战线等复杂工作,都没有做多少具体的努力,我一头扎进报刊宣传工作里面,对于我们所创办的刊物,就像一个年轻的母亲生了一个胖小子那样,又兴奋又辛苦,从早到晚为它忙得不亦乐乎。

在车耀先先生的努力下,《大声》周刊即将面市的时候,震惊世界的“双十二事变”发生了。像火上浇油一样,成都的救亡运动一下子就形成了燎原之势。当我们从收音机里听到张杨发动“兵谏”扣押蒋介石,逼蒋停止内战、团结一致对日抗战的消息后,民先队和各救国会的负责人不约而同地来到车耀先先生开设的努力餐馆内,共同商讨对事变的态度和应当采取的行动。第一个行动就是马上把这个好消息和事变的经过公之于社会。于是先用学联名义散发一个《宣言》,中心思想是赞扬张杨的爱国行动,支持张杨提出的八项主张。

大家当场拟定了《宣言》的文稿,马上去印刷。《宣言》印好后,一部分交学联成员去张贴和分发,一部分由学联组织了一批骨干,两个一组,互相掩护,于13日下午6时左右,在本市主要街道进行散发和发表演说。

这是民先队第一次通过学联的公开行动,在全市人民和大中学学生中引起了强烈反响,也震动了国民党反动派。他们的头头说:“没有估计到成都共产党还有这样大的力量!”四川大学的教官扬言追查散发张贴《宣言》的“赤色分子”。据说也没查出什么人。

“双十二事变”的和平解决,共产党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更加得到各界人民的赞赏,成都民先队抓紧这一有利时机,一方面在扩大各行各业救亡运动的基础上,促进相互团结起来,联合组成一个比较能够统一行动的联合组织;一方面扩大民先队本身的队伍,使之更适宜于成为日益广泛的救亡运动的核心力量。

“双十二事变”四个月以后,成都学生救国会等36个团体联合起来,在城北的一个古庙(叫十方堂)里聚集了几百名各界代表人物,举行了“成都各界救国联合会”的成立大会。这比原来的“各

界救亡联合会”的群众性更为广泛，声势更为浩大。以后又分别成立了“学生救国联合会”、“妇女救国联合会”、“文化界救国联合会”、“工人救国联合会”和“工商界救国联合会”等救亡组织，使成都市的抗日救亡运动由小型分散的活动逐渐发展为公开的大型活动。

1937年5月31日，成都各界救国联合会在中山公园（现在的劳动人民文化宫）召开了各界群众纪念“五卅运动”12周年纪念大会。各救国团体的代表在大会上踊跃发言，号召各界人民加紧团结，一致抗日救国。大会邀请了各方面的知名人士参加，如辛亥革命后担任四川军政府督都、人称为“五老七贤”之一的尹昌衡老先生也在会上发表了激动人心的讲演。大会以后，还举行了盛大的游行示威。为了防止国民党特务的捣乱，民先队还特地组织了纠察队和交通队，保证了大会和游行的顺利进行。

也在这时，民先队和海燕社经过几次酝酿以后，于6月初在文庙后街的桂花小学召开了正式的合并大会，改选了民先队的领导成员，除了原来的五个领导成员以外，还增加了康乃尔、蒋慕岳、饶孟文、侯方岳、彭文龙、张文澄和肖玲。

这个时期，我虽然也常到基层组织去讲解时事，也参加过几次下乡宣传，但我的主要活动还是编辑刊物。“双十二事变”后，我们就已经动手编辑《大声》第1期了，登记证一批下来，周刊在1937年1月17日正式出版发行了。

一切反动派统治人民的法宝，就是愚民政策，最主要的手段就是封锁新闻、控制舆论。“双十二事变”发生以后，国民党反动派千方百计地掩盖和歪曲事实真相。《大声》首先刊登了张杨对时局主张的通电和共产党调解西安事变的通电等重要文件，用事实告诉

读者：张杨把蒋介石抓起来，是因为蒋介石强迫张杨调转枪口进攻陕北红军，扩大内战，而不是张杨拥兵犯上，违法乱纪；而共产党的政策是劝说张杨释放蒋介石，揭穿汉奸亲日派借机扩大内战的阴谋，以利于逼蒋抗日，并不是为派系斗争而抓蒋。

这都是当时一般报刊不敢登载的新闻。《大声》除了以报道事实真相而闻名于世外，还巧妙地运用舆论武器进一步阐明是非，褒贬忠奸。例如《大声》登了一篇车耀先先生用“一兮”署名的《今日之张学良》。在这篇介绍张学良的短文中，不仅提出了张学良扣押蒋介石是无罪的，而且还透露了“九一八”时张放弃东北是蒋介石命令的内幕。这篇短文表面上是宣传要蒋介石“宽大为怀”，以抗日大局为重，实际上宣扬了张学良敢于冒杀身之祸进行兵谏的大智大勇行为。短文说，张学良“既为达到爱国目的，而甘冒天下之大不韪，又为顾全国之纲纪，而甘受政府之大审判。前者之犯法，非胆大不敢作；后者之守法，非识大不能为。此种身拥数十万众之国家大员做此惊天动地、循规蹈矩之事体之人，除了光明磊落大勇大谋的张学良，不惟我国历史上少见，即全世界各国也不多得”。到此，文章笔锋一转，巧妙地提出应该把受扣押的张学良放回西安领导抗日。短文说：“若及时使之抗战以伸其志，率领思家慕切之健儿，必如饿马之奔槽所向无敌！收复失地，易如反掌。这点，我想政府早已见到，必在最短期内纵张回陕整顿一切。不然，无功可图，无力可赎，虽特赦于张何补，虽裁罪于国何益，既负政府之裁成，又负委座之苦心，这又何必呢？”文章最后结语：“张学良之伟大人格，仅仅次于蒋委员长一人之下，在双十二之张学良，我们惟恐甚多；在今日之张学良，我们又嫌甚少！”这样的好文章，国民党新闻检查官也如芒在背，很难剔除。

读者争先购买《大声》，他们从《大声》上明白了“双十二事变”的是非黑白，而且明白了各有关方面对这一事件的立场观点，还明白了在报道这一事件中各个不同报刊的是非态度。

《大声》在创办时发行 1500 份，到第 3 期就增加到 5000 多份。要知道在当时的成都，虽有“公费办报”，确没有“公费订报”，几乎全是个人自己订报，因而一个报纸和刊物能发行上千份就不容易了。

《大声》受到广大读者欢迎，自然也就受到反动派当局的惧怕和恼怒。他们明令禁止学校学生订阅，还动员一些流氓打报童、撕刊物，给车耀先写恐吓信。车先生公开在《大声》上发表《答友人书》说：“我毅然和友人组织‘抗敌后援会’，我编辑《大声》目的在于唤起民众，强化民族意识，督促政府团结御侮，抗日救亡。我想这是中国国民应该做的事，这完全没有错！可是，这就不得了，什么‘反动刊物’呀！‘宣传共产党’呀……罪名都来了。我想，只要政府愿踏北洋军阀的覆辙，我也愿步邵飘萍的后尘！”充分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威武不屈的坚强品格和为国家民族甘愿抛头颅、洒热血的雄心壮志。

《大声》周刊出版到 13 期，终于遭到查封，罪名是“消息言论不正确”。这是我们早就预料到的，我们再接再厉，到 5 月 8 日，也就是《大声》停刊 20 天后，又以《大生》的新名字出版了。可惜《大生》周刊，刚刚出了 5 期，又被查封，罪名是“更名出版后，言论更为荒谬”。

6 月 5 日，《大生》被查封不久，7 月 7 日就发生了日军进攻芦沟桥，迫使我军奋起还击，爆发了震惊中外的“七七事变”。这时，我们根本不理睬国民党批准不批准，决定立即行动，在 7 月 9 日出

版了《图存》周刊。

按当时条件,7月9日出版的《图存》,必须在四五天以前就交稿,所以这期当然不可能有“七七事变”的材料。七七事变爆发时,我们赶写了一个图存社的宣言,加在《图存》创刊号里。这个宣言先一天就印发出去了。为了抢时间,对这个宣言稿,我们采取三个人同时写,择优选用的办法,结果,我写的被认为是比较适合的。这一偶然的成功,对我是一个很大的鼓舞,更加坚定了我从此以笔作枪,冲上笔阵的决心。

这篇宣言题目是《以血肉的抗战答复敌人的侵略》。文中说:“六年来血的教训,已经深深地使我们知道:敌人对我们的阴谋是永无止境的,对我们的侵略更是非到整个灭亡我国是不会停止的,那一弛一张,一硬一软,一文一武的变化,不过是想缓和我们的抗战情绪,分化我们的抗战势力,支配汉奸卖国贼以破坏我们的抗战阵营,利用我们内部的矛盾以达到它‘以华制华’的毒计,‘蚕食鲸吞’、‘双管齐下’、‘威胁利诱’……只会把我们推入殖民地的深渊,把我们四万万五千万炎黄子孙驱上奴隶的境地。……要生存只有马上抗战,不愿当亡国奴,只有大伙一起歼灭我们的敌人。”

这是50年前一个爱国大学生迸发出来的心声!

十一、从黑夜唱到天明

七七抗战爆发的消息,像久旱季节的一声惊雷,刚一传到成都,大街小巷一片喧腾。7月8日下午,成都最重要的街道上,出现了一支歌咏宣传队。四十多位男女青年学生,高唱救亡歌曲,吸引了来往行人的注意。人们将歌咏队员们团团围住,听他们慷慨激昂的演讲,听他们热情奔放的歌声,报以热烈的掌声。从7月9日清晨开始,成都市几个重要地区的街道上,像雄鸡报晓一样,抗日救亡的歌声冲破黎明的宁静,在天空中飘荡。这是成都民先队领导下的一支朝气蓬勃的生力军——天明歌咏团,在成都各界群众面前崭露了头角。

民先队开展的宣传活动,就是组织青年学生到群众中去,把抗日救国的最新消息和最基本的道路,及时告诉更多的群众。各种名目的宣传队,用群众喜闻乐见的演唱(金钱板、道情等)、讲演、活报剧等民间艺术形式,进行生动活泼的宣传。其中,歌咏演出和教群众唱歌,是一个最容易流传的形式。群众学会了一首歌,就从被宣传者的身份变成了宣传者,也就等于扩大了宣传队伍。民先队中几位热爱歌咏的同志,在“七七”以前就酝酿成立一个专门的歌

咏队,定名为“天明歌咏团”。7月7日这天,大家一听到抗战爆发的消息,立即决定在第二天下午到成都最繁华的春熙路,沿途高举着“天明歌咏团”的大横幅,高唱着《义勇军进行曲》、《救亡进行曲》、《枪口对外》、《毕业歌》、《牺牲已到最后关头》、《大刀进行曲》等歌曲,举行游行示威。在路过少城公园和中山公园时,围观的群众很多,歌咏队就停下来教歌和作简短的讲演。队伍行进到春熙路时,跟随在歌咏队后面的群众已达数百人。浩浩荡荡的游行队伍,激昂嘹亮的救亡歌声,有力地显示了抗日救国力量的壮大和深入人心。沿途,我们及时地对警察作争取团结的工作,他们很自觉地为歌咏队站岗,维持秩序。

在结束这次歌咏游行时,大家决定从7月9日起,分成十来人的一个一个小分队,分散在全城几个主要地区的街道上,学报晓的雄鸡,从黑夜一直唱到天明。歌咏队越唱越有名,几个主要的电影院、剧院都请我们在开演前去演唱,官办的成都广播电台也专门请歌咏队去演播。“天明歌咏团”的名声很快传到全国,著名音乐家、诗人任钧特地为我们谱写了《天明歌咏团团歌》,对我们是一个很宝贵的鼓励。《团歌》的歌词是:

我们歌唱——
在街头,在农村歌唱:
用歌唱唤醒垂梦的人们,
让他们从梦中惊醒!
我们是报晓的雄鸡——
要从黑夜唱到天明!
要从黑夜唱到天明!
我们歌唱——

热情地雄壮地歌唱：
用歌声鼓舞清醒的人们。
让他们向战场迈进！
我们是报晓的雄鸡——
要从黑夜唱到天明！
要从黑夜唱到天明！

我分管民先队的宣传工作，是歌咏团积极的倡导者，也是歌咏队的一员。我们大家一起歌唱，一起游行，到人多的地方，我还常常站在高处进行简短的讲演，我还为歌咏团写歌词，记得我曾用麦新作词、吕骥作曲的《保卫马德里》的曲调填写了一个《保卫大上海》的歌词。可惜，事隔60年，歌词的具体词句怎么也想不起来了。

1931年的“九一八”，日本帝国主义的军队公然侵占我东三省，日本侵略势力节节扩张，我们亲爱的祖国开始陷入了殖民地的茫茫黑夜时期。华北我军在芦沟桥打响抗击日寇的枪声，表明中国人民终于冲破黑暗，走向光明。“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全国武装的弟兄们！抗战的一天来到了！”激起了全国人民的爱国热情和对抗日将士的声援。“七七”抗战的第二天，成都各界联合会立即召开声势浩大的支援平津抗日将士的市民大会。会后，决定把成都各界救国联合会改名为“成都民众华北抗敌后援会”（简称华抗）。在它的领导下，青年、工人、妇女、文化界等各界抗敌后援会，也相继成立，除了宣传活动以外，还特别发起援助抗日将士的募捐和捐献棉衣棉鞋的活动。

抗战前夕，二姐从北平回到成都，她是妇女抗战后援会的领导

人之一。我随她到妇抗会去过几次,看见她们募捐棉衣棉鞋的火热情景。

在这同时,我还给其他宣传队写唱词,随同一些宣传队到郊区去作宣传。我曾经有意识地作过比较,同是一个宣传内容,如果用四川方言作口头演说或用“金钱板”唱词演唱,两者的效果差别很大。演唱比演说的效果在深度和广度上都更突出,群众对“金钱板”这种通俗易懂的宣传形式十分欢迎,这也加深和鼓舞了我从事通俗化、大众化宣传的决心。

华北抗战推动着全国全民加紧开展全面抗战。民先队把主要工作放在发动群众性的抗日救亡运动上。同时,也加强对四川上层的统一战线工作,争取地方势力中进步和中间力量,参加到抗日救亡战线行列里来。七七抗战爆发初期,国民党军队一再失利,蒋介石的国民政府决定由南京迁到重庆,这一消息的传出,激化了国民党中央同四川地方势力的矛盾,促使刘湘对民众抗日救亡运动的态度由观望转向支持。刘湘一方面赞成国共团结,共同抗日;一方面是想把运动纳入他的控制范围。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刘湘派人同“华抗”谈判,要求“华抗”结束,组成一个在四川省党部统一领导下的四川各界抗战后援会(简称“省抗”)。“华抗”的民先队对这一建议进行了多次讨论,认为建立统一的救国组织,取得合法地位,有利于团结一切抗日力量,在更大范围内开展救亡活动。同时也要警惕地方势力的反复无常,翻脸不认人。讨论的结果是同意结束“华抗”,建立“省抗”,但“华抗”的领导成员必须参加“省抗”的领导班子,“华抗”的各级组织基本上原封不动地转为“省抗”的各级组织。

这是有关“华抗”和“省抗”领导权的争论,反复商量达不成协

议,在这中间,二姐和我作了一点促进工作。我的叔祖父胡素民,这时正是国民党四川省党部设计委员会的委员(设计委员会是省党部的高级顾问组织),二姐和我特地到叔公家去过几次,劝他对省党部决策人做些工作。

叔公对二姐和我从小就十分喜爱,他也是我们走向革命道路的一个带路人。我到成都以后,多次拜访过他。他是孙中山三大政策的坚决拥护者和贯彻执行者,是国民党在四川势力中的革命派。他不仅赞成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而且拥护列宁在苏联的社会主义政策。他对成都中苏友好协会的成立和具体工作的开展,都作了很重要的贡献。他还把新生的小儿子取名为“来苏”,他向我们解释说,他希望苏联的今天成为中国的明天,成为我们的未来。他对我由华大转学到川大、由学数学转变为学政治的志愿是支持的。对我们组织民先队,参加抗日救亡运动,也是支持的。这次,对于成立“省抗”“华抗”和民先队争取掌握领导权,他也是支持的。为了这事,他在省党部内部,团结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和分化顽固势力方面作了很多工作,促进省党部同意“华抗”和民先队的条件。这些事,他没有张扬,对我们也没有具体讲述过,但他这件不为人知的功劳,是不可泯灭的。

7月17日,成都各界召开了万人参加的“四川省抗敌后援会”的成立大会,原来“华抗”的领导总部全部搬到省党部,“华抗”的领导成员参加到“省抗”的领导——常委会之中,而且掌握了组织组和宣传组的具体领导权。

“省抗”成立之初,成都市各地区各行业的各种抗日救亡活动风起云涌,声势浩大。一时间,抗日救亡运动的总指挥部竟然设在四川国民党省党部里,原来无人敢去的阴森森的地方,突然变成人

来人往熙熙攘攘的热闹场所了。青年人到此,也不再小心翼翼怕这怕那了,而是扬眉吐气、雄赳赳气昂昂地进进出出。我作为民先队负责宣传的领导成员,自然也经常到这里的宣传组去商量工作。

当然,我的主要精力还是放在编辑刊物方面,只是为了适应新形势的需要,我们把编辑工作同群众工作结合起来,成立了一个综合性的大型救亡团体——星芒社。星芒社先后出版了《星芒周报》和《星芒报》(三日刊),编辑方针逐步转上通俗化大众化的轨道,从此,我的新闻生涯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致力于办一张通俗化大众化的新型报纸。

十二、我成了职业革命者

抗战爆发以后,随着全国人民投入抗日救亡运动的爱国热潮高涨的形势发展,我的生活也改变了过去的轨道,如同这热潮中的一朵小小浪花,奔腾跳跃,不停息地扑向理想的彼岸,最明显的是我停止了在四川大学的学业,从此结束了我一生中仅有的从小学到大学的16年学生生涯。

进入川大不久,我就成了一个“逃学”的“浪子”。抗战爆发后,民先队的宣传工作和编辑刊物的工作大大增加,我已经无法在上课前去制造假象,伪装读书,拿不出时间来在课前课后补习课堂上的教学内容,更无法为应付考试突击几天而获得较高的考分。有时,两三天都不能回到学校。有几次我深夜赶回学校,校门已经关上了。那时,川大的校门是城门楼式的,不像省立师范那样,校门关了,还可以翻墙跳进去。因此,从1937年下学期起,我干脆从“逃学”转为退学。

老实说,我当时结束学习生涯而走入社会,没有丝毫留恋情绪。可是我完全没有料到,从此我不仅离开了学校,还离开了我的母亲,这是我常常感到于心不安的。到成都以后,我每年寒暑假都

脱不开身,没有回过家乡一次。可是我总是想,总会有机会回家去看望我那从22岁就守寡的母亲的。而一进入社会,没日没夜的工作,忙不完的事等着我去处理,更是身不由己了。回家看妈妈的愿望,只能深埋在心底。加上在这年年底,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一个职业革命者,心里装的是国家、民族的兴亡大事,一浪赶一浪迎面而来的是写稿、编改、出报等一系列具体而又不可马虎的工作,相比之下,我对母亲的感情自然而然地淡薄下来。1939年年底,我奉命离开成都,远走高飞了。在一个炮火连天、战乱频仍的环境里,不要说在母亲膝下尽孝,就是写封信去向母亲报告儿子的行踪,也无法办到,我的确变成了一个“不孝”的儿子。直到1958年,二十多年以后,我才把母亲从家乡接到北京。那时,她已经是年近七旬的白发老媪了。

1937年12月,成都市共产党重新建立组织时,第一批发展的新党员中,大部分是民先队的队员。四川省的党组织,在1934年到1935年间遭到严重的破坏,留下的个别党员还在继续坚持斗争,发挥作用。我所遇到的车耀先先生就是这样。从北平来成都而没有接上组织关系的韩天石、王广义也是这样。这时期,党中央也曾不断派人到四川来做上层统战工作,发展个别党员。抗战后,中央派来的邹凤平、廖志高等同志在1937年底到成都,首先找到韩天石等同志,重新建立党组织。我是经韩天石介绍的第一批入党的党员。当时,大多数民先队员入党时都批准为正式党员,没有后补期,我经党组织同意,完全脱离学校,踏上了以革命为职业的人生道路。

考入川大以后,我的主要经济来源是靠在课余做兼课教师的收入,几乎每天晚上都要到补习学校去教课。这虽是一个不稳定

的职业,但每月挣七八块钱,还能维持最低的生活水平。我兼课教数学全靠吃老本,靠高中时学的数学知识,基本上不做什么准备,一到教室就开口讲课。可是,有一次在课堂上,突然被一道代数题难住了,弄得我面红耳赤,十分难为情。虽然勉强对付过去了,总感到问心有愧。细想想,我已放弃了数学,改学政治而又要继续依靠数学来教学生,发生这类差错是注定了的,这次对付过去了,以后还会发生。经过一番考虑,我自动辞了职,断了经济来源。三个月的时间,我没有一文收入,我只好尽量节省,靠积攒下来的一点钱过日子。当时,我专门到贫民区的小摊上去吃饭,尝尝苦力穷人的生活滋味。我吃过“肠肠饭”,就是用猪羊的肠肺杂碎等熬的汤,把饭“冒”一下,就是烫一下,饭上留一点肠子之类。还吃过一种“牙子饭”,据说是凭经验下尽可能少的米,焖一平锅饭,做到米少饭多,然后在锅内把饭分成一牙一牙的,按成本算一牙多少钱,这种饭比买普通的一碗饭钱少饭多。吃这种饭,一般都搭配一点卤,或者买一点点小菜。最有意思的你也可以买一小块回锅肉。吃这块肉时,不是一口就吃下去了,而是一点一点的咬来就饭吃。稍好一点是吃豆花饭,一碗饭和一小碗豆花。最省最省的吃法就是两个铜板买两个“锅盔”(中间空心的烧饼),向店家讨一碗不要钱的“高汤”(熬了多次的骨头汤)。实在嘴馋了,肚子太“素”了,只好到二姐家或者姑妈家去混一顿饭吃。有时她们塞给我十几个铜板,我又撑着面子不要,说我有钱。有一次,想到姑妈家去吃顿饭,去得不巧,人家都快吃完了,只得说:“吃过了!”硬着头皮坐在旁边,悄悄地往肚子里吞口水。我虽然自幼就生在清贫之家,过着十分简朴的生活,却从来没有尝到过如此艰难的吃饱肚子的问题,这也是我一生中所度过的最艰难的岁月。

这种苦日子虽然难过,但却使我体验到一点点贫苦阶层的生活滋味,多学到一点老百姓的生动的日常生活语言。有几次,我见有的苦力,捧着一碗牙子饭,站在小茶馆外边,边吃边听评书。我仔细观察他们随着评书情节的发展,脸上表现出喜怒哀乐的感情,更加体会到民间说唱形式的优点。以后有几次,我特别让宣传队到贫民区去作宣传,作讲演时,听的人少,但是在唱金钱板、莲花落时,围拢来听的人就多得多。这也加强了我从事通俗化宣传的信念和决心。

不久,一个女民先队员、读中学的学生余硕卿,请我为她补习功课,每星期去她家三次。这样我又有了几块钱的收入,结束了最困苦的日子。这位余硕卿同志后来到了延安,进了陕北公学,入了党。1939年党组织把她派到重庆,埋伏在国民党军统局电讯总台,成立了共产党的秘密支部,为党传送了大量重要情报,立下了奇特的功勋。1940年被敌人逮捕,关在重庆白公馆内,受尽酷刑,以后转到贵州息烽集中营。她在狱中进行了顽强的斗争,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坚贞不屈的大无畏精神,英勇就义,牺牲时年仅24岁。谁知在全国解放后,余硕卿竟被诬陷为叛徒,蒙受奇冤。直到1983年才得到平反昭雪,被列为国家一级革命烈士。据说,在她回忆自己的一生时,还记得16岁时我为她补习功课的情景,并说车耀先和我是引导她走上革命道路的带路人。以后,为她平反昭雪的过程中,我也尽了自己的努力。

1937年7月《图存》周刊出版时,我们就估计到它的短命,因为它没有立案,没有合法手续,而且它的内容和形式,都同《大声》、《大生》一脉相承,像孪生兄弟一般。果然,《图存》只出了3期,7月24日又被省政府查封,公开的罪名是“未经批准,违法出版”。

实际上是因为车耀先先生为《图存》第3期写的社论,像一把锐利的匕首,直指国民党政府的胸膛,弄得它一肚子恼火,但是不好发作,只好找个借口,一封了事。这篇短短的600字的社论,题目是:《政府何以自解?!》现在读来,仍是一篇铿锵有力的好文章,很值得抄录下来,供后人赏析。

国家,已被敌人的飞机大炮,轰炸得残缺不全;无情的火焰,已经燃烧到眉毛的尖端;而我们还在希望和平,仍然若无其事!噫!恐怕古今中外,再也找不出第二个来了吧!

从“九一八”起,我们就知道要抵抗;我们就在呐喊“一面交涉,一面抵抗”;而且有过局部的抵抗。到了今天,敌人从沈阳杀到山海关;从山海关杀到天津、北平;我们还是只限于“知道要抵抗”,“一面交涉、一面抵抗”,“局部抵抗”。敌人就不然:他利用我们的和平交涉,来侵占我们的土地,剥夺我们的主权,取缔我们的爱国运动;甚至不惜全国总动员,来消灭我们的局部抵抗。

自然,我们拥护和平,为的是准备实力。我们若无其事,是表示信赖政府。然而,我们准备了六年的实力,难道不能抵抗华北的数千敌人么?难道连平津都不能保卫么?天哪!叫我们这样的信赖,怎样维持下去。

我们的陆军,为什么不调到前线去抵抗!北上的国军,为什么不加入二十九军作战?我们的海军,难道连制止敌舰在内河开炮的能力都没有么?传说比敌人还强的空军,为什么没有一架飞到平津的天空?为什么还要谈判?为什么不经济绝交?为什么还不释放爱国犯和政治犯?为什么不集中军队?为什么不发起民众的抗日运动?为什么不向敌人提出最

后通牒？为什么不作战时准备？为什么不肃清汉奸和亲日派？为什么……一言以蔽之：不但不像抗战的样子，连抗战的准备都不像！我们贤明的政府，我们信赖的政府，何以自解？

这一连串的“为什么”，质问得当局无法回答，只能用行政手段，予以查封，想封住人民的呼声，封住车耀先的嘴巴。国民党政府不让《图存》存在下去是路人皆知的事，我们不得不早作打算。蒋慕岳是四川省政府的职员，以他的名义，去申请登记成立“星芒通讯社”。“星芒通讯社”被批准后，我们一面印发通讯稿，一面筹办刊物。9月18日，《星芒周报》出版了。从成立“星芒社”、发通讯稿到筹办周刊，我都是蒋的助手，实际上我是《星芒周报》的主要编辑。

“星芒通讯社”是一个大型的综合性的救国团体，“星芒通讯社”是登记的名字，人们都叫“星芒社”。印发通讯稿和出版刊物是它很重要的工作，这只是它的一部分工作，还有其他的许多工作。比如“星芒宣传队”，包括歌唱、演活报剧、演唱金钱板、莲花落、演讲等等。“天明歌咏团”在星芒社成立之前就已开展活动，对内是星芒宣传队的歌咏团，对外仍然叫“天明歌咏团”。星芒社还成立了一个“星芒图书馆”，组织了难以数计的读书会、读报小组。图书馆还办夜校，请一些比较有名的人物去讲课。还组织了像新文学、世界语、通俗文艺等研究会。还有一个“星芒俱乐部”，组织篮球队、排球队、游泳队、自行车队等体育运动。

1938年4月《星芒报》三日刊出版以后，受到广大读者欢迎。《星芒报》上利用各种民间艺术形式的稿件又是抗日宣传队的材料，因此《星芒报》蜚声全川，各地纷纷成立读报组和代销处，好些

地方干脆成立星芒社分社,开展各种形式的抗日救国活动。因而“星芒社”又承担了很多对外地分社的指导工作。

1937年年底,共产党四川省工作委员会已在成都成立,民先队对成都抗日救亡运动的核心指导作用已经变为榜样示范作用。民先队直接领导下发展起来的大型综合性的救国团体“星芒社”,逐步开展了多元化的活动。在当时,反映了成都救国运动蓬勃兴起的新形势,也促进了这种大好形势向纵深发展。

“星芒通讯社”成立以后,我就完全离开了川大。星芒社在少城公园对面的文化街——祠堂街33号,有几间平房和一间十二三平方米的房间,星芒社的编辑室就设在战时出版社门市部的楼上。两张桌子,一个放油印机,专门印发通讯稿,一张编辑办公用。还有一张单人床,供我、蒋慕岳和其他同志有时在这里过夜。这时,党委又要我到四川日报社去作夜班编辑工作,因而我大部分的晚上也不住在这个小楼上。

我从搬出川大以后,日日夜夜地勤勤恳恳地工作。当然,那时是没有工资的,包括在四川日报工作,也完全是自觉自愿地义务劳动。当年鲁迅先生形容的孺子牛精神,吃进去的是草,挤出来的是奶,可说是我们当时的生动写照。吃的“草”,不是党组织发给我们,是靠业余劳动挣一点“草”吃。到了1938年4月,《星芒报》三日刊出版,星芒社各项工作的展开,加上四川日报的夜班编辑工作,实在忙得连去打工挣点钱也很困难,党组织才决定给我每月发八块钱的生活费。这就是当年一个职业革命者的生活情景:提着脑袋加入共产党,全心全意从事抗日救亡工作,简朴的生活,辛勤的劳动,我们人人都朝气蓬勃,乐观向上,充满战斗精神,尽心竭力地贡献自己的一切。

在星芒社里,我的工作重点还是负责编辑工作。先是编《星芒周报》,出了8期,当局要查封,恰好我们自己也没有钱再维持下去,就同民先队员熊复主办的《救亡周报》合作,又出版了3期《星芒、救亡联合周报》,终于又被政府封闭了。原来办《救亡周刊》的同志立即筹备,改名出版了《成都战时学生旬刊》,得到全川学生的热爱。而我在这期间,1937年11月28日,还用“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的名义,负责编辑出版了《抗日先锋》周刊。它的主要任务是打算侧重对民先队员进行组织教育和思想教育,想注重解决政策上思想上一些比较深层次的问题,比如刊登过《反对左倾空谈》的文章,批评统一战线中的“左倾”思想,这是当时一般救亡报刊不去谈论的问题。当然,这个周刊也是短命的,它也只出了3期。

在这期间,《大声》周刊也在申请复刊,经过几番周折,凭借车耀先在上层的影响,拖了两个多月,《大声》周刊终于用原来的名字,在11月13日正式复刊了。因为我已经开辟了星芒社这个新阵地,在《星芒周报》受压中,又开始忙着筹备一个崭新的报纸《星芒报》,因此我没有再插手《大声》周刊的编辑工作。

我虽然离开了《大声》周刊,却离不开车耀先先生。他是我们民先队领导成员的良好益友,是我投身于救国救民斗争的引路人。《大声》复刊后,编辑部仍然设在祠堂街努力餐馆内。星芒社也在祠堂街,相距不远。只要有空,我总想着去看看车先生。时局有变化时,我向他请教;宣传上遇着问题时,也向他请教。记得在《大声》复刊以后,我还特地赶去向他道贺。他当时曾语重心长地对我说:“《大声》是复刊了,但它终究还会被查封的。如果这个专制独裁的‘一个主义、一个党、一个领袖’没有被查封,这个专制独裁的社会没有被查封,《大声》还会被查封,你们《星芒报》也会被封。”

那些顽固派把《大声》、《星芒》这些抗日救亡报刊当成肉中刺眼中钉，不拔掉，他们是死不瞑目的。”

车先生的话说得太对了。《大声》、《星芒》和其他救亡报刊以后的命运，完全证实了他的预言。

1939年11月，我奉命秘密去延安时，无法去向他告别，谁知这竟成了一件终生的憾事。在我离开成都四个月后，他在成都“抢米事件”（注：1940年3月14日，国民党成都特务机关策划组织两三名暴徒，持枪捣毁川军潘文华在成都的一个粮库，弄得遍地都是大米。暴徒走后，很多贫民都去抢米。特务又来抓人，诬蔑成都共产党抢仓库的米，把车耀先先生和罗世文、朱亚凡等人逮捕。人们说这是希特勒国会纵火案的翻版。）中被当局逮捕，1946年在渣滓洞被国民党特务杀害。车先生入党时，曾写诗作为誓词，诗中有“愿以我血溅后土，换得神州永太平”。他预见到在中国这个专制独裁的国家，只有千百万人的流血牺牲，才能换来新的神州大地。他以大无畏的精神，坚定地履行了自己的誓言。

1984年我回到成都，努力餐馆内设了一个车先生的纪念室，以纪念先生诞辰90周年。我特地赶去，瞻仰了先生的遗容，参观了他的革命业绩展览。在无限怀念的心潮激荡中，我向先生献上了一首悼诗，现抄录如下：

深切的怀念

“一九三六年秋，我在蓉城初试笔锋，幸遇良师车耀先同志创办《大声》周刊，我参加了编写工作，得到他在革命思想和宣传业务上的帮助。当时，耀先同志开设了一个努力餐馆，在

它的掩护下，团结各界同志和朋友，组织革命队伍，创办救亡团体，开展抗日宣传。很多战友踏上革命战场，开始革命长征，努力餐馆是第一站，车耀先同志是我们永志不忘的指导员。在耀先同志诞辰九十周年、烈士纪念馆开幕，努力餐馆开业五十五周年之际，耀先同志的音容笑貌闪烁在眼前，他的宏言伟论萦绕耳边，特献小诗一首，以表敬意。

文武双全车耀先，
英豪聚义“努力餐”；
民喉党舌促抗战，
龙飞蛇舞伐倭蛮。

良师益友车耀先，
扶我挥笔进报坛；
千百战友长征远，
光荣首战“努力餐”。

一九八二年二月四日

离开《大声》的时候，我的新的理想，是办一张通俗化大众化的《星芒报》（三日刊），它的宗旨是“识字少的人能看得懂，不识字的人也听得懂”。我怀着极大的热情和希望在进行筹备工作。新的《星芒报》出版，标志着我在成都的新闻战线上又开辟一个新的战场。

十三、星芒社——反动派的肉中刺

《星芒报》(三日刊)的出版,对我来说,就像一个年轻的母亲,在连生几个孩子都夭折以后,又生下一个健壮的孩子那样,内心充满了欣慰和幸福感。它一出世就受到读者的喜爱,因为它的天性就是招惹人喜爱的。它的“天性”就是我们办报的宗旨:“要使识字少的人能够看得懂,不识字的人能够听得懂。”正是基于这种报纸群众化的方针,这个新生的“婴儿”不仅需要主办者、编辑者以及作者和读者去哺育它、培养它,而且,它一诞生就开始承担起为读者服务,也是为人民为国家服务的神圣职责。

它是一张八开的小报。作为报纸来说,是最小最小的报纸。当时的纸张、印刷条件都很差,纸张是半手工业生产的黄色土纸,印刷是很简单的半手工的小机器,印出来的报纸同现在出版的报纸根本无法相比。但是,它正像一个穿着打补丁的土布衣衫的乡村姑娘一样,不仅是她的眉眼可爱,更主要的是她那颗为国为民的赤诚的心,更令人可亲可爱。

《星芒报》的鲜明而突出的特点,就是它摆脱了当时一般报纸那种半文半白的新闻语言,完全用白话,用群众熟悉的日常用语,

并且尽可能地用四川的普通话,来表达新闻的内容。当然我们也不用那些很难懂的方言俚语,但是对那些四川人普遍喜欢用的熟语、成语、谚语和歇后语,却是有意采用的。因而,《星芒报》读起来或者听起来川味很浓,像川菜一样,吃起来相当安逸。

摆脱当时流行的老一套的新闻腔,还得到政治上一个好处,就是摆脱了国民党中央社在新闻和社论中那种惯用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也就是我们不仅用老百姓的语言习惯来写文章,而且还用老百姓的眼光、看法和心意来写文章。这样,这个小报就不仅使老百姓读着顺口,听着顺耳,更重要的是合乎老百姓的心意,听着顺心顺意,拍手赞成。我们仅有的几个编辑人员,努力争取将报纸办成从内容到形式都够得上是老百姓自己的报纸。

报纸的宣传中心自然是抗日救国,每期的头条都是三天来抗日战争的进展战况和最新消息。那时,正是台儿庄大捷,报纸连续不断地及时报导了这次战役的来龙去脉,对这次战役在抗战全局意义的分析和前途的展望,都用通俗易懂的语言,简单明了地加以阐述。为了帮助读者真正看懂,还配有战况地图和漫画,还专设了一个“不懂的字眼”的专栏,对有关的人名、地名、新名词、成语、典故和有关的历史进行简要的解释。

每期头条地位的战局综述的稿子,大都是由我负责撰写的。写这类稿子,要求很严格,战争新闻要快,要准确,因此不仅要翻阅几种报纸和通讯稿,还要查阅有关资料。如何下笔,又得费心费时地字斟句酌。那时,写作条件很差,又正逢酷暑季节,日日夜夜,挥汗如雨,也要完成这份苦差事。

我们曾经大力促进和热烈欢送四川军队开赴前线抗日。《星芒报》也突出地宣传川军抗战的情况,特辟了一个“前方来信”和

“无法投邮的家信”专栏，前者是发表将士们的来信，后者刊登川军家属写给前方亲人的家信，用以沟通川军前后方的联系。

为了用事实揭露国民党反动派诬蔑共产党军队“游而不击”的谎言，在每期的抗战新闻中，总要注意及时报导华北、山西、山东、河南等地八路军和新四军的战绩。

《星芒报》宣传抗日救国的指导思想，是动员全国各地各族人民各阶层人士积极投入抗日战线，打一场全民族全方位的战争。因而除了宣传抗日前线的战况和全国支援前线的行动以外，还注意宣传改革专制的政治制度，提倡民主自由，宣传废除苛捐杂税、提倡改善人民生活。我们注意刊登各地群众的来信，反映他们的苦难生活和保甲长的敲诈勒索。《星芒报》设有“生活报告”专栏，特意地反映工人农民和家属生活的困苦情况。我们用“跑街先生”作笔名开辟“街头访问”专栏，采访走街串巷的小商贩，从他们嘴里反映穷苦人的呼声。特别受到欢迎的是“假衙门”专栏，由假法官“张公道”判案。在国民党和军阀的反动统治下，劳动人民的冤屈苦难太多了，可是“衙门口向南开，有理无钱别进来”，人民有冤无处伸，有苦无处诉。《星芒报》开设这个“假衙门”专栏，告状的是真人真事，被告的是那些贪官污吏，但审案判案是假的，判决是没有法律效力的。但是，它为受压迫、受剥削的人民申冤出气，伸张了正义，而且也造成一种社会舆论，刹一刹那些横行霸道的贪官污吏的威风。报纸一出来，好多人都争着看，认为虽然是“假衙门”，也总算为老百姓出了一口气。有的小孩子看了“假衙门”，也自称“张公道”，和小伙伴们扮演审判贪官污吏的游戏，他们恨哪一个赃官，就审判哪一个，大人看了也很解气。

《星芒报》还设有“青年公园”、“妇女园地”、“小战士的吼声”、

“老百姓茶馆”等专栏,刊登的都是各界人民的呼声和老百姓的街谈巷议,都是从大量来信来稿中选出来的。

《星芒报》特别注意运用各种民间文艺的形式来表彰和歌颂抗日战争中英勇杀敌为国立功的英雄故事,如金钱板《大战台儿庄》、时事弹词《义勇军之母》、小调歌谣《送郎出山》、儿歌《买抗日糖》等,特别是长篇连载的评书《华北五英雄》,这是著名的通俗小说家冯诗云用“磨刀人”笔名为我们写的,每期刊登七八百字,吸引了很多读者,好多人就是专为读这个评书才每期都购买《星芒报》的。

小小的《星芒报》很快就成为星芒宣传团和其他宣传团体的宣传材料,也成为很多民间艺人的演唱蓝本,成为遍布成都大街小巷、大小茶馆里谈抗战、讲民主的议论依据。四川很多县纷纷成立“星芒报读报组”,读报组中的积极分子还推销报纸,组织别人读报,有的也成立宣传组,拿报纸上的材料去演唱宣传。

《星芒报》很快由三五千份突破了1万份,有时接近2万份,这在四川当时的报纸发行史上是十分罕见的。《星芒报》活跃在广阔的四川抗日救国运动的政治舞台上,成为一支密切联系群众的生力军。

这时期,在共产党四川省工委的领导下,成都和四川的救国运动发展很快,声势浩大。星芒社、群力社、大声社、妇教会、工抗会等也都成立了宣传团,四川几个大学就组织了四个实力雄厚的“抗敌宣传团”。由戏剧界著名人物组织的“抗敌话剧团”、“影人剧团”、“四川旅外演出队”等文艺团体,到成都和四川各地公演《放下你的鞭子》、《流民三千万》、《抓壮丁》等话剧,深入人心。共产党员力量强的报纸《四川日报》、《新民报》、《时事新刊》和在重庆出版的党中央机关报《新华日报》的发行量大大增加,有力地激发了四川

人民抗日救国的热情,推动着四川救国运动的蓬勃发展,促成十万川军奔赴抗日前线。

面对蓬勃发展的成都抗日救国运动,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相当深入人心,国民党反动派感到惧怕和恐慌。这时,四川地方进步势力在刘湘带领川军出川以后,也产生了分化,一些地方实力派也同国民党反动派沆瀣一气,又加强了惯用的压制手段,连以国民党省党部为大本营的、盛极一时的“四川省抗敌后援会”也被迫停止活动,先后制造了震动一时的“郫县事件”、“川大稻草案”和“捣毁星芒社”的严重事件。

1938年2月,群力社宣传团12人到彭县、新乐、郫县宣传台儿庄大捷。当宣传团到达郫县时,国民党郫县政府扣押了宣传队员,不准演唱,而且用武装押回成都。成都共产党组织发动各救国团体派出代表几百人到车站迎接,经过斗争,迫使国民党省政府释放了群力社全部宣传队员。

紧接“郫县事件”,在3月份又发生了“川大稻草案”。修筑凤凰山机场的民工,为了早日将日本侵略者赶出中国,日夜奋战在工地上,生活条件很苦,睡在地上连稻草也没铺。“四川大学抗敌后援会”发动全校师生捐献了385元钱,买了1万斤稻草送到工地,表示对民工的慰劳。在川大的国民党特务分子捏造事实,诬告后援会的领导人康乃尔和王怀安贪污捐款,诬陷进步教授黄宪章是后台,并将黄逮捕。经过据理力争,成都地方法院终于判决康、王无罪,释放了黄教授。国民党反动派的阴谋诡计又一次失败了。

捣毁星芒社发生在5月5日,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天府中学校长肖寿眉,是四川军阀杨森的妻舅,大川银行的老板。他是国民党特务的一个头目,是反苏反共的顽固派。天府中学教员张克林,

是位老国民党员，他从青年时代就信仰三民主义，拥护孙中山的三大政策，藏有《孙中山和列宁》一书。他曾经作过中央军校的教官，作过杨森二十军的秘书长。当时，他是星晨外文学学校的校长，在天府中学兼任历史地理课教员。当他在教授史地教科书的“苏联之部”时，肖校长就出面干涉，要他停止教授“苏联之部”，说什么：“苏联是我们的敌人，如要讲，则应持攻击的态度。”张教授对此很反感，向肖校长提出抗议书，还写了《致天府中学同学的一封公开信》。他把这封公开信送给星芒通讯社，要求发给成都各报纸刊登。5月9日，成都《新民报》、《四川日报》、《华西日报》等主要报纸都登出了这封公开信。信中不仅公布了肖校长阻止他上苏联课的反苏言论，而且还揭露了他平时在学校散布的许多对抗日战争的消极言论。肖寿眉看到报纸后，大为恼火。他马上在纪念周的学生大会上进行煽动，说这则新闻不只是关系他个人的事，而是诋毁了天府中学的名誉，是侮辱全校一千多同学的人格。他讲到这里，故意向学生发问：“应该怎么办？”有的学生在下面喊：“打！”肖校长对此不但不阻止，还要各班推举出三个代表来商量。当天下午4点钟，在某些学生代表的鼓动下，纠集了两三百学生，身穿校服，由教官带领，排队向祠堂街进发，声称要去质问星芒社。

祠堂街33号的两间门面是战时出版社开设的书店，楼上租给星芒社作为编辑部的办公室，后院是星芒社的宣传团、图书馆、读书会的活动场所。正门挂的是战时出版社的牌子，只在侧门挂了星芒通讯社的牌子。

天府中学的学生队伍到了祠堂街，拥进战时出版社的书店。出版社的负责人告诉他们，星芒社在楼上，书店与星芒社是两个独立的单位。他们不理，二三百人把书店挤得满满的。星芒社的负

责人蒋慕岳赶紧出面接洽,请他们派出代表上楼去商谈。很快,警察局、警备司令部和宪兵司令部也来了人。警察劝学生退出出版社的书店。他们不退,警察只好把其他人劝走,留下全是穿校服的天府学生。

这时,张克林先生也来了,学生们一见他,高喊:“打张克林!”有人拥上就要动手。警察赶紧阻拦,劝学生不要打人,让张先生上楼。有的学生就骂警察是汉奸,把警察的胸章撕下,举手就打,其他学生也喊打。一个胸前佩带证章,嘴里镶着金牙的“学生”跳上书店的柜台,用手一挥,高叫一声“打!”挤在书店里的学生马上乒乒乓乓地大打出手,掀翻柜台,推倒书架,把书店的招牌砸烂。一时间好好的一个书店被砸得一片狼藉,书在人们的脚下乱踩,门窗被砸烂,满街都是碎玻璃。围观的群众说:“这哪像学生干的事!真是有辱斯文。”

这时,我正站在楼梯口的隔墙边,半个身子在外面,半个身子在里面,伸着头在仔细观察这场“武打戏”的上演场面。忽然听得“呼”的一声,一个学生抡着一块木板猛地向我打来,我赶紧把整个身子躲在隔墙里。如果我不是耳灵眼快,躲过这一飞板,至少也得落个头破血流,惨遭毒手。在这种一片混乱的情况下,几个军警也显得无能为力,只好站在一旁看着。天黑下来,不知是谁打烂了一个灯泡,这才提醒了书店店员,把电闸一拉,店里一片黑暗,学生们把书架书柜拉到街上去继续打砸。

楼下打得凶狠的时候,楼上谈判也进行得十分激烈。星芒社的社长蒋慕岳对我说,这事是由于星芒社所发的通讯稿引起的,由他和方白非(通讯稿的负责人)去同他们谈判,叫我不要出头,我才得以站在楼梯口观战。谈判开始不久,肖寿眉也赶来参加,有时两

人唇枪舌剑,争论激烈。星芒社社方要求肖寿眉道歉赔礼,向出版社赔偿损失,天府校方要求星芒社发表更正,向学校赔礼道歉。星芒社一再声明新闻报道没有错,更不能道歉。双方相持不下,反复争论。这时,楼下仍然打得噼里啪啦,喊“打”的叫声十分猖狂,警方提出要肖寿眉收拾局面把学生撤走。肖寿眉耍了一个花招说,现在无法争出你是我非,最重要的是平息学生愤怒,劝他们撤回学校。他劝社方暂时答应学生要求,同意更正道歉,“先把学生哄骗回去再说”。社长蒋慕岳考虑,这样闹下去不是办法,青年人容易被煽动,被利用,容易被冲昏头脑,失去理智。街上围观的群众人山人海,水泄不通,交通也中断了。还听说学生中有人带了手枪和炸弹。这倒不是我们怕打,而是想到事件扩大对国家不利,对市民不利,所以星芒社暂时答应学生要求,把学生“哄”回去以后再说。

这样,肖校长下楼“哄”学生说,“星芒社答应更正道歉,谈判结果圆满”。于是在他的带领下,学生才喊着口号,唱着歌,列队撤离祠堂街。他们原来计划还要去打新民报。听说新民报所在地春熙路已经戒严,断绝交通,肖寿眉只好把学生带回天府中学,这场“武打戏”才算收场。

星芒社当然不能公开更正,更不能道歉赔礼。第二天,5月15日,星芒社社长蒋慕岳和战时出版社社长杨道生联合举行了记者招待会,详细介绍了打星芒社和捣毁战时出版社的事实经过,也介绍了谈判的情况和结果。省政府秘书沈天泽先生自愿出面调解,而且已经达成协议:由肖寿眉向星芒社、战时出版社和张克林先生道歉,并且赔偿战时出版社的损失。但是第二天,肖又反悔赖账。第四天,由五十几位新闻界知名人士签名,并派出11名代表向省政府王主席和绥靖公署邓主任请愿,要求严办肖寿眉。第五天,绥

署派交际科马科长到星芒社,说他愿意担任调解,劝我们暂时作文字上和法律上的休战,静候合理解决。我们为了尊重当局的意见,当即表示只要赔偿战时出版社的损失,只要当局能顾念到今后新闻界、出版界的合法权益,在抗日第一的前提下,接受马科长的调解意见:新闻界暂时停止对肖寿眉的批评;战时出版社也把贴出的声讨肖寿眉的布告撕下来,把任人参观的被摧毁的书籍和家具也收存起来。但是肖寿眉却不买绥靖公署的账,在报上大登启事,骂星芒社发表的文告是“汉奸言论”,污蔑这次事件是星芒社、战时出版社和张克林三位一体的阴谋,是张克林自买自卖的把戏。第七天,马科长招待各报社负责人,提出三点调解原则:第一,由肖张两人向新闻界道歉;第二,由肖张两人赔偿出版社的损失;第三,新闻界不必再与肖为难。对这三点,到会的人虽然觉得把张克林同肖寿眉同等对待是不公正的,但也表示了一致同意。谁知,几天以后,马科长说,肖寿眉还是拒绝接受,我们只好诉诸法庭,求得法律解决。

星芒社与战时出版社正式向法院起诉。初审时,肖还承认有错,以后了解到整个政局将向右转,而且打探到星芒社和战时出版社都是中共地下党办的,在四川反动势力支持下,他又摆出一副有恃无恐的流氓面孔坚不认错,对战时出版社也不赔偿,把责任都推到张克林身上。以后,法院对这桩案子也故意推延,经过几次催问也不答理。随着国民党反动势力的嚣张,这事也就不了了之了。

但是,事件的是非早已大白天下,成都和重庆的主要报纸都刊登了事件的缘起和调解、诉讼经过,一些主要报纸还发表了社论或评论,《新华日报》也发表了《成都天府中学事件》的社论,把肖寿眉破坏中苏关系、破坏抗日救亡运动的粗暴行为公诸于众,使他臭名

昭著,受到社会舆论的谴责。

8月,国民党省党部通令全川:禁止人民组织任何抗日救亡团体和集会游行,并宣布战时图书杂志的审查办法,压制抗战舆论。12日,成都市政府下令查禁抗战文艺刊物28种,各报的文艺副刊大多被取缔。23日封闭《大声》周报,28日封闭《星芒报》。

这些反动措施并没有把成都的救亡运动压制得无声无息。地下党利用一切有利条件,继续开展救亡活动。例如在查封《星芒报》时,还同时查封了《华西日报》,并派特务去捣毁报社。《华西日报》是地方进步势力川军潘文华主办的报纸,地下党一方面通过报社内部的党员进行斗争,一方面通过统战人士说服潘文华抗拒查封命令,坚持把《华西日报》照样办下去。

9月,地下党领导成都各救国团体召开了10万人的群众大会,拥护“国际联盟”援助中国、制裁日本的正义行为。会后,成都青年抗敌协会、星芒社、群力社、大声社的宣传团照样活动,这就在事实上抗拒和突破了当局的反动命令。我们在活动方式方法上更谨慎一些,在内容上同群众的切身利益更加密切地结合起来。这年10月,印刷工人要求增加薪金,编辑部同志支持他们进行了三次加薪斗争,都得到了胜利。

星芒社在被天府中学捣乱以后,继续出版《星芒报》,一期也没有少出,一天也没有脱期。星芒宣传团、星芒图书馆、星芒读书会、特别是星芒俱乐部的各种活动都搞得更加红火。全川各地的星芒读报组发展得更为广泛,《星芒报》更加受到广大读者的喜爱。很多读者为了安慰和鼓励我们继续把报办好,写来了很多热情洋溢的慰问信,有不少人还为报社捐款,无论多少,哪怕是一两毛钱,都代表着一颗颗火热的心,我们在报上刊登捐款人的姓名和捐款数

目,表彰他们的爱国行动。进入七八月,眼看局势在逆转,已经预料到《星芒报》的寿命维持不久,大家为另谋出路做了准备。当时成都有一个《蜀话报》,因为内部问题无法继续出版,停刊的日期很短,复刊不必再向政府申请登记。冯诗云认识《蜀话报》的老板,约蒋慕岳同那个老板商量,出了10元钱就买了他的登记证。因而在8月28日,星芒报被查封以后,不到一个星期,我们又以《蜀话报》的名字,换汤不换药地又出版了。这时,《蜀话报》的社长是叶雨苍,经理是余履新,他们主要同蒋慕岳发生关系,由他们去负责登记、立案和办理纸张、印刷、发行等经营管理,我同冯诗云负责编辑工作。今天想起来,我们当时也太幼稚,报社的社址在原来的地方,报纸的内容没有变,连报纸的编排形式也没有变,只是换了一个报头,读者一看就认出这是用《蜀话报》的名字出版的《星芒报》。

可以想见,随着形势的变化,它的命运是不会长的。

十四、练就一身闹中取静的本领

战时出版社被捣毁，是由于受到星芒社的牵连。它的老板杨道生同志也是地下党员，党的四川省工委和成都市委的领导成员常在他家开会，这点特务分子肖寿眉不会不知道，他们趁机也捣毁了战时出版社，可说是一箭双雕。肖寿眉赖着不赔偿，星芒社又不能分担出版社的损失，只好早点搬走，减轻它的负担。而且，《星芒报》还是惹事的祸根，搬走了也免得以后再连累它。

蒋慕岳真是一位能干的事业家。他的社会关系多，善于活动，足智多谋。仍然是凭着他的努力，7月初，星芒报和星芒通讯社搬到春熙路新集市场，星芒宣传团和星芒图书馆还在战时出版社的后院继续活动。星芒报的新社址，是在一个建筑公司里，他们的办事人员很少，一天到晚忙得连一个守摊的人都没有。我们在它的门市部安了一个柜台，作为星芒报的发行部，在它的楼上挤出一间小房作为我们的编辑室。上面还有一个尖顶的小阁楼，人走进去只能弯着腰，我们三四个人像沙汀鱼一样挤在阁楼地板上过夜。

这时，我还同时在四川日报作夜班。四川日报总编辑杜桴生也是地下党员，是成都市委书记，党组织派他来主持《四川日报》的

工作。老杜是一位很能干的人，为人热情和蔼，平易近人，我们这些新党员对他很亲近。他一脸大麻子，很多熟人当面叫他杜麻子，我们也亲切地叫他麻哥，他也毫不介意。他同四川地方实力有比较密切的关系，所以党组织派他去主持四川日报，报上的社论常常是他的手笔。当时的《四川日报》，实际上是共产党的秘密机关报。党组织派民先队的同志去帮助他，我帮他编地方新闻版，每天从八九点钟一直忙到午夜12点。工作完全是尽义务，没有工资，晚上有碗汤面或者一盘炒饭吃。

《四川日报》编辑室旁边有一间房，摆四张小床。我不愿半夜回到《星芒报》那个阁楼上，就在这间房里过夜。有意思的是，四川日报社的背后正是川戏剧场悦来茶园，每天10点钟开早场，从八九点钟就开始擂三次开台锣鼓，一次擂好几分钟。鼓声咚咚，锣声嘤嘤，五里以外，都会听到锣鼓声。这锣鼓声传到报社办公室更是震耳欲聋，因此作夜班的人，一般都不愿在这里过夜，可我却被磨炼出来了，任你怎样敲锣打鼓，我照样呼呼大睡，到10点钟大戏开场，我才起床。偶尔有一天上午没事，我就索性垂在床上听戏。我以后从事报纸工作，几十年作夜班，这种长年累月整夜的熬劲，就是从那时打下了基础。真是近海能游水，近山能爬高。

这时，我还磨炼出在吵吵嚷嚷的茶馆里写稿编报的本领。成都的茶馆真是一块宝地，一个多方面为顾客服务的场所。起床后到茶馆去洗脸刷牙，睡觉前到那里去洗脚和洗涮。泡一碗茶坐大半天，中间你要出去走走，把几个茶碗往桌子中间一凑，就表示你还要回来，堂倌（服务员）照样把你的茶碗和座位留着。那个年月茶馆里叫卖着各种糖果、点心、冬菜包子、红油抄手和担担面，招手就到，香喷喷热腾腾地送到你的面前，又便宜又好吃。茶馆里还常

常有说评书唱清音的，你编写累了站起来伸伸懒腰，走几步，还可以听听说唱，散散心。除了蒋慕岳、冯诗云、方白非和我以外，几位经常为《星芒报》写稿的作者也常到茶馆里碰头，经常来的人有姚俊闻、刘梦痴、肖稚苓、刘延年、谭吐、江农、车辐等，有些人已记不得了。一些熟悉的读者有事也到茶馆来找我们，向我们提供情况，送来稿件，或者要求解答问题。说我们那时的编辑部设在茶馆里，并不夸张。

如果我们只是为了写稿和编报，就常常到新南门外河边上的茶馆去，那里草坪青青，垂柳荫荫，花红叶绿，蝶舞莺啼，真是一个休息游玩的好地方。

当时，成都一些比较进步的编辑记者经常碰头聚会的地方，就是新集商场内的二泉茶楼。成都一些比较进步的编辑记者喜欢到这里来打问消息，交换新闻，议论时局，发发牢骚。杜桴生等地下党的负责人，常常利用这个机会向记者们放风，有意识地传播党中央的政策、敌后根据地的情况以及国民党的某些内幕丑闻，即便于影响新闻宣传，又有利于联络进步记者和争取中间势力。我们把这种碰头会叫做“神仙会”。这里实际上是一个记者俱乐部，大家到这里来也吹吹牛，聊聊天，讲一些趣闻笑话，有时有人出一些馊点子，大家娱乐娱乐。有一次，记不得是哪位仁兄出了一个主意，故意要茶馆里的堂倌到附近一家“泡粩馆”（泡粩是大米粉发酵蒸的发糕），说那里的泡粩又甜又香又便宜。堂倌说他泡茶添水已经忙得不可开交，哪有工夫出去买泡粩。这位记者就大声说服他去，认认真真同这个堂倌讲这个泡粩如何好吃，死皮赖脸地硬要他去，于是引起茶馆老板的兴趣，也叫那个堂倌去买。结果还是那个泡粩馆的伙计送来一蒸笼热腾腾、白生生的泡粩，那位记者请大家来

品尝,熟入、生人都拿一块尝尝,博得大家同声称赞。事后才知道,原来是这位仁兄同泡粑馆老板事先策划好的一场活广告。当时广告业很不发达,这场生动活泼的广告活报剧,一蒸笼泡粑,使这家泡粑店赢得长时期的高朋满座,食客盈门。我认为写中国广告史时,五十多年前这场广告活报剧是值得载入史册的。

无论是星芒报,还是蜀话报,既没有编委会,也未正式任命主编。以后说我是主编,那是用以后的制度为以前的事定的名义。我们没有固定的编辑,也没有钱去聘请工作人员。参加工作的全是义务的志愿军。特别值得表扬的是冯诗云,他算是长期的固定的埋头苦干的主力军。长期担负编写、校对和责任编辑的工作,实际上就是冯诗云和我两人,其他同志也常来参战,但来去不定,因为这不是他们的主业。

冯诗云(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他是创办《工人日报》的第一任总编辑)原是成都《人报》的主编,是成都著名的章回小说的作家。在我设计《星芒报》的版面内容时,就确定要辟一个章回小说的专栏,希望约请一位章回小说的名家来撰写,每期连载。经过《新新新闻》报社的姚俊闻(《星芒报》的主要作者,“三言两语”、“随说二分”的专栏作者)的介绍,我特地登门去拜访了冯诗云。

《人报》在春熙路旁边一条小街上,一间小小的门面房挂了一个《人报》的牌子,编辑室就在楼上,只有门面房的一半大。他主持这个八开的小报,就在这半边楼上写稿、编报和睡觉,所以,他第一次为我们写连载小说《国战演义》时,就是用的“半边楼主”的笔名。冯诗云听了我向 he 介绍创办《星芒报》的目的和计划,以及在这之前我们编辑《大声》周刊和《星芒》周刊的情况,他十分赞同我们的主张和办报方针,满口答应为《星芒报》写章回小说,当场约定三天

后去拿稿子。以后我每三天去一次,有时他已写好,有时他还没有动笔。他真是下笔如流水,水到渠成。我坐在他旁边,他拿起笔一口气写下去,七八百字不到一个钟头就写完了。他重看一篇,改几处字句就交卷。

《星芒报》有一些热情的作者经常帮助写稿,自动投稿的读者也很多,稿源丰富,所有来稿都由我一人阅读、挑选、编辑。我除了编写占第一版一半篇幅的战争新闻以外,还要负责编排、校对工作。诗云见我一个人也实在辛苦,就自愿同我一起分担编写、校对工作。

我们一见如故,很快就成为志同道合、同甘共苦的亲密战友。《人报》和《四川日报》都在春熙路附近,我们都作夜班,早上10点钟左右起床,我胡乱吃一点早点以后,就到《人报》去找他。我们经常一同到新南门外坐茶馆编写稿子,或者一同先到祠堂街星芒社去拿来稿来信,然后再上茶馆,或者一同到二泉茶楼去听听新闻。

那时,我们没有钱给他发工资,只是在下午两三点钟时在茶馆请他吃一碗面,或者到外面吃一顿豆花饭。那时,真可谓“君子之交淡如水”,从来没有为这种穷苦日子表示过不满。《星芒报》被砸以后,销路大增,报社有了一点盈余,搬到新集商场以后,我们的蒋老板才主动拿出钱来为我和老冯包了两餐饭。每人七角钱一周,每天中饭和晚饭,两荤两素,一碟咸菜,一碗汤。这是我离开四川大学以后,很难吃到的好饭。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在《人民日报》作了三十多年的夜班编辑,在吵闹环境中能编稿,在吵闹环境中能睡觉。有的朋友开玩笑,说我生就一个作夜班的命。其实,这种闹中取静的本事是在成都这一段时间锻炼出来的。

《蜀话报》刚刚创办不久,地下党四川省工委派我到西安附近

的安吴堡去参加全国青年代表大会。安吴堡离陕甘宁边区不远，指示我在出席青代会以后，就不要再回成都，直接奔赴延安。

在抗日救国运动中，青年，特别是青年学生是掀起爱国浪潮的主力军。共产党中央决定通过全国青年救国组织活动的指导来加强对全国青年和全国人民救国运动的领导。由西北青年救国联合会发起，邀请全国各地青年组织派代表到安吴堡的青年抗日救国训练班（类似延安的延安大学）来参加全国青年代表大会，成立全国青年抗日救国联合会。四川省委决定派我代表成都青年组织去参加这个盛会。

这是我作为党员第一次受到这样重要的派遣，也是我第一次出川，而且将实现我向往民主圣地延安的理想，我感到十分荣幸和振奋。

谁知好梦难圆。当时，全国各地青年纷纷奔赴延安，国民党反动派在各地设关立卡，处处阻拦。在“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的剑门关下的梓潼县，他们特设了一个所谓“蒋委员长行辕稽查处”，专门阻拦四川和西南各省青年。我乘坐成都到西安的长途汽车出发，第一天到达梓潼县，在车站过夜。我在一个小旅馆吃过饭，刚上床躺下，稽查处的特务们，荷枪实弹地冲进了我住的房间。他们说：“县长有请！”不由分说，就把我拘留起来。在县政府警察所所在的衙神庙里扣押了一个多月，然后被强制返回成都。

出人意料，我关在那里反而受到优待。这是为什么？梓潼县地下党派人来探望我时，才透露了我之所以受到拘留和优待的原因。

我在成都，早就是国民党特务监视的重要对象。为了挣脱特务们的阻拦，事先做了许多准备。我叔公胡素民是国民党省党部

的设计委员(高级顾问),我去西安的公开理由是去谋职业,拿的是叔公给陕西省党部书记长的介绍信,我的个人身份是《蜀话报》的记者,托他给我安排一个职位。我以为这样就可以蒙混过关万无一失了。

当时,据国民党的情报,他们把在安吴堡召开西北青年代表大会说成是中国共产党要在延安召开纪念苏联十月革命节的大会,他们说全国各地的共匪首脑人物都要到延安去开会,所以通知各地特务机关特别加紧侦察,阻挡去参加这次会议的人。因而,在我离开成都时,就被特务盯上梢了。当我在梓潼车站旅店门前的茶馆里洗脚时,梓潼行辕稽查处处的特务就拿着我的照片在悄悄核对。他们知道我是胡素民的侄孙,还传说我是什么共产党川陕省委的巡视员,因而用“县长有请”而不用武装逮捕的办法,把我带到县政府。一个官员询问我的姓名、年龄、籍贯等,看了叔公胡素民给陕西省党部书记长的介绍信,就把信拿去找县长。据说县长看完信后很为难,因为这位县长是我叔公的学生,对叔公十分敬重。他们经过商量,不把我交给稽查处作为一般犯人来扣押,而是把我放在县警察所,由所里腾出一间办公室,让我临时住在那里,把我软禁起来。有警察守大门,不让出去。到吃饭时,由警察带我到附近一家饭馆去吃饭,吃完饭就回来。

我在梓潼被拘留以后,成都方面马上进行营救。二姐去找叔公胡素民想办法,他满口答应。当时四川省党部有几位负责人是他的学生。共产党四川省委书记吴玉章也去找四川省政府主席张群,他是吴老的学生。经过多方活动,四川行辕稽查处答应放我,但要在十月革命节以后,目的是不让我到延安去开他们所说的全国党员代表大会。

在梓潼警察所被拘留期间,对我教育最深的,是使我能够亲眼观察到一些真正受苦受难的贫民老百姓。被抓到这里来的,大多是交不起租子或者交不起税款的人。到这里来告状的大多是受到百般欺压来申冤求救的人。在这里受到拘押的人,也大多是遭受冤屈,不堪忍受毒打凌辱,出于一时激愤而反抗或者铤而走险的人。有一位老农民的悲惨遭遇,至今我还记得比较清楚。他早已倾家荡产,不得不一再拖欠财主(地主加高利贷者)驴打滚的债款。一天,财主派人去催债,要把他的小儿子抓去抵债,他万般无奈拿起棍棒打伤了狗腿子,几个狗腿子就当场把他的10岁的小儿子打成重伤,拖到财主家过了两天就死了。这个老汉只好到镇公所去告状。这个财主矢口抵赖,为了杀人灭口,财主又派人把这个小孩的尸体剁成小块丢到大粪坑里。这个老汉在财主家的一个仆人的帮助下,把孩子的尸体从粪坑里捞出来,装在麻袋里,用鸡公车推到镇公所,请求申冤。镇公所害怕那个财主,不予理睬,老汉一气之下,就悄悄地把那个财主的小儿子也打个半死。这样,镇公所就把老汉打得头破血流,然后送到县警察所关押起来。

这个警察所原来是座庙宇,正殿三大间,是所长和几个职员办公的地方,现在腾出一间给我住。正殿对面是一个小戏台,台上住着十来个警察,打地铺挤在戏台的地板上。台下,用一些木椽子作栏杆,关押一些临时拘留的人。这个老汉关在这里,一天到晚,不是大声嚎叫,就是小声哭泣,又叫骂又诉说,引起我的注意,仔细打听了他的遭遇。我当时除了劝所长秉公处理外,只能在出去吃饭时买几个锅盔回来送给他。这个案子,据说是这样结案的:财主打死了老汉的孩子不偿命,因为老汉也把财主的孩子打成重伤。为了补债,财主免去老汉三年贷款的利息。据所长说,这已经算是老

汉打赢了这场官司。

在这一个月当中,我比较深刻地了解到国民党统治下贫苦人民的情况,财主恶霸横行霸道的情况,地方官僚机构“为民办事”的情况。这些,都是我见所未见、闻所未闻的现实生活。

在梓潼期间,我更深切地感受到《星芒报》的巨大影响。这里有好些《星芒报》的读报组,他们中间有些人成了民先队队员和共产党员。这些读报组,同其他抗日进步团体一起,推动着梓潼县的抗日救亡运动。在我被拘留期间,他们加强了对警察的工作,通过警察经常给我送来报纸刊物和信件。在我获得保释被遣送回成都时,他们还在一个富豪人家的大院里,为我举行了一个一二百人的欢送会,使我深受感动。

离开梓潼时,成都党委特派骆是愚同志(解放后曾任四川省和甘肃省政协的负责人)来接我回成都。党组织还托他给我带来100元法币作为路费和零用钱。令人好笑的是,在30年后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这100元法币竟然成为造反派们说我是“法国特务”的“罪证”。

法币,是当时国民党中央政府发行的流通纸币。他们认为其他地方政府发行的纸币都是不合法的,只有中央政府发行的才合法,所以特别冠以“法币”之名。在“文革”时,那些造反派们知识贫乏到了荒唐可笑的地步,他们不懂历史,更缺乏常识,为了罗织罪名,胡猜乱想,无限上纲,加罪于人。他们看了我写的材料,硬说我得到100元法币就是“一百元法国钱”,认定我是“法国特务”。“文化大革命”是这类可笑可恶事件的丰产时期,什么样的荒诞可笑的事都发生过,使人哭笑不得。

我回到成都以后,二姐带我到叔公家里,向他表示感谢。他还

特地吩咐佣人做了几个好菜来款待我们。

叔公这时已经由新三民主义者明显地转变为共产主义者。他对孙中山三大政策的新三民主义十分拥护。1925年,孙先生逝世时,他写的挽联是:

公死失无上导师,如木之坏,山之颓,危象再呈尼父后;
民生是最终政策,果道既行,人既寿,丰功自与列宁同。

抗战爆发以后,叔公同共产党地下党员张秀熟、车耀先等经常联系,他积极主张国共再次合作,团结抗日,坚决反对“先安内后攘外”的政策;对四川省国民党禁止人民组织抗日救国团体和压制抗战舆论深表不满。在省党部召开的军政府联合纪念周上,他曾用《中国到何处去》为题发表演说,阐明他上述主张,公开批判国民党顽固派倒行逆施的政策,因而最终把他排挤出省党部。十八集团军第二方面军司令部公开聘请他为顾问。

叔公半生为官,两袖清风,正如他自己写的文章中所说:“贫逾陶令,无可守之田园。”1947年逝世时,家无长物,只有四壁书籍。

我从梓潼回到他家时,他的客厅里贴有马克思、恩格斯、克鲁泡特金和托尔斯泰四人的画像。他还撰写了一副对联:“是人中之四杰,与家下为一家。”他是一位学者,一位教育家,著书立说,教育后人。他同我们讲话,引经据典,层层说理,娓娓动听。他知道我和二姐都是共产党员,十分赞赏。北伐时期,他叫他的二儿到黄埔军校,参加北伐。1936年他又鼓励他的三儿胡彬甫去延安抗日军政大学,毕业后参加了新四军(新中国成立后,历任我驻外使馆的武官,离休前是贵州省军区的副司令员)。

从梓潼回到成都一年后我就去了延安。在这一年中,我和二

姐总是过两个月就去看望叔公一次。可惜我去延安时,因为行动机密而紧急,未能向叔公辞行,谁知这就成了我们的永别。1947年他逝世时,他被公选为家乡威远县的临时参议会的议长,享年75岁。我是在1949年全国解放后才听到叔公去世的消息。多年来,我都感到这是我一生中的一件憾事。

十五、别了成都，别了四川

回到成都以后，我的主要工作还是负责编辑蜀话报，除了固定工作的蒋慕岳和冯诗云以外，还有谭吐、刘延年、江农、肖稚苓、车幅等人也经常来帮助。

这时，四川的政治形势，同全国的抗日形势一样，由于国民党顽固势力的扩张和渗透，出现了恶化的趋势。顽固派对救国战线上的积极分子越来越恼恨。党组织总的布置是逐渐转移，保存实力，安排这些积极分子通过各种关系到前线、到延安去。

1938年11月中旬，我刚刚从梓潼回到成都，中国青年记者学会成都分会，趁雷鸣远华北战地督导团赴华北的机会，号召成都新闻工作者参加华北记者采访团。雷鸣远是比利时人，天主教神甫，又是天津《益世报》的创始人。抗战时期他在河北安国县设立修道院，曾经动员修道院的修士和教徒跟随国民党第三军在河北、山西一带参加救护伤员工作。后来蒋介石把他调到武汉，任战地督导团的团长。在督导团赴华北战地服务时，武汉的中国青年记者协会总会请他去作报告，所以他路过成都时，中国青年记者学会成都分会也请他去作报告，还同他商量，他同意成都派出记者组成记者

采访团跟随他到华北。

先是蒋慕岳报名参加。到临出发前,其他几位报了名的又不愿去了,给记者团造成了困难。冯诗云对这种中途变卦的人很恼火,气愤地说:“他们不去,我去!”诗云原来没打算去,什么都没有准备,连衣服被褥和旅行箱袋也没有。蒋慕岳是记者团团长,见诗云拔刀相助,当然十分赞成,动员诗云一同前往,并在物质上给以支援,诗云也就由犹豫转而积极参加了。

从蜀话报当时的工作来说,慕岳要走,我就很感为难。诗云又要走,更是突然袭击。经过多方考虑,为了支持前线抗日战争,又可以达到转移干部的目的,我还是勉为其难,尽管心里恋恋不舍,表面上还是高高兴兴地欢送他们奔赴前线。好在这时,蜀话报的编辑工作沿袭星芒报的路子,已经有一套较为熟练的经验,而且在群众中也有较好的基础。因而他们走后,蜀话报还是照常出版。

蒋冯参加的华北记者采访团,到了山西中条山地区,发展成12人,改名为“中国青年记者学会华北战地服务队”。这支记者服务队在這一地区,推动发展了各项新闻出版工作,仅是他们采写的战地通讯,在重庆、成都和山西等地的报纸上,就先后刊登了数十篇。

这支新闻界的生力军,在新中国成立以后,成为新闻界的一批骨干力量。从星芒报、蜀话报锻炼出来的蒋慕岳和冯诗云,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几十年中,都担负着相当重要的报纸工作。离休前,冯诗云是工人日报的总编辑,蒋慕岳是英文中国日报的社长。“文革”以后,他们两人还合作创办了中国农民报,我当时主持人民日报社的工作,在编辑、经理人员、印刷机器和办工用房等方面给予大力支援。他们原来打算办一张直接为农民阅读的大众化的报纸,但办起来以后,很难按照他们原来的理想办下去,他们也就退

出了编辑工作。

在这里附带回述了这段历史,说明当时星芒报、蜀话报对中国新闻界的贡献是有深远意义的。

1939年,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以后,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国民党对内政策,由联合抗日转变为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到今年3月,《蜀话报》也被迫停刊了。在成都党组织的筹划下,过了一个多月,我们又用《新民报三日增刊》的名义继续出版,原班人马,坚持原来的风格,显示了我们坚忍不拔的战斗精神。

4月底,四川省委决定在重庆十八集团军办事处开办党员训练班,成都党组织选派两人去参加,恰好是我和二姐胡德辉。

我俩正好是5月5日到达重庆的。在成都到重庆的路途中,遭遇到日本飞机在5月3、4两天对重庆的大轰炸。尽管我们从新闻报道中早就知道了日本飞机对我国狂轰滥炸的惨象,但是耳闻不如眼见,当我们到了重庆,亲临现场,真是如同进入了被妖魔鬼怪蹂躏过的悲惨世界。全城火焰冲天,硝烟弥漫,地上血水处处皆是,遍地横尸,电线杆和树枝上还挂着断臂残腿。全城都是废墟,砖石下还压着老弱妇孺的尸体。烧焦了的骨头,烤干了的血肉,凄惨的哭叫,刺鼻的奇臭,顿然使人心如刀绞,惨不忍睹,悲不忍闻,人就像快要发疯一样地魂飞魄散,目瞪口呆。

半年以前,在梓潼时,稍稍真切地体验到国民党统治下的悲惨人间,这次亲临日寇轮番轰炸的古城重庆,前者是几十年反动统治的恶果,后者是日寇两天肆虐的罪证。事后统计,这两天的轰炸,一共炸死了4575人,炸伤了3637人,据历史学家说,这在世界空袭史上也是最高记录。

当然,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仇恨远远超过了对国民党反动派的

仇恨。但是,日寇对中国人民的侵略罪行,包括这次如此肆无忌惮地狂轰滥炸,也是国民党反动派的反动制度、反动政策和反动思想的纵容和加剧下酿成的滔天大罪。蒋介石曾经说过:“日军乃癣疥之疾,共匪乃心腹之患。”他将异族的入侵和国内同胞的抗日民主要求,如此轻重倒置,是非混淆,可见他反动思想的顽固。在抗日战争初期,我们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深仇,并未能减轻对国民党反动派的大恨。当时,共产党把“反蒋抗日”的政策转变为“促蒋抗日”、“联蒋抗日”,这对于我们这些在大后方工作的党员来说,在思想上完全想通是很不容易的。同样,我们这些白区党员,对于那种仅仅强调对外谋求民族解放,而放松了对内争取民主自由和改善人民生活的倾向,也是无论如何想不通的。

进入重庆,我们强忍着悲痛和恐惧,经过几十次的打问,才找到同地下党接头的地方。只见那里房屋倒塌,仅剩下一个破烂的门洞,走近一看,却看见一位同志留在门洞里,他很热情地接待我们,使我们突然感到投入母亲的怀抱一样流出热泪来。我们把暗藏在裤腰里的介绍信——卷成小卷的纸条给了他,他一面用纸画图,一面仔细告诉我们如何到红岩嘴去找大有农场,八路军办事处就搬到那里。那时我们都没有手表,又走了两三个钟头,问路不下几十次,终于找到了红岩嘴。这里不仅是我们亲爱的家,而且是一个令人惊异的新天地。

一股可命名为“解放区的作风”扑面而来,使人感到耳目一新。这里上自首长(如周恩来)下至小鬼(小勤务员)都是很亲热很平等。大家都蹲在地上吃一大锅饭,有说有笑。一个碗自己去盛饭,一个盘到炊事员那里去打菜,一个菜,不够吃时还可以去加菜。讲课时可以提问题,讨论时可以各抒己见。

这次党员训练班,来自四川各地选派的党员三四十人。讲课的是周恩来、董必武、吴玉章、凯丰、邓颖超等赫赫有名的大人物。老实说,我对当时讲的抗日战争的形势和抗日救国统一战线政策,是很感兴趣的;而对于中共党史、苏共党史以及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听得似懂非懂,兴趣不大。讲课最受欢迎的是周恩来。

通过这一个月的学习,更加坚定了两点:参加共产党是正确的;到延安,是最理想的出路。

从重庆回到成都以后,《新民报三日增刊》也不让出下去了。但是,不到山穷水尽,决不罢休。这时我去找到周文同志,他是有名作家,是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战联合会成都分会的执行理事。我们已经认识一年多,但交往较少,我们在文艺大众化问题上观点一致,他曾经同我谈过,文抗会打算出版一个大众化的文艺刊物。我去拜访他,探问他出版大众化刊物的打算。我们一拍即合,商定由他出面去登记,用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战联合会和成都分会的名义,联合出版一个《通俗文艺》十日刊,编辑工作由我负责。

周文是四川西康人,1933年在上海参加“左联”,热心从事文艺大众化的工作。他自己不仅写了好些大众化的作品和大众化的文艺理论文章,还把苏联的著名小说《毁灭》加以改编,写成通俗读物,受到读者欢迎。鲁迅很赏识他的成就。他在“左联”协助鲁迅推动文艺大众化的工作。

“八一三”上海抗战以后,他回到四川,团结成都作家和文艺青年,推动文艺界抗日救国工作。1939年1月,组织成立了成都抗敌协会分会。2月出版了《笔阵》半月刊,成为成都青年很热爱的一个文艺刊物。我们的《通俗文艺》十日刊在8月25日正式出版。

通俗文艺的编辑室就设在文协,地址是布后街,好像是在一所

中学的一个教室里。我先住在这里。这时日本飞机还是常常来成都骚扰。我们平时把稿件放在一个小箱子里,一听见空袭警报,就把被子往身上一披,提上小箱子就走,随着人流跑出城外,找一棵大树下躲飞机,坐在地下照样编稿子,饿了就啃一块锅盔,困了就裹着被子睡一阵。

到了10月初,形势更加恶化,党组织通知我赶快隐蔽起来,尽量少抛头露面,等待时机到延安去。这时,二姐在协进中学教书,她同大伯母在北郊北巷子租了一家农村小院,我也就躲到她家里。

大伯母是一位十分慈祥、善于操持家务的人。她思想进步,很支持二姐和我参加共产党,参加抗日救国工作。地下党的负责同志也很喜欢她,他们很高兴到北巷子来开会。大伯母不仅给他们站岗放哨,还为他们送信找人,送传单,还常常为他们做可口的普通饭菜。

搬到北巷子以后,我常在太阳快下山时才敢出来活动。我悄悄地溜到布后街,为通俗文艺做一些编写工作。

《蜀话报》变为《通俗文艺》以后,就由通俗化的时事报纸改为通俗化的文艺刊物,虽然同样是大众化、通俗化的工作,但是从我个人的志趣来说,还是喜欢办报纸而不是办刊物。这点,周文同志很了解我,他认为只要条件成熟,还是准备出版一份通俗化的报纸。

很凑巧,1939年年底,我们都到延安以后,周文参加陕甘宁边区文协的工作,我参加《中国青年》杂志的编辑工作。1940年年初,他同毛主席见面,谈到了他对文艺大众化的打算,在毛主席的支持下,他在文协负责筹办一个大众读物社。读物社先要办的就是出版一张大众化通俗化的报纸,他推荐我来负责筹办这张报纸。这样,我立即被调到大众读物社,筹办《边区群众报》。我同周文在

成都编辑《通俗文艺》期间,建立了比较亲密的友谊,成为志同道合的朋友,这决定了我在延安十年的编辑工作,坚定了我从事大众化报纸编辑工作的志向。

1939年11月中旬的一个黄昏,党组织的一位负责同志把我带到祠堂街一个大旅馆里面,八路军办事处在这里租了几间房子作为兵站。我一进兵站的房间,马上换了一身棉军装,戴上一个“八路”的袖章。我读中学时叫胡德恕,这次又给自己改了一个新名字,叫胡德书。军衔是文书上上。晚上挤在地板上睡了半夜,第二天太阳还没出来,一个押车副官就带着我离开了我生活八年的成都和养育我23年的四川。

当时我的心情很复杂。在满怀希望和兴奋中,我感到很内疚的是对我母亲的不辞而别。自从我离开老家上成都升学以后,我就再没有回家去看望过我的母亲。我这人自小就不那么恋家,一有空就到外面去玩,放了学常常不回家吃饭,在外面玩到天黑才回家。从9岁上高级小学起,就到离家30里的自流井去上学。上初中时,还到离家几百里外的雅安上川南师范读了一年。16岁到成都上学,离家更远了。寒暑假回家缺少路费,而且我是那样死心读书,也没有放假回家的强烈愿望。20岁考入四川大学,参加了革命,就更没有什么假期了。加上我这人干一行、爱一行、钻一行,够得上是全心全意为大众解放献出一切,对母亲的感情也就越来越淡薄了。

这些年,祖母去世后,我母亲成了一家之长。二伯父减少了对我升学的费用,对我母亲还是照样按月送米送油送肉。二伯母也去世了,新的二伯母是原来二伯父家的丫环,为人也很忠厚,对我母亲也很照顾。

四合堡寨子上的这个家,就是我母亲和祖母留下的一个八姑,原来侍候祖母的丫环春兰仍然留在我家。母亲带着春兰耕种着家门前的大半亩菜地,一年四季新鲜蔬菜不断。母亲会做很多种咸菜,还经常帮助邻里缝衣做鞋,零用钱也不缺。邻里都称赞我母亲会管家,过着中等的富裕生活。

我大哥过继给大伯母以后,初中毕业就不愿继续读书,在界牌场老房子那里也开了一个茶馆。以后大哥还参加了地方上的哥老会,成为年轻的一个头领。他看上了二伯父家的另一个丫环,和她结了婚,这个新的大嫂也是一个治家能手。

大伯母向来都是自食其力,常年在外地教书,从不要大哥供养她。所以大哥也能给母亲一些补助。我离开四川以后,大哥又学了中医,不开茶馆了,四乡行医,收入也还可以。我离开成都时,对母亲不辞而别虽然感到内疚,但也算放心。离开成都的前夜,我给母亲和大哥写了信,表明我不辞而别的遗憾。我说,这次去前线,有可能牺牲,以身许国,但也很可能在抗战胜利后回来,一家团圆。

天还未亮,我们就出发了。我身穿军装,坐在八路军的军车上。车上满载着新棉衣。押车副官坐在驾驶室里,我一个人高高地坐在棉衣包裹之上。车队在浓雾中前进,开着两条银蛇似的车灯,不断地鸣响着喇叭,在川陕公路上奔驰。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这样威风凛凛地坐在军车上。当车过梓潼时,已经快中午了,薄雾还笼罩着这个小小的山城。蒋介石行辕稽查处要求停车检查时,押车副官拿出十八集团军的通行证给他看了一下,连车都没有停,就堂堂正正地呼啸而去。回想起一年前我在梓潼被稽查处扣押的情景,内心迸发出一股骄傲的豪情。我用蔑视的眼光笑对稽查员,心中暗语:“你看我今天大摇大摆地去延安,你能奈何我?”但

是,那破败的房舍和衣衫褴褛的行人,沿途千百次地重复出现在我的眼前,刺痛着我的心,这是旧中国苦难的面貌。贫穷的国家,贫苦的人民,不改变中国人民这种苦难的境遇,我誓死不回四川!

48年之后,1987年12月,我第三次路过梓潼。这年,我以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的身份,回四川视察文物保护法的执行情况。显然,梓潼已经变得太多了,从表面看,宽阔的街道两旁是新的商店和高层的公家楼宇,人们的穿着更是旧貌换新颜了。我找了一些老人来座谈,想了解一下四十多年前的梓潼,回忆一下我在这里被拘留时的情况,可惜知情的人很少。

这次我留下了一首《三过梓潼》的小诗,抄在下面留作纪念:

头次抵潼城,萋萋五十春,
特务阻北进,忿忿陷围圉。

翌年二次进,威威破鬼门,
压车充文书,堂堂八路军。

鹤发怀童心,欣欣三进城,
处处腾热气,亲亲同志情。

军车穿过梓潼以后,沿着川陕公路,穿过天险蜀道的剑门关,越过难于上青天的大巴山和秦岭,进入八百里秦川。到了西安以后,转而向北,奔向陕甘宁边区,奔向延安!

新的生活旅程,即将在我面前展开。我心中充满了希望,充满了豪情,今后的岁月,那将是一个崭新的世界!

十六、新闻学徒的基础课

我从小学升入大学,从大学中途辍学进入社会,从此成了一个职业革命者。而且,完全没有想到,从此进入新闻界,开始了我五十多年的新闻工作,开始了一辈子都在兢兢业业、时刻不敢懈怠的报人生涯。旧社会对编报的人尊称叫编报先生,贬称叫编报匠。一晃就是80岁了,我这一辈子只干了这一个行业。

从1936年到1939年这三年多时间,是我踏入新闻界的学徒时期。既无经验,也无理论,没有读过一本关于新闻工作的书,甚至没有想到应该找本书来学习一番。当然是有老师指教的,车耀先、冯诗云、杜桴生都是我的老师,还有《生活周刊》、《新华日报》作为榜样。但主要的还是靠自己边工作边摸索,才领略到一点初步经验和粗浅的知识,逐渐由模糊到比较明确。这段时间之所以决定我一生的事业,其中一个主要的原因是我这人学一行爱一行,干什么钻什么,越干越钻,钻出了兴趣,钻出一点道道,也钻出了志向和信心。因而入了门,就想登堂入室,决心一辈子在这个山头“修仙炼道”。

应该承认,我在从事革命工作的初期阶段,是很能发挥我个人

的才能的,所从事的专业也很适合自己的志愿。完全没有想到,中期以后,这条“修仙炼道”的征途,真好像比唐僧西天取经还要艰险,我在新闻事业中逐渐形成的理想和希望,至今还没有实现。

回过头来追寻一下学徒阶段的情景,那时摸索出来的初步经验和粗浅知识,还是十分可贵的。因而除了在前几章里所谈到的以外,特设专章加以回述。可惜,从《蜀话报》以后的报纸至今没有找到,一些事例就不能具体谈到了。

在这三年中,我参加编辑的公开发行的报刊前后一共 11 个。办了被封,封了又办,这使我越来越深切感到:新闻自由是新闻工作的生命线。

1936 年冬,创办《活路》旬刊时,有如初生的牛犊不怕虎,不懂得办理报刊登记的法律手续,也不知道当局对舆论控制的严格。我们三个同学一商量,就联合写了一个申办书,不等当局批准,就大摇大摆地编印出来公开发行了。当然,很快就遭到当局的勒令查封,这才醒悟到:原来国民党统治下是没有新闻自由的。

从那以后,我们办《大声》周刊,被封了;办《大生》周刊,被封了;办《图存》周刊,被封了;办《星芒周报》,被封了;又办《星芒救亡联合周报》,被封了;又办《抗日先锋》,被封了;又办《星芒报》,被封了;又办《蜀话报》,被封了;又办《新民报三日增刊》,被封了;又办《通俗文艺》五日刊,在我离开成都后不久也被查封了。办了 11 次,查封了 11 次。在国民党统治下,短短三年中间,不是两次三次遭受到扼杀新闻自由的苦痛,也不是五次六次,而是整整 11 次!这在活生生地重复了 11 次的事实教育,迫使我深深地深深地感受到:要办一张人民的报纸,必须争取一个人民的政权;要争取新闻自由,必须争取一个能够真正保障人民民主自由的人民自己的民

主政府。

封了办,办了封,封了再办,再封再办,在三年中一共办了 11 次,这也充分显示出:在国民党的统治下,当时共产党人的那股坚忍不拔、百折不挠和战斗到底的顽强精神。每办一次和每封一次,都是对我们的锻炼!而我们就是在那种恶劣的形势下被千锤百炼出来的,锤炼出越来越坚强的勇于战斗和善于战斗的本领,也增强了我们坚决反对国民党的“一个主义、一个党、一个领袖”的专制政权,执著追求和创建一个人民民主政权的理想、信念和决心。

还应当看到,当时之所以能够封了再办,三年中办了 11 次,其中一个极为重要的政治原因,是当时的中国还是两种政治势力又团结又斗争、相互争夺、相互制约的政治局面。虽然蒋介石想尽一切手段要搞成“一个主义、一个党、一个领袖”的一党专政的中国,但是做不到。不只是共产党反对,各民主党派反对,国民党内部坚持孙中山三大政策的势力也反对!的的确确是广大人民群众反对,因而还很难形成全国大一统的一党专政和一人独裁的专制体制。当时,在国民党统治区,事实上确实存在着限制与反限制、独裁与反独裁的某些民主权利和新闻自由。

千万不能小看这种事实存在着的限制和反限制斗争中的某种程度的民主权利和新闻自由,这比起法西斯一党专政统治下的完全专制独裁的政治局面来说,还是十分难能可贵的。当时,在国民党政府的临时首都,共产党中央可以出版自己的机关报《新华日报》,全国一些大中城市还可能出版在共产党领导下或者影响下的报纸和刊物。在成都,共产党地下党组织领导的《四川日报》、《时事新刊》、《民声报》、《大声》周刊、《星芒报》等等,还能出版。我所参加编辑的《大声》、《星芒》,才能办了封,封了又办,再封再办。即

使在国民党大搞反共阴谋的“皖南事变”影响下，国民党政府的新闻局可以任意扣押《新华日报》有关这一事实真相的很多稿件，但是，《新华日报》在周恩来直接主持下，在万不得已、无可奈何时，还能施展出最后一手的抵抗措施——“开天窗”，在被抽掉稿件的空白里写上了16个大字：“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

为了说明当时这一点点新闻自由的难能可贵，我在1988年出版的《民主论》一书中，曾有过这样一段论述，我以为是值得抄在下面的：

“刘少奇在1943年总结华北、华中等地白区斗争的经验时，曾指出：当时出版了《华北烽火》等党的半公开刊物，又利用了当时平津、上海等地许多‘左倾’刊物，发表了我们所写的许多文章。这样，就迅速将党的新政策广泛地传播开来，在社会上取得了极大的同情。在华中许多重要城市恢复和发展了党的组织，出版了《新华日报》及其它书报，向各方面进行了统一战线工作等，这就有力地配合了党的武装斗争和根据地建设。毛泽东曾经盛赞鲁迅先生在敌人反革命的文化围剿中成了中国文化革命的巨人。设想：如果没有这点点言论出版自由，任何进步报刊书籍不能问世，鲁迅的影响何能如此大的扩展？中国在辛亥革命后，涌现出了一大批了不起的思想家、科学家、文学家、音乐家、美术家，创造了许多了不起的伟大作品，不能不说与封建专制统治被削弱，某些民主形式的出现有关。这也说明，在国民党的反动统治下，即使是间或存在的十分微弱的言论出版自由、新闻自由，对于人民革命和社会进步也是值得充分利用、不可忽视的条件。”

尽管如此，我们对这一点点的自由是丝毫不满足的。我们

的目标是要争取全中国人民的全面的民主自由,争取在全国人民民主制度胜利建立和健全下的新闻自由。当时,我很向往很急于奔赴民主圣地延安,不只是希望在陕甘宁边区的民主自由条件下办一张为人民喜闻乐见的报纸,而且希望我们的国家完全从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下解放出来,也从国民党法西斯主义的铁蹄下解放出来,希望人民的新闻事业在人民真正当家作主的天下,自由地发展壮大起来。

上面所说的我们当时争取新闻自由的情况,只是争取办报的自由。而新闻自由中,我们当时所争取的还有新闻传播的自由。

从《大声》起,车耀先先生就一再向我们传授这堂新闻基础课。《大声》是一个新闻性很强的刊物,它虽是周刊,但它具有报纸最鲜明的时事性,它的首要任务就是尽可能迅速地报道人们最关心的时事新闻。这里要强调报道的,不是一般“人咬狗”一类的社会新闻,而是要强调报道政治新闻,特别是强调人们当时最关心的政治新闻,并不是一般的政治新闻。

《大声》周刊是在1937年1月17日创刊的,“双十二事变”刚刚发生一个月。由于国民党严格的新闻封锁,人们仍然蒙在鼓里,对事变的真相知道的很少。我们日夜紧张地赶着出版《大声》,第一个重要任务就是向广大读者报道“双十二事变”中张学良、杨虎城把蒋介石抓起来又放出来的真相,以及当时共产党的政策和蒋、汪、日之间的政治矛盾。

当时国民党的宣传,是说张学良和杨虎城勾结陕北共军把蒋抓起来,是叛国作乱;以后张受蒋委员长伟大人格的感召,亲自送蒋回南京,是认罪伏法。《大声》透露事件的真相:由于蒋介石一再强迫张学良进攻陕北共军,扩大内战,张学良忍无可忍,联合杨虎

城把蒋介石抓起来,是被迫由促蒋团结抗日转变为逼蒋团结抗日。

《大声》还透露,国民党内部亲日派何应钦趁机加紧活动,一面进兵潼关,一面扬言要轰炸西安,企图一箭双雕,既消灭张杨,又害死蒋介石,以便篡夺蒋介石的军政大权,达到扩大内战、投降日寇的目的。

《大声》还透露:事变时,共产党事先毫无所知,事变后受张杨的邀请,特派出周恩来来到西安进行调解,坚持和平解决,主张释放蒋介石,促蒋停止内战,一致抗日。

《大声》还透露:蒋介石接受张杨八项主张,张才释放蒋介石,而且亲自送蒋回南京,表明自己并无任何私心,完全是为了挽救国家民族的危亡。

当时,在新闻封锁政策的控制下,要透露“双十二”事变的真实情况,不仅消息来源困难,也是大冒风险的事。国民党处处限制记者的采访自由,但当时的记者有好些人确是通天入地,有一套包打听、钻新闻的本事。很多重要新闻都是千方百计搞来的,都是冒着很大风险搞来的,都是敢冒天下之大不韪、敢冒报刊被查封、报人被关进监牢而刊登出来的。这种新闻的报道自由是经过千难万险争取得来的。

特别值得提出的,这种限制与反限制的斗争方法是十分巧妙的。对一些重大事件,既不能登头条新闻,也不能直截了当地报道出来,而是采取了拐弯抹角、声东击西的办法。例如,《大声》为了透露张杨“双十二”兵谏的真相,在署名“笠盟”的文章中作了出色的表现。这篇文章的题目是《宣传与谣言》,可说是一篇很难得的妙文。针对国民党亲日派对张杨的攻击,很简要地把西安事变以来的事实真相,一一公之于众。

这篇文章先批评“休谈国事”的格言已经行不通了。接着说：“委员长被扣的这件事情，不说国人应该如何注意；就是外国人也非常地吃惊。……所以我就像患了神经病一样，东一问，西一问；有人时便谈论，无人时就看报，总想明白真相。几日的努力，所得的材料，不过张学良不忠、不孝、不仁、不义而矣！以一字罪之曰‘逆’，以一字伐之曰‘诛’；不同意此二字者，非国民！有反对此二字者，是共匪！舆论如此，不能深问，既已如此，何敢深谈。”以后，作者请教一位“科学先生”，请他当法官，审判一下张杨有何罪行。这位法官说要判案就得要证据，于是我把所见所闻告诉法官，法官说：“怎么不见被告的片言只语？我不能凭一面之词就下断语啊！”作者说，在他正为难之际，旁边一位老吏说：“上海《日日新闻》和西安广播电台，岂不就可以收到些被告的口供吗？”还说：“《日日新闻》是造谣的，西安广播电台是含有宣传作用的。造谣与宣传是不免的，但瞒不过科学先生。”作者于是订了一份航空的《日日新闻》，每晚听两小时西安广播。结果，不过零零碎碎地看了一些谣言，倒不明不白地听了些宣传，把这些谣言和宣传一起送给科学先生。于是作者巧妙地把事实的真相、所谓的“共产党的宣传和各方谣言”，夹杂在一起，罗列了19条，表面上一视同仁，实际揭露了真相，揭示了真理，不仅把张学良扣蒋时的八项主张和杨虎城的七点政见一一道出，把亲日派扩大内战的活动，蒋介石被释放时的几条保证也一一道出，还把共产党释放蒋介石、促进团结抗日的主张也透露出来了。作者在文章结尾时说：“因此，必须先要经过检查官的严格侦察，认为证据确凿，不然的话，虽然宣判了也是不能禁止人家提出上诉的。”作者有意避开为张杨正面下断语，但看了19条材料，张学良是否“逆”，该不该“诛”，就清清楚楚了。

至于《大声》周刊敢于刊登《共产党调停陕变通电》这一类极为重要的文件,当然不能及时刊出,因辗转传递,来之不易。也不能以大字标题在头条地位刊出,只能用“明日黄花”、“救亡史料”的栏目,刊登在很不显眼的地方。这当然是为了减少引起国民党当局的注意,而对广大读者,他们一看就会抓住,不会忽略过去的。

新闻自由的另一个根本要义,是言论自由,或者叫批评自由,特别是批评当局的自由。旧社会说记者是无冕之王,当然是极而言之。但新闻舆论机关必须具有对当局的严格监督的责任,这确实是它的一个特殊的职能。这点,一个民主的政府,对舆论机关是十分尊重并大力予以扶持的;而一个专制政府,则恰恰相反,他们是十分惧怕,并尽力予以钳制,甚至完全扼杀。

在办《大声》周刊时,我们特别强调舆论监督。除了报道新闻以外,第二位就是发表言论,车耀先先生的主要工作就是撰写每期社论(当时我们叫“社声”)。当时,《大声》的言论真是怀着的一颗赤子之心,大声疾呼,直言不讳,慷慨陈词。当局确实又恨又怕,经常给车先生发出警告和威胁。车先生受到当局的监视、压制和打击,信封里装子弹更是常事。办这样的刊物,写这样的文章,是需要很大的勇气的。当时,人们说在新闻战线上是提着脑袋冲杀,这是毫不夸张的。

不仅要敢于批评,还要善于批评。车先生的社声,不仅政治立场鲜明,像匕首一样又短又锋利,而且注意贴近地方特点,贴近人民生活,给读者以一种强烈的感染力。像纪念儿童节这样的文章,很容易写得一般化,年年照样说几句套话,可是车先生写来,却是笔下生花。他在《大声》11期(1937年4月3日)的社声中写道:“我们的政府定在四月四日为儿童节。可是我们四川的一千五百

万儿童中,有几十个县的儿童还在吃树叶、泥巴,过着饥寒交迫的悲惨生活。真正能过儿童节幸福生活的小孩,在今天只有百分之一的少爷小姐。所以在纪念儿童节的今天,千万不能忘记百分之九十九的贫苦儿童啊!”他又说:“儿童是国家的主人翁,我们不但要改善他们的生活,在今天还要收回失地,争取民族独立,使他们不当亡国子孙,才对得起儿童,否则有何面目见我们的祖先!”

当然,对当时专制的当局,很多批评是不能直言不讳的,只能采取转弯抹角、正话反说的手法来表达真实的意见。比如《大声》创刊号刊登了一篇署名“一兮”的《今日之张学良》的文章。我在第十章中已经介绍过了,文章表面上是批评张学良,吹捧蒋介石,实际上是表扬张学良,鞭挞蒋介石,现在读来,也是上等妙文。

到了星芒报时期,办的是更加大众化、通俗化了。我们的评论注意运用民间形式,文章的内容尽管很尖锐,但说得更巧妙更为自由一点。这个时期,我主持社论,叫“正经话”,不仅有“三言两语”,还有“随说二分”等更为随便自由的栏目。比如在星芒社被捣毁时,在第12期的报上“随说二分”专栏就发表了一篇《校长与军长》的短文,很是风趣。现抄在下面:

“有人看见某校长亲自出马,捣毁星芒报和战时出版社,便问校长与军长有何区别?

“夫子曰:军长主战,校长主降。校长攻内,军长攻外。军长抗日,校长反俄。

“马占山曰:幸好校长不是军长,否则祠堂街已踏为平地。

“殷汝耕曰:可惜军长不是校长,否则,我大皇军已统一中国。

“老子曰:天下事,本有幸,有不幸焉。”

这类文章现在读来也是令人拍案叫好的。

值得单独提出来的,我们当时在争取新闻报道自由和评论自由时,有一个很重要的措施,就是摆脱国民党中央通讯社的控制。当时,国民党“一个党、一个报、一个通讯社”的新闻统治体制,是他们尽力以求的主体体系,正处于逐步强化阶段,还没有达到十分严密的完备的程度,因此可以钻的空子还有,还容许一些比较进步的通讯社存在。如共产党领导的、由范长江同志主持的国际新闻社;由李公朴任社长、由八路军办事处负责经费的全民通讯社;而且还容许各省地方势力办通讯社。其中有些还同中央社唱异调,甚至唱反调,如川康通讯社。至于单纯发布地方新闻的地方通讯社,他们也管得较松。我们就是用“星芒通讯社”的名义去登记立案的,先发行星芒社通讯稿,后办《星芒报》,以后虽然分别叫星芒通讯社和星芒报社,但还是统称“星芒社”。在《星芒报》被勒令停刊以后,星芒通讯社仍然存在。星芒社初期,是一班人马,几个人忙两项工作,以后分开了,我专管报社。在我离开成都以后,星芒通讯社还继续发稿,业务上还有所发展,主要负责人是方白非、肖稚苓,直到1940年初的“抢米事件”发生,成都形势急转直下,通讯社才停止发稿。

我们在办《大声》周刊时,完全避开了国民党中央通讯社的控制,不登中央社的稿子,不按中央社的宣传口径报道和评论重大的时局新闻。到星芒报时期,我们更加强调所办的是一张大众化、通俗化的小报,不能照登中央社的稿件,也不能用中央社那种不文不白的新闻语言,只能按我们的要求来选择和改写中央社的稿件,这就给了我们一个从政治上摆脱国民党中央社控制的理由。

争取新闻自由是我这个新闻学徒所上的一门基础课。在成都初上笔阵时期,我还是一个20岁到23岁的幼稚青年,只是新闻战

线的一个小小新兵,这种基础教育培养了我,鼓舞着我继续前进,不断成长。

在成都的三年新闻学徒期间,另一门很重要的基础课,就是报纸大众化的问题,这是我独特的喜好,它决定了以后在延安十年的办报生涯。新中国成立以后,我被调到人民日报这个全国性的大报,离开了我从事13年的大众化报纸的工作岗位,至今仍然认为这是我一生中一件很大的憾事。现在回过头来追忆成都三年大众化报纸的经验,还是觉得兴奋不已。

从办《活路》开始,思想上逐渐倾向于办一张大众化的报纸。当时的想法很简单:要抗日救亡,就要动员广大人民群众,而群众又处于受压迫受剥削的境地,的的确确是处于水深火热之中。不动员人民,抗日抗不了,当了亡国奴,人民将会受到更大的压迫和剥削;但是不改变人民受苦受难的生活现状,广大人民群众就不能真正动员起来。我初步认识到抗日救亡同改善人民生活是不可分的,这就是孙中山先生把民族主义同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结合在一起的道理,也是共产党把民族解放同争取民主自由和改善人民生活结合起来的道理。

再想到我国当时绝大多数群众是文盲,或者是文化程度很低,如何动员广大人民群众起来保家卫国和强国富民,最重要的措施之一,就是通过提高人民的文化程度来提高人民的觉悟程度,通过提高人民的觉悟,来动员、组织人民参加到民族解放、争取民主自由和改善民生的斗争战线上来。

这个很简单的道理,在我青少年时期的幼稚心灵里,逐渐意识到它的重要性。办一张为广大人民群众能阅读的大众化报纸,就是达到这一目的的一个十分必要的手段。

想得到就要做得到。在《活路》和《大声》创刊时，我们虽然明确确定以广大人民群众为读者对象，在这方面也做了很大努力，但在实际上，我们并没有很好地达到这个目标。在内容上和政治上，我们是坚定地为人民大众的，可是，我们的广大读者还不能是工农劳苦大众，因为他们的文化水平还很低，还看不懂我们的文章。就拿我当时写的《谁战胜谁？》的通俗讲话来说，内容太深，文字的学生腔很重。至于《大声》的其他文章，如社论、专文等，因为要适合中上层的党政人员，中高文化程度的知识分子和市民阅读，内容和文字上还有意识地高深一些，好些文章用的文言词句和历史典故较多，文化程度低的读者显然是难于看懂的。《大声》第6期登了一封读者来信，信中说得很坦率：“照贵刊的立场和主张，是大众化的，那么，词句希望如李公朴先生编的《大家看》那么通俗，价钱希望如马相伯他们办的《救亡情报》那样每份只卖一分钱；说到大众哪，经济、学识多半不及小众，敬请贵刊顾到，这样才能流传宽、收益广！”从这封信，可以看出读者对《大声》的要求，可以看出工农大众急需一个真正大众化的报刊，一个在内容上和形式上都大众化的报刊。当时，除了努力把《大声》办得更通俗一些以外，我们早就酝酿着另外办一个真正适合广大工农群众的大众化小报。1937年年底，在《大声》复刊的时候，我就在加紧筹办这样一张大众化的报纸。

《星芒报》终于在1938年4月出版了。在实践中，对于我前面所谈的简单道理，更加明确，逐渐深刻，也逐渐坚定地决心为这个理想而奋斗下去。

要在内容上和形式上都大众化，使两者很好地结合起来，谈起来容易，做起来却相当困难。当时我们所设想的目标也很简单，就

是想报纸要办得识字不多的人看得懂,不识字的人听得懂。无论在文字写作上和编辑工作上,要做到让群众真正喜爱,当然还要紧紧结合人民群众最希望了解的内容。但是,既不能只注重内容,又不能离开内容只注重文字形式,关键是在结合上下功夫。当时,群众最关心的是抗日救国、对内团结、各战场的进展情况、改进民主和改善民生。我们把及时报道抗日战争和围绕战争所发生的国内外大事放在首位。还特别注意有关群众的具体思想认识问题,尽量用四川的普通话把它写出来,并有意识地运用群众中流行的比喻、成语、俗语、歇后语等等,使读者感到生动活泼,亲切易懂。比如,《星芒》第3期刊登“老唐”写的《三言两语》,就是这样。

三言两语

中国人是大种鸡,叫得迟。这回打日本,越拖越有精神。常言道:“大船烂了有三千钉,中国再朗各打败仗,都不得像日本人一败涂地。你看山东、山西、河南、河北那些游击队和老百姓,岂止‘三千钉’?简直是几千几十万矛子。津浦路战事打得舒展,日本鬼子的援军老是拿不拢,这叫做后手不来,吊只草鞋。(注:当时的士兵同一般老百姓一样,没有布鞋穿;都是穿草鞋,行军时总是在腰上挂一双草鞋,准备脚上的草鞋穿烂了好换一双。)

当时,我们议论过多次:一张人民的报纸,主要在于内容,在文字上不一定通俗易懂,甚至为了照顾文化高的知识分子读者,还要特别采用一些文言文的语法和语句,采用一些典故和古诗词。如成都的《大声》周刊、《时事新报》和《四川日报》,重庆的《新华日报》等。

但是,一张大众化的报纸,在文字上就应当采用普通话,用一般老百姓常用的章法、语法和词汇。用我们当时不精确的话来说,我们认为前一种是“人民小众化的报纸”,后一种是“人民大众化的报纸”。

正如前面所说的,这当然不只是一个文字形式问题,还必须与内容密切结合,力求适合群众。要求更能反映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活情况、困难情况和摆脱痛苦的思想情况,更能满足群众的要求和希望,用群众所能看懂或听懂的文字把这些编写出来。比如,我们特别注意刊登各地农村和工厂的通讯,反映农民和工人的情况,刊登抗战军人从前方来信和他们的家属写给前方战士的信,反映军人和军属的情况。我们还设了一个“跑街先生”所采写的“街头访问”专栏,专门采写走街串巷的小买卖人,反映城市贫民的生活情况。我们还设了一个“老百姓茶馆”专栏,每期登四五篇老百姓的街谈巷议,都是从群众的来稿来信中挑选出来的。在《星芒》第37期上就登了这样一篇:

钱当泥巴用,不肯拔一毛

“成都献金已经七天,一共才得三万元。比武汉三天得百万,当然少得多;就连长沙、西安都赶不到,这是啥来头呢?你说是没得人出钱,那又不像,只要你到献金台去站一会儿,出钱的人还是多得很,不过出钱的多半是穷人,当了铺盖罩子也只不过块把钱;大家都是心有余而力不足,无可奈何。你说成都没得有钱人,那更不像,不见戏场餐馆内,真是钱当泥巴用。大家要晓得是啥子来头,只有去问那些有钱人脑筋中有没有国家观念。”

我们很注意选用群众的来稿来信。我们体会到,大众化的报纸要特别注意吸引人民大众来参加写稿,使报纸真正变成人民自己读自己办、自己的孩子自己爱的报纸。

《星芒报》等一系列的大众化报纸,之所以受到读者欢迎的又一个原因,是我们利用民间文艺形式,每期都刊登了很多富有四川色彩的大众化文艺作品。《星芒报》每期都刊登章回小说的连载,一期只登千把字,很多读者就是为了看这一小段小说来订购《星芒报》的。许多人也是从爱看这些连载的章回小说到爱看其他内容的。我们请冯诗云同志写抗日小说,他以“磨刀人”为笔名写的《华北五英雄》中篇小说,流传很广。我们还设有“城隍庙”专栏,专门刊登“金钱板”、“莲花落”、“花鼓”、“道情”等说唱新篇。《星芒报》还设有“星芒小舞台”专栏,刊登短小的川剧和京剧剧本,登过川剧名家贾培之的川剧和老舍的京剧,都是新编的剧本。这些都是深入群众进行抗日宣传的好材料,很受民间艺人和宣传队的欢迎。另外,我们还登了一些新诗歌和短篇小说。

《星芒报》等还大胆采用各种民间形式,赋以新的内容,称之为“旧瓶装新酒”,我认为是相当成功的。当时我对这并没有从理论上做过什么研究,我本人也不是真正长期深入工农大众的知识分子,只是从参加星芒社宣传队的活动中,比较深切地体会到工农大众的喜爱。只要我们一敲起金钱板,或者唱起小调,群众一下就拥来了,他们是那样聚精会神地听下去。而当我们用学生腔进行讲演时,坚持听下去的人就不多了。平时,我是喜欢坐茶馆的,也爱听评书、洋琴,看看周围的听众,那种着迷的情景是很感人的。

在大众文学“旧瓶装新酒”方面,文艺界当时有争论。怀疑和

反对的人说,民间形式局限性很大,不适于反映新内容。我们则认为,对这种局限性既要承认,又不要夸大,关键在于我们运用得当,善于运用。民间文学当然有一定的格式,比如金钱板,大多是三三四的字句,比较讲究韵脚,它的字句也不是死规定,也有一定的伸缩性,有的也可以加减一二字,而且也可以随时换韵,并不是那样死板。当然,它既然是一种文艺形式,它的内容更适宜于描写具体的事物和人物,不适宜于报道新闻和进行评论。我们虽然尝试过,用金钱板形式写时事政治新闻,由于内容是叙述和说理,加上新名词新术语多,效果不好。但是用金钱板的说唱形式表现抗日英雄人物,描绘一些具体的战斗过程,效果还是很好的。

民间形式是人民大众在长期实践、创造、提炼形成的一种特有的比较固定的格式。在形成过程中,本身就有一个较为长期的修改、突破、创新、完善的过程。我们既要大胆利用群众喜闻乐见的民间形式,又要大胆革新,做适当的探索,进行必要的修改和创新。比如章回小说,在每一回的结尾,总要加上固定的“要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的结束语,吸引读者看了上回,一定要看下回。冯诗云写的《华北五英雄》就不用这个格式,但他保留了章回小说结尾时那种巧妙的伏笔手法,虽然不说“且听下回分解”的话,同样能达到吸引读者非看下去不可的目的。

我在成都办大众化报纸的三年中,在实践上对我进行指引的是冯诗云同志,在理论上给以指点的是周文同志。抗战后,周文从上海回到成都以后,一方面参加四川文艺界抗敌协会和成都地下党的领导工作,一方面继续努力推进文艺大众化运动,编辑过几个文艺刊物,还为《四川日报》、《新新新闻》和《捷报》等编辑过文艺副刊,写过一些通俗文艺作品和儿童作品,还写过《谈目前通俗文学

的重要》、《唱本——地方艺术的革新》、《旧形式中艺术的创造》、《再谈方言文学》等文艺大众化的理论文章。他对我们办的《星芒报》、《蜀话报》热情支持。当时,我们强调“旧瓶装新酒”,广泛利用各种民间艺术形式来宣传抗日和民主,周文在给予鼓励的同时,还一再提醒我们防止不良倾向。依然记得大概有以下四点:一是注意排除在利用中因袭和传播封建迷信的东西,例如他反对用“命归阴”、“鬼神嚎”之类的词儿,反对用过多的文言词汇;二是不能只重形式的机械运用,他不同意用唱词来说时事,因为有很多新名词新术语很难用唱词来表达;三是他反对用那些粗野的土话;四是他主张根据内容来探索旧形式的改革和新形式的实验。这些意见对我们都是很宝贵的。这不仅坚定了我从事大众化报纸工作的决心和信心,也决定了我到延安后在他领导下创办《边区群众报》,坚持报纸大众化工作十年之久的信心和决心。

十七、思想上的来龙去脉

在我离开四川奔赴延安以前的 23 年的岁月里,从小学到大学,从一个未毕业的大学生到一个刚刚踏上革命征途的职业革命者,这一段历史行程,我已经在前面浮光掠影地简述过了。

对于我怎样会走上这条越走越远的、一去不回头的革命道路,从思想上追溯一下它的来龙去脉,还是很有必要的。因为一个人对自己的人生道路作如此重要的抉择,是在一定环境中的思想认识支配下走下去的。同时,也是在走下去的过程中,不断充实和修改自己的认识,不断吸收一些正确的,也掺杂着一些不大正确的思想,才能比较自觉地坚持不懈地走下去的,因而在前进的道路上免不了要走一些偏路、错路和弯路。所以,我想在回述这段历史的具体进程以后,专门追述一下我在这一时期——革命的幼稚时期的思想状况,有的如何从幼稚状态到比较成熟,有的仍然处在幼稚状态,有的已经埋下了我以后产生大的差错失误的思想根源。

总的来说,从思想上可以这样概括:我的这段时期,是一个幼稚的三民主义者向一个幼稚的马克思主义者转变的时期。

如我前面所说的,由于我父亲在我一岁时就早早去世,我们这

个寡母孤儿的家族支系,在那个比较富裕的家庭里,偏偏处于受压制受困苦的地位。

又由于我的大伯父和二叔公是老国民党员——同盟会会员,大伯父在辛亥革命时壮烈牺牲,是著名的烈士;二叔公是国民党左派的高级成员。因而在我稍稍懂事的时候,二叔公和大伯母就给我讲孙中山和辛亥革命的故事。特别是二叔公在我15岁以前,断断续续地对我讲了不少关于孙中山先生十次武装起义,终于推翻清王朝建立民国的历史故事,以及有关三民主义的初浅道理,在我思想上留下了深刻的烙印。

受压制的家庭地位,使我比较容易地崇拜孙先生的英雄事迹和接受他的革命思想,中山先生成为我一生中第一位最崇拜的伟人。

从当时的理解,孙中山先生既饱读中国的古书,信仰孔孟之道,又周游列国,研究世界进步思想,他的爱国主义和天下为公的思想的一个来源是儒家思想,他的三民主义是来源于美国的民有民治民享的思想。

二叔公在向我讲授中山学说的同时,也教育我懂得一点孔孟之道。我从小学起,高小、初中、高中和大学,我读的全是教会学校,读古书很少,只有《论语》、《孟子》和《幼学琼林》等几本,不仅读过,还背诵过,可惜大都是囫囵吞枣,但其中关于民本主义和仁义道德的词句,在我的头脑中,还是长期起作用的。因而在我的进步思想中和为人处世哲学中,自然也吸收了一些儒家学说的某些观点。

我第二个崇拜的是邹韬奋。他主办的生活书店所出版发行的《生活周刊》等一系列杂志和《大众哲学》一类的大众化读物,以及

由此带动起来的同时代的很多进步书刊,向我们这一代知识青年宣传了很多抗日救亡的道理,而且进一步宣传了国内很多进步思潮,宣传了关于苏联、苏共、中共、苏区的一些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方面和理论方面的初步知识,特别是宣传了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的政策方针和中国式社会主义的一些基本观点。邹韬奋确实不愧为中国青年的领袖,他引导一代青年走上革命的道路。

在这个时期,蒋介石国民党多方面背叛了孙中山的三民主义,而中国共产党的新民主主义的学说,又包括了三民主义,真正继承和发扬了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正如毛泽东所说,新民主主义就是新三民主义,就是孙中山自己说的“革命的三民主义”,因而我逐渐从信仰三民主义转到社会主义,从尊重孙中山的国民党和反对蒋介石的国民党,转到尊重共产党,直到参加共产党。即便如此,我仍然笃信我所拥护的毛泽东和新民主主义,笃信孙中山先生的新三民主义。记得在“文化大革命”中,那些极左分子曾经批判包括我在内的很多老知识分子不是马克思主义者,思想仍然停留在民主革命阶段,只是民主主义者,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同路人,是时代的落伍者。当时,我曾经回顾过我在成都时期和延安时期的新民主主义思想,觉得这个思想并不错,不是什么时代的落伍者,恰恰相反,那些极左分子才是时代的疯狂者。当时,我当然不敢说什么,但心里却想,如果我们真的搞几十年新民主主义,那该多好啊!

就是这个革命的三民主义——新民主主义在30年代指引着像我这样整个青年一代走上革命的道路。

从孙中山的民族主义来说,他的反满清反帝国主义的爱国思想,在“五四”以后发展为五族共和的民族平等和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压迫的爱国思想,对我的影响很大。在我读小学时,二叔公就给

我讲过孙先生为推翻清王朝所举行的十次武装起义,我像听《三国演义》、《水浒传》那样,产生很大的兴趣。从那时起,我对孙中山的崇拜就开始了。

1928年,在我12岁到雅安上川南师范学校读书时,开始知道有一个“打富济贫”的共产党。那时国民党政府对“共党分子”的镇压是很残酷很恐怖的。在我们学校就曾经被军警包围搜查共党分子。这样,在同学中关于共产党的传说就更多了。那时,我经常到图书室去看报,剿灭朱毛红军和谩骂共产党的新闻天天都有,我对国民党的宣传,红军“节节败退”、“溃不成军”之类,我还是有几分相信的。当时,我对红军武装反对国民党还是同情的,认为他们无非采用孙中山武装起义和陈胜吴广农民暴动的办法。但对国民党宣传的“共产共妻”还是觉得可怕。对“打富济贫”,我觉得有理,对“打土豪分田地”,觉得分田地有理,但对土豪都打,就觉得过分。因而对“共产”还同意,但“共妻”却认为是“大逆不道”的事。

当时找不到共产党的书。同学们说郭沫若、蒋光慈、鲁迅是共产党,找到他们的小说,是红书皮、书边不裁的,很奇怪,在书里也看不到关于共产党的情况,反而对郭的爱情诗和蒋的恋爱小说产生了兴趣。

“九一八”时,我又回到自贡培德中学,我怀着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仇恨,参加学校组织的抗日救亡宣传队。为了宣传,我常看报,这才从报上了解一点关于国民党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和共产党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的主张。

1933年秋进入省立第一师范以后,开始看到《生活周刊》。此后国民党暗杀杨杏佛,《生活》被查封、出版《新生》以后,几个好朋友更加热心阅读。以后因《闲话皇帝》一文,《新生》也被查封,以后

又出版《大众生活》。

这时,我已认识了教员车耀先,在他指引下,我对国民党对日本奴颜婢膝和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有了进一步了解,对共产党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十分拥护。在邹韬奋出版的杂志和书籍中,我进一步了解到,尽管蒋介石在好些方面背叛了孙中山的民族主义,但孙先生民族主义的思想仍然闪烁着光辉,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思想就是继承和发扬了孙先生民主主义思想。

孙先生的民权主义,同他的民主主义是密切相联的,推翻满清以后就是建立民国,对外坚决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压迫;对内汉满蒙回藏五族平等,给人民以民主自由的权利。

记得在我四五岁稍稍懂事以后,二叔公和大伯母就给我多次讲述大伯父反对清王朝、杀死县官、宣布独立以致英勇牺牲的英雄事迹,在我小小的心灵里就播下了反对专制政府的仇恨种子。

民国成立了,但民主政府并没有建立起来,孙中山壮志未酬身先死。孙中山逝世时我才九岁,二叔公继续给我讲蒋介石背叛孙中山,还是搞专制腐败那一套。我对清政府的仇恨就逐渐转到国民党政府身上。随着年龄的增长,对国民党政府的反动政策了解更多一些,特别是在“九一八”以后,他的对外妥协投降、对内剿共内战,对人民压迫剥削……我心灵中播下的仇恨种子就日渐成长起来了。

在我思想上,反日和反蒋,在相当长时期内是分不开的。到了“双十二”事变以后,我开始懂得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才由反蒋抗日变为联蒋抗日的思想。尽管如此,由于蒋介石独裁专制的法西斯统治,我越来越坚定地认为,争取人民民主和争取国家独立是密不可分的。甚至认为,国内是否民主是抗日能否胜利

的关键。在成都从1936~1939年三年间,我所编辑的报刊上,宣传争取民族独立和自由民主是两个结合得很紧密的主题。我所办的报刊,办了被查封,封了又办,11次办,11次封。这一方面是我受孙中山先生十次武装起义屡败不馁和受邹韬奋从《生活周刊》到《生活日报》坚强不屈的战斗精神所鼓舞。另一方面,也在战斗中增强了我反对专制、争取民主的信念和决心。从11次的查封中,使我十分深刻地体会到:民主政治是新闻自由的生命线,不在中国大地上铲除法西斯专制统治,就不可能有中国的新闻自由。这一鲜明的原理深深铭刻在我这个初步跨入新闻战线的年青战士的心上,这也就决定了我奔赴延安这个民主圣地的决心,殷切希望到解放区去办报,去追求崇高的新闻自由。

邹韬奋先生主持的周刊,一再肯定孙中山的民主思想,称赞他是中国近代革命运动史上第一个最鲜明地主张民主政治的人,称赞他是始终不渝地为民主政治而艰苦奋斗的人。毛泽东说,三大政策的三民主义是新三民主义,又说这就是共产党民主革命阶段的纲领,是共产党的最低纲领,而共产党的最高纲领是共产主义。

老实说,在我于1937年底参加共产党时,对什么是共产主义,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我的认识是很肤浅的。我对新民主主义的理解是从对新三民主义的理解而来的。而这些,也主要是从当时韬奋先生所主持的书刊中读到的。因为那时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还没有写,共产党很多文件和毛泽东的著作当时都是很难看到的。我曾经找到一本《共产党宣言》,读了三遍,可说是似懂非懂。我还借到一部《资本论》,读了两三个月,硬着头皮从头读到尾,实际还是没有读懂。如果说是“一窍不通”,是有些夸大了,说是懂得很少很少,却是事实。对资本家发财致富之路是剥削工人,对资本

主义制度就是维护这个剥削工人的统治制度,对无产阶级革命就是要推翻资本主义制度,等等,还是有了一点点粗浅的理解。

当时,我的理解是:国民党政府是资产阶级政府,实行的是资本主义制度。共产党的主张,本来是应该打倒它,只是为了大敌当前,日本帝国主义不只是中国无产阶级的敌人,也是中国资产阶级的敌人,两个阶级应当团结起来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因而共产党改变了打倒国民党的政策,改变为联合国民党实行抗日救国的政策,国民党也应该改变剿灭共产党的政策,改变为联合共产党实行团结抗日的政策。在国内政治上最主要的政策,就是要实行民主政治,用我们当时的话来说,就是应该改变国民党“一个主义、一个党、一个领袖”的法西斯专制的政策,改变为各个民主党派团结合作、共同执政的人民民主专政的政策。

当时,我对共产党的最低纲领同最高纲领之间的根本差别,就是对无产阶级专政的认识,我还是似懂非懂、半信半疑的。对一个初进社会的小青年来说,对理论是非的辨别能力是很差的,但是对于具体的人和事好坏的判断能力还是比较明确的。我常常是从人物的优劣来判断他所信仰的理论的是非,而不是从理论的是非来判断信仰者的优劣。最早我崇拜孙中山,崇拜我的大伯父胡馥垓;“双十二事变”时,我敬重张学良、杨虎城,也敬重周恩来。以后,我越来越崇拜邹韬奋。在抗战时期,我开始敬重杨杏佛、杜仲远,以后是“七君子”以及国民党民主党派的一些爱国领袖人物,如宋庆龄等。当时,对共产党的领袖人物知道的很少,李大钊、陈独秀的声望比朱德、毛泽东还高。在我心目中,比较熟知和敬重的人物中,非共产党人士比较多也比较突出。我所崇拜的邹韬奋当时也不是共产党员,但的确是他使我加深对抗日救国的理解,使我更了

解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也使我懂得一点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道理,特别是他在新闻出版事业上的业绩和奋斗精神是我学习的楷模。我虽然想过:在共产党的最低纲领时期,这些非共产党人,当然应当是人民民主专政政权中的领导人物,如果我有选举权的话,我就选这些人来执掌国家政权。到了无产阶级专政时期,只有无产阶级的民主,没有资产阶级的民主,如果要把这些在抗日时期的有功之臣也排除在最高领导层之外,我觉得很不合理,也很难理解。好在当时我认为这是很远很远的事,到快要离开成都以前,在1939年5月,我被派到重庆红岩嘴八路军办事处去参加党员训练班时,听到周恩来讲新民主主义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我才懂得共产党的方针政策是争取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政治力量。从当时周恩来、董必武、吴玉章等中共领袖人物在重庆的活动来看,他们的政治气量也是十分豁达大度的。这才使我更相信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是我国今后一个很长时期的最民主的政治,是孙中山民权主义的继承和发展。

根据我当时的一知半解,我对于无产阶级专政是一个阶级一个党的专政,还是很不理解的。因为蒋介石的国民党是一个阶级一个党的专政。德国希特勒的法西斯党也是一个阶级一个党专政,这都是相当令人恐怖、令人毛骨悚然的,同多党联合专政的民主政治是背道而驰的。为什么资产阶级的多党专政是专制制度,而无产阶级的一党专政制度却是民主制度?我那时很不理解。

孙先生的民主思想,对我走上新闻道路,特别是坚持从事大众化宣传工作方面,有着相当深刻的影响。记得当我准备参加车耀先主持的《大声》周刊的编辑工作时,我曾去看望二叔公胡素民。他当时是国民党四川省党部的设计委员,他同车耀先很熟,他们曾

一起筹划组织成都中苏友好协会。他对我参加组织民先队和编辑《大声》周刊的工作很支持。他说,他参加同盟会后的第一件革命工作,也是新闻工作,他被指派到京津同盟会的机关报《国民报》去当编辑。二叔公同我讲到了孙中山先生重视新闻工作的事。他说,孙先生在北伐前曾对党员作过一次讲演,题目叫《革命成功全赖宣传主义》。孙先生认为搞革命无非两种方法:一是“用武力压迫群众,强迫去行;一种是靠宣传,使人心悦诚服,情愿奉命去行”。先生在这个讲演里批评国民党过去搞革命“用武力的斗争太多,宣传的斗争太少”。他认为革命成功的方法,应该是“宣传要用九成,武力只可用一成”。

二叔公还向我介绍了中山先生的训政思想,就是“唤起民众,提高人民实行民主宪政的觉悟和知识”。他说孙先生在遗嘱中,特别强调积40年的经验,就是要“唤起民众”。为了“唤起民众”,孙先生十分重视言论权和结社权。1924年,先生北上经过上海招待新闻记者时,作过一次很著名的讲演。他检讨说,辛亥革命没有成功,中华民国是有名无实,是假民国。先生认为,中华民国,号称民国,要名副其实,就是“要这个国家真正以人民为主,要人民能够讲话,的确是有发言权,像这个情况,才是真民国;如果不然,就是假民国”。孙先生希望新闻界组织团体参加国民大会,公开讨论和解决国家大事。先生对新闻界抱着很大的希望,希望报界作国民的响导。他在这次讲演中说:“诸君是先觉先知,应该以先觉后知,以先觉觉后觉,尽自己的能力为国民的响导。”

二叔公把孙先生这两个讲演稿和其他几份讲演稿让我拿回去好好阅读。孙先生真是一位杰出的宣传家,他的讲演很大众化、通俗化,他讲得深入浅出,既有很高深的道理,又有很多人所共知的

具体事例,很引人入胜。

在这一时期,我最崇拜的两个伟人孙中山和邹韬奋,不只是我革命思想的引路人,也是我一生新闻工作的响导。

对孙中山先生的民主主义,我在少年时期就觉得十分重要,十分合乎情理。这不仅因为我是一个比较富裕家庭里的受压制者,是一个穷学生,而且还因为我自小为读书求学东奔西跑,到威远,到自流井,到雅安,到成都,近的百十里,远的几百里上千里,来来去去,都是徒步行走。路途中,见到破衣烂衫的劳动人民和沿街乞讨的乞丐,以及那些断壁颓垣的房舍,实在太多太多了。人间的贫富悬殊,重重苦难,时刻刺激着我的幼小心灵,我不断地在心灵中寻求答案:这是为什么?当我知道一点孙中山先生的平均地权、节制资本的民生主义的初浅道理时,我就觉得这比打富济贫的侠义行为更好,能够比较普遍而广泛地解决人民贫穷和社会不公的问题。

很小时我就知道,大伯父胡馭垓不仅是一个革命家,而且是一个实业救国的民主主义者,主张建设一个富强的国家。他参加四川保路同志会,组织保路同志军,就是为了确保四川人民的筑路权,依靠自己的力量,把铁路从成都修到重庆,从重庆修出四川,把四川同全国密切联系起来,从根本上改变“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的封闭落后面貌,大伯父为这一理想献出了生命。大伯母陈凤章继承大伯父实业救国的思想,在县立女子师范学校当校长时,办了蚕桑班、纺织班等实业专业,还鼓励我母亲进蚕桑班,能学会一技之长,独立谋生,我随母亲到县城读小学,知道一点种桑养蚕、纺丝织绸是振兴实业的一个好办法。以后,二姐在成都进入女子实业学校的化工班,她也向我讲述实业救国的重要,所以我的实业救国

的思想萌发得比较早。

在很长时期内,我都以为民国建立以后,革命任务已经完成,主要任务就是搞建设。1935年我决定报考华西大学数学系时,不只是因为在中学时受数学老师的影响,比较喜欢数学,还因为我认为数学是一切科学的基础,而科学又是发展实业的有利武器,所以攻读数学是很好的选择。

“一二·九”学生抗日爱国运动的爆发,我才比较明确地认识到,国家的革命任务远远没有完成,对外不独立,对内不民主,就没有振兴实业的起码条件。这样我才下决心从华西大学的数学系转到四川大学的政治经济系,从实业救国思想转变为政治救国的思想,认识到抗日救国是振兴实业的先决条件。

此后,我才逐渐认识到,建设民族工业和改善人民生活,必须同民族民主问题适当结合,说明我原来主张发展工农业、改善人民生活的思想还是重要的。

我以后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是因为我认为它是从社会革命出发的,马克思主义者努力追求的理想社会,是一个消灭剥削、消灭压迫的社会,我觉得这个思想同孙中山“天下为公”的思想是一致的。

对于共产党“打土豪分田地”和“没收资产阶级的财产”的政策,在相当长时期内我是不理解的,当时国民党报纸的宣传是“打”得很惨、“没收”得很惨,是令人十分恐怖的。等到我知道中共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知道中共改变了土地革命时期的方针政策,这才认识到中共的真正主张,认为与孙先生的平均地权和节制资本的主张是一致的,是合乎当前中国社会实际的切实可行的政策。

在成都从事抗日救亡宣传,特别是编辑大众化报刊的过程中,

逐渐加深了认识：不仅必须在革命成功以后专心致志地从事经济建设，就是在革命斗争的过程中，如果不配合进行经济建设，不相应改善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活条件，也不可能真正发动广大群众积极参加到革命斗争的行列里来，革命斗争也就不可能得到胜利。

十八、叛逆的恋爱

在写到我这 23 年的历史的结尾,不能不写写我的恋爱。这是
滋育我成长、鼓舞我走上革命道路的恋爱。

这是青梅竹马、从小就萌发起来的爱情;是十分甜蜜而又伴随着痛苦的爱情;是几罢不能,历经挫折,终于花好月圆,白头偕老的爱情。

她是我的堂姐,比我大四岁,是大伯父的第二个女儿。当时,她的名字叫胡德辉,我叫胡德恕。

我和二姐之间的感情,由童年、少年时的姐弟手足之情,随着岁月的流逝,年岁的增长,在不知不觉间转化为男女之间的爱情,时而清晰,时而混沌,时而热烈,时而淡漠,说不清,道不明,纠缠在这种不该发生的情感矛盾之中。直到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和二姐早已过了而立之年才结合为合法夫妻,前后走过了近二十年的曲折崎岖的爱情之路,才算有了渴望已久的美满归宿。

回想起来,我和二姐之间的这段恋情的萌芽,还是从我五六岁时说起。

那一年(1922),大伯母在威远女子师范学校当校长,一家人住

在威远县城里。我一岁多时,父亲去世,哥哥过继给大伯母,母亲守着我,同祖父母一同生活。大伯母受大伯父的影响,一向主张男女平等,女子应当有独立谋生的能力,不应做男子的附属品和家庭的奴隶。她劝说祖父母同意让我母亲去学习,进了女子师范的蚕桑班。那时进职业班的女学员,有未婚的,也有已婚的,已婚的女学员常常拖儿带女,我随同母亲进了城,和大伯母一家住在一起,我进入小学读一年级。

我小时,又好学又调皮,学习成绩好,捣乱的事也不少。记得有一天,一场大雨过后,我和小朋友们放学回家,路过一段山坡地。山水从山坡上顺沟冲下,水势很急。我们打赌比赛,看看谁敢从高处顺沟滑下来。这是一场危险的游戏。冲下来的山水,混杂着石子、泥沙、树枝等各种杂物,弄不好,轻者撞个鼻青脸肿,重者有被山水冲走的生命危险。可是我们这群不知天高地厚的顽皮儿童,个个逞能,谁也不甘落后,我当然也不能示弱做胆小鬼。我们一个接一个地跳进水沟,从坡上顺沟滑下来,一个个弄得满身泥水,鼻青脸肿,头破血流。回到了家,母亲一见,吓得双腿发软,半天说不出话来,不知我碰到了什么事,成了这一副“死里逃生”的模样。等到问明了原因之后,她又疼儿子又生气,将我按倒就打屁股。我本来经过那场惊吓和伤痛,心中已经充满了懊悔和委屈,母亲不但不安慰我,反而又打又骂,要我承认错误,保证以后放了学就回家,不准和同学一起玩耍。我死不告饶,拼命地哭叫反抗,同院的邻居出来劝解。可妈妈是个烈性子的人,气得她把我拖到院内井台上,头朝着井口,一边打一边说,谁来救,就把我扔到井里。邻居们在母亲盛怒之下,谁也不敢上前去相劝。这时 11 岁的二姐,悄悄绕到母亲身后,趁母亲不备,猛然冲过来,推开母亲,将我抱在怀中,转

身跑回家里，闭上门，不让母亲再进来打我。二姐为我擦干了泪水和血污，换上了干净衣服，安慰我，劝告我，再也不要去玩这种危险游戏。这件事牢牢地刻在我的心里，二姐爱我、疼我，是我的保护神。我总愿跟着她进进出出，依偎在她身旁，听她为我讲故事，教我做功课。

和二姐一家在威远共同生活了一年，由于祖父病故，祖母需要人侍候，再加上母亲对学习缺少兴趣，我和母亲又回到界牌场。每年寒暑假，大伯母一家总是回到界牌场老屋小住。

一年之后，二伯父把祖母和母亲搬迁到离界牌场五里路的乡下，住在四合堡的寨子上。每年暑假，二姐回界牌，总要到寨子上我们家来住一些时日。她特别喜欢二叔公，二叔公也特别喜欢她。因为她自小就决心继承父志，要做一个救国救民的有用之人。她学习成绩优异，又敢说敢做，勇于冲破封建陋习。二姐每次去看望二叔公，总是把我也带上。二叔公给我们讲了很多关于大伯父革命牺牲的事迹和孙中山的革命故事。

二叔公讲到大伯父牺牲以后，大伯母背着刚生下不久的二姐，手牵两岁多的大姐，随难民逃出威远，投奔保路军，才免遭诛杀。胡氏一家为推翻清政府的封建统治，献出了最优秀的儿子。大伯父英勇战斗壮烈牺牲的事迹，深深地激励着我们这两颗少年的心。作为胡氏的后代子孙，我们决不辱没先辈的光荣历史，家族的荣誉感促使我们发奋读书，将来能成为社会的栋梁之材。我和二姐之间的感情，也在这种革命教育中深化，同时激发了我们立大志、干大事的理想和目标。

1926年，我在四合堡读完四年制小学，10岁了。要读高级小学，只有到威远县或者自流井去，二伯父不愿出钱供我升学。我劝

阻母亲不要去求他,母亲只好把我送到自流井的二舅家,他在盐井上作管账先生,母亲求他送我住进培德中学的高小班。两年后升入中学,又读了一年。二舅对我母亲说,他实在供不起我继续上中学。我学习成绩好,一心想读书,可是学费、食宿费都成问题。正在忧心如焚的时候,二姐随大伯母在暑假中回乡,问起我读书的事,也觉得为难。她想了想说:“我们去找二叔公,看他有办法没有。”于是她带我一同去见二叔公,请二叔公设法帮我上初中。说也凑巧,叔祖父的女婿郭译卿在雅安上川南师范学校当教务长,如果去读师范,学费和食杂费都可免除,花钱不多。二叔公答应托郭姑爷带我到雅安去读书,我们都喜出望外。但是,雅安离威远有七八百里路,母亲舍不得,不愿我远行,二姐又花了一番功夫才把母亲说通。母亲也觉得没有更好的办法,哭了一场,只好勉强答应。这年二姐已16岁,正在成都读职业中学。她在我心目中,是那样足智多谋,为我救苦救难,成为我心中崇拜的女神。

在雅安上川南师范只读了一年就回来了。这主要是母亲不放心我这惟一的儿子,小小年纪就离家在外,万一有个闪失好歹,将来靠谁来养老!母亲听说我那位在盐井管账的二舅的职位被提升了,她又去请求二舅资助我回到培德中学去继续读书。同时,也因为郭姑爷在上川南师范的聘期已满,他也要走。我在学校受大龄学生的欺负,也不愿继续在雅安读下去。所以,母亲一说回自流井去读书,正合我的心意。

在自流井培德中学毕业那一年,大伯母和二姐也到自流井来教书。那时,无论是当教员,还是当职员,都不像我们现在这样,一干就是十年八年,甚至几十年都在一个学校里教书或一个机关工作。学校的教员,都是聘一个学期,到了寒暑假,如果接不到学校

继续聘任的聘书,就算到此解聘,另谋职业。这就是当时教育界的所谓“六腊战争”,就是每逢六月或腊月(十二月)争找下学期的职业。因此,大伯母的教书生活,常常是一年半载就换一个地方,家也搬来搬去。这年,大伯母在自流井曙光中学教书,二姐在职业中学毕业后,因为没钱升学,正好也在离自流井几里路的贡井一家大盐商家中当家庭教师。一到星期日,我就到大伯母家或二姐处,和她们共度一个快乐的星期日。

这时,在培德中学读书的,有我们胡家五个子弟。除我以外,有过继给大伯母的我的大哥胡德承,有二伯父的儿子、我的七弟胡德厚,有二叔公的两个儿子、我的八叔和九叔。他们的经济状况都比我这个寡妇的孤儿好,也只有我是靠舅父的资助上学的,我也不愿多花舅父的钱,从小养成省吃俭用的习惯。每当二伯父从界牌场坐轿子到自流井来玩,把七弟带去看电影、吃馆子,我就感到不平和闷闷不乐,有时为此蒙着被子哭一场。那时大伯母给我大哥的钱也不少,他对当时刚问世不久的自行车很着迷,星期天就租一辆车子从公园的山坡上向下滑行,同几个孩子一起玩得很痛快,他也很少到大伯母那里去玩。只要二姐从贡井回到大伯母家,我总是去同她一起玩。她如果不来自流井,我就专程到贡井二姐教书的那个人家去玩,感到特别的亲切温暖。

在这一年中,我从大伯母和二姐的口中,比较具体的得知家庭内部的一些不公平现象,知道了祖父遗留下来的家产,应该按三股来分,实际上全被二伯父独占。国民政府在1921年追认大伯父为辛亥革命烈士后,发给烈士遗属的3000大洋抚恤金,也由二伯父掌管。国民政府为给烈士遗属补偿损失,决定我家派一人去作一任官员,结果还是由二伯父到川南一个县去当了一任厘金局长。

这样二伯父在界牌场买房买地，开茶馆，放高利贷，很快就成为当地一个富豪人家。大伯母自来主张凭自己本事生活，对大伯父的抚恤金的使用，也不争不问。我母亲对这些事不可能不知道，但她从不对我说这些事。对于二伯父不愿出钱供我上学，她也只是向二伯父去恳求，人家不给，她也不据理力争。我更是不愿去求他，宁肯求二舅也不愿去求二伯父。

二姐知道这些事，心里愤愤不平，早就想去同二伯父讲理，受到大伯母的劝阻。眼看我初中毕业了，又面临读高中的用费问题，如何解决？二姐是一个敢说敢做，富有同情心，敢于打抱不平的女性，她为我策划了一场家庭斗争，趁着大伯母回乡，二伯父照例设宴招待全家老少的机会，决心同二伯父挑明家庭经济问题，逼他答应供给我到成都读高中的费用。

这场策划好的家庭斗争，既无唇枪舌剑针锋相对的说理论战，也无面红耳赤寸步不让的激烈斗争，正如我在前面《一场不战而胜的家庭革命》一文中所述，出乎意料地温和地解决了。当然，二伯父也是一个聪明人，他一听二姐的话，知道自己理亏，所以二姐的话还没有说完，二伯父就表示愿意供我到成都升高中。

当时，二姐和我毕竟单纯幼稚，以为我们的目的达到了，斗争胜利了，高兴得不知如何是好，在长辈面前只能压抑斗争胜利的喜悦，装做一副平平常常的模样。吃完饭，大伯母和母亲留在二伯母家打牌，我和二姐一同回到大伯母家中，一进门我俩就欢呼、跳跃起来：“我们胜利了！”斗争的胜利，理想的实现，使我对二姐充满钦佩和感激之情。二姐高兴地拥抱着我，我就将她抱起来，在房中打圈旋转。我们是那样的快乐，这快乐使我们忘却了一切，我们很自然地脸贴着脸，嘴对着嘴，亲吻起来。很快，二姐感到不对，在我怀

中挣扎,叫嚷着:“胡三放手,快把我放下!我听不见这些,只顾转啊转,二姐那丰满而柔软的女性身躯,在我怀中颤动。我的脑海中一片混沌,不明白自己在干些什么,只有爱的火焰在燃烧。从此,少年的我,陷入了对二姐的深深爱恋之中。”

发生了这次事件以后,我与二姐之间情感,发生了质的变化。我寻找一切可以单独接近她的机会,只要我们两人单独在一起时,我就难以抑制情感的冲动,总想去拥抱她,亲吻她。二姐总是推开我,温柔地制止我,但从不为此而发怒斥责我,这更使我心里燃烧起炽热的爱火。少年之恋,总是抛开现实,充满了幻想,憧憬着美好的未来。在离家上成都前的一天,我和二姐到四合堡寨子城墙下的竹林里去玩,我们躺在一块大石板上,仰望苍穹万里,浮想联翩,近看翠竹婆娑,婀娜多姿,心中柔情万缕,神魂荡漾。二姐的一根头发飘落在我的脸上,我又从自己头上拔下一根发丝编结在一起,藏在一条石缝里。二姐看着我的一举一动,默默无语,神情黯然。天真的我,对此却全然不觉,对二姐说:“我们要做结发夫妻,让它日后为我们作证。”二姐叹了一口气,只说了一句:“傻三!”就转身回家了。

我们的父亲是亲兄弟,二姐和我是堂姐堂弟,血缘关系近,这无论在以往的旧社会,还是今天的新社会,都是不允许结为夫妻的。当时,我只知道这是违背社会道德规范的,却不知道其中的道理,更不知道违背了这项规定的严重后果。对这场没有结合希望的爱情,二姐为什么说我是“傻三”,我并不明白其中的含意。

暑假过后,我随二姐到了成都,考进了华西大学的协和中学高中一年级。从1932年下半年到1934年的下半年,由于二伯父的失信,我在华西高中只读了半年,母亲来信说二伯父又不给钱了,

我只好东挪西借又读了半年,才决心考入四川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再读一年级。二年级时,一连害了两场大病,处于贫病交加的境地。朋友们劝我还是应该向二伯父要钱,我给他去了一封信,只给我汇来五元钱,气得我把汇票撕了,发誓今后决不要他的臭钱。

这几年二姐不在成都,在外县教书,我们书信来往,绵绵不断。她的来信虽然很理智,也很真情,我给她的信就放肆得多,但她从来没有责备过我。

这时,我正由少年进入青年时代,从同学中流传的一些书籍上也看到了男女之间的性爱内容,我对二姐的爱意已脱离了少年时代那种纯真无瑕的境界,具有了人类本能的性冲动。但是,我们双方都知道,我们是不能结婚的,这爱,必然是要夭折的。理智使我们发热的头脑冷静,激情又使我们难以控制爱的冲动,我们共处在希冀与失望,爱的短暂和甜蜜与爱的归宿渺茫的矛盾之中,备尝了爱的痛苦与辛酸。

1934年秋,二姐应聘到宜昌中学去教书。临行前我们很冷静地分析了我俩的前途,她劝我早日找一个爱人。我也劝她早日结婚,祝福她找一个比较如意的伴侣。果然,她在宜昌中学,很快就和一位男教员结了婚,1935年一同去了北平,想在北平读大学。

得到她结婚的消息,我的心情是十分矛盾的。一方面为她高兴,祝愿她们恩恩爱爱,白头偕老;一方面又十分痛苦。我们之间虽常有信件来往,但我对她的思念和爱恋的话,一句也不能说,只能深深地埋藏在心底。

1936年夏天,她们夫妇都回到成都,二姐生下了第一个孩子。我们在表面上是很理智的,但我们还是偷偷地抱头痛哭过。我责备她不该不同我打个招呼就决定结婚。二姐说,我们是堂姐弟,是

不能结合的,这种情感,只能终止和放弃。她劝我忘了她,另选一个中意的姑娘,不要再为这场没有希望的爱情而苦恼。

二姐的结婚和她对我的劝告,使我对她的情感一度冷却下来。可是不久,我就逐渐得知了二姐对自己的婚姻并不满意,她们夫妻之间经常争吵,二姐也有所表示,她们的结合是相当草率的。

二姐是一个活泼开朗、敢说敢做的女人。她自幼在大伯母的影响和教育下,主张男女平等,女人不依赖丈夫,应有自己独立的职业,独立的人格,有平等的家庭地位,不能做丈夫的附属品。这种性格和志向,大大违背了贤妻良母的中国女性的传统美德,理所当然地很难得到一般男人的赏识。她们夫妻间的感情裂痕在扩大。

当我了解到二姐的婚姻陷入这种不幸境地之后,我对她的同情和爱恋,又死灰复燃,希望在她的不幸中给予她一些人生的快感。这样,我们之间的恋情,一直断断续续地维持着。

1937、1938年,我参加了民先队的工作,二姐参加妇女救国会的宣传活动,我们都在抗战救国的救亡团体中工作,身边都有许多优秀的女青年。二姐常常向我介绍她的一些女朋友,希望我移情别恋,结束这场没有希望的爱情。我也劝她们夫妻和睦,家庭幸福,我也就放心死心了。可是,在我接触的几个女孩子中,同二姐一比总觉得相差太远,很难产生爱的情感。当时我们因忙于抗日救亡活动,常常数日数月不得见面,而一旦见了面,那炽热的爱恋之火,就会冲破理智的屏障。一想到婚姻,我们也都知道这是没有希望的事。所以,我和二姐之间,一直固守着那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不敢与社会的传统道德背离得太远。

1939年5月,中共西南局在重庆举办新党员训练班,成都市

委选派了两名新党员去受训,恰恰选派了我和二姐。

我们一到重庆就面临着日本侵略者对重庆的轰炸。飞机天天来扔炸弹,城里一片混乱。空袭警报一响,人们携老扶幼,纷纷钻进防空洞去。原定我们受训的重庆曾家岩八路军办事处,已被炸成一片废墟,办事处已迁至红岩嘴一家私人农场的二层小楼里,来参加受训的四十多名学员无处安排。有人提议,训练班停办,学员各回各地;有人主张,既然学员都来了,还是设法找个地方,把训练班办下去。恰好这家农场的场主饶国模是大伯母娘家的亲戚,二姐就去找饶伯母商量借房。饶伯母思想进步,同情支持八路军,就将一间六十多平米的大草棚借给了我们。学员们自己动手,将草棚改造了一番,四壁透风的竹竿墙抹上泥巴,可以遮风挡雨,棚内搭上三面的木板床铺,四十多人并头睡。训练班有男有女,都是年轻人,房小人多,大家挤在一起,从左边起睡男的,从右边起睡女的,男女相临的中间分界线,由我和二姐“接壤”。大家说,你们是姐弟,挨着点,没关系。于是我和二姐就这样并排睡了一个月。

岂不知,我和二姐之间,早已萌生了不为人们知晓的隐蔽着的爱情。每晚,我和她近在咫尺地睡在一排床铺上,尽管我们都循规蹈矩地严守着这条分界线,但是我更加感到,今生能够如此亲密地和二姐朝夕相处,那是多么幸福啊!

从重庆受训回来,党组织通知我,国民党当局已经注意到我,要我隐蔽起来,不再公开活动,准备去延安。我临时住在成都北门北巷子的大伯母家。这里靠近郊区,地点偏僻,不为国民党特务所注意,地下党的一些负责人,也常到大伯母家来开会,她为大家站岗放哨。大伯父牺牲的那一年,大伯母才20岁,她不争祖产,不争丈夫的抚恤金,终生以教书育人为业,自立谋生,将两个女儿和一

个过继的儿子抚养成人。大伯母和大伯父是自由恋爱结合的,所以她对女儿们的婚姻,也是抱着不干涉的态度。但对她自己的婚姻,却是严格遵守传统的旧俗。二姐几次劝她改嫁再婚,她都严词拒绝。二姐也用开玩笑的口吻对她说:“我就喜欢胡三,我要同他结婚。”也遭到大伯母的责骂。因为我勤奋好学,大伯母从小就喜欢我,当时决定把大哥“抱”(就是过继)给他作养子时,她就说过要我。因为“抱大不抱小”的旧规矩,最后还是抱了大哥。大伯母不知我同二姐之间的关系,她从没有想到我们之间的感情会发展成恋爱。这年二姐的丈夫在外地教书,她又怀上了第二个孩子。

这年,11月中旬的一天,我忽然接到通知,成都党组织决定我立即去延安,要我不要带什么衣物,第二天有人来带我到八路军兵站。临别前夜,二姐和我,互道珍重,难舍难分。此一别,能否再相见,难以预料;和二姐这场剪不断的爱恋,是否到此就算了结,更无法预测。命运将把我和二姐引向何方,又怎能知晓。离别在即,我们都难以压抑情感的冲动,我和二姐终于携手攀登了八年来这场恋爱所达到的身心交融的顶峰。

第二天傍晚,成都地下党的一位领导同志,按预定时间把我带到祠堂街的一个大旅馆,走进了八路军兵站的办事处。他们让我立即换上了八路军的棉军装,带上“八路”的袖章,我就成了八路军的一位文书上士。第二天一早,登上八路军的军车,坐在堆积得高高的棉军装上面,离开了生我养我的四川大地,向延安进发了!

从此和我二姐一别三年,1942年她到了延安,我们才得以相聚,开始了新的生活一页。

延安、西安部分
(1940—1952)

一、初识民主圣地的音容笑貌

延安，在抗日战争时期是革命青年日夜向往、实现抗日救国宏愿的民主圣地。来自白山黑水、黄河两岸、大江南北的众多有志之士，像万流归海一样，越过千峦万谷，纷纷奔向延安。

1938年10月，我第一次奔赴延安，被蒋介石行辕稽查处扣押在川北梓潼县警察局，经过多方营救，一个月后，取保释放，押解回蓉，不准北上。

1939年11月下旬，我又离蓉北上，第二次奔赴延安。这次，是穿着八路军的军装，以一个上士文书的身份，乘坐八路军的军车，沿着川陕公路，威风凛凛地开往延安。

“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的川陕公路，大体上沿着古栈道筑路，沿路蜿蜒崎岖，盘旋攀登，异常艰难。我高高地坐在满载军装的卡车顶上，虽然迎面而来的强劲寒风从耳边飕飕吹过，但我当时正是青春年盛，心潮澎湃，被即将到来的美好理想的实现而热血沸腾，不仅毫未感到初冬的萧瑟凉意，反而觉得自己像剑仙侠客一样，开始了我豪迈的人生。

那时的公路，基本上是土石路，坑坑洼洼，汽车走得很慢。过

嘉陵江,翻秦岭,渡渭水,晓行夜宿,走了一个多星期,才到达川陕边境的宝鸡城。我这个23岁的青年大学生,才第一次见到了铁路和火车。从宝鸡到西安,要改乘火车,军车的押车副官和我帮着把军装包裹从卡车上搬下来,又搬上了火车。在八路军兵站,我们告别了卡车,坐上了令人感到稀奇的火车,十分兴奋,也十分好奇。可是没想到,在30年后的“文化大革命”中,我这第一次坐火车,竟然成为“国民党特务”的一个“罪证”:红卫兵气势汹汹地拍案责问:“国民党的火车,能让你随便坐吗?”真是又可气又可笑!

在西安,停留了将近一个星期,住在八路军办事处。我上街看了看西安的市容。这是发生“一二·九”运动的地方,也是张学良和杨虎城二将军举行兵谏、逼蒋抗日的名城,令我产生无限感慨。一天,我和押车副官、司机一块儿在街上的澡堂子洗了一次澡,为此受到了严厉批评。办事处的同志们批评我们麻痹大意,缺少警惕性,万一被国民党特务抓了去,岂不是白白送了性命!

从西安又改乘卡车北上延安。西安八路军办事处又派了三辆军车同行,组成了一个小小的车队。谁知一出西安在灞桥渡河时又受到“蒋委员长行辕稽查处”的刁难。他们在检查时,发现一个贴了十八集团军总部封条的铁皮箱子,硬要开箱检查。押车副官把一只脚踏在箱子上,摆出一副强硬的架式:你就是天王老子,也不让你检查!双方争执不下,只能各自向上峰请示。我们在这里被阻拦了一夜。第二天,西安八路军办事处派来一位军官,说这个箱子里装的是十八集团军总部的军事机密文件,没有总部的命令,任何人也不能打开。这个军官见多识广,有一套和国民党打交道的外交本领。只见他有说有笑,合情合理,说得对方理屈词穷,无言以对。经过双方一再向上峰请示以后,终于在当天中午放我们

免检通过了。

这时,我还是相当崇拜武力的。不仅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主张抗日还击,对于国民党顽固派的挑衅和骚扰,我也主张以眼还眼,以牙还牙。我第一次去延安,人家用武力把我扣留,又用武力把我押送回成都,亲身体会到“武力”的“权威性”。这次我们穿的是军装,坐的是军车,还有十八集团军的军事力量作后盾,终于抵制了国民党的武装检查,冲破了武装封锁,胜利到达了延安。斯大林的“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的理论,我是很信服的。

黄昏时,通过双方哨卡,顺利抵达陕甘宁边区,夜宿边境的交道镇,立刻使人呼吸到一股清新的空气。

在进入边区路口的岗哨上,既有全副武装的八路军战士,也有手持红缨枪的民兵。沿途的哨卡,都有雄赳赳的男女民兵和儿童团员,既有严肃查问,又有微笑的敬礼。

交道镇的店铺很破旧,看起来商业萧条,但同国民党统治区的城镇显然不同的是,街上看不到破破烂烂的乞丐和花花绿绿的妓女。

副官带我们到街上小馆里吃了一大碗羊肉泡馍,味道鲜美。晚上,我第一次睡热炕,折腾得一夜不能安睡。炕上只有一张炕席,被子很脏,我们都和衣而卧,只把棉袄脱下来盖在身上。身子下面的火炕很热,像烙烧饼一样,上面又相当凉,只得常常翻身,无法入睡。到天快亮时,火炕的热劲儿小了,才算打了一个盹儿。

大概是12月20日的上午,我们终于看到了延安清凉山上的宝塔。第一眼印象,这里却是一片荒山秃岭。经过战争创伤后的小小肤施县城,满目的颓墙烂瓦,很难看见完整的民房和店铺。居民和机关都住在四郊山沟沟的窑洞里,几乎看不见房子。这和我

想像中的延安大不相同,若不是投身到此,真是很难使人相信,这就是中国共产党中央机关和十八集团军总部所在地的“红色首都”。

军车把我送到一个山沟,停在几排窑洞的旁边,说这里就是中央组织部。中组部的同志很热情地表示欢迎我的到来,使我顿然感到在这荒凉的山沟里,还深藏着这样温暖的人情味。四川省委给我的介绍信,是一张小纸条卷成的一个两三分长的小纸丸,缝在裤衩的裤带里。两位同志看了我的介绍信说,他们已经知道我要来,我的工作分配在正在筹备中的中国青年救国联合会,党内叫中共中央青年工作委员会,简称“中央青委”。中央组织部的同志立即写了一封介绍信,让军车把我送到青委。我对这个山区小县一时还分不清东南西北,军车又拉我到另一个山沟沟入口处的几排窑洞前(以后才知道这里叫大砭沟),我就正式进入这个新社会了。

青委接待我的人,也是一位穿着普通军装的中等身材的青年人。他介绍自己叫胡乔木。原来他就是我早就听说过的中央青委的宣传部长。他温文尔雅,轻言细语地对我说了几句客套话,说他早就知道我的情况,去年就听说我要来(他指的是我去年到安吴堡青训班出席全国青救会代表会议后转赴延安),他们已经研究过,分配我去参加《中国青年》杂志的编辑工作。他说,我已经作过几年的编辑工作,相信我一定能干好。又说,先不忙工作,先看看党中央的文件和毛主席的一些著作,这些是在大后方很难看到的。他还要我翻一翻已经出版的《中国青年》杂志,了解一下情况。

这样,我的任务,首先是学习。我像一个贪吃的孩子一样,如饥似渴地读着,读着,俨然回到了我迷恋数学的学生时代。我不仅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大学校,而且在我眼前逐渐展现出十分引

人入胜的崭新世界。

除了学习就是观察。抽时间到附近走走,同先来的同志聊聊,想逐渐了解这个新社会。

第一次吃中午饭时,才见到青委机关里的人。他们都和我一样,穿的都是肥大的棉军装,都是一群八路军的战士。经人指点,才知道这位就是冯文彬,那两位是李昌、黄华。

吃饭时,大家集中在伙房前边的空地上,三个一群,五个一伙,都蹲在地上吃饭。一个人拿两只碗,一只碗去装菜,炊事员掌勺,一人给一勺菜——炒土豆丝,饭是小米窝窝头。大家穿的都一样,吃的也一样,这不是自己多年来追求的平等社会吗?

到延安不久,就过阳历年,碰上大会餐,美美地吃了一顿肉。会餐,不是吃几盘几碗,而是吃一个大烩菜,红烧肥肉坨,加豆腐、粉条、萝卜、白菜,一人一大勺,满满的一大碗。好些人吃不够,又去要一勺,有的人吃了两勺,再去要一勺,也照样给。炊事员还笑着说,不够再给一大勺。真是想吃多少就给多少,敞开肚皮吃肉。我似乎觉得自己已经尝到了一点“各取所需”的味道。

当时,对于穿的一样,吃的一样,感到十分满意。我初到延安,对全面情况了解得很肤浅。事实上,当时的“干部服”、“小灶食堂”还没有普遍推行,只在中央大机关的少数首长中才有。而我,又的确怀着比较幼稚的平均主义思想。

最使我感到心满意足的是供给制。自从我10岁读高级小学起,就开始为钱所苦恼,每年都为升学时没有钱交学费而伤脑筋,一进入社会,要维持最低的生活费用,仍然感到很困难。我从上大学起,就挤进教师的行列,半工半读。教书先生,最苦恼的就是“六腊战争”。旧社会教书,都是一学期一学期的受聘,每逢6月、12

月(腊月),如果得不到下学期的聘书,就得失业,就得陷入愁吃愁穿的恐慌之中。到了延安,马上就有工作,马上就不愁吃穿住。当时,对这种“铁饭碗”的供给制,真是“山呼万岁”!民主圣地的延安就像磁铁石一样,紧紧地吸引着我。

初到延安的头几天,另一个突出的印象,是呼吸到一阵阵自由的空气。延安的白天,大家紧张地忙着工作和学习,都关在自己的窑洞里,路上很少见到行人。一到晚饭后,即便是寒冷的冬天,从全国各地拥来的青年人,大都走出窑洞,汇集到延河两岸的小石子河滩上,东一群,西一伙,散步的散步,谈笑的谈笑,议论的议论,唱歌的唱歌,跳舞的跳舞。《延安颂》和《黄河大合唱》的歌声,伴随着爽朗的笑声,回荡在延河河谷,整个延安变得热烈而欢腾。我想,青年人在延安不愁失业,不愁失学,不愁吃穿,不愁住宿,能敞怀议论,能放声歌唱,这不就是我们所追求的理想世界吗!

到延安时,刚刚开过“一二·九”四周年的纪念会,毛泽东在纪念大会上的讲演词,在12月16日的《新中华报》上发表。我仔细阅读了这篇文章。他充分肯定了“一二·九”以后,各地爱国青年推动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先锋作用,这当然也包括我们在成都所作的努力。我们就是被卷进“一二·九”的浪潮而又参加推波助澜的,所以对毛泽东这篇讲话感到十分亲切。当时我曾经抄下了以下几段:“从五四运动起,共产党就与知识分子结合在一起,‘一二·九’运动中,共产党起了骨干的作用。这些说明知识分子要与共产党结合,要与八路军新四军结合。共产党非常喜欢知识分子,反对的只是那少数坏知识分子。”“知识分子一定要与军队结合起来,笔与枪结合起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抗战胜利,建立一个民主共和国出来!”

当时,我还读到12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的《大量吸收知识分子的决定》,这个决定也是毛泽东同志起草的。我也抄下了下面这段话:“共产党必须善于吸收知识分子,才能组织伟大的抗日力量,组织千百万农民群众,发展革命的文化运动和发展革命统一战线,没有知识分子参加,革命的胜利是不可能的。”“对知识分子的正确政策,是革命胜利的重要条件之一。”

这些话都说到我的心里。老实说,当时我对“共产党是无产阶级(工人阶级)的先锋队”的理论是很不理解的。我以为共产党是知识分子的先锋队,而知识分子又是工人和农民的先锋队;共产党的领袖人物主要是知识分子,五四运动是知识分子领导起来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是知识分子领导起来的。我当时对工人的伟大作用是很不理解的。我是从知识分子的伟大作用这个角度来称赞毛泽东和党中央对知识分子的正确决策。我以为知识分子才是真正的“民族解放先锋队”,作为一个“民族解放先锋队”的成员,我感到十分光荣,同时也感到延安也是一个十分尊重知识分子的延安。

初到延安,在最初短短的一两个月中,印象就很深,但我还无法把它概括起来。我第一次听到毛泽东在讨论大会上的讲话时,他对陕甘宁边区的“十个没有”的概括,言简意赅,正中下怀。他针对国民党顽固派要求取消边区的叫嚣,反驳说:“陕甘宁边区是全国最进步的地方,这里是民主抗日的根据地。这里一没有贪官污吏,二没有土豪劣绅,三没有赌博,四没有娼妓,五没有小老婆,六没有叫花子,七没有结党营私之徒,八没有萎靡不振之气,九没有人吃摩擦饭,十没有人发国难财,为什么要取消它呢?”(原注:“吃摩擦饭”即是说有些国民党人以反共为专门职业)毛泽东同志这“十个没有”,通俗易懂,很合乎我强调报刊宣传要大众化的意愿。

老实说,我当时对延安的印象,还没有这样完整,这样深刻。我的最初印象只是没有失业,没有等级制度,没有乞丐,没有妓女,没有对青年、对知识分子的压制迫害,仅仅如此。延安给我的印象,比我原来的想像还要美满。

二、瞭望民主中国的理想境界

对一个满怀理想与追求,热情积极向上的青年知识分子来说,我并不满足于对延安的这点点初浅的感性认识。一种强烈的探索与判断的愿望,还驱使我从理性的角度来加深对这个民主圣地的认识。

中央青委要我不忙去工作,先学习文件,加深对党的方针政策的理解,这是一着好棋,促使我在思想上理论上开始打基础,坚定了我追随中国共产党的意志和信念,坚决走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求解放的职业革命者的人生大道。

我当时所信仰的,只能说是新民主主义,还够不上说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崇拜者。对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应该说还没有入门。刚刚入门的,只能说是结合中国实际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思想。

在我初到延安的一两个月的时间里,我仔细阅读了1935年以来的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关于抗日战争的文件。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在2月15日《中国文化》的创刊号上发表,更是喜雨及时。我如饥似渴地反复学习,对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的理论,感到极大

的兴趣。

当然,这还是很肤浅的了解,既不深,也不广。《新民主主义论》原来的题目是《新民主主义的政治和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公开发表时才改为《新民主主义论》,说明这篇文章的重点是政治和文化,这也正合我意。我对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就懂得很少,能够接受的还是孙中山的节制资本和平均地权。对于苏联十月革命的胜利,为什么是标志着资本主义一定灭亡,社会主义一定会在全世界范围内代替资本主义的道理;对于中国共产党的最低纲领和最高纲领;对于三民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根本不同,等等,我还是似懂非懂的。当时还没有“毛泽东思想”的提法,只能说是刚刚跨入毛泽东学说的门槛。当然也是从这时起,我对毛泽东十分钦佩,认为他确是孙中山以后的伟大人物。

当时,我之所以那样信仰新民主主义的理论,是因为蒋介石背叛了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推行“一个主义、一个党、一个领袖”的方针政策,实际上把三民主义逐渐改变为法西斯主义,他这个蒋委员长变成了中国的希特勒。这是我们在国民党统治区多年来的亲身体验,是一切爱国人士不约而同的共识。

不打日本打内战,“攘外必先安内”,对外和,对内狠,这算什么民族主义?在国内搞国民党一党专政,把共产党当成匪党;对于一切主张抗日的民主人士和一切主张实行新三民主义的国民党人士,也都当成同情、勾结共产党的亲共分子;在全国实行法西斯特务统治,对民主党派的领袖人物七君子 and 很多优秀的学者名人都加以种种迫害,这算什么民权主义?而在农村,田园荒芜,饿殍遍地;在城市到处是乞丐和妓女,一般知识分子都受到失业半失业的威胁,这算什么民生主义。

蒋介石国民党这样背叛了孙中山的三民主义,而毛泽东和共产党又是那样一再宣称继承和发展三民主义,明确表示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就是共产党的新民主主义,理所当然地引起我极大的关注。我刚刚到延安的初步所见所闻又一再证明,共产党的新民主主义并不是漂亮的宣传口号,也不是空中楼阁的许诺,而是正在切切实实地贯彻执行并见诸实效的。

1940年初,正是国民党反动势力恶性发展的时期。蒋介石发动第一次反共高潮,一方面调兵遣将包围陕甘宁边区,并在华北和江南公然配合日军对解放区的“扫荡”;另一方面,则由汪精卫出面公开向日本帝国主义投降,同日本签订了《日支新关系调整要纲》的卖国条约。我对于国民党这种反共卖国的行为十分气愤,对共产党提出的“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主张衷心拥护,把自己的全部希望都寄托在中国共产党身上。

到延安一个多月以后,在1940年2月1日,我第一次参加了“延安人民讨汪大会”。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参加这样庄严隆重、声势浩大的群众大会。我第一次远远地看到了毛泽东同志,他穿的是同我一样的棉军服,不同的是他比我们多披了一件棉大衣。我第一次听到了他在讨汪大会上发表的演说:《团结一切抗日力量,反对反共顽固派》。还听到了宣读他起草的《向国民党的十点要求》的通电。毛泽东那义正辞严的论辩,不时挥动的有力手臂,铿锵有力地富于鼓动性的语言,受到了到会群众的热烈欢迎。毛泽东的演说和通电,从内容到文辞,在我听来,都十分精彩,无懈可击。可以说,当时我和延安的许多青年知识分子一样,对他的钦佩和崇拜,达到了相当狂热的程度。

从这以后,对毛泽东的文稿,我都是怀着十分钦佩的心情来阅读。阅读时,用红笔画单线、双线、圈圈点点,还作过很多摘要。可惜,1947年胡宗南率几十万大军进攻延安,我跟随西北野战军转战陕北,把这些笔记本都销毁了。时隔五十多年,我重新翻阅毛泽东当时的著作,仍然感到:从政治上说是十分正确的,斗争性和策略性都很强;从文字上说,生动活泼,尖锐泼辣,文采奕奕,这说明我当时对他的崇拜并不全是青年人常有的那种情感激动,主要是在思想上和理论上的信服。

那篇《向国民党的十点要求》,是一篇骈文体的通电,写得精练活泼,对偶工整,读来铿锵有力,琅琅上口,易于背诵。在第二点中,毛泽东讲“加紧团结”,精辟地阐明了抗日、团结和进步三者之间的关系。他批评国民党顽固派不讲团结和进步,专讲“统一”,是“假统一之名,行独霸之实。弃团结之义,肇分裂之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矣”。而中国共产党则“坚决提倡真统一,反对假统一……非统一于投降而统一于抗日,非统一于分裂而统一于团结,非统一于倒退而统一于进步。以抗日、团结、进步三者为基础的统一才是真统一……”“舍此而求统一,无论出何花样,弄何玄虚,均为南辕北辙,实属未敢苟同。”“统一必须以团结为基础,团结必须以进步为基础;惟进步乃能团结,惟团结乃能统一,实为不易之定论。”

《十点要求》的第三点提出要求国民党厉行宪政、实行民主的主张。这一点是这样写的:

“三曰厉行宪政。训政多年,毫无结果。物极必反,宪政为先。然而言论不自由,党禁未开放,一切犹是反宪政之行为。以此制宪,何殊官样文章。以此行宪,何异一党专政。当此国难深重之秋,若犹不思变计,则日汪肆扰于外,奸徒破坏于内,国脉民命,岌

岌可危矣。政府宜开放党禁,扶植舆论,以为诚意推行宪政之表示。昭大信于国民,启新国之气运,诚未有急于此者。”

这一点里提出要实行宪政,首先就是开放党禁,改变一党专政,就是扶植舆论,倡导言论自由。这真是一言九鼎,正中时弊。

“宪政是什么?就是民主政治。”在讨汪大会后的20天,毛泽东在延安宪政促进会成立时,又发表了一个很精彩的演讲《新民主主义的宪政》。在这里他明确提出推行民主政治的主张。他说:“什么是民主主义的宪政呢?就是几个革命阶级联合起来对于汉奸反对派的专政。从前有人说过一句话,就是‘有饭大家吃’,我想这可以比喻新民主主义。既然有饭大家吃,就不能由一党一派一个阶级来专政。”他引用孙中山先生在《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的话来阐明这个道理。他说:“同志们,我们研究宪政,各种书都要看,但尤其要看的,是这篇宣言,这篇宣言中上述几句话,应该熟读而牢记之。‘为一般平民所共有,非少数人所得而私’,就是我们所说的新民主主义宪政的具体内容,就是几个革命阶级联合起来对于汉奸反动派的民主专政,就是我们今天所要的宪政。这样的宪政就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宪政。”他还说:“现在有些历来反对宪政的人,也在口头上谈宪政了。……因为被抗日的人民逼得没有办法,只好应付一下。”他说,国民党反动派“是在挂宪政的羊头,卖一党专政的狗肉。我并不是随便骂他们,我的话是有根据的,这根据就在于他们一面谈宪政,一面却不给人民以丝毫的自由”。

因为国民党反动派不给人民以丝毫的自由,在全国遍布特务机关,实行专横残暴的统治,毛泽东称之为“法西斯主义的一党专政”。在专制统治下,首先受到迫害的是广大的革命青年。所以毛

泽东在《十点要求》中的第五点“保护青年”，第七点“取缔特务机关”里所阐述的主张，对于我这样刚从国民党统治区的白色恐怖中挣扎出来的革命青年来说，是举双手拥护的。

在“保护青年”一点中，毛泽东明确地指出：“近在西安附近有集中营之设。将西北、中原各省之进步青年七百余入拘系一处，施以精神与肉体之奴役，形同囚犯，惨不忍闻。青年何辜，遭此荼毒？夫青年乃国家之精华，进步青年尤属抗战之至宝。信仰为人人之自由，而思想绝非武力所能压制者。”

毛泽东在“取缔特务机关”一点中说：“特务机关之横行，时人比诸唐之周兴、来俊臣，明之魏忠贤、刘瑾。彼辈不注意敌人而以对内为能事，杀人如麻，贪贿无艺，实谣言之大本营，奸邪之制造所。使通国之人重足而立、侧目而视者，无过于此辈穷凶极恶之特务人员。”

以我个人的亲身经历来说，受到特务分子的监视、盯梢、窃听、打小报告，是家常便饭。我们的抗日宣传队常常被阻难，被捣毁，被强迫解散和被扣押；我们召集的抗日集会常常被勒令禁止举行，或者受到捣乱破坏；我们办的《星芒报》和报社楼下的出版社被特务暴徒完全捣毁，彻底砸烂；我们办的报刊经常被撕烂或没收，报童遭殴打，外地的发行点被捣毁；特务分子在我们四川大学阴谋制造“稻草事件”，陷害民先队员和学联成员，逮捕进步教授；我第一次奔赴延安，被蒋介石行辕稽查处拘留一个月后押送回蓉，等等。这不过是这帮穷凶极恶的独裁者所实施的恐怖统治罪行中九牛一毛而已。

特别使人痛心疾首、终生难忘的惨剧，是在我离开成都还不到三个月，国民党反动派像希特勒搞“国会纵火案”一样，制造了震惊

中外的“成都抢米事件”，对成都共产党领导人和社会上的知名人士进行了大逮捕。曾经同我并肩战斗的一些同志被捕了，我最尊敬的、我的革命引路人车耀先先生也是这次被捕的，他以后被囚禁在特务机关的秘密监牢，终被杀害。完全可以想到，如果我不是提前被秘密送到延安，而仍然留在成都的话，我也很可能成为“抢米事件”的牺牲者之一，我的历史也会像车耀先一样，在40年代初就早早结束了。

作为一个革命的幸存者，我在刚到延安的短短两个月中，不仅有一些颇为新鲜的感性认识，还有一些相当深刻的理性认识；我不只是从现实中初步体验到民主圣地的音容笑貌，而且从理论上由此瞭望到民主中国的理想境界。

三、办报的理想新天地

“在人民不能当家作主的地区，要办一张人民的报纸，确实是难上加难。办人民的报纸，是为了人民打天下；也只有人民打下了一片江山，在人民的天下，才能办成真正的人民报纸。”

“1939年冬，我奔赴延安，不只是为了为人民打天下，而且还要为人民办报纸，要在人民天下办一张真正为人民喜闻乐见的报纸。”

这是1984年我写的关于在延安办报这一段历史的一篇回忆录中的话。

到延安两个月后，很快就实现了我要办一张人民的报纸的理想。1940年3月，我参加了创办《边区群众报》的工作，开始了我在延安办报的十年历程。

在延安青委的两个月专心学习当中，我不仅热情而真诚地领会了毛泽东关于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思想，也同样热情而真诚地研究了他关于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思想。作为一个以笔为枪的革命文化战士，我为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文化，已经亲身历尽艰辛、坚忍地战斗了三四年，特别是在反对文化专制主义和探

索大众化通俗化的办报方针方面,在实践上有了一些深切的体会,在理论上也有了一些初步的心得。毛泽东关于新民主主义文化的论述把我提高到新的境界,为我所从事的报纸事业开辟了新的天地。

当时,我对社会主义和新民主主义的“两个区别开来”还很不理解,但对于“新民主主义文化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新民主主义文化是大众的,因而是民主的。它应为全民族中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农劳苦民众服务,并逐渐成为他们的文化”等观点,与我情投意合,感到特别亲切。

正是在这种相当深刻的亲身体会和比较明确的思想认识下,我兴高采烈地、全心全意地投入《边区群众报》的创刊和编辑工作,开始了一千十年的新事业。

1940年2月初,同我在成都一起办《通俗文艺》的周文同志也从成都到达延安。他住在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同党中央住的杨家岭靠得很近。一天晚饭后,他在延河边散步,恰好遇上毛泽东同志。经人介绍,毛泽东表示欢迎周文到延安。看来毛泽东对周文在左联时期就从事大众化文艺工作已有所了解。几天后,毛泽东专门邀请周文到他的住所去谈话。周文曾任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组织部长、常委和党团书记。毛泽东很有兴趣地询问周文关于30年代左翼文坛的情况,很关心关于文言文、白话文和大众化通俗化方面的情况。毛泽东向周文介绍边区的文化状况,特别强调边区人民文化程度低,文盲多,教育不发达。毛泽东主张注意文化的普及工作,鼓励周文继续在大众化方面开辟一个新的阵地。毛泽东提议创办一个大众读物社,创办一张通俗化报纸,编辑一批大众化的通俗小册子。毛泽东希望周文来负责主持这项工作,他还给这

个报纸取名为《边区群众报》。周文很高兴地接受了毛泽东的意见。毛泽东马上通知边区党委和中央宣传部，还通知中央组织部立即为创办大众读物社选定社址、筹备经费和调集干部。

边区党委指定宣传部长李卓然同志直接领导这项工作，他马上派出白彦博同志做大众读物社的秘书长，赵守一同志任报纸科长，同周文同志一起开始了筹备工作。边区文协也决定把山嘴上那两排窑洞腾出来作为大众读物社的社址。

在毛泽东接见周文的当天下午，周文就到中央青委来找我，向我介绍了毛同他谈话的内容，希望我参加大众读物社和边区群众报的工作，我当然十分高兴。

两天以后，胡乔木告诉我，中央组织部已经决定调我到大众读物社去工作，要我马上去报到。我根本没有行李，背着在成都带来的粗布小挎包，一个人从延安南门外兴致勃勃地走到延安北门外，投入了大众读物社的创办与编辑工作。

大众读物社在3月12日正式成立，周文是社长。下设一个报纸科，负责编辑《边区群众报》；一个通联科，负责通讯网的建立，编辑一个帮助通讯员写作的刊物《大众习作》；一个丛书科，负责编辑《大众文库》和《大众画库》。

最初，报纸科只有两个人，科长赵守一，编辑就是我。以后说，一开始我就是边区群众报的主编是不对的，因为当时还没有这个职位，而且只有我一个编辑，作主的是赵守一这个科长。当时延安的印刷条件很困难，只有一个中央印刷厂，有一台对开机和两台四开机，负责承印《新中华报》、《解放》等中央报刊和新华书店出版的少数书籍就很紧张了。我们的《边区群众报》只能用红军时代带来的一台石印机来印刷。

经过短短十几天的准备,我们的《边区群众报》(十日刊)第1期在3月25日正式出版了。它是一张石印的四开小报。要知道当时的书报都是用又粗又黄的马兰纸印刷的。而《边区群众报》却用的是很难买到的晋恒纸,誊写员抄写的是一手很清秀的楷体字,印刷得白净漂亮,十分喜人。

这个白白生生、眉清目秀的小宝贝,是大众读物社的掌上明珠,也是受到边区人民宠爱的孩子,我们为她的诞生付出了十多个不眠之夜。

30年代,我国的印刷条件是很落后的。石印仅仅比油印前进了一步。我没有编过石印报,技术上的要求十分繁琐细致,每篇文章的字数,连标点符号都必须算得一清二楚。排版时每篇稿子的文字都不能有一点差错,常常要根据版面情况来编辑稿件。为了版面美观,我们请丛书科的画家为稿件配画和制作刊头题花;特别是要求文章要短,栏目要多,麻雀虽小,肝胆俱全。这些都要作妥帖的安排,石印比铅印困难得多。

真像姑娘绣花一样,慢工出细活,每期报纸都是这样精心编排版面、精心印刷出来的。《边区群众报》的诞生,为大众读物社带来了欢腾喜气,立即得到毛主席等中央和边区领导人的称赞,更主要的是立即得到广大边区基层干部、小学教员、中小学生和老百姓的喜爱。因为她不只是在内容上注意宣传抗日救国的形势和道理,宣传陕甘宁边区为支援抗日前线所进行的生产建设,还刊登了一些短小精悍的文艺作品,在文字上尽量采用边区老百姓的流行语言,努力争取识字不多的人能够读懂,不识字的人也能够听懂。

《边区群众报》的顺利出版,完全出乎我的意料之外。对于我们这些刚从国民党统治区到达共产党解放区的人来说,感到特别

惊奇,特别新鲜。首先是这里没有专制制度的压制,也没有官僚机构的刁难。当然,这件事是共产党的领袖毛泽东热心提出兴办的,各级领导都特别重视,各个环节解决问题也很雷厉风行。这里不像在国民党统治区那样,不愁登记注册,不愁筹措经费,不愁租赁社址,不愁印刷、纸张、发行。最主要的是办报没有受监视、拘押、坐牢、杀头的危险。在一个偌大的中华民国,除了这小小的解放区以外,哪里有这样民主自由的办报环境!

从物质条件上说,国统区虽然有很好的店铺,有很豪华的住宅,但它不属于我们这些穷知识分子。在成都办《大声》时,由于车耀先先生是餐馆的老板,才腾出一间 20 平米的房间作编辑室。到了办《蜀话报》时,只租了一间十二三平米的小房间。以后办《蜀话报》,也不过是增加一间直不起身来的尖顶阁楼,作为我们两三个人过夜的卧室。而在延安,我们拥有七个窑洞,每个窑洞约 20 平米,摆两张床,还可以摆两张办公桌,一个钱的租金也不收,这是在国统区连想也想不到的。

这里吃饭穿衣全是供给制,吃得虽然不像成都那样两荤两素,但菜足饭饱,也大大超过了一般老百姓的生活水平。这里的衣服,里里外外全是军装,床上被褥、洗漱用具全是八路军战士的军用品,一人一份,一律平等。

在延安不愁吃,不愁穿,不愁住,一心一意干工作,全心全意为人民办报纸,这样单纯,这样朴素,这样真诚,这样实干苦干,延安实实在在是一个理想的新天地。

《边区群众报》一出世就受到普遍欢迎。先是十日刊,很快改为七日刊、五日刊,各地纷纷要求增加份数,而且要求报纸扩大版面,充实内容。所以石印四开两版的《边区群众报》出了 10 期以

后,就改为铅印四开四版的周刊。考虑到读者的文化水平不高,当时采用的是四号字,个别文章用老五号字,每期报纸由四千多字增加到八九千字,内容充实多了。

当时,在经济文化相当落后的陕甘宁边区,只有一百五十多万人口。《边区群众报》竟然发行到一万多份,可说是一个奇迹。石印时,先是一千多份,增加到五千多份,改为铅印后很快就发行到一万多份,还满足不了各方面的需要,如果不是印刷和纸张的限制,发行量还会增加。

原来设想,《边区群众报》只是一个文化性、文艺性的通俗读物,可是由于她的发行量大,普遍深入到各乡村,在传播时事新闻和宣传政治政策方面的作用,越来越重要,共产党边区中央局很快就明确确定她是党委的机关报。1941年5月,边区中央局改为西北中央局。《边区群众报》自然成为西北局的机关报。

1942年2月,大众读物社结束,成立边区群众报社,搬出边区文协,从延安的北门外搬到南门外新市场对面的山头上,由西北局直接领导报社的工作。边区群众报的政治性加强了,她的大众化通俗化的特点仍然十分鲜明,也更加得到上至毛主席、下到老百姓的喜爱。

在《边区群众报》出刊半年以后,1940年11月30日,毛泽东主席给周文的信中表扬了我们,他在信中写道:“你的工作是有意意义有成绩的,我们都非常高兴。”这里说的“我们”,当然是指党中央的其他领导同志。在1941年《边区群众报》创刊一周年纪念的时候,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当面问过毛主席:“你最喜欢读什么报?”毛主席很爽快地答复:“《边区群众报》。”

1943年的边区文教群英会上,边区政府授予边区群众报“特

等文教模范”的光荣称号。作为群众报的主编,我也被授予“特等文教模范工作者”,我们的副主编金照和文艺编辑柯蓝同志得了甲等奖。

1946年3月,《边区群众报》创刊六周年的时候,毛泽东主席又给报纸题词:“希望读者多利用报纸,推动工作,学习文化。”西北局书记习仲勋同志写的祝贺文章中称赞群众报说:“这个报纸是边区群众公认的好报纸,谁也喜欢它,谁也爱护它。为什么好?它不但容易读容易懂,并且说出了边区群众要说的话,讲出了边区群众要知道的事情。这就是为群众服务,当得起‘群众报’这个光荣的称号。”

从1940年3月《边区群众报》创刊,到1947年延安保卫战时期用各种形式坚持出报,在延安收复之前,1948年1月正式改为《群众日报》,到1949年5月20日西安解放,群众报社的同志陆续从延安搬迁到西安,5月27日在西安正式出版《群众日报》,在这将近十年的过程中,群众报的经历也十分复杂,但是她的大众化通俗化的光荣传统,始终坚持下来没有改变。

四、办一张群众喜闻乐见的报纸

1. 让群众一看就懂，一听就明白

每当我回忆起在延安编辑《边区群众报》那十年难忘的岁月，我的心灵就感到一种深深地隐痛和由衷地遗憾，那就是我们兢兢业业地奋战了2500多个日日夜夜编辑出版的363期报纸的合订本，被进占延安的国民党军队统统毁掉了。

1947年，国民党军队大举进攻陕甘宁边区，党中央决定为消灭胡宗南的部队，撤离延安。3月17日晚上，我们含泪撤出了延安。在准备撤退的坚壁清野中，我们把七年多一共363期的《边区群众报》合订本，埋藏在一个旧窑洞里。我们挖了几乎半边山，还作了一些伪装，满以为埋藏得很保险。一年以后，我们打败了胡宗南的50万大军，收复了延安。当我们回到故居时，才发现我们埋藏在这里的“宝贝”，已经被国民党军队挖了出来，全都付之一炬

了。我们深深地懊悔自己的警惕性不高,埋藏的地点和埋藏的方法有漏洞,处理得不严密,以致我们心爱的“娇儿”被国民党全部“屠杀”了!我后悔得捶胸顿足,一切都无济于事了。全国解放以后,我们花了很多工夫来搜集这个时期的报纸,结果还是断期少页,残缺不全,难于弥补这终生的伤痛。特别是对我撰写这一时期的回忆录,增加了不少困难。

今年,我整整80周岁了。延安十年,正是我23岁到33岁的青年时代,精力充沛,好学上进。每当我回想起延安十年所编辑的那份小小的报纸,仍然是一往情深,犹如青年时代的恋人,一切都是那么美好,令人终生难忘。如果说,在成都办报三年是我报人生涯的幼年时期,那么,在延安十年就进入了办报的青年时代,一年年地成长成熟起来。这时,我不仅已有成都三年创办大众化报纸的经验,而且还积累了延安十年编一张大众化报纸的实践经验,这十年呕心沥血付出的辛勤劳动所换来的理论探索 and 实践经验,为我以后到北京三十余年坚持到底的报人生涯,奠定了比较坚实的基础,对于如何办好一张为人民群众所喜闻乐见的报纸,探索出一些比较可贵的基本理论知识和基本实践经验。

《边区群众报》创办之初,并不是心中无数的盲目的摸索,而是思想上有着相当明确的理论指导。在成都的三年,我们最初只有一个很朦胧的大众化的理想,然后在工作中去摸索,在摸索中逐渐体会出大众化的道理。而在延安的十年,是先有比较明确的大众化理论,一开始就在方向上和方法上具有相当自觉的正确的指导思想。究竟要办一张什么样的报纸?我们心中的确是很明了的:办一张为边区人民最喜爱的报纸,要直接办给边区老百姓阅读,识字很少的人看得懂,不识字的人听得懂。用老百姓的话说,就是一

读就懂,一听就明白。

办报初期,周文同志专门给我们讲文艺大众化的理论。那时,他首先讲的是列宁关于文艺大众化的论述。列宁说:“艺术非为着民众,为着几百万劳苦的大众——就是为着工人农人而存在不可。艺术非成为这些人的东西不可。艺术的根底应该深深地埋在民众里面。在几百万的人口里面,单单为着几百人乃至几千人而存在的艺术,是不必要的。艺术是属于民众的。所以在劳动大众里面,艺术应该种下它的深根。艺术,非使大众理解不可,非使大众爱好不可。艺术应该和他们的感情、思想、意志结合,而使他昂扬起来。在大众里面,艺术应该唤醒大众的艺术,而使这些艺术家发展。工人和农人的大众,正在需要黑面包的时候,难道我们将一点甜蜜的饼干送给少数人就行了吗?……”周文同志还介绍我们读鲁迅那篇《文艺大众化》的文章。鲁迅说:“文艺本应该并非只有少数的优秀者才能够鉴赏。而是只有少数的先天的低能者所不能鉴赏的东西。……应该多有为大众设想的作品,竭力来作浅显易解的作品,使大家能懂、爱看,以挤掉一些陈腐的劳什子。”在《边区群众报》创刊三年以后,毛主席才发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所以当时周文介绍我们要仔细学习的,还是《新民主主义论》中“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是大众的,因而是民主的……”这一大段话。特别是列宁的话“艺术是属于大众的。……艺术,非使大众理解不可,非使大众爱好不可”,成为我们的座右铭。

为了真正贯彻大众化的方针,做到报纸能使老百姓一看就懂,每期稿子编好以后,周文就召集全社大会来集体“审稿”,特别邀请文化比较低的边区籍的炊事员和小鬼(勤务员)来“审稿”。“审稿”的程序是:先把稿子念一遍,然后征求大家对稿子内容的意见。如

果有大的意见,就返工重写;如果没有大的意见,就一字一句地再读第二遍,读完一段就征求大家对这一段的结构、句法和用词用字的意见,务必做到正确而又通俗,特别是认真听取文化低的同志的意见,看他们是不是一念就懂,一听就懂。对每篇稿子边审边改,改得大家都满意了,才算一致通过。

一张大众化的报纸,首要的是内容问题,但在集体审稿中,最花工夫的还是语言文字问题。

中国的语言文字很复杂。当时,有古时的文言文;有梁启超式的文言文(一般政界用的文字,如毛泽东起草的《向国民党的十点要求》就用了很多文言词汇、典故和对偶排句);有“五四”以来的白话文,这种白话文中采用很多外语直译过来的词汇和西欧的倒装句;有鸳鸯蝴蝶派白话小说的白话文,其中夹杂着很多古诗词;还有报界通行的不文不白的新闻体白话文;还有各地口头流行的方言土语……这些,我们认为都不能用。当时虽然还没有规定通行全国的标准普通话,但我们所采用的还是一般能懂的普通话,有意识地采用一些陕北地方的普通话,如“婆姨”、“土包子”、“美得太”等,对于那些太土的话,如“尔个”(现在),或者不文明的脏话,如“驴日的”等自然是不用的。

最难改的是不文不白的学生腔,坚持用“和”、“同”代替“与”、“及”,用“都”代替“皆”,用“时候”代替“时”,用“容易”代替“易”等等。对于一些常用的新名词,或者在文章中顺便解释,或者在“名词解释”专栏里作说明。

总之,要注意每一句话都要做到念得顺口,听得顺耳,努力使粗识字的人,甚至文盲也能够听懂。报纸出了一年以后,我们把几十期《边区群众报》上所用的字,作了一个很详细的统计,报上常用

的字大约是400个,就是说,凡是认识400个字的人,就能够读懂群众报。

这里要特别说一下关于运用民间艺术形式来宣传新内容的问题。这是我们在成都办《星芒报》起就运用得比较成功的经验。当时,周文他们叫“用旧瓶装新酒”,在大众化文艺运动中是一个很热门的话题。在边区群众报时期,我们对此思想上更加明确,灵活地运用民间艺术形式,是办好一张大众化通俗化报纸的成功经验。

许多民间艺术形式,如陕北说书和陕北秧歌,是男女老少都喜欢的表演艺术形式,用这种旧形式装新内容,宣传效果十分显著。群众报的柯蓝同志用陕北说书形式写的《抗日英雄洋铁桶》和《乌鸦告状》等长篇连载,很快传遍了山村小镇,成为家喻户晓的故事。陕北很多说书艺人,像韩起祥这样的名家都把这些作为演唱的脚本,从头至尾地唱给群众听,起到了普及宣传的作用。1943年边区群英大会以后,我写了一篇六百多句唱词的《英雄会》,虽然在文艺性上远远不如柯蓝的作品,但对群英大会的情况,写得一清二楚,很快就成为各地文工团、宣传队、读报组和民间艺人的唱本,使群英会的情况和精神迅速而广泛地传遍边区,深入人心。

由于边区群众报比较出色地运用民间艺术形式进行宣传,也为我国培养出像柯蓝、李季、闻捷、杜鹏程、胡采、汤洛等相当有名的文艺家,也算是边区群众报对国家的又一贡献。

这次翻旧报,重读闻捷同志当年用“芦花公鸡调”写的一首歌谣《牛儿要喂好》,仍然感到是一篇很好的作品,现在抄在下面:

乌金豆子寸金草,一把一把添满槽;
再捧清泉长流水,牛儿牛儿吃喝饱。
圈里干净圈门牢,让你睡个安稳觉;

我心挂在你心上，牛儿牛儿可知道？
半夜提灯来添草，北风吹得呼呼嚎，
你要提心别冻了，虎豹来了要嚎叫。
惊蛰一到快出圈，套上犁儿走得欢，
好比蛟龙出浅水，好比虎奔万里山。
再添草来再加料，命根命根要吃饱，
今年生产要搞好，多打粮食靠你了。
粮囤满来全家笑，你的功劳真不小，
金黄谷草堆得多，把你喂得哈哈笑。

大家都很有兴趣的是编谜语。为了配合当时的宣传，我们特意搜集了很多民间谜语准备利用。我们还常常编写一些新谜语，句子很短又很有意义，在群众中也十分流行。如第 301 期上刊登的一首犁头的谜语，是这样写的：

嘴儿尖尖，尾儿弯弯，
不在地面走，只往地里钻，
后面要扶，前面要牵。

在 208 期上找出一首我编的谜语，是为了配合宣传妇女参加生产的：

有口没舌，与婆姨亲热，
专门制造分裂，破坏为了建设。

谜底是“剪刀”，受到妇女们的称赞。

对于民间艺术形式的运用，我们既用旧，又创新，适当突破旧

框框的束缚。比如在陕北农民中流行的《春耕数九歌》，我们在文字上做了一些改动，赋予它新的意义。在 86 期上，登了出来：

一九，二九，合门叫狗，
 种田锄地全靠一双手。
 三九，四九，冻破石头，
 缴了公粮回家走，过年的东西样样有！
 五九，六九，延河水吼，
 早些预备种子和耕牛，开荒五十亩！
 七九，八九，延河看柳，
 九九再一九，犁牛遍地走，
 娃娃婆姨都向地里走，看门的有狗！
 九九再一九，犁牛遍地走，
 又种小米又种豆，春耕的英雄我为首！
 数九在心头，有话说出口，
 只有劳动才快活，偷懒的才丢丑！

对于民间语言和民间文艺形式，我们既充分继承、吸收和运用，又大胆进行改造、发展和创新，在宣传上收到了家喻户晓、妇孺皆知的普及效果。

2. 用群众喜爱的文字编写群众喜爱的内容

办一张为人民群众所喜闻乐见的报纸，我上面所讲的，只是文字编写的问题。但是，编一张真正为群众所喜闻乐见的大众化的

报纸,不仅仅是文字问题,更重要的还是内容问题。就是要用群众喜爱的文字,来编写群众所喜爱的内容,这两方面要密切结合起来。

周文同志在筹办边区群众报时,向我们介绍文艺大众化和报纸大众化运动的历史进程中,就着重讲过如何正确对待文字形式和文稿内容的关系。五四运动以来,文艺大众化和报纸大众化运动逐步发展起来,主张形式为主和主张内容为主,还有主张两者密切结合等不同的主张,彼此间都有些争论。当时,比较流行一时的,是用半文半白的文字,来写风花雪月、帝王将相、武侠剑客、才子佳人等言情小说、公案小说和武侠小说,以及用这种风格编辑的通俗小报,颇受中小知识分子和一般市民的喜爱。30年代左联时期,周文同志等人所从事的文艺大众化运动,在文字上和内容上都进行了很大的改革。在文字上他们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改革半文半白的文字,努力改用接近全国流行口语的白话文,致力于大众语运动,在内容上则强调写民族民主革命,写古今民族英雄,写农民、工人、士兵、知识分子等劳动人民的苦难和斗争。

边区群众报继承“五四”大众化的传统,根据边区的群众文化水平和具体情况,又有一些改进和发展。在文字上使用流行的普通话,特别注意采用能够通行的陕北话,避免使用外乡人难懂的陕北土话。

当时报纸的内容主要是抗日救亡。具体说,一是战争(先是抗日战争,以后是解放战争)的进展情况;二是围绕抗战的民主政治和人民生活;三是相关的国际问题;四是通俗文艺作品。

《边区群众报》很长时期是周刊,四开四版四号字,每期约一万字,如何选择和安排报纸的内容,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俗话说

“巧妇难为无米之炊”，而我们的情况恰恰相反，要说的、该说的太多，要恰到好处地每顿只选出四五个菜，也是难为巧妇的。这里，第一是如何体会文化水平低的群众心理：他们究竟最想知道什么？他们能够了解什么？他们还需要和能够接受什么？第二，根据第一个原则，如何在文字上进行精选精编，真正做到他们能读能懂，而且爱读爱听？在《边区群众报》创刊一周年纪念时，我写了一篇经验总结文章，提出《边区群众报》的第一个特点是在字数少、内容多的狭缝当中奋斗，一方面做到通俗、明白、多样性、活泼有趣，来正确地达到宣传群众、组织群众的政治任务；一方面又要做到短小精悍，简单具体，去适合文化比较落后的边区群众。还有一个决定性的因素，就是《边区群众报》也是一份党报。我们千万不能忘记，党委需要自己的机关报向边区群众进行宣传。党委需要宣传的内容中，什么是群众需要的？什么是群众能够接受的？什么是群众最喜爱的？因而，怎样善于把党委的宣传意图同群众的需要和喜爱结合起来，也是《边区群众报》在选择和安排内容上的一个难题。

应该承认，当时陕甘宁边区党委（以后改为中央西北局）的确是全心全意为边区人民服务的，是千方百计地为边区人民兴利除弊做着很多实实在在的事情。在延安时期，边区党委和它的党报——《边区群众报》在根本上是一致的，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办群众之所需，做群众之所爱。当时，我们办报的人感到同党委是情投意合的，没有感到什么大的矛盾。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奋斗宗旨上，延安十年时期，党委同党报是同心协力的。

先摆几件具体事例。

比如，中央和边区党委很多重要的指示和中央领导同志的重要讲话，从原则上说，党报都是应该刊登的。但是，考虑到广大群

众和基层干部的接受能力,却不能照登全文,只能有选择地用通俗语言加以改写和缩编。例如,在抗战六周年时,《边区群众报》上登载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为抗战六周年纪念宣言》,原文七千五百多字,经过改编压缩,只登了二千三百多字。又如:毛泽东主席著名的《组织起来》,是毛主席在边区劳动英雄大会上的讲话,对掀起边区的大生产运动是十分重要的,原文五千三百多字,经过我们改编以后的文章只一千九百多字。当然也有例外,比如《边区各界抗敌救国会为拥军工作告全边区父老兄弟书》,共四千三百多字,一是需要把内容原原本本告诉边区人民,一是文字也写得比较通俗易懂。《边区群众报》出了一个增刊,用两个版的篇幅刊登了全文。

值得强调的是,我们并不是机械地拘泥于字数的多少,为了真正做到为群众所喜爱,有时候,稿件的字数稍长一些反而能收到更好的效果。例如,1945年10月14日的《边区群众报》,刊登毛主席从重庆回延安的新闻,竟然比《解放日报》长得多,《解放日报》只写了一百五十多字,《边区群众报》却写了五百三十多字。对比这两条新闻,两种处理办法,我觉得比较能够鲜明地体现《边区群众报》在内容和形式上大众化的特点。

《解放日报》用流行的“新闻体”写了一条毛主席回到延安的很简短的新闻,加上一条当晚欢迎会的新闻和重庆送行的新闻,编在了一起,登在头版头条。

昨日延安各界热烈欢迎毛主席 国共会谈已获重要战果

〈本报讯〉昨日午后一时半，国民政府军委会政治部部长张治中将军陪同中共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同志飞返延安。中共中央各部委负责同志、边区政府林、李正副主席，本市各机关团体学校代表及群众万余人，齐集机场迎迓。下机后，毛主席、张治中将军先后发表简短演说，群众高呼口号，鼓掌不息。张治中将军随即乘车下榻总司令官邸休息。

《边区群众报》的消息也是登在头版头条，但写法和标题都明显不同：

成千成万的人向飞机场跑 毛主席回来了！

“毛主席啥时候回来呀？”全边区人民天天在想着，天天在望着。十月十一日，消息传开了，说：毛主席今天三点钟一定回来。每个人从早晨就望着，恨这个三点钟为什么不早一点到呢？等着，等着，等到一点钟，忽然，嗡嗡嗡在响，人们惊奇地叫起来了：“飞机！”“毛主席！”人们跑出来了，有的问：“说三点钟嘛？为啥一点钟就到了呢？”有的说：“早到早放心！到飞机场！快跑吧！”

跑！大家像飞机一样地跑！工作人员在跑，老百姓在跑；

老汉拉着孙孙在跑，婆姨们抱着娃娃在跑。过河的时候，一群小学生，急得鞋袜都不脱，就从河里跑过去了。劳动模范吴满有，一上午就赶到城里来了，这个五十几岁的老英雄，也和年青人一样的跑着，他一面跑一面问：“飞机落下来了么？”人们告诉他：“落下来了！”他喜欢得跳着脚，拍着手，笑着说：“这就放心了！这就放心了！”

跑到飞机场，大家都争着看毛主席。毛主席下飞机了，大家都拍手。用全身的力量拍手。毛主席举起帽子，给大家打招呼，他对大家说：“中国只有一条路，就是和平、民主、团结！这次谈判解决了一些问题，还有一些问题也能解决，困难还有很多，但是我想是能克服的！”是的，我们知道还有很多困难，我们能够克服一切困难，因为我们有毛主席的领导！大家拍着手，用全身的力量拍着手，欢迎我们的毛主席！

这是多么好的新闻！时间已经过去 50 年，读到这样的新闻，还是令人拍案叫好。好就好在它写的是广大人民群众的心里话，生动感人地写出了人民群众的真实感情，写出了全边区人民、也是全国人民盼望国共合作、民主团结、和平建设新中国的强烈愿望，写出了全边区人民、也是全国人民拥护共产党，热爱人民领袖毛主席的真挚感情。

“和平、民主、团结！”这是党中央的战略口号，也是广大人民群众的共同愿望和心里话。作为党的喉舌的党报真正成了人民的喉舌。就在重庆谈判时期，陕甘宁边区进行了轰轰烈烈的选举运动，这是中国当时最民主的选举，是民主圣地驰名中外的特色之一。这时，《边区群众报》以很大的篇幅来宣传报道这场选举，报上不仅

刊登了各地的选举新闻,报道选举如何提高人民当家做主的积极性,报道选举如何鼓舞保卫边区的战斗事迹,报道选举如何推动边区大生产运动的热烈景象,批评选举中和日常工作中的不民主的典型事例,还有“选举知识”讲话连载,“选举问答”,“选举典型经验介绍”,以及反映选举的歌谣、故事等等。报纸还为选举写了一系列的社论。我们当时撰写社论是先订出一个比较完整的计划,把一个大题目分成几个小题目来写,使文章尽量做到短而精,一篇一个小主题,鲜明突出。就在刊登毛主席回到延安的那期报上(第277期),就登了一篇这样的社论,题目是《发扬民主,就不要领导吗?》,现在看来,我认为也是写得比较好的,可以反映出一个大众化报纸的社论风格。此文只有700字,特抄在下面:

发扬民主,就不要领导吗?

有的同志认为,发扬民主,就不要领导。其实民主和领导,是分不开的,咱们边区为什么有民主呢?就是因为有共产党的领导,共产党领导群众来讲民主。共产党的领导为什么受群众欢迎呢?就是因为共产党发扬了民主,让大家做主人,让大家出主意,共产党根据大家的主意来办事。但是,因为我们过去的工作还有缺点,民主还发扬的不够,这次选举,就要更加发扬民主,干部就要领导大家来发扬民主;民主发扬得更好,将来领导也就会更好,将来工作也会做得更好。

这次选举,如果不领导,不把选举的道理说通,很多干部就不愿意发动群众来检查政府工作,很多干部也不愿意向群众承认错误,也不愿意和群众一起来研究工作,很多群众也会

怕批评政府,也不会大胆发言。而且,发扬民主,决不是乱七八糟,不是为了把工作搞坏。发扬民主,是放手发动群众来检查工作,把工作搞好。比如,当群众已经大胆说话时,领导上就要引导群众集中力量,检查和讨论当时当地最重要的问题。如果不领导,有些群众就会东说西说,抓不着中心。比如,当群众已经大胆批评了,有的人批评得不正确,领导上就要设法把这个不正确的批评,引导到正确的批评。比如,有的群众说出了正确的意见,领导上就要引导旁的人来注意这个好意见。

但是,领导不是强迫命令,领导是很细心地说服教育工作。比如,哪个群众,进行了不正确的批评,要领导,不是马上不让人家说,不是很凶的和人家争论;要领导,就是用很好的态度,把他看法不正确的地方提出来,和他商量,开导他,用道理说服他。说服的方法,最好是发动积极分子和他好好讲道理,使大多数群众相信我们的道理,使群众也自愿的起来和他讲道理,使那个人也信服这个道理,这样才是正确的领导。

我认为这样的社论,这样的新闻,这样的内容,正如列宁所说的,真正体现了人民大众的感情、思想、意志,体现了报纸是党的喉舌和人民喉舌的结合。

作为人民的喉舌,《边区群众报》刊登了很多批评党和政府工作的来信。延安是民主圣地,人民充分享有批评的权利。1942年,边区增加了公粮,有的老百姓批评了毛主席。有一天在大雷雨的时候,有人很偏激地说:雷为什么不打毛主席呢?毛主席听了这话,既没有把他打成反革命,也没有发脾气,反而在大会小会上讲这件事,还称赞群众批评的勇气,他指示边区政府检查工作,而且

发动了大生产运动,来增加生产,减轻群众的负担。在这种民主空气下,《边区群众报》刊登批评稿件,没有遇到什么大的阻力。

当然,上面说的反映人民群众的意见,批评政府的缺点,这些不是大众化的人民报纸所独有的,一切人民的报纸也要尽可能注意这种特点。在《边区群众报》创刊一年以后,1941年5月16日,《解放日报》创刊了。开初,在这方面注意不够,出报十个月以后,就是1942年4月,《解放日报》进行了一次很重要的改版。在改版的《致读者》社论中,就明确提出“具备党报所必需的品质:党性、群众性、战斗性和组织性”。以后,《解放日报》发表了一系列改革党报的社论,在强调增强党性的同时,特别强调增强党报的群众性。社论中说,党报必须“密切与群众联系,反映群众的情绪、生活和要求,记载他们可歌可泣的英勇奋斗的事迹,反映他们身受的苦难和惨痛,宣传他们的意见和呼声。报纸的任务:不仅要充实群众的知识,扩大他们的眼界,启发他们的觉悟,教导他们,组织他们,而且要成为他们的反映者、喉舌,与他们共患难的朋友”。应该承认,《边区群众报》是努力这样做的,但做得还很不够,《解放日报》的改版,也大大促进了《边区群众报》进一步地大众化。

3. 党委、党报和群众的正确关系

作为西北局机关报的《边区群众报》,对于党中央的决策和最高领袖毛主席的讲话,竟敢不全文照登,还加以删节改编,这是在西北局正确领导下所采取的一种灵活措施。

当时,西北局对于办一张面向群众的大众化党报的方针,充分

体现了这种鲜明的群众观点。办一张为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报纸,不是仅仅根据党委的主观要求来机械地进行宣传,而是根据群众的实际情况和文化接受能力来机动灵活地进行宣传。当时党委还是很注意在办报工作中贯彻和发扬党的群众路线的优良传统的。

还有一点也是十分重要的,就是当时西北局对于报社具体领导的方法也是很正确的。对于党委自己委任的报社负责人员,确实信任他们,放手让他们去独立负责地开展工作的。而不是像以后很多党委那样,事事指示照办,处处要求请示批准,稍不如意,就批评指责为“不听话”、“闹独立性”、“同领导不保持一致”。不是强调自觉地服从,而是用纪律来制服。

那时,西北局分工直接领导边区群众报的是宣传部长李卓然同志。他是一位优秀的宣传工作领导者。我刚到大众读物社不久,他第一次同我谈话,和颜悦色,平易近人。他告诉我,毛主席很重视大众化工作,《边区群众报》就是毛主席亲自指示办的。卓然同志向我简要介绍了边区的情况,特别嘱咐我不要蹲在上面,要经常到基层去,了解边区农村的实际情况,了解区乡干部,了解农民,要虚心向群众学习。他对我表示了很大的信任,说:“你在大后方已经有办大众化报纸的经验,希望你大胆工作。”

那时西北局好像没有常委会和书记处,也没有副书记,只有宣传部、组织部等几个部长,书记是高岗,他是一位令人见而生畏的首长。当时西北局的例会和一些重要的工作会议都让我列席,帮助我了解领导意图。我只有在会上才见到高岗。使我一生难忘的是他曾经在一次会议上狠狠地批评了我一顿。事情是这样的:在第一期《边区群众报》上我写的一篇时事述评中,提到了蒋介石,我用

了“中华民国的元首”、“中国人民的领袖”等称呼。他很生气,大骂“什么狗屁领袖,反动头子”!然后,声严色厉地斥责我:“你连这一点也不懂吗?”他如此直眉瞪眼地骂人,真是可怕,把我镇住了,我忍着,没有敢说话。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受到这样严厉的训斥。我满肚子怒气,满肚子委屈,对他的批评不服,就把中央党报《新华日报》找出来(那时延安《解放日报》还没有创刊),那上面好些报道中都有“国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国民党总裁”、“中华民国元首”、“中国人民伟大领袖”、“蒋委员长万岁”等对蒋介石的称呼。我带上这几张报纸去见李卓然部长,指给他看,率直地提出高岗对《边区群众报》的批评是不对的,那天他在会上骂我也是不对的。李部长很冷静地听完我的话,然后轻言细语地向我解释。他没有正面说高岗批评的不对,只是很委婉地说:“现在是国共合作时期,我们对蒋介石的态度是又团结又斗争,一般称呼也还是很客气的。《新华日报》在重庆出版,当然对蒋介石那样称呼。你刚从国民党统治区来,这样称呼惯了,不能怪你。”他又说:“《边区群众报》是在延安出版,我们可以注意少用这样的称呼就是了。”他还劝我说:“高岗同志批评《边区群众报》,没有什么恶意,他脾气大一点,话说得重一点,你不要介意。”经过他这样心平气和地解释,我心里舒服多了。但我还是对高岗很有意见,见到高岗,尽量避免同他接触,而他还是同往常一样,见了我还是点头打招呼,还是让我继续列席西北局例会,文件也继续发给我。我的忿忿之情才逐渐平息下来。

那时西北局派来经常指导报社工作的,先是赵守一同志,在《边区群众报》创刊初期,他还兼任大众读物社的报纸科长,直接指导我工作。大约半年以后他调走了,换成秦川同志。他们都很随和,有问题随时商量,有意见就说,有批评可以争论,有说有笑,平

等待人。赵守一同志见我日夜辛劳,给我取了一个绰号叫“毛驴子”。当时边区一般农民家庭都有一匹毛驴,它最能吃苦耐劳,不吭不响地担当起一家的重活累活。西北局的一些同志也这样叫我,当时上下级关系是很和谐很亲热的。

西北局在延安时期对边区群众报的正确领导,我以为,在我们党报历史上是值得永志不忘的一页。1984年我退出新闻岗位以后,对这段历史作过一番研究,特别是从党委同党报的关系方面总结了一下《边区群众报》的特点。这个总结比较真切地反映了当时的实际。现在回忆起来,仍然活生生地呈现在我的面前。当时,我是这样写的:

“《边区群众报》是一张直接为人民大众阅读的报纸,同时,它是边区党委、以后是西北局的机关报。这两种性质的报纸的结合一致,是《边区群众报》的一个突出的特色。

“它的第一个特点,就是它是直接办给文化水平低的广大群众和基层干部阅读的。一般的党报都是以干部和知识分子为主要对象,甚至是以中高级干部和中高级知识分子为主要对象。而要以广大群众、基层干部和小学教师为对象的报纸,一般不是党报,是党所领导的群众性的报纸。《边区群众报》成为党报,不只是经过党委的明文规定,更主要的是因为它是在党委坚强的、经常的、直接的领导之下。报纸本身很明确,自己是党的喉舌,它要坚定地、及时地、经常地、深入地宣传党委的路线方针政策,密切配合党委每个时期的中心工作,成为党委宣传、鼓动、教育和组织广大群众的比较强有力的工具。它同时又明确:自己也是人民的喉舌,它在党的领导下,充分地、及时地反映广大人民群众的心里话,成为党和人民密切联系的工具。正因为它同时是人民的报纸,更加符合

我们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我觉得,党委在办一个以中高级干部为主要对象的党报的同时,能够再办一个以广大群众和基层干部为对象的大众化的党报,是十分必要的。就是以干部为主要对象的党报,也要尽可能地面向群众,面向基层,因为现在广大农民和工人群众的文化水平也越来越高,他们对党报提出了新的要求,这是不能忽视的。

“第二,《边区群众报》这个大众化党报的另一个特点,是它在一般情况下,不登党的决议文件的全文,不登党的领导同志讲话的全文,不登党和政府会议的详细的长篇报道,连一些最重要的长文章也不登。但是,它绝不是不宣传这些文件、讲话和会议的重要内容,相反,它是十分积极进行宣传的,只是它不采取照登、照抄、照转的办法,而是根据自己读者对象的接受能力,有的放矢地进行宣传。它采取大胆改编的办法,用尽可能通俗易懂的语言和尽量简单明了的文字来进行改写。这样宣传所产生的实际效果,比照登照转的效果要好得多。这一点,党委从来没有批评过《边区群众报》,反而加以表扬。离开延安以后,我主要编辑以中高级干部为主要对象的党报,对报社的编辑来说,越是发表重要文件的时候,编报工作越轻松,反正一登一大版,几大版,照登就行了。在延安编报的时候,情况完全不同。每当重要文件或者重要会议召开时,编报的同志最紧张,大家十分认真地学习和讨论,研究如何进行卓有成效的宣传,而要改写这类稿件是十分不容易的。这类稿件常常是我们集体学习后的集体写作,是我们严肃认真学习后的精心写作。

“第三个特点,是报纸登载自上而下的稿件比较少,登载自下而上的稿件和信件要多得多,大量的篇幅不是登载上层活动,而是

登载基层和群众的活动。我们的上层,本来是为基层服务的,是为人民服务的,适当刊载一些上层的活动是必要的,是人民群众关心的。但是,我们有很多上层活动同人民群众没有直接关系。报纸常常刊载很多上层活动,并不是因为人民群众关心,也不是因为必须让人民群众知晓,仅仅是为了表明上层各单位自己的工作,是为各单位自己服务的。刊载过多的上层活动,常常是一般报纸的特点,也恰恰是它的缺点。

“第四,对于这样一个小小的大众化党报,西北局是很重视的,对它的领导是很主动和周到的。当时,报社的同志努力作到既同党委同呼吸,又同人民共命运;既要知党心,也要知民心。当时,我是一个新入党的小青年,西北局让我经常列席常委会,还列席边区政府的最高会议,西北局的领导同志在视察、检查和总结重大工作的时候,经常让我或者报社记者参加。记得在土改时期,我每次参加检查总结会议以后,都根据会议的情况和西北局领导同志的意见写一篇土改工作述评,不仅在《边区群众报》上登,《解放日报》也常常转载。这个时期,报社这一伙小青年的确是意气风发,工作热情,信心百倍,奋勇向前,因为我们真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因为我们有党委的坚强领导和亲切关怀,因为我们的报纸不是一张普通的大众化报纸,而是一张大众化的党报。”

《边区群众报》在边区人民中深深地扎下了根,人们称它是“咱们的报”。当时在群众中流传着一个谜语:“有个好朋友,没脚就会走;七天来一次,来了不停口;说东又说西,肚里样样有;交上这朋友,走在人前头。”谜底是《边区群众报》,这充分表明边区人民对它的热爱。

毛泽东同志在1940年写信表扬过《边区群众报》。1946年报

纸创刊六周年时,毛泽东同志又特地为我们赠写了题词:“希望读者多利用报纸,推动工作,学习文化。”报纸为此发表了社论:《你是群众报的主人,你要利用它》。西北局书记习仲勋特地代表党委写了一篇文章表扬边区群众报。这是一份非常宝贵的文件,它正确评价了边区群众报六年来的工作。同时也表明,当时毛主席和党中央对于西北局的办报方针和边区群众报的办报实践是赞成和支持的。文章写得很热情,很通俗,也很短,只有七百四十多字,我把它抄在下面。

庆贺《边区群众报》六周年

《边区群众报》出满三百期了,值得大大庆贺。

这个报纸是边区群众公认的好报纸,谁也喜欢它,谁也爱护它。为什么好?它不但容易读容易懂,并且说出了边区群众要说的话,讲出了边区群众要知道的事情。这就是为群众服务,当得起“群众报”这个光荣的称号。它过去是这样做的,今后还要这样做。

六年以来,这个报纸对边区人民是尽了最大的组织和指导作用的。它告诉边区群众和干部团结抗战、生产建设的任务,当边区的喇叭筒,而且教边区干部和群众怎样来工作,来动员,来生产,来完成这些任务。日本打败了,边区较前巩固了,《边区群众报》是有很大的功劳的。这个报纸要好好办下去。现在中国和平建设时期开始了,这个报纸按照什么方针来办呢?边区的方针是继续紧紧团结,好好生产,和一切反民主势力作斗争,建设一

个更繁荣、更巩固的边区。这个报纸的方针也应该是这样的。

报纸是什么？是一种工具。边区干部一定要明白，《边区群众报》是指导工作的工具，是干部学习的工具。有些干部说，我们曾经不知道要做些什么，或者不知道怎么样去做，看罢群众报才知道的。我们干部进入和平建设时期，要学会更多的本领，新的更多的知识。从哪里学来？群众报是很好的一个学校。所以我们不论领导机关和干部，都要好好重视这个报纸，经过它交换经验。哪里有新的经验，好的工作方法，做好了新的工作范例，就写出来登在报上，别的地方也就读到了，大家来学。哪里有不好的事情，不好的作风，也写出来登在报上，批评一下，别的地方也就读到了，大家也就警惕了，不再犯毛病。在这里，要提一句，我们要好好表扬工作做得好的，但也要批评工作做坏了的。我们革命同志是不怕而且要有自我批评的。

大家爱护群众报，大家替群众报写稿，继续把群众报办得更好更好。

（此文登在1946年4月1日301期《边区群众报》上）

这篇短文，充分反映了西北局当时对自己的党报的领导方针，也反映了党委对党报的领导艺术。回想当年，我们好像一匹强壮的烈马，在党委的高明驭手的驾驭下，使我们在边区这个民主模样的广阔天地间，自由驰骋。

4. 报纸—通讯员—读报组组成的新体系

《边区群众报》能够得到边区广大群众的欢迎,起决定作用的是我们比较注意贯彻办报的群众路线。一方面是我们这些办报的知识分子真正的经常深入群众,向群众学习,不断地改造思想和提高自己的觉悟水平;另一方面在宣传教育群众时,特别注意组织广大群众来参加编报工作。

在《边区群众报》创刊一周年的时候,我们已经在这个民主模范根据地的陕甘宁边区,初步建立起一个比较完整的大众化的宣传组织体系。

这个体系由三个部分组成:

第一部分,群众报社本身是一个首脑部。为了使这个首脑部真正发挥它的领导组织效能,全社工作同志不是高高在上,脱离群众,而是经常置身于群众当中,从了解实际、了解群众的实践中不断学习,提高自己,充实自己,使自己和群众尽可能的心心相印,息息相通,而又能比较正确地指导群众。

第二部分,在报社周围,就是在全边区,组织广大通讯员队伍,使通讯网中每个通讯员也在不断学习,提高自己,提高为群众报写作稿件的能力。

第三部分,在这个大众通讯网的周围,也就是在边区各县各区各乡各学校,组织了很多群众报的读报组,由大众通讯员主持读报、讲报,结合读报进行宣传教育工作,提高广大群众的政治水平和文化水平。从这中间又培养出一批新的通讯员,为群众报写出

一批较好的稿件。

这样,就能够名副其实地使报纸成为边区群众喜闻乐见的报纸,也可以说是人民群众自己办自己读的报纸。

下面,我从这三方面加以比较具体的回述。

第一,为了深入实际,深入群众,报社工作人员没有一个是成天坐在办公室里的。我们定了一个制度:做采访工作的同志当然经常深入农村,做编辑工作的同志,也是大部分时间在外活动。

陕甘宁边区是一个农业经济相当落后的地区,我们的任务就是深入农村、深入农民。群众报是周刊,编好这一期报纸以后,商量一下新一期的内容计划,马上分头下乡,在乡下了解情况,写好稿子,念给群众听,经过修改以后带回报社,然后赶着编写通讯员的来稿来信,进行版面的编排工作。

报社同志在延安附近都分头建立了经常联系的据点。我的据点就是著名劳动模范吴满有的柳林区吴家枣园村。陕北的天气属于高原气候,就是在炎热的夏天,早晚也很凉。我们下乡,冬天穿一身棉军服,夏天也用一根棍子穿在棉袄袖子里,扛在肩上随身带着,早晚披上,睡觉时盖上,和群众真是同吃同住同劳动,吃在农民家里,睡在农民炕上。当时也不是拿着笔记本边谈边记,进行专门采访,而是同老乡一起劳动,或者一起吃饭时,我问他答,是在谈家常中有说有笑,很自然地了解情况,征求意见。这样,老乡才信任你,愿意同你讲心里话。去的次数多了,人也熟了,交了几个好朋友了,就能够真正了解到真实情况,也能够听到男女老少的真心话,更能够亲身体会到乡村的风土人情,搜集到一些民间谚语、民歌民谣和民间故事。

我们的原则是先作群众的学生,后作群众的先生。我们体会

到,干部是群众的知心人,才能办出人民的知心报。

著名作家柯蓝同志,五十多年前在边区群众报工作时,找到了一个深入群众,创作大众文艺的好办法,写出了十分出色的作品。当时在陕北民间有一位很有名的说书人韩起祥,他是个盲人,柯蓝自愿去作他的徒弟,为他背褡裢,用个棍子牵着他翻山渡河,走乡串户,像亲人一样照顾他的生活,诚心诚意地向他学习,然后为他改编旧书段旧唱词,创作新书段新唱词。柯蓝写的《乌鸦告状》轰动了陕北。韩起祥敲着鱼鼓筒板,边唱边说,走到哪里都被老乡层层围住,受到群众的热烈欢迎。以后在边区文教英模大会上,韩起祥获得了特等文教模范的奖励,柯蓝也得到甲等奖。

第二,为了吸引大批大众通讯员来参加编报工作,从大众读物社时起,我们就开始进行了很多细致而繁重的组织工作和培训工作。

当时,我们不仅比较明确地认识到,有了大众化的干部队伍,才能办好大众化的报纸;而且认识到,要办好大众化的报纸,仅仅依靠报社少数干部的大众化还不行,仅仅依靠外来文化人的大众化还不行,还必须组织一批大众通讯员来参加编报工作。他们是当地群众中土生土长的积极分子,是在文盲遍地的农村中极为稀少的知识分子,他们比我们这些外来的知识分子更了解边区的社会生活实际,更了解边区的群众心理,由他们为边区群众报写稿、提供情况和提出意见,这对坚决贯彻执行“群众办报”、“全党办报”、“全民办报”的大众化的方针,是不可忽视的重要条件。当时我们曾经学习过列宁关于报纸工作的论述,他提出,报纸有五个专业工作人员,就必须有五百个到五千个非专业的“编外撰稿人”的教导,在这一点上,我们是十分信奉、坚决实行的。

《边区群众报》一创刊,就受到边区群众的热烈欢迎。来信很多,大多是称赞表扬的信,来稿不多,我们当时采取“每信必复”的原则,强调回信要充满热情,希望读者常来信,更希望多写稿,多提供情况、搜集材料和提出意见。同时,每封信都发去“通讯员登记表”,欢迎参加到通讯员队伍里来。

一张张受人喜爱的报纸,一封封热情的回信,引来了越来越多的来信和来稿,迎来了不断增加的通讯员。

对于每件来稿,我们强调采取尊重作者、爱护作者和细心帮助的态度。对能用的稿子进行修改加工,对不能用的稿子提出具体意见,不能泼冷水,不能挫伤作者的写稿积极性,鼓励继续努力。

报社的同志们花很大功夫给通讯员回信,就像给家里人写信那样,一封封的送到边区各地。报社的热情换来了通讯员的更大热情,越来越多的来信来稿激励着整个报社的上上下下。

广大通讯员的来信来稿,是办好报纸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丰富源泉。

在来信来稿日渐增加的情况下,人们越来越感到继续采用“每信必复”的手工业办法,难于维持下去。先是对一个时期一个专题的写稿要求,拟出“写稿提纲”,印发各通讯员;对于一些同类性质的信件和稿件,采取综合回信的办法,这就启发了我们酝酿创办一个供给通讯员阅读的刊物。大约在报纸出版半年以后,我们又创办了一本新型刊物《大众习作》,由胡采同志主编。

《大众习作》的出版,又一次受到边区军民的热烈欢迎。不仅是通讯员欢迎,凡是要动笔写作的同志都欢迎。语文课的教员欢迎,广大青年文学爱好者欢迎,各种办公室的秘书同志欢迎。可惜,我们未能把出版的《大众习作》保存下来,绝大部分都同报纸合

订本一起,在1947年被进占延安的国民党军队毁掉了。解放后只搜集到几本。我手里一本是1940年11月15日出版的二、三期合刊,只要看一看它的目录,就感到很有吸引力。这一期的论文有:周文同志写的《谈谈民歌》,胡采同志写的《写人写事要入情入理》和林朗同志写的《标点符号的用法》。在“工作经验”专栏里,有赵守一同志写的《怎样写工作报告》和刘若金同志写的《怎样教民众夜校》。在“公开信”专栏里,有周文写的《写文章要懂得剪裁》,方之中同志写的《谈谈叙事诗歌》,海原同志写的《怎样写通讯》,还有我写的《给写唱词的同志的信》。另外还登了九篇“习作”和八篇“原稿和改稿”。

我想对“原稿和改稿”专栏多记述几笔。我认为这是一个新创造。我们每期选登几篇原稿,同时登出我们的改稿,还特别登出“改写说明”,让通讯员去琢磨:原稿有什么缺点?改稿有什么优点?为什么要这样修改?“改写说明”讲解我们为什么要这样修改的道理,而且结合具体稿件的修改,谈一些写作时如何选题、构思、分章节和语法修辞方面的道理。这一栏体现了报纸编者帮助通讯员写作的苦心和爱心,很受通讯员喜爱,也成为中学国文教员可以向学生讲解的教材,成为文学青年和秘书的写作指南。这个刊物受到毛泽东的表扬不是没有道理的。

第三,在通讯员网的外围,形成一个人数众多的读报组网络。每一个通讯员都尽可能地建立一个读报组。这是一个以阅读群众报为中心的进行政治宣传、学习知识、提高文化、扫除文盲、推动抗日救国和生产建设等各项工作的宣传教育性的群众组织,不仅受到广大群众的欢迎,也受到党政军民各基层单位的欢迎。

我下乡的时候,总要想办法去观察读报组的活动。有的通讯

员,结合自己的教师、宣传干事或者文工团员的任务,在报纸来了以后,自己先仔细阅读,还作一些准备,因而每到读报的时候,把读报会变成一次生动活泼的宣传教育会。读报的时候,除正式参加读报组的人以外,总有临时参加的很多老人、妇女和儿童。通讯员一边读报一边讲,作一次简短的政治宣传。对于一些故事,就像说书先生那样绘声绘色地讲说。对于一些唱词或歌谣,就边读边唱。对一些新歌,就教大家唱。一些基层干部常常利用这个机会讲一些新政策和布置一些新任务。

至今印象很深的,是我曾经以读报组为核心,组织过几次生产娱乐相结合的月光晚会。第一次是在关中地区的一个村里。当时正值中秋,生产互助组把玉米棒子掰下来堆在场上,忙不过来脱粒。我同读报组研究,让他们同村里干部和学校商量,组织了一个月光晚会。大家先把大堆的玉米分堆成一个个小堆,全村能劳动的男女老少都团团坐在玉米棒小堆的周围,一边劳动一边娱乐。劳动是用两个玉米棒子相互搓擦使玉米粒脱落下来,娱乐是宣传时事、说评书、讲故事、唱小调、教新歌,拉拉队的叫声此起彼伏,掌声笑声融成一片,大家在银色的月光下,不到一个钟头就把成山的玉米棒剥得光光的。全村老少快快乐乐地完成了生产任务,群众和干部都很高兴。

遍布边区农村的群众报读报组,确实成为农村文化活动的活跃力量。有的读报组还办夜校,教识字,扫除文盲;有的办小的演唱组,配合中心工作搞宣传;有的通过读报组了解新情况新问题,为报纸写稿;有的为报纸搜集民歌、民谣、民间故事。读报组更广泛更深入地发挥了《边区群众报》的宣传教育作用,推动大众化运动,提高了人民群众的政治文化水平。

大众化的报纸——大众化的通讯网——大众化的读报组群，是陕甘宁边区推行大众文化运动的一个体系，发挥了宣传群众、教育群众和组织群众的显著作用。

在成都办《大声》时期，特别是办《星芒报》时期，我们也组织过通讯员和读报组，但在国民党反动派统治下，都被当成什么共产党“赤色宣传”的“反动组织”加以种种限制、破坏和禁止，形不成大众化的文化体系。而在陕甘宁边区，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和扶持下，这个新的大众化文化体系才朝气蓬勃、欣欣向荣地开展起来。

在人民当家做主的地区，在人民的天下，才能办成真正的人民的报纸。

在延安时期，真如鱼在江河，鸟在天空，自由游弋，自由翱翔，意气风发地度过了10年的编报生涯。

五、热心大众化运动的领路人 ——周文

在这一节里,我想特别写一写我们大众读物社社长周文同志对大众文化运动的杰出贡献。他虽然在1941年4月调去当边区政府的教育厅长,11月又调任边区政府秘书长,但仍然兼任大众读物社的社长,丝毫也没有放松领导《边区群众报》、《大众习作》、《大众文库》和《大众画库》的工作。周文同志以正确的理论指导和精心的实践安排,领导大众读物社取得了相当优异的成绩。

大众读物社开始出版《边区群众报》时,只有五个人。周文到中央组织部跑了几趟,先后调来作过大众化工作的金照、谭吐、张思俊等比较有经验的文化人。那时,虽然有大批全国知名的文化人涌进延安,可是愿意从事大众化工作的人并不多。在我们所在的边区文化协会这个“山头”里,就是一个外来文化人集中的地方。当时在文协山头的几十位文化人中,大都是著名的文学家艺术家,他们的工作对象是中等文化程度以上的知识分子,他们创作的是大作品,他们不少人不愿意做、甚至还有点看不起大众化的工作。像我们大众读物社的十来个人,是小文化人。虽然在国民党统治区从事文化工作也有几年了,但工作的对象是工农兵和小市民,编

的是一些大众化通俗化的报刊,写的是一些唱词、快板、评书之类的小作品,因而知名度很小很小,很少在那些大作家的视野之内。

可喜的是在文协山头里还有第三种文化人。他们原来也是大作家,却是很赞成很支持大众化的工作,周文就是一个相当突出的人物。还有文协的主任柯仲平、秘书长庄启东、大作家丁玲、哲学家艾思奇、作曲家张寒晖、木刻家刘岷等人,都是倡导大众化工作的热心人。像比较有名的胡采、林金朋、方之中等,也自愿地到大众读物社来工作。还有一些刚来延安的文学青年,如柯蓝、钟纪明等人,他们看到《边区群众报》以后,也自动要求调到大众读物社来工作。

看不起大众化工作的大文化人也相当多,他们还有一套错误的理论观点。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里批评的正是这种人。用毛的话说,就是在文艺为什么人的问题上、在提高与普及等等问题上,都存在不正确的观点。

周文从30年代初参加左联时起,就积极从事大众化工作,他不仅在大众化理论方面有独创性的突出建树,而且是一个开创大众化运动的先行者。他在大众读物社任社长时,还同时负责主编文协出版的《大众文艺》杂志。在这一时期,他先后发表过《鲁迅先生与文艺大众化》、《文化大众化实践中的意见》等论文。在《边区群众报》创刊一周年时,他领导我们认真总结了一年来的实践经验,编辑了《大众化问题研究》一书,他自己写了《序》,还写了《大众化运动历史鸟瞰》和《大众化写作问题》两篇论文。他在这些论文中,有很多真知灼见和独创性的评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以前,毛泽东同志找过好多文艺家谈话,其中多次找周文同志商谈。毛泽东这次的讲话吸收了很多人的意见,其中关于大众化问题,很显然

是受到周文观点的启发,吸收了周文同志的观点。

周文同志领导建立的大众化运动的新体系,在边区发挥了很大作用。早在1930年3月,鲁迅在大力提倡文艺大众化时就说过,大众化的文艺运动需要民主政治的帮助,“若是大规模的设施,就必须政治之力的帮助,一条腿是走不成路的……”回想在成都时期,我们就是一条腿走路走不下去了。在办《大声》、特别是办《星芒报》时期,我们也注意发展通讯员和读报组,有的通讯员还建立报纸代销处或星芒报分社,有的读报组同抗日宣传队结合起来,推动了当地的抗日救亡运动,也推动了普及教育和识字扫盲活动。但是在国民党统治区,我们办的报纸被当成反动报纸,屡遭打击和查禁,我们的通讯员和代销处受到迫害,我们的读报组被认为是赤化宣传,禁止活动。在这种专制独裁的法西斯统治下,怎么可能形成报社——通讯员——读报组的大众化运动体系呢!

正如鲁迅所说的,陕甘宁边区这个模范的抗日民主根据地,为大众化运动提供了十分有利的政治条件。在这种优异的政治条件下,周文如鱼得水,顺利地实践着他的理想,把他的理论变成了现实。

在这期间,周文同志奋发有为,忘我工作,还挤出时间从事大众化的文艺写作。在《大众习作》的“原作与改作”专栏里,周文用“谷天”的笔名,为热爱写作的年轻人改写文章,每期都有一两篇。十年前,他在上海改写的苏联小说《铁流》通俗本,又进行了细致地修改,列入了《战士丛书》之一。这样,《铁流》的翻译本和缩写本在延安接二连三的再版翻印。当时,林伯渠主席说:“延安有一个很大的印刷厂,把《铁流》不知翻印了多少版,参加长征的老干部,很少没有看过这本书的,完成了教育人民教育部队的教科书任务。”

周文根据读者来信中反映政府的布告、公文看不懂的意见,进行了一番研究之后,提出民主政府的公文改革问题。他提出,我们政府的公文在内容上都应注意摆脱旧官僚衙门那一套公文体式和文风,进行大改革,不仅要把公文、布告的文言文改为白话文,而且要改革整个旧衙门的公文体式。周文的这些意见得到边区政府林伯渠主席的赞赏。林主席还赞赏周文对改革边区教育的意见,于是在1941年4月,边区政府任命周文为教育厅长,11月又任命他为秘书长,同时还要他继续负责大众读物社社长的的工作。

周文草拟了改革公文的19种格式,经过边区政府政务会议讨论通过。1942年1月,在《解放日报》上刊登了他所起草的《陕甘宁边区新的公文体式草稿》。这篇文章从公文的类别(15种)、形式(18种)、注意事项(5条)三个方面,详细阐述了民主政府的新公文体式,对各个解放区的公文改革起了很好的作用。

与此同时,周文还给毛泽东同志写了一封信,从公文改革提出改革文风的问题。2月1日,毛泽东同志给周文回信说:“你的意思很对,我们正着手改革并准备专为此事开一次干部会议。望你向《解放日报》写些关于此问题的文章,打击党八股与新文言文。”果然,在2月8日,延安就召开了干部大会,毛泽东作了著名的《反对党八股》的报告。

可见,周文对文化大众化运动的贡献,无论从深度和广度来看,都达到了相当突出的程度。

周文在大众读物社任社长时期,是边区文协的常委,兼管文协总务部,他又兼任边区政府的教育厅长,以后又改任秘书长,工作任务繁重。这时,周文才三十三四岁,正是年富力强、精力充沛的中青年时期。由于他日以继夜地工作,奋力拼搏,1941年秋天,得

了一场很重的伤寒病,肠胃出血,高热不退。到了11月初,正值边区第二届参议会在延安召开,周文的病尚未痊愈,带病坚持工作,负责起草了大会闭幕时的《宣言》。

1942年2月18日,大众读物社结束,改为边区群众报社,周文才到边区政府去专任秘书长的的工作。

结束大众读物社,成立边区群众报社有两个主要原因:

一是《边区群众报》在宣传党的方针政策方面发挥了越来越大的作用,引起西北局的重视。原来把群众报放在文协主办的大众读物社,是把它看成是一种普及文化的大众读物。随着群众报的政治宣传作用的增强,西北局认为有必要突出报纸的政治性,更合乎它作为党的机关报的性格,所以决定正式成立边区群众报社,从文协山头搬到新市场对面的山头,直接归西北局领导。此外领导上还认为,群众报社可以同时完成编辑出版原来大众读物社的《大众文库》和《大众画库》等通俗读物的任务,因而把大众读物社改为边区群众报社。

第二个原因是边区为了对付国民党反动派的封锁,正在进行精兵简政,各种机构人员都在精减调整。1941年9月,因为纸张短缺,出版物精简,我们的《大众习作》出了六期以后,就忍痛停刊了。这次在中央和西北局机关进行精简时,决定把大众读物社改为边区群众报社,人员可以减少1/3(大概是由六七十人减为四五十人),任务同样可以完成。

周文同志在离开群众报时,有两个理想没有实现。一是大众读物社结束以后,他在边区政府成立了一个大众化工作委员会,计划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以后开展工作。当时,在全国各个抗日民主根据地中,陕甘宁边区是党中央所在地,又是人才济济、精英群集

的地方,各方面的工作都做得比较好。党中央打算趁这次精兵简政的机会,派一些得力干部去充实各根据地的工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中,周文认识了贺龙,贺老总欢迎他到晋西北去工作。周文就给中央写了一封信,响应中央调人加强其他根据地的号召,自愿到晋西北去。毛主席看了周文的信,很高兴地对周文说:“到晋绥真好,贺龙要人,要一批知识分子到晋西北。”这样,周文赶快移交了秘书长的工作,8月下旬,就到晋西北去了。这样,大众化工作委员会的设想就未能按照他的计划开展。

二是他准备把《边区群众报》变为边区参议会的机关报的打算也没有实现。起初,西北局对周文的建议是同意的,认为党中央已经正式宣布《解放日报》同时也是西北局的机关报,把《边区群众报》作为边区参议会的机关报,也是很好的设想,因而在成立边区群众报社时,正式任命边区参议会的议长谢觉哉兼任群众报的社长。但以后谢老同西北局商量,说他实在太忙,无法负责领导群众报的工作。谢老认为,党的报纸实际上也是民意机关的报纸,不必特别打出旗号说是民意机关的报纸。西北局最后还是同意了谢老的意见,仍然任命西北局宣传部长李卓然同志任边区群众报社的社长。

很可惜,我当时的觉悟还很低,没有理解到周文同志这个建议的重要意义,因而我也没有去为他这个建议作出一些努力,结果,在民主政治上和报纸工作上,都是我一个很大的失策。

如果当时《边区群众报》正式宣布为边区参议会的机关报,按照当时的习惯作法,延安这个模范根据地的重要举措,很快会引起各根据地的效法。可以设想一下,如果当时《边区群众报》真的正式确定为边区参议会的机关报,就很可能自然形成在抗日民主根

据地里,民意机关拥有自己机关报的优良传统,这就会在我们的民主政治史和报纸史上留下一页光荣的篇章。

回忆起这些事,不仅更加怀念周文同志在大众化运动中的高瞻远瞩,而且更加惋惜自己当时没有十分虚心地向他学习。

老实说,我在那时已经开始滋长了骄傲自满的情绪,对周文同志的意见有时是很不尊重的。最突出的一件事是在总结大众读物社一年工作,出版《大众化工作研究》一书的时候,我的争功争名思想给周文同志出了一个难题,造成了不良影响。在这本书中,周文写了序言,写了《大众文化运动史的鸟瞰》一文,还写了一篇大众读物社一年经验总结的文章。我负责写一篇《我们怎样编辑边区群众报》。因为群众报是大众读物社的第一位工作,周文那篇文章应当包括群众报的主要经验,这样,两篇文章在内容上就不能不有所重复。周文的处理办法是把我文章中的好些部分删去,把删去的部分一大段一大段地原样加在他的文章中。我看后很生气,并向周文提出了批评意见。周文向我解释,这是为了使这篇全面性的总结文章更完整更深刻,并向我说明他的文章不仅是代表他个人,而是以社长的身份代表全社。同时,他向我道歉,说事先没有同我商量就这样做了,很不妥当。从大原则上看问题,我当时无法坚持要他恢复我那篇文章原貌的意见,只能在表面上默许了他的作法,但在我心里却一直耿耿于怀。在这本书校对清样的时候,我删去了我那篇文章的署名,并十分不满地说:“这已经不是我的文章了。”周文两次向我解释,希望我恢复署名,我都没有同意,坚持要删。周文对我这种不顾大局的作法,最后作了妥协。这本书一共14篇文章,都是大众读物社各部门负责同志写的,惟独我这位群众报主编的文章没有署名,使人很容易想到大众读物社内部、特别

是在周胡之间存在着很大的矛盾。对于我这种不顾大局的行为，周文容忍了，而我的错误也就永远铭刻在这本书的目录上。在这以后的50多年间，什么时候重翻这本书，都感到内疚和脸红。

值得反省的是我对自己这种争功争名的个人主义思想，在很长时期内都自以为是，缺乏自觉，认为这是周文的错误，是周文对不起我的地方。直到1952年5月，周文同志蒙受不白之冤含恨西去时，我正在西安，消息传来，万分悲痛。这时回忆起在延安同周文相处的情景，才开始认识到自己10年前的这一错误，才感到自己很对不起周文同志。

写这篇回忆录时，周文同志已经去世44年了。1976年，党中央为他平反昭雪、恢复他的名誉和党籍已经又20年了。应该承认，周文同鲁迅等先辈所大声疾呼、奋力推行的大众化运动，建国后的数十年里，开展得并不理想。全国解放以后，我对大众化方向的坚持和奋斗也做得很不够，很惭愧，也深感自己有负于周文同志对我的言传身教。关于这方面的问题，我还有很多话要说，只能在以后的回忆录中再作补充了。

六、“座谈会”吹出的热风和冷风

1942年,周文虽然离开了边区群众报社,但他仍然关心着报纸,同我们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党中央召开延安文艺座谈会时,他推荐我参加,并带着我一同到杨家岭中央大礼堂出席会议。在闭会那天集体留影时,我原想站在后排,是他拉我到前排,同他一起坐在第一排最左边的两个板凳上。那年我26岁。50多年后重新审视这张照片,毛主席、朱总司令在第一排中间,李伯钊、草明、丁玲、陈波儿、塞克等,夹杂着坐在他俩的左右。我坐在第一排的边边上,我是那么的矮小瘦弱,像个十六七岁的“小鬼”。

这次听毛泽东同志作报告,是我第一次面对面地听他讲话。他不是念稿子,而是即席发言。他拿着一叠纸,上面写着大字的提纲,他的讲话生动活泼,说理精辟,语惊四座。还不时穿插很多典型的具体事例,引起了满堂的掌声和笑声。

我之所以听得特别入神,感到特别亲切,是由于他所讲的一些主要内容,是我们边区群众报社早就是这样做的,而且做了几年了,曾经得到毛本人的数次表扬。

我当时很有点骄傲自满洋洋得意的情绪,自以为做大众化工

作做得很好,很符合党中央毛主席的心意。听讲话时,我感到自己有些飘飘然,好像是一个打了多次胜仗的老战士聆听司令员在庆功会上的讲话一样,我听得很兴奋,兴奋得眼睛放光,面孔发红,觉得很多话,都说到了我的心坎上。我感到毛泽东不仅说了我想说而没有说的话,而且把我想说又说不了他那样鲜明、那样深刻、那样精彩的话,都淋漓尽致地讲了出来。他的讲话把我带到了一个晴空万里自由翱翔的崭新的精神世界。

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毛泽东曾说:“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是科学的、民主的,因而也是人民大众的。”什么是人民大众呢?在这次讲话中,他说得十分明确,就是列宁说的,“千千万万劳动人民”,就是占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

毛泽东发出富有鼓动性的号召,为“中国的革命的文学家艺术家,有出息的文学家艺术家”指明了方向:“必须到群众中去,必须长期地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到惟一的最广大最丰富的源泉中去,观察、体验、研究、分析一切人,一切阶级、一切群众、一切生动的生活形式和斗争形式,一切文学和艺术的原始材料,然后才有可能进入创作过程。”^① 否则,就会成为“空头文学家”、“空头艺术家”。这番话,使我们这些早就深入到人民大众中去的文化人,早就从理论上和实践上努力全心全意为人民大众服务的文化人,受到特别强烈的鼓舞。当时在我们边区文联机关的山头里,就存在大作家和小文人的区别。当时。文联的主任柯仲平、周文、丁玲、张寒暄等大作家是支持大众化工作的,对我们的工作是肯定的支持的,但是,也有相当多的大作家

^①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60~861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

是看不起我们这些小文化人的。

毛泽东讲话中关于“雪中送炭”的号召,使我激动得热泪盈眶。他在讲到文艺工作中的普及与提高的关系时肯定“普及工作的任务更为迫切”。“普及的东西比较简单浅显,因此也比较容易为目前广大人民群众所迅速接受。……现在工农兵面前的问题,是他们正在和敌人作残酷的流血斗争,他们由于长时期的封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统治,不识字,无文化,所以他们迫切要求一个普遍的启蒙运动,迫切要求得到他们所急需的和容易接受的文化知识和文艺作品,去提高他们的斗争热情和胜利信心,加强他们的团结,便于他们同心同德地去和敌人作斗争。”因而毛泽东特别强调:“对于他们,第一步需要还不是‘锦上添花’,而是‘雪中送炭’。”^①这对于我们这些勤勤恳恳为人民群众“雪中送炭”的“小毛驴”们,是多么大的安慰啊!这也是对我们强有力的鞭策,使我们增强了任重道远、坚忍不拔、顽强奋斗的责任感和推动力。

陕北是一个很穷苦的地区,绝大多数老百姓家都没有大车,没有骡马,只有身价很低的而又能吃苦耐劳的小毛驴,帮助农民耕种、推磨、运粮、拉炭,直到送婆姨娃娃走亲戚,都由它来承担。它整天没声没息地辛勤劳动,是陕北人民家家喜欢饲养的小长工。我在延安时,也是没日没夜地勤奋工作,埋头苦干,不吭一声,因而我们报纸科的科长赵守一同志,常常很亲热地叫我“毛驴子”“小毛驴”,这个诨名很快就传开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以后,我们这些为陕北老百姓“雪中送炭”的“小毛驴”们,感到特别光荣和自豪。

^①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61—862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

毛泽东在这次讲话中特别阐明：文艺工作的对象既然是工农兵及其干部，那么了解他们、熟悉他们自然成为“第一位的工作”。他还强调，要熟悉工农兵就要长期深入群众，他说：“什么叫‘大众化’呢？就是我们文艺工作者的思想感情和工农兵大众的思想感情打成一片。”你要了解群众，也要群众了解你，就要“和群众打成一片，就得下决心，经过长期的甚至是痛苦的磨练”。

这一点，我们大众读物社和边区群众报的同志们，已经有了两年多深入群众的经验，经受过两年多“痛苦的磨练”，在思想感情上的确已经有了很大的转变：就是从不了解不熟悉到比较了解熟悉，而且对边区的工农兵产生了尊敬和热爱的感情。当时，陕北人把外来的知识分子叫“洋包子”，外来人把陕北人叫“土包子”，我们这些经常深入农村深入群众的知识分子，也被称为“土包子”，每当我听到这种称谓，感到自己在大众化的道路上总算入了门了。

当时，毛泽东在延安虽然威信很高，但还没有建立起“四个伟大”那样的个人迷信。大家觉得他伟大，但还没有人喊他“伟大领袖”。当时我觉得他之所以伟大，就在于他特别重视和充分肯定已有的成就和大家的经验，善于对各方面的成绩和创造加以综合分析，提高到一个新的高度来认识。

应该看到，在他讲话之前，各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大众化文艺运动，已经是相当热烈地进行着，已经涌现出很多好现象好经验。拿我们陕甘宁边区来说，不仅有大众读物社所创建的大众化的文化新体系，还开展着为消灭文盲而斗争的扫盲运动。艾思奇同志的文章《使三百万双眼睛睁开》，很激动人心。还有像民众剧团、抗战剧团、西北文工团等长期下乡下厂下连队巡回演出，正如诗人柯仲平所说，这就像“喜鹊一样在边区的山山沟沟飞翔着”。那么多宣

传队和说书人在走乡串户,那么多的秧歌剧和活报剧在村镇上演,那么多民歌和新歌剧在群众中流行,那么多新作品和新作家在涌现……当时的延安,不愧为抗日民主的根据地,不愧为大众化文艺文化百花齐放的模范区。那时,毛泽东虽然快五十岁了,但他同二三十岁的青年一样,是那样热情,那样活跃,无论是秧歌还是话剧,无论是秦腔还是京剧,都少不了他的鼓掌和叫好。在文艺座谈会前,他约了那么多文学家艺术家单独谈话,还召开了一些小型座谈会,广泛地了解情况,学习知识,征求意见,讨论问题。这就是他的伟大之所在,也是他的《讲话》中的深刻精辟之所在。

毛泽东的思想理论,我认为在延安时期正处于飞跃期、高峰期。他曾是人们公认的领袖,但不是皇帝,也不是神。人们拥护他,称赞他,也有人议论他,批评他,这是很正常的领袖同人民的关系。不仅有人议论他的决策用人,也议论他的婚姻恋爱和私生活,就是对这篇光辉的文艺座谈会讲话,也有议论,有批评。

边区群众报的同志,对于他所说的“知识分子不干净”、“工人农民不脏”的比喻就有议论。我们笑他实际上并没有长期生活在农村,在农村时也不是真正同农民一起同吃同住同劳动。不像我们比较长期住在农村,同农民一锅吃饭,一个炕上睡觉,盖农民的被子,同农民一起掏大粪。我们感情上愿意同农民打成一片,但也不否认农民不讲卫生以及生活上比较脏的事实。毛泽东说,觉得农民脏到觉得不脏,是阶级感情的变化!虽是比喻,但不确切。因为农民的确比知识分子脏。一般贫下中农的房子,满屋烟熏得漆黑,被褥和帐子发黑发臭,农民长期不洗澡,甚至不洗脸,特别是虱子、臭虫、跳蚤、蚊子、小咬(墨蚊)等等,实在咬得人很难入睡。那时,我们开玩笑地说,虱子密密麻麻,臭虫列队进攻,的确没有夸

大。

如果说这种脏与不脏是比喻思想革命不革命,品德高尚不高尚,也不很恰当。因为农民中虽有很多革命分子,有舍己救人的,有一心为公的人,有真诚坦率的人……但总的说来,一般农民是私心较重的,思想是相当保守的,心胸比较狭窄的,眼光比较短浅。这恰恰是“脏”,是“不干净”。对知识分子,一般的说也是自私自利,患得患失,但因为他们有知识,思想不那么保守,眼光比较看得远,因而易于倾向革命,这也是客观事实。拿这点来说,知识分子“不干净”,农民“最干净”也是站不住脚的。

当时,我很同意“先做学生、后做先生”的道理,就是承认农民的很多地方值得学习,但是由于长期穷苦而形成的不卫生的习惯,是不能学的。而且还要向他们宣传讲卫生的道理,劝他们逐渐养成讲卫生的习惯,不能认为他们“脏”是好的特性,是值得尊敬、值得学习的。

我经常蹲点的地方是柳林区著名劳动模范吴满有的村庄。以后,开展大生产运动时,毛泽东还派他的儿子毛岸英背着一袋小米去向吴满有学习,主要是跟着他学习生产劳动,学习他如何种庄稼,同时学习他的革命思想和道德品质。有时,我和毛岸英也碰在一起,我们很早起来,为吴满有打扫院子、猪圈和厕所,我们并不是因为他家“不干净”才喜欢住在他家里。

当时,我对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学说没有什么研究。对毛泽东所说的从资产阶级思想转变为无产阶级思想,我还弄不清楚。对认为农民脏,知识分子干净,就是资产阶级感情;而认为农民不脏,知识分子脏,就是无产阶级感情,转变过来以后,就是阶级感情变了。对毛的这些话,我当时是半懂不懂,半信半疑,存在很多疑问,

心里并不完全信服。

在学习讨论《讲话》时，对于只有阶级的爱，没有抽象的爱，没有抽象的自由，没有抽象的真理，更是不懂，表示怀疑。当时我们以为，阶级的爱是有一定道理的，但不能说一切爱都是阶级的爱，没有超阶级的爱。对于那时最突出的爱国主义，我们就有过不同的争论。认为无产阶级应当爱国，资产阶级也应当爱国，受苦受难的劳动人民最爱国，资产阶级上层人物中也有抗日救国的领袖。大资产阶级的领袖蒋介石实行先安内后攘外的政策是卖国政策，但他同共产党讲统一战线，联合抗日，不能说这些也是卖国主义。而在国民党阵营中，出现张学良、杨虎城这样的人物，更是爱国主义的大英雄。

对于《讲话》中关于“歌颂和暴露”联系到阶级立场那一部分，我们弄不清楚的问题较多，争论也比较大。

当时我认为：毛泽东把批评放在暴露的大题目下来谈，而不是把暴露放在批评的大题目下来谈，是主次不分，容易把正常的批评同敌人对我们的暴露混淆起来。因为中国的确存在“暴露人民”的文学，“嘲笑和攻击革命人民和革命政党”，那主要在国民党统治区和日本敌占区。但从延安、边区和整个抗日民主根据地来说，全国各地的革命先进人物纷纷奔赴延安和各根据地，总的来说是拥护共产党，热爱国家和人民的。个别坏人混进来是可能的，是极少数。到边区以后来“嘲笑和攻击革命人民和革命政党”的更是极少数。有的同志在批评时主观片面、以偏概全、全盘否定或者不恰当地使用了冷嘲热讽、刻薄挖苦的言词，只是批评中的偏差，是态度、分寸问题，不能归之为立场问题。

我以为毛应当把革命人民之间的批评和自我批评问题突出来

讲。正如他所讲的：“人民大众也是有缺点的，这些缺点应当用人民内部的批评和自我批评来克服，而进行这种批评和自我批评也是文艺的最重要的任务之一。”我以为在充分讲透这方面道理的前提下，提醒大家分清国统区和边区的根本区别，分清共产党和国民党的根本区别，注意批评的对象，批评的方法，批评的态度和批评的效果，防止立场上的毛病。恰巧这时发生了王实味的《野百合花》的问题。

《讲话》之前，延安各机关在2月听了毛泽东的整风报告以后，都在进行整风学习。中央研究院的特别研究员王实味在整风初期就向法院领导提了一些意见，他还在《解放日报》发表了《野百合花》一组杂文。杂文批评延安文艺晚会是“歌啭玉堂春，舞回金莲步的升平气象”，还批评延安的生活待遇是“衣分三色，食分五等”，有一个“干部服小厨房阶层”，等等，引起领导上的强烈反响，开始对王进行批评。在《讲话》以后第四天，中央研究院召开整风大会来批评王实味。在短短两周之内，王实味就由思想问题变为政治问题，很快又联系到他的历史，变为“敌我问题”，说王实味是“反革命”的“托派分子”。

在讨论学习《讲话》时，我和一些同志就认为毛讲的批评和暴露的立场问题很难掌握。比如王实味的批评，可以说是“夸大事实”、“冷嘲热讽”，也可以说是个人主义、平均主义的情绪出发，是偏激的言论；可是当时整风领导者却认为是立场错误，是在“嘲笑和攻击革命人民和革命政党”，肯定“不单是思想上的错误，还是政治上的错误”，这就把王的性质定为敌我问题了。是毛的讲话产生了副作用，还是讲话本身也有毛病？

在王实味之前，还有《轻骑队》大型壁报的问题，这上面也登了

一些批评延安消极面的稿子,反映也大不相同。有人说是正常的批评,有人说是挑剔、攻击,是丑化。

老实说,我当时在政治上还是比较迟钝的。我对延安的现实处于心满意足的状态。不愁工作,不愁吃穿住,这是我多年来求之不得的条件,太理想了。因而对一些同志所注意的延安现实中的缺点和不满意的地方,可以说我都是视而不见,见而不怪,或者认为是不值得注意的小问题。我不像有的同志那样,每期《轻骑队》贴出来后就赶着去看,只是到大砭沟去办事时,才站在人群中看看题目和读几篇我认为有意思的稿子。当时,有一种风声,说《轻骑队》是小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墙报,我也不同意。我虽然也赞成报纸应该以歌颂和表扬为主,但我也主张经常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认为报纸少不了批评。

至于当时已经有人从延安这些缺点和阴暗面,看出延安的政治制度和共产党在理论上的毛病,当时我还没有那种水平。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掀起两股巨风,一股是热风,一股是冷风。这股热风,发动了大众化文艺文化运动的新高潮,对我的影响最大,鼓舞着我们在大众化的道路上更加方向明确、信心百倍地投入新的工作。因为这时,正是大众读物社结束,边区群众报社成立的时候,除了办好《边区群众报》以外,还要继续进行大众读物社的一些编辑工作。这时,我们所创立的大众化文化的新体系发展得很快,报社的来稿来信来访大大增加,通讯员和读报组也大大增加,报社的工作任务更为繁重。报社人员四天在家、三天下乡的制度更加固定和健全。我们是穿梭不断地来往于农村和报社之间,而且这时还有相当多的生产劳动任务,我简直是废寝忘食也忙不过来。

对那时掀起的那股冷风,我几乎是视而不见,不闻不问。这股冷风,从批判王实味的《野百合花》到批评丁玲的《三八有感》,扩展到批判更多的作家和作品,整个整风运动变为反对“小资产阶级思想”的运动。这时,《解放日报》上每天长篇累牍地刊登批判文章,我几乎都没有看,对运动的情况也很少过问。

是不是我们就置身于整风运动之外呢?当然不是。因为我们以为,《边区群众报》整风的主要内容,就是如何更好地贯彻大众化的方针,这是得到西北局宣传部同意的。

七、整风的和风细雨和 “抢救”的急风暴雨

毛泽东同志在1942年1月所作的整风报告,对运动的方针政策规定得很明确。运动一开始,是按照“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和“团结——批评——团结”的方针和方法进行的。大家先是认真学习文件,然后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用文件的精神来检查自己的思想作风,找出自己的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的具体表现,分析它产生的原因和今后改进的办法。在开初阶段,大家心情舒畅地投入了学习。

可是,从4月起,党中央的机关报《解放日报》连续发表了批判王实味《野百合花》的文章,连带也批评了丁玲的《三八有感》,还突出批评了大型墙报《轻骑队》。这样,整风学习的和风细雨味越来越少,运动的火药味就越来越浓了。

毛泽东在讲话中所指的“嘲笑和攻击革命人民和革命政党”的人,大家都猜到指的就是王实味。果然,在讲话后的第四天,全延安就开始了对王实味的大批判。从此以后,整风运动就从“用文件精神来检查自己的思想作风”转到开展对“小资产阶级的错误思想”的批判,批判的矛头是针对外来的文化人和知识分子。

到了1943年4月3日,中共中央发布的《关于继续开展整风运动的决定》中明确规定:“整风的主要斗争目标,是纠正干部中非无产阶级思想(封建思想、资产阶级思想、小资产阶级思想)与肃清党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这个决定对当时延安形势的估计就出现了偏差。决定认为“自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成立与我党大量发展党员以来,日寇与国民党大规模地施行其特务政策,我党各地党政军学机关中,已被他们打入大批内奸分子,其方法非常巧妙,其数量至足惊人”。

4月9日到12日,中央领导整风学习的总学习委员会(主任是毛泽东,康生是副主任兼中直机关总学委会主任)召开了延安两万多人参加的中央直属单位工作人员大会,动员反特斗争。大家都称为“抢救失足者”的“抢救运动”。总学委会夸大敌情,认为“特务如麻”,他们片面追求查出阶级敌人的比例数字,大搞逼供信,制造了很多冤假错案,伤害了大批同志。

这样,报社编辑部的正常编辑工作秩序被扰乱了。但是,报社同志还是尽一切努力坚持群众报按期出版,在我和报社同志的要求下,每周有两天的编报时间,其余时间全部投入抢救运动。

抢救运动像战争的风暴立即席卷延安,整个延安顿时陷入恐慌之中。好些机关还搞刑讯逼供,各种刑罚,封建的、法西斯的暴力刑讯都用上了。

我们这个四五十人的小小机关——边区群众报社,抢救运动算是搞得比较文明的。这功劳应当归功于我们的顶头上司——西北局宣传部部长李卓然同志和他派到报社来领导运动的秦川同志。当时,我只知道卓然同志在红四方面军当过政治部主任,他在政治上曾受过很大的委屈,我估计他早就看出抢救运动的极左倾

向,所以他不像某些领导人那样,先定抓特务的指标,抓不到这个数额,单位负责人就是“右倾”,就是包庇敌人,甚至本人也成了特务。有些人为了保全自己,也就不顾一切地大搞逼供信,形成处处有特务的局面。各单位负责人纷纷向上报“成绩”,以诬陷同志来向上邀功受赏。

在各单位纷纷向上级报告抓出多少特务分子的“成绩”的基础上,总学委召开坦白大会,把一些逼得无路可走、只好“坦白”的人和一些投机分子,弄到大会上去现身说法,作坦白报告,给未抓出特务分子的各单位施加压力,让他们“争当先进”。有的假坦白分子又血口喷人,胡乱咬人,受株连的某些人也不得不赶快坦白,弄得整个延安风声鹤唳,血雨腥风,人人提心吊胆,惶惶不可终日。

应该说,比较起来,我们报社是相当文明的,可是也动了枪,上了刑。每天开斗争大会时,陕北干部的总支书记一上场,就把手枪摆在桌子上作为威慑力量。动不动就把人吊在房梁上,好在只是推推拉拉,没有拷打。只要你一承认“我是特务”,马上就从房梁上放下来,把你关在窑洞里去写“交代材料”。而且还立即得到优待——吃一碗鸡蛋挂面,这是当时延安招待客人的好饭。有的人一连坦白三次,吃了三碗鸡蛋面才“过关”!现在想起来,十分可笑。

在普遍而严重的刑讯逼供下,延安的“特务”队伍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真是特务如麻,多得怕人,每天都流传着“谁谁谁也是特务”的消息。

忽然,传来消息,说我们整个四川地下党都是“红旗党”(就是打着共产党红旗的国民党组织的特务党)。我们四川省委书记邹凤平是特务,我的入党介绍人、成都市委书记韩天石也是特务。这时,二姐胡德辉刚到延安,也被认为是“红旗党”,关在党校里审查。

这些人都是特务，怎能令人相信呢？整个四川地下党都是特务党，又怎能使人信以为真呢？当邹凤平同志由于受不了威胁和侮辱、愤而自杀的消息传来以后，更加引起我的反感。

介绍我入党的同志是特务，我加入的党是特务组织，我怎么能不是特务呢？这时，我已经坐卧不安了。幸亏李卓然同志领导稳重，他一再强调《边区群众报》一期也不能停，把报社主编都打倒了，谁来办报呢？对抢救运动，他更是强调一定要先弄清事实，后戴帽子。加上秦川对邹凤平也比较了解，据他以后说，他当时根本不相信邹凤平是特务，不相信四川党是“红旗党”，也不相信我这个一心为党为人民的“毛驴子”会是反革命分子，因而西北局宣传部决定把我的问题拖一拖，放到最后再说。这就把我保下来了。

我还是报社领导，因而也仍然是抢救运动的领导小组成员，每次碰头会确定斗争对象时，我总要为人家说几句好话，希望能保下几个人，结果常常碰壁。在审查副主编金照和谭吐时，我说我们日日夜夜共同工作，他们对延安、对共产党好，怎么会是特务呢？争论较大，定不下来。以后他们说金照是上海人，是“一·二八”时当的特务，你不了解情况，说我不能证明他历史清白，最后还是决定对他进行批斗。但对谭吐同志，我坚持说，从1938年起，他就同我一起在成都《蜀话报》工作，那时我是报社的支部书记，他同我一起过了两年的党组织生活，我们朝夕相处，工作、学习和生活都在一起，我完全了解，绝对不会是特务。双方争执不下，最后我气愤地说：“如果你们认定谭吐这个党员也是特务，那么我这个党支部书记也是特务，你们就把我们一起批斗吧！”就这样，终于把谭吐保下来了。结果，在报社四五十个外来知识分子干部中，没有被当做特务来斗争的，只有我和谭吐两个人。

谢天谢地,抢救运动只搞了两个多月就结束了。如果像二十多年后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十年那样长,恐怕我们共产党早就自毁长城、玉石俱焚了。

抢救运动使延安出现恐慌以后,总学委会的主任、抢救运动的总指挥毛泽东出面来制止运动的恶性发展,由他来承认错误,向大家脱帽敬礼,赔礼道歉,不到100天就把运动的错误方向扭转过来了。

我还记得,在听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时候,丁玲同志曾对周文和我说,在毛讲话的一个多月前,毛在一个高级干部会上就说过王实味是托派。她说,她的《三八有感》和王实味的《野百合花》在《解放日报》上发表以后,4月,《解放日报》在批评《野百合花》时,就同时批评了《三八有感》。在4月初的一次高干会议上,文艺界只有周扬和丁玲参加,毛在会上就说过,丁玲和王实味不同,丁玲是同志,王实味是托派。

由此可见,在中央研究院批斗王实味,康生说王实味是托派之前的一个多月,毛已经为王实味定了性,公开说王是反革命托派分子。从整风运动转为抢救运动,就是以批斗王实味为导火线的,这不可能是康生一个人在捣鬼,这是领导运动的总学委的重大决策。我当时并不清楚康生是一个怎样的人,很多人都不清楚康生会有那么大的力量,竟然能在延安扭转了运动的方向?!

在文协机关,住着几十位著名的文化人,我们虽然同住在一个山沟里,我同他们的交往却不多。丁玲算是同我有比较密切的关系,因为周文和丁玲是老朋友,丁玲对大众化运动也很关心,周文和柯仲平都带我到了玲的窑洞里去拜访过。丁玲的窑也是土窑,比我们的大一些,墙壁上挖有书架和沙发,陈设很简陋,布置得很

别致,给我印象很深,因而丁玲的《三八有感》刊登出来时,我当天就看了,认为写得好。

王实味的《野百合花》是已经公开批判了之后,我才找来看的。人们说王实味认为延安存在一种“歌啾玉堂春、舞回金莲步的升平气象”,我读第一遍时没有找到这句话,问了别人才指出来给我看,原来这话不是在正文里,而是在正文的一个括号里的陪衬话。

批判王实味的开初,我并未在意,只顾忙着自己的工作。但在批评丁玲时,立即引起了我的关心。记得在《解放日报》发表批评王实味文章的一个月以后,在一篇批评《轻骑队》墙报的文章中,才点名批评了丁玲。

我找出《三八有感》来又看了一遍,还是没有看出什么毛病。当时我正处在与二姐热恋的时期,她是位积极的女权主义者,她强调男女平等,主张妇女要有独立的事业和独立的人格。在她的影响下,我的女权主义思想也相当重,觉得女同志参加革命比男人难得多,即使到了延安,女同志受到有形无形的干扰还是特别多。我以为,丁玲作为一位著名的女作家,在妇女节时出来为妇女说一点话,是理所当然的;即使她说的话有什么不适当之处,她也有说话的自由,何况她所说的是真实情况,是真情的吐露,应当引起延安领导层的注意。

把丁玲和王实味拉在一起来批,我就没有好感。很快又停止了她的《解放日报》文艺副刊主编的工作,我的抵触情绪更大了。

当时,引起我更大反感的是所谓“小资产阶级思想”。反正我们知识分子都是“小资产阶级”,我们的一切思想,只要被认定是不好的思想,都是“小资产阶级思想”;只要被认定为好的思想,就是受到了无产阶级思想的改造。好的思想都是无产阶级的思想,坏

的思想都是小资产阶级思想,我想不通,接受不了。所以,当时我对整风运动的一个主要的目标是批评和纠正小资产阶级思想,对于把要整顿的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等三股不正之风,都说成是小资产阶级思想,无论从理论上和实践上,我都感到与客观实际不符,在情感上难以接受。

对于批评《轻骑队》,我也是想不通的,并感到有一定的精神压力,心里总是不高兴。这同我的办报思想有关。《轻骑队》是1941年春发刊的,是中央青委几位同志主办的。他们办这个大型墙报的目的,据他们4月23日在《解放日报》上发表的自我批评中说:“它是革命队伍里自我批评的一种形式的尝试。我们所以要以这微弱的力量指责、揭露、批评和建议,无非是为了赶走工作、学习、生活中不健康的成分。在创刊的时候,我们的旗帜上即写着:严肃、谨慎、诚恳。我们提出不油腔滑调,不冷嘲热讽,不作人身攻击,不戴大帽子,负责任和自由讨论。”《轻骑队》受到延安青年的广泛欢迎,说明他们的目标对,作法也对,效果也是好的。即使某些文章,或者某些论述失之偏颇或失之荒谬,也不能视之为“实际上是为讽刺而讽刺,养成只发牢骚不解决实际问题的坏风气”,更不能说是“讽刺和攻击革命人民和革命政党”,大摆一棍子打死的威风。

周文曾经告诉过我,说毛泽东在讲话之前,曾邀集鲁迅艺术学院的一些党员、教师征求意见。毛曾经说过这样的话,知识分子到延安以前,按照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把延安想得一切都很好,延安主要是好的,但也有缺点。这些人到了延安以后,看到了缺点,看到了一些不如人意的地方,于是就对延安不满,就发牢骚。

我听了周文这话,也对周文发了一番牢骚。我说,《讲话》既然

说“人民大众也是有缺点的,这些缺点应当用人民内部的批评和自我批评来克服,而进行这种批评和自我批评也是文艺的最重要的任务之一”,那么,偌大一个延安,无非这样一个小小的墙报,刊登那么寥寥几位写的几篇短文来说三道四,就值得那样大张挞伐吗?周文告诫我,现在不要说这些。他说:“正在加酱油的时候,不忙放醋。”

现在回想起来,我当时对延安是心满意足的,也没有看出那么大的问题。对于《轻骑队》墙报,有几个人能够出来指手画脚一番,又有什么不好呢?能够像丁玲、王实味那样议论一番,又是什么大错大罪呢?

今天回想起在延安整风阶段,有令我欢迎的地方,也有令我情绪抵触的地方。加上我的编报工作实在过于繁重,因而我的办法就是埋头工作,有些学习会能不参加我就请假。尽管如此,我自己思想作风上的毛病还是进行了严格的检查。虽然我对什么“小资产阶级思想”的提法有反感,但对于那些三风不正的种种事实,还是能明辨是非,采取毫不姑息的态度。特别是以后,确定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为整风学习文件,我觉得如获至宝,反复学习,有些名言和段落成为我的座右铭,用以反省和自律。我以为,作为一个共产党员,必须处处严格要求自己,要能够“慎独”,努力使自己成为社会的表率。

八、经济封锁与大生产运动

国民党反动派在发动第二次反共高潮中，配合军事上制造摩擦，还派遣一些特务钻到边区的核心，从内部进行破坏，这是想得到的。但是，他们不可能派遣如蚂蚁那样多的特务打进来，也不可能把共产党几个省的组织全部变质为特务党（红旗党），这也是很容易想到的。可是，当时居然发动一场大规模的抢救运动，把绝大部分外来知识分子都当成特务来审查、来批斗，这的确是很少有人会预想到的。这是一件“众人皆醒党独醉”的大错误。

这只能证明党的领导集团在阶级斗争政策上的严重扩大化，却不能削弱从全国各地投奔到延安的进步青年要求抗日的决心。因而，抢救运动的严重错误，没有动摇我们对国民党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警惕和仇恨，没有动摇我们对党对边区的拥护和热爱。

早在我到延安刚满一周年的时候，1941年1月7日，国民党发动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加紧了对各抗日根据地的军事进攻。更加增强了我对国民党的恨和对共产党的爱。当时周恩来在《新华日报》上的题词和《抗议无法无天的罪行》的社论，我一再阅读。现在，经过五十多年以后，我又一次把这篇社论找出来重读了一

遍,仍感到字字句句扣人心弦。社论说:“皖南事变电讯传来,闻者心惊,读者发指。此等自毁军令,自坏国法,自损国力之举,实可谓无法无天之至!”

随之而来的,配合军事进攻的升级,国民党强化了文化专制主义,掀起一个大规模地迫害进步文化人士和进步书刊的逆流。当时,最使我痛心疾首的,是我最崇敬的邹韬奋和车耀先遭到迫害。邹先生十几年惨淡经营的遍布全国的五十几家生活书店和分店全部被查封,先生被迫逃亡香港。车耀先先生则被投入法西斯集中营,竟然成为他进入死牢的开始。

大家都骂国民党是法西斯党,我更加憎恨这个专制、独裁、横蛮、残暴、无法无天的国民党法西斯。

皖南事变以后,国民党军队四十多万人分三个封锁区和五道封锁线,对陕甘宁边区进行包围,不断挑起战争摩擦。

这时边区群众报派出了一些军事记者分赴边区的关中、陇东、绥德、三边等专区进行战地采访。我自己到了关中,随着八路军出入两方犬牙交错的边沿地区,工作了十来天。

边区的边缘地区,因为经常受到国民党军队的骚扰,影响生产的发展,比起延安附近农村,经济情况差得多,但比起国民党统治区,还是好得多,至少有吃有穿,不像那里田园荒芜,房舍破烂,说“一贫如洗”并不夸张。我到那里去住了几天,给我留下了一生难忘的两件事。

一是吃黑糠窝头。这是用小米糠再碾碎以后蒸的,真是难以下咽,不仅难嚼,而且刺刮喉咙,主人一家大小都吃这种黑东西。他们见我难于下咽,说:“这比吃观音土好得多了!”我只好下狠心吞下去。谁知这不仅引起很难受的胀肚,更可怕的是拉不出大便

来,憋了三天,只好用手指抠出来,引起痔疮大发作。

二是同臭虫大战。晚上,我一个人睡在一个旧窑洞里,臭虫多得可怕,一排排一串串地从各种缝隙中爬出来,结队进攻,真是闻所未闻,见所未见,令人毛骨悚然的怪事。开初我用手指抹杀,以后用手掌抹杀,弄得满手臭黄水,还是杀不完。好在我随身带了针线,赶快把自己带来的床单缝成一个口袋,把身体装在里面,尽管这样,还是辗转反侧,到天快亮时才迷糊了一小会儿。起床一看,床单上血迹斑斑。

这都是我一生难忘的磨难。对别人说起,都是骇人听闻的稀奇事。

在边区的边缘村庄,因有敌军的不断骚扰,常常有小的战斗。边区人民一面给八路军抬伤兵,送弹药,站岗放哨;一面坚持生产,他们组成小型的扎工队,照样在田地里干活。这里农民虽然也穿得破旧,缝缝补补,但不像国民党统治区那边那样衣不遮体,褴褛不堪。这里吃的是煮红薯加野菜,有时还加一个新的玉米棒子,比起吃黑糠窝窝,也可说是“天渊之别”。

这时,边区正进行土改。为了改善农民生活,发动群众支援战争,群众欢迎土改。那时的土改,不是把地主富农的土地无偿地分配给贫苦农民,而是减租减息,实行的是二五减租(减少25%)。那时,西北局的政策是很正确的,下面执行的也相当严格,一方面说服地主富农减租减息,让农民有饭吃;一方面又说服农民交租、交息,让地富也有饭吃,而且对地富分子不打不骂,形成团结抗战的政治局面。当时边区在那样困难的条件下,能够打退敌军的骚扰,又能坚持生产劳动,与当时土改政策的正确是分不开的。

我还同敌占区的几位两面政权的乡村小官谈过话。他们表面

上为国民党军队办事,暗地里为我们送情报。有的人当着敌军面,也一起抢老百姓的东西,事后又偷偷送回去。这几次谈话,给我最深的印象,是人心的向背。无论是老百姓还是下层官员,大多咒骂国民党,称赞共产党,大家眼巴巴地望着边区,盼望八路军能够把他们那里也扩大进去。

这次,我同八路军有了较多的接触,还到他们的连队和队部的驻地去过几次,算是我第一次认识八路军。最深刻的印象是,他们的确是热爱人民的子弟兵。使我大为惊讶的,一是他们都穿着粗布军装,没有领章和肩章,官兵一律;二是他们严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老百姓称赞他们“最守规矩”、“最老实”;三是他们挤出时间帮助群众生产劳动,抢着干各种脏活累活;四是帮助群众学文化、办娱乐、搞卫生。你只要看看哪个村子扫得特别清洁整齐,那里肯定驻有八路军。我见过一些国民党军队中的那种烂杆子队伍、烟枪队伍、土匪队伍,同八路军相比真是天渊之别。共产党只要长期保持有这样一支天兵天将,打败日本帝国主义,战胜国民党反动派是必然的。

在皖南事变之前,1940年10月,国民党政府就对八路军和新四军停止发放军饷,陕甘宁边区的经费更加困难。相当贫苦的一百五十多万边区人民的公粮负担,很难养活边区七万多军政人员和八万多匹军马。

困难阻挡不住共产党人的前进步伐。当时党中央所采取的对策,一是进行精兵简政,一是发动大生产运动,既减轻财政支出,又增加了粮食和副食品的生产。

记得在1941年6月,边区政府正在小礼堂召开县长会议。3日下午,忽然大雨滂沱,电闪雷鸣。当时延安的建筑都是因陋就简

的土木房，一个响雷把小礼堂的一根柱子打断，延川县的代理县长当场触电牺牲。

这个消息传得很快。有一个农民对增加公粮负担很不满意，他生气地说：“老天爷不睁眼，咋不打死毛泽东！”公安人员要把这个农民抓起来，说他辱骂领袖。毛泽东知道了这件事后，立即指示公安人员放了这个农民，制止了这个错误行动。并且指示边区政府汲取教训，马上降低征收公粮的数额，减轻人民的负担。

可见，当时毛泽东很能体谅人民的疾苦，而且宽宏大量，能容忍对他的咒骂。这件事很快就传遍了边区各地，十分得人心，很多老百姓称赞毛泽东主席是“明君圣主”。

在边区军民中开展大生产运动，也是共产党深得人心的大事。第二次反共高潮以后，党中央就提出“自己动手，生产自给”的方针，生产运动在各根据地逐渐展开。从1941年三五九旅在南泥湾大开荒地，边区各机关也纷纷响应，小小的群众报社也抽人参加上山开荒。留在社里的人也在自己窑洞前面的小块土地上，种一点西红柿、茄子和辣椒。

为了响应毛泽东主席发出“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号召，每一个机关都制定了具体的生产计划，每个工作人员都规定有一定的生产任务，必须完成。

我当时身体比较瘦弱，但也不甘落后。我们几个人掏大粪，我跳进粪坑，用洗脸盆一盆一盆地端粪。送上去一盆就高叫“红烧肉来了”、“红烧什锦来了”，情绪高涨，气氛热烈。秋凉以后，我又参加女同志的军鞋生产组，纳鞋底、纳鞋帮都难不了我。因为我小时常常陪着母亲作针线，十岁离家上学，衣服鞋袜破了，全是自己缝缝补补。以后，我还学会了打毛线，织毛衣、毛裤、袜子、手套都行。

1944年我还为自己设计、自己编织了一件毛衣，胸前是一个大红星，红星上面套有“自己动手”四个白字，经过自己精心编织，受到很多人夸奖，我自己穿上也显得特别神气。

1947年延安保卫战初期，我一直穿着这件自己织的毛衣。那是阴历三四月，天气比较凉，到了五六月，行军时再背上一个背包，实在热得难以行走。在大热天，我只好把背包里的其他东西全丢了，连我心爱的笔记本也烧了。有一次在烈日炎炎下，全身都被汗水湿透了。有的同志看我还背着这件毛衣，取笑我说：“等战争胜利后，让你爱人打一件比这好得多的毛衣。”我还是舍不得丢掉它。最后，在一次急行军中，背着这件毛衣实在太苦了，只好忍心甩掉这个包袱。我把这件心爱的毛衣从山上向山下丢去，嘴里还说：“亲爱的毛衣，我自己编你，现在又自己丢掉你，希望你能遇到一个更爱你的人，去吧！”真像送别自己亲人那样难过。多年以后，一想起这件事，还是十分懊悔。

在整风运动特别是在抢救运动中，大家心情压抑，机关里死气沉沉，听不到歌声，更听不到欢笑声。大生产运动一来，人们一下就活跃起来了，唱着歌开荒，哼着小调纺线，整个机关热气腾腾，充满了朝气。开初，毛主席号召大家用自己的双手去创造丰衣足食的生活，还不大相信能做得到，经过几个月的辛勤劳动，美好的理想终于成了现实。机关生活也逐渐得到改善。先是半个月改善一次生活，吃一餐白面馒头和炖猪肉，不久就改为一周一次。机关里的等级制也明显了。由于批评过王实味的“小资产阶级的平均主义”，大家对“干部服小厨房阶级”的现象，没有人敢公开反对了，但背后议论还是很多。在吃饭上，我享受吃中灶的待遇，但在第一批发细布干部服时，却没有我，我心里很不满意，背后发过牢骚，特别

是在公开场合,遇见熟悉的朋友,人家穿的是细布制服,自己还穿着粗布衣裳,就觉得很不好意思。

机关生活改善以后,讲究吃的空气也盛行起来了。因为我会做四川菜,节假日一些同志把肉和菜送到我那里,由我做一顿好饭,大家痛痛快快地吃一顿。记得当时我的拿手好菜是坛子肉,就是把肥瘦肉切成块以后,拌上豆瓣酱和姜蒜,装在一起放在开水锅里,用文火煨它两三个小时,肉烂味香。在当时条件下,我的坛子肉成了闻名机关内外的好菜。

在生产劳动中,我们认真经受锻炼,受到很大的教育。与此同时,也使我对毛泽东在文艺座谈会上讲的知识分子“最无知识”的说法,产生了怀疑。

一般来说,知识分子是“五谷不分,四体不勤”的。从我个人来说,大生产运动以前我确实是“五谷不分”,但并不是“四体不勤”。在贫困的农村和小镇的生活环境下,生活对于我来说,确实是“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受到一定的生活锻炼。当然也不能说是四体很勤。我一直是读书编报,长期从事案头工作,四体却也不那么不勤。经过大生产运动,不仅五谷可分了,而且身体也锻炼得健壮一些了。特别是还增加了一些农业生产的科学知识和劳动技能。应该承认,在这点上,我们一方面是从农民那里学到了一些农业生产的实践经验;另一方面,我们也成了农民的老师,将自己从书本上学到的比较科学的生产知识和技术教给农民。大生产以前,我们向农民学如何挖地,如何锄草,如何割谷子等简单的生产劳动,在这一点上,也可以说我们当时是“最无知识”的。但是,在大生产运动之中,我们从书本上和具有科学知识的专家那里,学到了科学种田等比较高一点的知识和技术。

术,然后,我们把这些传授给农民,提高了农民的生产知识和技术。在这期间,我们发动广大通讯员注意搜集关于农业生产的民间谚语和有关的民歌民谣,请自然科学院研究农业的专家来研究和提高,为我们编写了一些科学种田的小册子,也为群众报撰写农业知识。我们这时下乡就能够向农民传授一点点生产知识,能够作农民一点点先生,受到农民的欢迎。相形之下,知识分子就不是“比较地最无知识”,而最有知识的就不是农民,而是有农业知识的专家,是知识分子。这时,我也就更感到毛泽东所说的“知识分子比较地最无知识”的论断是很片面的,是不恰当的。毛的压低知识分子、抬高劳动人民的错误,就显得更为突出了。

应当承认,当时,群众报社所编写的小册子和报上登的农业知识是很浅很浅的,农业科学技术发展前途却是很远很远的。农民要求向他们普及科学知识,而这种普及又要求知识分子对科学技术的掌握上再进一步不断地提高,希望有更多的农业专家。知识分子自然要同工农相结合,要向工农学习;工农也应当同知识分子相结合,向知识分子学习。

九、我当了陕甘宁边区的 特等文教模范

延安的大生产运动，发展到 1944 年冬，又掀起了一个新的高潮。12 月，陕甘宁边区政府召开了劳动英雄和模范工作者大会。在这次会上，最出名的是吴满有，他被授以特等农业劳动英雄的称号，他所在的延安县柳林区，也被评为特等农业模范单位。

在这次会上，边区群众报社也被评为特等文教模范单位，我也被评为特等文教模范，副主编金照同志和文艺编辑柯蓝都得了甲等奖。

群众报社的同志们个个兴高采烈。很多人认为：吴满有能够成为特等劳动英雄，联系到几年来《边区群众报》对他的教育和帮助，报社同志们也有一份功劳。我心里也洋溢着几分骄傲和自豪。但是，在分析吴满有获得如此殊荣的原因上，我的头脑还是比较冷静的。我以为，报社对吴满有的帮助是尽心尽力的，但不能夸功，更不能贪天之功。因为我们在 1940 年初到柳林区吴家枣园去蹲点时，吴满有已经在生产劳动和做事为人方面相当出名。正因为他劳动好、思想作风好、群众关系好，我们才选择他所在的柳林区长期蹲点，把他作为联系重点。而且，延安县的党政部门对吴满有

的教育和帮助是最经常最主要的。我们边区群众报社的同志们把每期的报纸读给他听,为他讲解,把吴家枣园村和柳林区的广大农民的劳动热情和思想觉悟都宣传鼓动起来,这对吴满有的进步是有一定促进作用的。吴满有和柳林区能夺得英雄模范的特等奖,主要是靠他们自己长期艰苦奋斗干出来的。

边区群众报社之所以得到特等奖,更不是因为它帮助了一个吴满有,而是因为他帮助了千百个吴满有式的劳动模范,帮助边区广大农民提高文化水平、政治觉悟和生产知识。

我个人受奖,也不是只奖励我这个“小毛驴子”,而是奖励我带动了报社的一群“小毛驴子”们。一个小单位,三个人得奖,当时也是很突出的。这是因为我们勤勤恳恳地工作,把报纸办得“稍识字的人看得懂,不识字的人听得懂”,成为西北局领导推动边区工作的一个小小的得力助手。

不能小看报纸的作用,但也不能夸大报纸的作用。大生产运动的显赫成绩是边区军民热情加苦干的结晶。整个边区都沸腾了,每一个机关、学校、部队,干部、战士、教师、学生都热情高涨,积极投身于大生产运动。我置身其中,同大家一样,辛勤耕耘,手上和脚上都留下了一层厚厚的老茧,也是切切实实的记录。

1943年到1944年,全边区军民的粮食、食油、蔬菜和猪肉逐步作到了自给自足。穿的棉衣、毛衣、鞋袜和棉花、毛线都是自己生产的,棉衣自己做,毛衣自己织。住的窑洞、房屋、开会的大小礼堂,木料是自己上山砍的,石灰砖瓦是自己开窑脱坯烧的,而且是自己设计建造的。我们用的桌椅板凳、纸张笔墨,烧的柴火、木炭也是自己造的。我们用自己动手的办法,达到了丰衣足食的目的。

大生产运动的好处,当然不仅仅是改善了机关、部队生活,更

大的意义是减轻了人民的负担,群众抗日救国和反对国民党反共摩擦的积极性提高了。共产党、八路军和边区政府在人民心目中的威信大大提高了。对于我们这些在国民党统治区生活了二三十年的知识分子来说,得到了特别深刻的启示,感慨很多。

在鲜明的对比中,我体会到:国统区的人民为什么那样穷苦?就是因为国民党政府不仅不扶助人民发展生产,反而搞了那么多的苛捐杂税,敲骨吸髓地压榨人民,弄得全国民穷财尽。而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主根据地之所以受到人民拥护,因为我们一方面大力扶助老百姓生产自救;一方面又精兵简政,军政干部自己生产,减轻人民的负担。这不是空洞的宣传,也不是抽象的说教,而是每个老百姓都亲身体会到的活生生的事实。

在这次盛大的英模大会前一年,1943年的10月,毛泽东在招待边区劳动英雄大会上说过一段十分深刻的话,我一直铭刻在心。他说:“县区党政工作人员在财政经济问题上,应以百分之九十的精力帮助农民增加生产,然后以百分之十的精力从农民取得税收。对前者用了苦功,对后者便轻而易举。”(《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6年7月横排本,第866页)这百分之九十和百分之十的比例分配,就是共产党政府和国民党政府一个十分鲜明的区别。老百姓叫国民党政府为“刮民政府”,叫共产党政府为“爱民政府”,人民对当权者这种善恶分明、爱憎分明的说法,是从多年的亲身经历中体会出来的。对我们这些知识分子来说,经过大生产运动,也有了亲身体会。无论在大生产运动前、大生产运动中和大生产运动后,我们这些知识分子在党的指引下都比较自觉地深入群众,深入生活。老百姓的生活变化,老百姓的言谈表情,前前后后的事实,给我们以实实在在的教育。

1944年底的劳动英雄和模范工作者大会,比前一次(1943年)的规模大了一倍多,劳动英雄和模范工作者由上次的200人增加到476人。这也表明,大生产运动深得民心。

毛泽东在这次大会上的讲话《必须学会做经济工作》,我是一字一句记录下来的。这次讲话引起我思想上一个飞跃。从一桩桩一件件生动的事实联系到毛泽东讲的精辟的理论,加深了我对人民的党、人民军队和人民政府根本特征的认识。毛的这个讲话虽然只是讲经济工作,不是专门讲党、军队和政权的根本性质,而我是同国民党的鲜明对比中来加以倾听和加深认识的。我不只看到我们党在抗日战争中的必然胜利,而且也看到它必然会成为新中国的缔造者——因为它当时的确是来自人民而又全心全意为人民谋福利的政党。

老实说,整风运动特别是抢救运动曾使我对党产生了一定的悲观情绪,使我对党产生了一定误解,而大生产运动却很快挽回了一切消极影响,全党上下一心、生气勃勃的精神状态,又使我扫清了心灵上空的云翳,欢欣鼓舞地投入了生产热潮。

按我当时的觉悟水平和理论水平,我比较明确地体会到:国民党是一个不管人民死活的党,共产党最突出的优点,就是真心实意地关心人民的疾苦,一心一意为人民谋福利。

毛泽东号召解放区全体党政军人员必须学会做经济工作,要切实实地同全体人民一起开展大生产运动,这是同国民党的党政军截然不同。他在这次讲话的结尾时说:“我们要有两三年功夫才能学会做经济工作,到了各解放区在粮食和工业品全部或大部自种自造自给并有盈余的日子,就是我们全部学会在农村环境中学会做经济工作的日子。”他说:“将来从城市赶走了敌人,我们也

要学会做经济工作。”他最后一句话说：“中国靠我们来建设，我们必须努力学习。”这使我在当时看到了解放全中国以后建设新中国的光明前景。

经过整风运动和大生产运动，我在思想上有一个很大的提高，可以说是使我从政治上的幼稚时期开始向比较成熟时期的转化。特别是随之而开的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对我这一转化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1945年4月23日抗日战争即将胜利的前夕，中国共产党召开了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七大之前，党的六届七中全会，发表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在七大会议上，毛泽东同志作了《论联合政府》的报告，这两个文件对我的教育和启发，对我政治思想的成熟，具有决定性的作用。成熟的标志，是使我更为清楚地认识了我们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的基本任务，以及二十几年来三次左倾路线对这一任务的严重干扰，这使我在继续革命的道路上增加了几分自觉性，减少了几分盲目性。

在七次代表大会期间，我在省立师范和四川大学时的同学，被人们称为“三学士”之一的涂万鹏，作为七大的代表来到了延安。我们三人中，周海文于1938年春先到延安，我是1939年底到达延安，涂万鹏留在川东地下党，据说做了地委书记，被四川地下党选派为七大代表出席会议。多年未见的老友得以相聚在延安，又兴奋又激动。涂的身体瘦弱，神情却显得沉着多了，反映了他在白区工作的艰巨性。他谈到了以往那些出生入死的险恶岁月，躲过了国民党的一次次追捕和第二次反共高潮。（可惜，在以后的白色恐怖中他被捕叛变了）

同涂的交谈加深了我对“抢救运动”的反感。一些人把在国民党法西斯独裁统治下提着脑袋干革命的地下党，竟然打成什么“红

旗党”，污蔑为国民党的特务组织，这种颠倒敌我、混淆黑白、残害同志、破坏革命的抢救运动，实在是太荒唐太可恶了。

涂在谈话中提醒我注意《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这份文件。他说这个决议强调了白区工作的重要，明确提出了刘少奇是“正确路线在白区工作的代表”，希望我好好学习这个决议中关于刘少奇在白区同左倾路线的斗争。同涂谈话后，我又仔细地读了一遍，加深了我对白区工作的重要性、艰巨性和复杂性的理解。

我开始革命是在白区，革命生涯的初期在白区，我踏上新闻战线也是在白区。在我未接触和认识马克思主义之前，我开始革命时是信仰民主主义的。而在我了解了马克思主义、加入了共产党之后，我的思想仍然停留在民主主义。20年后，在“文革”中批判我是“小资产阶级民主派”，是“共产主义的同路人”，我是“认罪”的。

我前面说，经过整风运动特别是七大，我的思想开始进入比较成熟的时期，其实质，就是我的革命理想和目标，比较明确地定位于新民主主义。

我是一个喜欢学习的人，即使在工作最紧张的情况下，我也要挤出时间来读书。七大前后，我不止一次地认真学习《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和《论联合政府》，还重新学习了《新民主主义论》等有关文件。我当时的政治主张，就是首先打败日本帝国主义和反对国民党专制独裁统治。在国内政策上，我比较明确的是强调各种经济成分长期并存，各种政治见解自由竞争，各民主党派团结合作，成立一个民主联合政府，建立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富强的新民主主义国家。

对于文件中所谈到的各次路线斗争的材料，我因为历史知识

太差,读起来似懂非懂,没有办法去分清路线是非曲折,只是蜻蜓点水般的浏览过去。但是,对于几次左倾路线最主要的恶果还是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有两句话我记得十分清楚,一句是各次左倾路线“它们都混淆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一定界限,并主观地急于要超过民主革命”。(《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6年7月横排本,第924页)另一句话是各次左倾路线的同志们“只知道关门主义和冒险主义,盲目地认为‘斗争高于一切,一切为了斗争’,‘不断地扩大和提高斗争’,因而不断地陷于不应有的和本可避免的失败”。(同上,第933页)这是因为我在成都时就了解到白区党组织被敌人“一网打尽”的惨痛事实和延安抢救运动的严重错误所得到的教训。

对于这两个文件,我在思想上还弄不清楚,在情绪上还有所抵触的,还是关于所谓“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有关论述。这是从整风运动以来,从学习毛泽东整风报告以来,就传留下来的。毛泽东把一切好的思想作风都说成是无产阶级的,把一切不好的思想作风都说成是小资产阶级、资产阶级的,特别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认为是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都说成是无产阶级的,而对那些被认为是右的和左的错误路线、方针、政策,都说成是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这是我弄不懂、想不通的。

毛泽东的整顿三风的报告是很精彩的。他讲了很多有说服力的道理,像反对党八股中很多论点,确实是我们写文章和编报纸的圭臬。我的确很认真地检查过自己存在的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的歪风邪气,并认为一个决心一生一世干革命的革命者,一个合格的共产党员,必须随时警惕和纠正这三股不正之风。但是,那时我不能接受的,是把这三股歪风和这类具体的缺点错误,都说

成是“非无产阶级的思想作风”，是“小资产阶级的思想作风”。整风运动一开始，就把“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作为主要的整风对象，就是整我们这些从白区来的知识分子。

我没有接触过如马克思所说的现代化大机器生产所造就出来的无产阶级。当时，陕甘宁边区的工业十分落后，我所见到的都是手工业和半机械化工业的工人。真正无产阶级的高贵品质和思想作风是什么，我弄不清楚。我所知道的是，当时中国共产党的党员，号称无产阶级的先锋队，绝大多数都是农民和知识分子，工人很少，真正大生产工业的工人更少。我们党中央那些领袖人物，包括毛泽东在内，也大都出身于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原来也不属于无产阶级，他们是怎么成为“无产阶级先锋队”的“先锋”了呢？

当时，我曾悄悄自问：毛泽东就没有小资产阶级的思想作风吗？关于他婚姻恋爱等方面的种种传言，几乎是尽人皆知的。他对《轻骑队》的态度，时而这样，时而那样。《轻骑队》出版以后，他的秘书胡乔木就把每期的稿子油印给毛泽东看，听说他不仅称赞《轻骑队》的内容，还称赞《轻骑队》文章的文风是“生动活泼、新鲜有力的马克思主义的文风”。在《解放日报》正式批评《野百合花》、《三八有感》和《轻骑队》以后的不几天，毛泽东为了准备延安文艺座谈会的讲话内容，曾经召集鲁迅艺术学院的几位党员教员开了一次座谈会。据说，毛对当时一些人对延安的批评，还说过这样的话：知识分子到延安以前，按照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把延安想得一切都很好。延安主要是好的，但也有缺点。他们到延安以后，看到了缺点，就对延安不满，就发牢骚。

这个时候，毛对于这类批评延安的文章的评价还是好的，至少认为是因为想得太多，不合理想，就发牢骚。可是过了十几天，在

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说法就不同了,把从好心出发的发牢骚,说成是恶意的暴露和攻击了。

我听了毛的文艺座谈会讲话以后,在开展批评问题上是否存在怀疑的。认为毛的讲话,时而这样,时而又那样,给我的印象是:最好不要批评,好意的批评很容易变成恶意的攻击,甚至会招来大祸。

为什么对延安、对共产党、对八路军就批评不得呢?为什么一批评就是小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平均主义呢?这点,我当时很想不通。但我没有说出来,只是闷在肚子里。

回想起来,我当时觉悟不高,沉醉于对延安对共产党的光明面,没有察觉到它的另一面,没有加入批评延安者的行列,也没有感到《野百合花》、《轻骑队》一类的批评是什么坏事。老实说,那些发现和批评延安的人是先知先觉,我是后知后觉。结果,先知先觉反而成了小资产阶级的典型,而像我这样的后知后觉,却安全度过了整风这一关。

把延安看得不好是小资产阶级,看得太好,也是小资产阶级,那么,把延安看成什么样才是无产阶级呢?

整风运动就是要弄清楚“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区别”。当时,我没有弄清楚究竟区别在哪里。在七大前后的文件中,对这点讲得更多,但右了、左了都是小资产阶级、资产阶级,只有不左不右才是无产阶级,我还是弄不清楚这是为什么。

十、边区群众是怎样 进行民主选举的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口号,喊了14年,日本鬼子兵终于被赶出去了!中国人民的八年抗日战争终于胜利了!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口号,我从15岁喊到29岁,从一个刚刚懂事的少年,成为一个自觉自强,并能够自立自主的革命干部。受侵略受压迫、蒙受耻辱的中华民族,终于从日寇的奴役下解放出来了,终于能够扬眉吐气了。

日本投降的特大喜讯,像天空中猛然降临的电闪雷鸣,立即轰动了延安。我们边区群众报社正处在延安闹市区——新市场对面的山头上,欢腾的人群像潮水一样拥到这里。整个延安顿时张灯结彩,锣鼓喧天。我卷在欢乐的人流中,流着欢乐的眼泪,响着欢乐的笑声,喊着欢乐的口号,唱着欢乐的歌曲,扭着欢乐的秧歌。欢乐的人群举着各式各样的灯笼火把,把延河两岸照耀成一片灯海。火炬像舞龙一般游行,一队接着一队,全市灯火彻夜通明。

随着游行队伍,我从延安南门,沿着延河走到党中央的驻地杨家岭,然后沿着清凉山回到报社。身体很疲倦了,但是,我的心潮翻涌,思绪连翩,不想入睡,靠在自己窑洞前沿的高坡上,凝视着坡

下闪闪的火把和灯光,思考着胜利后怎么办?

雄鸡已经叫过一遍,我才回到窑里,在床上打了一个盹就翻身起来,端上一碗红薯稀饭来到编辑室,忙着编辑抗战胜利后的第1期报纸。这时的《边区群众报》还是周报,15日的事只能在19日报上刊出。那时报上的社论很大部分是我执笔写的。这期社论《胜利快要得到了,我们还要继续奋斗》的第一段说:“日本法西斯投降了,我们英勇抗战了八年,胜利就马上快要到来了,好像我们辛苦了一年的庄稼,现在快要到收割的时候了!但是,庄稼虽是眼看成熟了,要由我们收割回来,放到我们的粮囤里,还不是容易的事,因为有一个狗赃官要抢收我们的庄稼,这个狗赃官就是国民党反动派头子蒋介石。……”社论最后说:“所以,胜利虽是快到了,庄稼虽是快收割了,我们还应该认识清楚,面前还是有很多的困难,我们还要继续奋斗!我们还要加紧努力!”

经过八年来的艰苦奋斗和英勇牺牲,才换来今天的欢乐和舒畅。我们“决不能忘记豺狼还在,不能把胜利的果实让豺狼吞食”。(肖军的诗)当时,我们的心情是喜中有忧,而且是大喜后的大忧。但是,在大忧面前,经过战火锻炼的共产党和解放区人民,并没有妥协退让,而是知难而上,用战胜日寇的勇敢和智慧,去迎接国民党反动派的进攻。

打败日寇的胜利鼓舞了我们,使我们越战越强。我们必胜的源泉,在于我们占1亿人口的19个解放区,在于解放区所鼓舞和带动起来的4亿人民。我们的方针是两条:一是尽可能争取国内团结,避免内战;二是准备应付可能发生的内战,乘胜前进,迎接新的战斗。两条方针的保证都是加强解放区建设,争取从战争时期进入和平建设时期。在19个解放区中,陕甘宁边区是首席解放

区。在1945年1月15日边区劳动英雄和模范工作者大会的闭幕会上,彭德怀副总司令向代表们说:“你们和全体人民把陕甘宁边区贫穷的山谷建设成富庶的边区。……八路军和新四军有这样的边区作为立脚点和出发点,所以能在敌后坚持抗战,愈战愈强……”晋察冀军区司令员聂荣臻也说:“陕甘宁边区不仅是抗日的出发点,并且是建设新民主主义中国的出发点。”实际上,当时的陕甘宁边区早就是全国人民寄托希望的地方,我们边区本身的任务,就是从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和军事上都建设得更好,成为全国的模范区。

在庆祝抗战胜利的欢笑声中,西北局和边区政府在9月6日发出关于民主选举工作的指示,要求在10月15日到12月底进行乡、县、边区三级改选。边区群众报的宣传重点也就转到民主选举方面来。报社的编辑记者几乎全部深入到选举的第一线。我们每个人都选择一个比较好的或者相当差的乡村,长期在那里蹲点,同时,也注意这个乡一般地区的发展情况,有什么新情况、新问题作跟踪了解,写成稿子念给群众和干部听了以后带回报社。

所幸的是在我搜集到的残缺报纸中,还找到我当时写的一篇关于吴满有乡选举的报导。作为难得的史料,我把它抄在下面:

吴满有乡在选举前就酝酿,选举乡上干部研究报上的文章

下乡向群众宣传,吸收群众的意见

吴满有乡已经酝酿选举工作。乡长、指导员和文书,对于解放报上登的试选消息和群众报上登的选举知识,都看得很

仔细，看了，还进行漫谈。指导员纪开发同志说：“今年选举，要发动群众来彻底检查政府的工作，比上一次的搞选举，就难做得多了。只要搞好了，群众真正负责来管理政府，以后的工作也就好做得多了。所以这一次一定要下决心把选举搞好。”

要搞好就要早准备。乡长王治福同志说：“早准备好，干部和群众都认清了这次选举的意义，等到县上把工作一布置下来，就可以马上开始。”

十号开乡政府委员会，十一号开党员流动训练班，除了布置秋季工作以外，也传达了今年选举的特点。

十二号，王乡长到康家圪塔，和村长杨茂村拉话，说：“今年的选举，主要是发动群众来检查政府工作，要群众大胆地批评政府工作，干部决不能报复。”当时，杨村长就告诉王乡长，说：“六月间，你才调来不久，我有一次遇到麻塔的第四，第四问我，王乡长好不好？我反问他：‘你说好不好？’第四说：‘王乡长脾气大，爱训人。’我问他：‘训过你吗？’他说：‘到没有训过我，可把我们庄上那几个二流子训结实了。’我问他：‘训二流子干啥？’他说：‘给他们订计划，要他们生产。’我说：‘训二流子让他们生产，你说王乡长好不好？’他说：‘这样说，那就是好吗。’杨村长说完这话以后，王乡长承认自己脾气大，以后要改。杨村长听了，很高兴地说：“你这人是脾气大一点，性子急。有一次庙河来了伤兵，人都上山去锄草了，伤兵等得发火了，你急得没办法，看见槐树窑子的刘正发到庙河来闲串，你就叫他抬伤兵，他不去，俩人就吵起来。其实庙河来了伤兵，应该要村长去叫人，用不着你去叫人家刘正发，同他吵起来。”王乡长听了，连连承认自己不对。杨村长越说越高兴，对旁的

干部也提了一些意见,而且说:“一定要发动群众大胆提意见。”

指导员纪开发同志,十二号到麻塔,和几位老汉闲拉,宣传选举说:“群众是掌柜,干部是伙计,政府工作做得不好,干部不好,你们就要来领导。你们关心,常提意见,就可以做得好;你们如果不管,工作就很难做好。”这样拉着拉着,几个老汉也提出意见来了。都说,王乡长办事认真,又公道,就是嘴打人,说话厉害,批评严厉。

王乡长是二十几岁的年轻人,工作很能干,很负责,就是脾气大一点;他听了几处群众都说他这个缺点,他决心改正。还说:“群众对政府对我们干部是有意见的,我们的工作是有缺点的,只要我们好好解释,群众是会说出来的。”(季委)

当时《边区群众报》是基层干部和广大群众学习选举和实行民主的好教材。报上登的“选举知识”和“选举问题讨论”等专栏和有关的评论,以及那些典型报导和经验介绍都发挥了实际效果。群众的报纸,群众读,群众用,群众爱,群众办,我们就是在这种深切的感受和激励中提高自己,锻炼自己,鼓舞我们在报纸大众化的道路上兴致勃勃地前进。

整个选举过程,从发动群众,批评政府工作,到酝酿和讨论候选人,以至到投票选举,我们报社人员都是一个环节一个环节、一步一步地进行体验、了解、写稿、读报,这对于像我们这种不了解农村农民的知识分子来说,的确是一次实实在在的、真真切切的生活体验。

使我体会最深切的,就是更加认识到蒋介石专制独裁制度下

所谓“训政时期”的虚伪性。应该承认,中国广大群众的文化水平和政治水平都很低,要实行民主宪政,进行民主选举,的确有很大的困难,当然应当先进行一定的训练。但是国民党反动派故意夸大这种困难,认为必须对群众进行长期的民主宪政的训练,确定在实行宪政之前,先要有一个很长的“训政时期”,而且以此为幌子,把“行宪时期”无限期地拖延下去。

早在1940年3月1日,毛泽东在延安讨汪大会上提出的《向国民党的十点要求》中的第三点,就曾明确提出应该“厉行宪政”,批评国民党“‘训政’多年,毫无结果。物极必反,宪政为先”。认为“言论不自由,党禁未开放,一切就是反宪政之行为”。因而提出“政府宜即开放党禁,扶植舆论,以为诚意推行宪政之表示”。在2月20日延安成立宪政促进会时,毛泽东的讲演中又说,孙中山先生的遗嘱要求在最短期间召开国民会议,实行宪政。孙中山说的是“最短期间,一不是最长,二不是较长,三也不是一般的短,而是最短”,“要使国民会议在最短期内实现”。还说:“孙先生死了十五年了,他主张的国民会议至今没有开。天天闹训政,把时间糊里糊涂地闹掉了,把一个最短期间,变成了最长期间……”不要天天空喊“训政”,而要立即实行民主宪政。

为了促进国民党立即开始实行宪政,早日召开国民大会,选举民主政府,共产党领导的19个解放区,由陕甘宁边区带头首先进行民主选举,为全国民主宪政作一个榜样。

这个榜样做得很好。这是我们的亲眼所见、亲身体会的。

边区的县区乡三级干部,先进行了10天的训练,进行了具体作法的训练。广大选民都学习了选举知识,进行了热烈的学习讨论。说明训练是必要的,但时期可以尽可能缩短。

我们的亲身体会说明：发动群众批评政府工作，并不困难。关键不在选民的文化水平，而在选民的政治水平。由于边区的各级领导干部比较民主，很愿意听取群众的批评，边区群众又有比较自由的民主权利，也敢于和乐于畅所欲言。对于那些胆小怕事的群众，他们有话闷在心里，经过那些敢于批评的积极分子带头，民主气氛越来越活跃，你说我也说，很快也就打消顾虑，畅所欲言了。

可以明显地看出，检查批评政府工作这一段做好以后，就为推选和评议候选人的阶段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对于原来的乡村干部，比较好的都是经常深入群众的人，一般选民对他们谁好谁差早就心中有数。对于涌现出来的新人，群众当然就更清楚，因而经过几次评议，筛选出比较适当的乡政府领导候选人，也不是很困难的事。

候选人筛选出来以后，向群众一个一个地进行详细介绍。有的是由熟悉的人来介绍，有的是由自己介绍，介绍后进行问答，解释群众对候选人提出的疑问，有的是解答有意的考问。这样，在选举以前，一般选民对候选人的情况就比较了解。

在这之后，进行选举。适合群众文化水平低的投票方法很有创造性。有的是在每个候选人名字下放一个小盆，赞成谁就在谁的盆里投一颗豆子。有的在候选人面前放一个小篮，赞成谁就在谁的小篮里放一支筷子。有的在候选人名字下面放一张大纸，赞成谁就用点燃的香头在那人的名字下面烧一个小孔。

投票点设在几个窑洞里。先让选民去一个一个地认清候选人。有的还在候选人名字下面画一个简单的画像。要知道，在40年代的边区，照相是很少见的，《边区群众报》是边区级的报纸，但报社连一台照相机也没有。我在1945年调到解放日报就任采访

通讯部主任,当时的记者都没有照相机。

在选举以前,选民一次又一次地去认清和记准候选人的名字。投票时一个一个地进入窑洞去投票,基本上达到了秘密投票的要求。这些土办法又民主又公正,又简单易行,这办法是我们这类知识分子坐在办公室里想不出来的。当时有些同志认为农民文盲多,文化水平低,无法进行民主选举,经过这种从实际出发、因地制宜的办法,实行的效果出人意外的好,原来的顾虑也自然打消了。

事实证明:夸大所谓“训政时期”的作用,故意推延“训政时期”,完全是国民党反动派反对推行民主宪政的借口。

当然,应该承认,实行民主宪政也是一个长期的渐进的过程。但是,选民只能在民主选举的实践中才能学会民主,不必先进行长期的训练以后才去实地进行选举,行使民主权利。

老实说,执政党如果不下决心开始实行民主宪政,不真心诚意地提倡民主,各种舆论工具如果不积极地去宣传民主,如果不让老百姓去学习实行民主,而且在实行中继续学习,中国的民主就只能停留在文件上和口头上。像陕甘宁边区这样,说干就干,立即开步走,在干中学习,在干中提高,中国的民主才有希望。几个月的民主选举的实践,大大增强了我们的信心,更加认识到延安确实是民主圣地,是中国民主的灯塔。

这时,国民党反动派已经开始向各解放区发动进攻。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争取国内和平团结、反对内战的种种努力终于失败。解放区军民本来想收起武器从事国内和平建设,可惜,又被迫拿起武器抵抗国民党反动派的进攻。中国人民刚刚结束了长达八年的抗日战争,不得不转入又一场规模巨大的解放战争。

中国的革命战争实际上是农民战争,战争的主力是农民。为

了进一步动员广大农民投入解放战争,就不能不发动农民从封建土地制度的剥削和压迫下解放出来。这时,各解放区的农民迫切要求得到土地,好些地区已经开始从地主手中分得土地。因而,在解放战争初期,进行一场土地改革是十分重要的。

共产党中央,在1945年底发布减租和生产的指示以后,在1946年5月又发表了《关于土地问题的指示》(就是著名的“五四指示”)。

陕甘宁边区是老解放区,绝大部分地区早就解决了土地问题,由于西北局和边区政府领导得好,因而在这次土改运动中进行得十分稳妥扎实。

这次土改,我和报社的很多同志都参加了工作组,我仍然在柳林区蹲点。这时西北局的书记是习仲勋同志。我自始至终参加他所主持的布置土改、汇报情况和总结经验的一系列会议。我和报社同志在这次土改中了解一些基层情况,也比较了解全边区总的情况,特别是我一生中第一次这样深切地体会到一个高级党委的方针政策 and 领导艺术。

仲勋同志是一位很令人尊敬的、很优秀的高级领导干部。他亲自领导这次土改的最大优点,就是切实了解和识别不同地区的不同特点,善于采取不同的办法来处理那些错综复杂的问题。

仲勋同志是一位十分平易近人,没有官架子的领导干部。他既能耐心地听取各种不同意见,又能诲人不倦地向干部讲解党的政策方针和工作方式方法,谆谆善诱地启发干部去开创工作。

可惜,我当时的笔记本在战争中丢失了。但是,50年后的今天,我仍然比较清楚地记得他当时讲话的要点。

他很仔细地反复讲陕甘宁边区的特点。他说,边区是老解放

区,同新解放区不同,很多地区早就解决了分配土地的问题,因而不能再搞“打土豪、分田地”那一套。他还讲,在土改中要注意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团结面要大,打击面要小。他一再讲党的统一战线政策的重要,是我们党能够得到胜利的三大法宝之一。他常常提醒干部要团结和尊重地富中的开明人士、工商界人士和知识分子。

当时,陕甘宁边区的近邻晋绥边区,受左倾思想的影响,出现较为普遍的混乱现象,也波及到陕甘宁边区的一些地区,也跟着学乱斗、乱扣、乱拷、乱没收财物、乱扫地出门那一套。仲勋同志领导工作组很快纠正了这些偏差。记得他说,在陕甘宁边区我们共产党早就掌了权,边区的土改运动是我们党按照政策自上而下发动群众有计划有步骤进行的,不像国民党统治区,大都是由群众自下而上自动搞起来的。他说,毛主席说的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绣花,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行动,是针对国民党统治区说的。

这时,我已经调到解放日报社,兼任解放日报的采访部主任,负责主持关于边区的宣传。每次参加仲勋同志主持的汇报会以后,我总要写一篇边区土改工作的新闻述评,登在《边区群众报》上,也登在《解放日报》的边区版上。记得那时《晋绥日报》在土改宣传中有一些左的偏向,曾经受到毛泽东的表扬。仲勋同志特别关照我,对于那些左倾蛮干的宣传,边区群众报和解放日报边区版不能跟着干。因而,我们在土改宣传中基本上避免了左的错误。

这一点对我印象很深。对于党报如何作党委的喉舌,从这时起,就开始有了不同的体会。这点我将在下一章来加以叙述。

十一、在学习解放日报中 引发的思考

我是1945年10月25日,由新市场对面的山头搬到清凉山的。这天,边区群众报社的全体人员都搬到了解放日报社内。我作为边区群众报的总编辑,兼任解放日报的采访通讯部主任,分管解放日报关于陕甘宁边区的宣传。

八年抗战胜利以后,全国人民盼望进入国内和平建设时期的努力,受到国民党反动派的破坏,一场新的国内战争,看来是在劫难逃,整个陕甘宁边区立即进行各种具体准备,适应解放战争时期的到来。

党中央决定,准备在必要时把领导中心从延安迁到华北,到时候解放日报要随同中央迁移。西北局决定先把边区群众报社搬到解放日报社里,这是一项很重要的措施。

记得当时西北局宣传部长、边区群众报社的社长李卓然,向我交代了新的任务。归纳起来是三条:

一是准备在解放日报迁移时,接收遗留下来的物资,主要是印刷设备。

二是学习解放日报的办报经验,准备将来把《边区群众报》从

四开周报改为对开日报。

三是决定我兼任解放日报采访通讯部主任,把两报的记者队伍和通讯员队伍统一起来,加强《解放日报》对陕甘宁边区的宣传。

1942年,《解放日报》大改版时,已经加强了对边区的宣传。记得改版以前,《解放日报》主要是采用国内外通讯社的稿件,刊登国内外的时事新闻,对边区和延安的大事,都安排在很不显眼的地位。比如,1942年2月1日毛泽东在中央党校作整顿三风的报告,动员全党开展整风运动,只登在第3版右下角一个三栏题的地位。2月8日,中央宣传部召开整顿文风大会,毛泽东在会上作了反对党八股的报告,也是登在3版左下角的三栏地位。从党的工作的重要性和群众需要的迫切性来说,作为党中央的机关报,都应该把它们看作特别重要的新闻,放在1版头条的地位。

改版时,中央批评了这种“为国内外通讯社办报”的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指导思想。1942年4月1日,《解放日报》改版时的社论《致读者》中明确提出:“报纸必须与整个党的方针、党的政策、党的动向密切相联,呼吸相通,使报纸应该成为实现党的一切政策,一切号召的尖兵、倡导者。”还说:“密切地与群众联系,反映群众的情绪、生活、需求和要求,记载他们可歌可泣的奋斗事迹,反映他们身受的苦难和惨痛,传达他们的意见和呼声。”可见,只有做到这两点,才配称为党的喉舌和人民的喉舌。

仅从改版前后版面安排的变化,就可以明显地体现出这种精神。例如,改版前大体的安排是:1版欧洲,2版远东,3版国内,4版上半版是陕甘宁边区,下半版是副刊。改版后的安排大为改观:1版是要闻、战况、社论,2版是生产、政治和战斗通讯,3版是思想、艺术、文化、科学,4版才是国际。劳动模范吴满有的消息上了

1 版头条,陕甘宁边区的稿件也大受重视了。

《边区群众报》比《解放日报》创刊早一年。《边区群众报》是西北局的机关报,又是一个专为广大群众和基层干部阅读的大众化报纸,因而它同地方党委和广大群众的关系比较密切,显得比较容易解决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问题。在《解放日报》改版时,我认真学习了改版的有关文件,从内心里还感到有点自豪,觉得我们的办报方针是正确的。但是对改版前的《解放日报》,我并没有看出它的缺点,还以为中央级的大报就应当是那种格调。在学习了解放日报改版文件以后,看到改版后《解放日报》的报纸面目大改变,才算比较清楚地了解到党报作为党的喉舌和人民喉舌的道理。

我们搬到解放日报社以后,两个报社的通讯网合并起来,两个报社的记者队伍统一使用,陕甘宁边区的新闻报道在数量上大大增加,在质量上也大为提高,以边区为题材的各种评论和文艺作品也更为充实了。

学习了解放日报的改版文件和改版后的报纸面目以后,《边区群众报》也更为活跃。一是办报方针更明确了;二是工作活动范围大了。报社的记者编辑如鱼得水,好像从小河沟游到大江里一样,更能施展才干了。在联系实际、联系群众方面,《解放日报》和《边区群众报》都受到了党和群众的称赞。

至于向解放日报学习办大型日报的经验,我也有很大收获。一般地说,解放日报编辑记者的文化水平和知识水平比我们高。边区群众报的记者在发现新闻线索、采访和写作新闻稿件等方面,向解放日报记者学到很多东西。我在柳林区吴家枣园蹲点那么多年,我所写的关于吴满有的报导,比起解放日报记者莫艾同志写的新闻通讯来,就其深度和广度来说,就差得很多。

1946年9月,边区群众报在处理诗人李季的长诗《王贵与李香香》的失误,就暴露了我们编辑工作落后于解放日报的状态。当时,李季同志在三边专区工作,写了一首叙事长诗《红旗插在死羊湾》,送给三边报和解放日报,《三边报》全文登了。解放日报副刊部的编辑认为很好,还特别找我们采访通讯部管理三边稿件的同志了解作者情况。原稿很长,一段唱词、一段说白,这位编辑同志把说白删去了,改成一首长诗,标题也改为《王贵与李香香》,在副刊上连载了三天(1946年9月22至24日)。这是一首用陕北民歌信天游形式写的长诗,歌颂陕北人民的革命斗争,塑造了王贵和李香香两个动人的形象,无论从内容和形式上都是很优秀的。解放日报的总编辑陆定一还特别写了一篇短文大加称赞。可是,作为一贯注意刊登民间文学的《边区群众报》,却没有发现和重视这篇以后成为流传全国的文学精品。当时认为《三边报》和《解放日报》都刊登了,《边区群众报》就不必再登了,这表明编辑部在识别和衡量稿件质量高低上,有很大的不足。两年以后,李季同志到边区群众报来工作时,我还为此向他说过一番道歉的话。

在学习编辑国内外通讯社的电讯稿方面,我的兴趣很大。我常常到解放日报新闻部的编辑室去参观学习。他们当时对解放战争情况,确实是了如指掌。对双方军事力量配备、战略布局和战役动向,以及双方的军事实力、武器装备、高级长官的姓名和特点等等,都相当熟悉。编辑室墙上贴的战争进展情况的地图上,插着红蓝小旗,标记着每天的变化和动向。我很佩服他们对于时局形势的记忆力、观察力和分析力。

很可惜,在学习评论写作方面我的收获很小。这主要怪我的认识不对和努力不够。《边区群众报》的评论对《解放日报》来说,

只是“小言论”。《解放日报》的社论都是毛泽东、杨松、陆定一、胡乔木等人的大作，谈论的都是国内和国际的大事。对于写这类评论，我在思想上就望而生畏，根本就没有勇气敢去动笔试写。就是评论边区的大事，我也没有勇气去试写。在土改宣传中，我经常撰写的供边区县区干部阅读的述评文章，都是夹叙夹议，叙多评少，虽然也在《边区群众报》和《解放日报》上同时刊载，但我当时也没有雄心去试写成社论一类的评论。今天回想起来，我这种“安分守己”的工作态度，使我失去了一个很好的学习机会。

在学习解放日报一年半当中，对我来说，最大的收获还是在党报的办报方针上有所觉悟，虽然是很初浅的，可确实是十分可贵的。

当时很简要地提出：党报所必备的品质，是党性、群众性、战斗性和组织性。或者说，党报是党的报纸，也是人民的报纸；报纸是党的喉舌，也是人民的喉舌。

按我的理解，可以概括为三个方面：一是党报同党委的关系；二是党报同人民群众的关系；三是党的喉舌同人民喉舌的关系。在第一方面，我们边区群众报同西北局关系是很正常的，双方都很满意。那时像我这样的青年干部，经常列席西北局的常委会和边区政府的例会，阅读很重要的文件，参加西北局和边区政府召开的重要工作会议。正如我前面说的，我自始至终参加习仲勋同志主持的关于边区土改工作的一系列会议，边区群众报关于边区土改的宣传，都是在西北局直接指挥下进行的，既做到了比较正确、比较及时地宣传了西北局有关的方针政策和计划步骤，也比较全面深刻地反映了边区土改的实际情况和各界群众的意见呼声。

我很佩服西北局的领导。就拿土改来说，毗邻的晋绥分局，在

一段时期内,政策上犯了左的错误,晋绥日报也跟着犯了错误。而西北局既遵照中央的精神,又善于从实际出发,对下面某些左的倾向坚决及时地进行了纠正,没有犯左的错误。尽管当时毛泽东曾经表扬过晋绥日报一些左的宣传,边区群众报在西北局的领导下也没有犯这类错误。

在整风运动中,特别是抢救运动时期,党中央也犯了左的错误,但从《边区群众报》的情况来看,西北局的领导还是比较冷静稳当的,对发生的偏向也纠正得很快。当时,《边区群众报》的主要读者对象是基层干部和广大群众。因此,我们对延安高级机关的活动一向很少报道,对机关整风和抢救运动都采取一律不反映的方针,西北局也同意这种作法,因而也避免了犯错误。

当时,西北局几位主要领导同志的领导作风是很正派的。无论是习仲勋同志,还是宣传部长李卓然,或者是组织部长马文瑞,都很平易近人,有说有笑,我们很容易到他们办公的窑洞去当面请示报告。宣传部几位经常同我们联系的同志,更是常来常往,商商量量,丝毫没有上下级间的隔阂和顾虑。说老实话,这种亲密无间的上下级关系,在进城以后就越来越疏远了。

搬到解放日报社以后,我的工作受到西北局和解放日报的双重领导。我深深体会到,无论是博古、陆定一,还是直接领导我的余光生、艾思奇、范长江,他们的水平都很高,他们出的主意,写的文章和改的稿子,都令人钦佩。他们和蔼可亲,总是很耐心地听取我们的意见,很虚心地尊重我们的意见,从来没有板起面孔指手画脚的官架子,所以边区群众报同党委的关系更为密切。

在同人民群众的关系方面也有很大加强。首先是通讯员队伍和记者队伍扩大以后,对边区的情况和群众的苦乐了解得更及时

更深入了。报上采用来自基层的稿件增多了,报上反映实际问题和群众呼声的稿件也更加丰富多彩了,无论是《边区群众报》和《解放日报》都更加受到边区群众和广大干部的喜爱。

在党的喉舌同人民的喉舌两者之间的统一方面,我们的认识和作法也有进步。事实证明,只要党委的方针政策正确,真正合乎人民的利益;党报又善于宣传贯彻党的方针政策,报纸就自然既是党的喉舌也是人民的喉舌;如果党委的方针政策错了,党报也跟着错了,党报虽然是党的喉舌,甚至受到党委表扬,但却不是人民的喉舌,得不到人民的拥护。在一段时期内,晋绥分局和晋绥日报的情况,就有力地说明了这点,对我们的启示是深刻的。

记得当时在学习解放日报改版文件时,在两个喉舌的理解上,显然存在着分歧。有的同志认为党报是党的喉舌,自然而然也是人民的喉舌。一些同志对这种“自然而然”的说法抱怀疑态度。在《解放日报》改版一年以后的《本报创刊一千期》的社论中,对两者关系讲得相当明确。社论说:“我国现代报纸的历史……亦已百数十年,然而属于人民的报纸,则仍寥寥可数……广大的中国人民大众。要建立自己喉舌的报纸,报道自己的活动,畅谈自己的意见,真是历尽了千辛万苦,求之而不可多得。本报是中国共产党的党报,当然义不容辞,要坚持这一方针。这个方针即是:使本报成为抗日人民大众的报纸,成为鼓吹抗战、鼓吹民主、鼓吹进步的号角。我们要把人民大众的生活,人民大众的抗战活动,人民大众的意见,在报纸上反映出来。”

这里所说的“义不容辞”同“自然而然”就有原则上的分歧。可惜当时我对这一分歧,认识还很肤浅,也没有从理论上去加以研究。

谁知,时间一下就过去50年了。没有想到,这一分歧竟然时轻时重,延续发展下来,成为我们新闻工作实践上和新闻学理论上的一个争论的焦点,也就是关于党报的党性和人民性的争论,成为党报办报方针上的原则分歧。这是后话,只能放到以后再去展开论述了。

随着解放战争的发展,解放日报随同中央转移到华北的日期逼近了。对于接收解放日报带不走的物资器材等方面的工作,由行政部门去负责,我基本上没有过问,只是埋头于采访通讯和编辑工作。

1946年底,国民党反动派进攻延安的军事布署开始行动。11月,一部分先疏散到延安以北的瓦窑堡,以后又转移到晋冀鲁豫解放区的河北省涉县。留在延安的一部分,从11月20日起,把《解放日报》由对开四版缩小为两版。在这之前,《边区群众报》于11月2日由周刊改为周二刊。

1947年3月13日,国民党反动派的飞机大肆轰炸延安,清凉山上也落下了炸弹,报社的中文译电科被炸。这天,解放日报出版了最后一期报纸以后,全部人员随中央机关撤出延安。15日,疏散到瓦窑堡的同志继续出版《解放日报》,由对开两版改为四开两版。从3月15日起到3月27日又出了13期。

3月18日子夜,我们边区群众报的全体人员,随西北局机关撤离了延安,沿着山沟沟向北撤退。我心中暗暗发誓:我们一定能够很快回到延安!

十二、第一次经受战火锻炼

1947年3月18日子夜,我们告别了清凉山,从延安向北撤退。天黑沉沉的,没有星光,没有灯火,我难舍难离地想再看看延安一眼,可是四周一片漆黑,看不见山顶上的宝塔,看不见新市场的大门牌,看不见延安的城墙,整个延安的山崩崩山沟沟,都沉浸在一片黑暗之中。延安——八年来,与我朝夕相守,培育我、锻炼我的母亲,在这离别的时刻,连她的身影也看不清,就默默地踏上了征途。

尽管我十分清楚,这是毛主席决定的战略转移,用不了多久,我们会回来。可是,我们的心头,仍然像压了一块石头那样沉重。

队伍静静地沿着延河走了一段。就钻进山沟向北偏东的方向前进。边区群众报的队伍,是西北局机关队伍中的一个小分队,夹在大队的中间。前,看不到头,后,看不见尾,大家心情沉重地闷着头跟着队伍向前走。

在延安七八年,早已走惯了山路。延安的机关都是从山下到山上一排一排的窑洞,每天上山下山,要跑好多趟。从这个机关到

那个机关,从市区到郊区,都靠两条腿爬上爬下,磨炼出一双铁脚板。在黑夜里高一脚低一脚地行军,并不觉得难,也不觉得苦。

大队像一字长蛇阵般弯弯曲曲地透迤推进。走到天已经大亮,到达离延安八九十里路的安寨东南的一个小村子,大家喝了几口水,咬了一点干粮,倒头就睡了。我们电台的几个同志没有睡,一住下来就开始接收新华社和中央社的电讯稿,大约在上午10点多钟,就收到中央社播发的敌军占领延安的消息。无论它如何吹牛说:“经过七昼夜激战,于19日晨占领延安”,“俘虏敌军五万,缴获武器弹药无数”等等,我们都一条一条地收录下来,立即把敌人这个“陕北大捷”的消息分送西北局机关。

西北局机关的队伍同西北人民解放军总部常常在一起行动。解放军机关流动性大,西北局机关流动性比较小,因而有时两者靠得很近,有时离的很远。我在安塞真武洞附近只住了两天,商量了一下边区群众报在战争时期的工作部署后,我就带着几个同志到住在青化砭附近的西北人民解放军政治部去报到,在政治部主任徐立清领导下,成立了新华社西北前线分社,我担任社长。我们当时用的机器是一台很简陋的四灯收发报机,发电靠一台小小的手摇马达。

党中央、毛主席坚持留在陕北,《解放日报》、新华总社留在中央身边的小分队代号叫“四大队”,主持工作的是范长江同志。前线分社在业务上由四大队直接领导。我们的任务是把西北战场的战况及时向总社发出报导。同时把战争新闻和通讯发给边区群众报。

战争时期,中央和西北局领导的新闻单位在体制上进行了很大的调整,总的原则是由以报为主转变为以社(新华社)为主。在

清凉山,解放日报、新华总社和延安新华广播电台是三位一体的中央新闻首脑单位。陕北战争开始以后,就把工作重点由编辑《解放日报》改变为播发新华社电讯稿,在《解放日报》停刊以后,代表中央的言论也由新华社的名义播发全国和全世界。

同时,清凉山新闻首脑机关的大部分人员,由廖承志率领,随同刘少奇同志领导的中央工作组奔赴华北,小部分人员由范长江率领跟随党中央、毛主席在陕北坚持工作。

这时,西北局领导的新闻单位,边区群众报社也改为西北新华社,包括西北新华社和负责发行报刊的西北新华书店,由杜桴生任副社长(社长由宣传部长李卓然兼任)。这种由以报为主转变为以社为主,由编辑报纸为主改变为以收发新闻为主,对于边区群众报的工作来说,也是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转变。表现在战时报纸不能正常出版,但编发新华社的通讯稿却一天也不能停止。从读者对象来说,也有很大的转变。原来《边区群众报》的读者,是以基层干部和广大群众为主,现在变为以西北局系统的中高级干部为主。报纸的内容就随之有较大的改变,就是由大众化的报纸逐渐改变为一般性的报纸。

这一时期,我虽然在名义上仍然是边区群众报社和西北新华社的总编辑,但我没有作任何具体工作,一切工作都由副总编辑金照同志和林朗同志负责,我把全部精力投入前线分社的报导工作。

当时,前线分社只有十几个人,除了几名收报员和译电员、一名杂务人员外,其余的都深入到西北解放军中作随军记者,负责采写战争新闻和通讯,组织编发部队通讯员的稿件。经常在分社里的就我一个人,一方面编发记者和通讯员的来稿,一方面同西北解放军司令部联系,编写主要战报。

前线分社的工作是相当艰苦的。在激烈的战斗中，部队经常在夜间急行军，我们这些随军记者，当然也跟着急行军。在一般急行军中，每个人拉着前面同志的衣服跟着走，走着走着就进入半睡半醒状态，我们自夸为“走着路睡觉”或“睡着觉行军”。一休息下来，无论是躺在地上，还是靠在坡上，倒头就睡。吃饭时，也常常是闭着眼睛，边吃边睡，我们又自夸为“睡着觉吃饭”或“吃着饭睡觉”。急行军常常是一路小跑，一跑就是一个多小时。很多次都是在雨中行军。有一次在滂沱大雨中行军，队伍进入一条山沟，前面几辆辎重马车陷在泥浆里，越陷越深，怎么拉也拉不出来，后面长长的队伍只好站着、靠着或者坐着淋雨，一停就是几个钟头，全身早就淋透了。到了宿营地，在老乡腾出的空窑里，人们脱得光光的，一件一件地把衣服烤干。大家有说有笑，毫不在乎，更未听说谁因此伤风感冒。

到部队的前十来天，我虽然身体瘦弱，对于行军的艰苦，还能挺得住。可是由于头脑里出了点问题，好像病了几天，一下就寡言少语了。我的病按当时流行的说法，是“小资产阶级爱面子”的虚荣心在作怪。

事情是这样的。在部队中，等级制度是比较明显的。像我这样的干部，当时是应该配备军马的。因为前线分社是新建的一个小单位，还未来得及分发马匹。在行军中，和与自己差不多的同志们相比，感到人家都骑在马上行军，而自己没有马骑，面子上很过不去。有一次，我一个人到司令部去开会，要经过一段离敌人很近的地带，政治部临时派了一名战士背一枝长枪跟在我后面作保护，我越走越觉得心里不舒服。回分社后，我发了牢骚，生气地说：“我又不是俘虏，派一个战士押送我。”很快，组织上就给我配备了警卫

员和一匹浅灰色的日本大马。这样一来,我反而感到不好意思。我分配警卫员去做其他的事,不愿意他总跟着我。在行军中,我也很少骑马,常常让生病的同志乘坐,只有在跟随总部首长们一起行军时,才骑上那匹大马,和首长们同样快马加鞭奔驰前进。在战争中我很喜爱这匹大洋马,每天晚上我都要去为它加草喂水。在行军途中,凡是上坡的时候我都下马,在后面拉着它的尾巴,一步一步地向上爬。有一次,我一个人拉着马去司令部,在一片开阔地带,突然遇上敌机轰炸,我让马卧倒,我贴着他的肚皮躺着,深感我们是同呼吸共命运的战友。久而久之,我们之间建立了亲密的感情。

在前线,生活上并不觉得很苦。首先是粮食比较充足,即使在最困难的时候,伟大的边区人民倾其所有来支援战争。陕北的山药蛋是我们的宝贝。有粮时,它是菜;无粮时,它就是最好的粮。战争中,菜当然是很少的,连咸菜也很少,常常是一小碟野菜加一些盐,或者一点辣椒加一点盐,拌着小米饭,就是美味佳肴了。当时,盐也很少。有一次老乡跌死了一头羊,我们弄到一条羊腿,没有盐,只能吃红枣炖羊肉。小米、糜子、荞麦、糠粃,是主要的粮食。面粉很稀少,只有在打大胜仗时才能吃一次蒸馍。经常成问题的是油,因为吃的油和点灯的油都是一样,有时是棉籽油,更多的时候是羊油。我们经常通宵打夜工,点灯的油总不够,常常把食油拿来照明用,炒菜就常常没有油水。肉当然更少,但每次打胜仗以后,总要美美地吃一顿。

当时,部队的作战情绪是很旺盛的,充满必胜信心,最大的快乐就是打了大胜仗。战士的快乐是缴了多少枪支弹药,抓了多少俘虏,消灭了多少敌人。我们的快乐是写了多少稿子,发了多少条

新闻通讯。这些稿子特别是战争通讯,大都送给群众报,只有重大新闻才发到长江同志那里。每次西北战场打了大胜仗以后,新华社总社总要播发一两篇我们的新闻报道。

当然,我们的十几名随军记者更为艰苦,也十分勇敢,他们是在枪林弹雨下进行采访和写作的。他们还常常帮助抢救伤员,同战士一样冲锋陷阵。我们的记者蓝钰同志,有一次同连队一起被敌人包围,在进行英勇抵抗以后,他同战士们一起,从十多丈高的山崖上跳了下来,及时地报道了这场英勇的突围战。

每次,中央要开会,西北局和中央就靠得比较近,我总要回群众报去看看,也要到总社去向长江同志汇报请示。

从3月18日我军撤出延安,到5月4日,在47天中,我军在清化砭、羊马河和蟠龙打了三场大仗,获得了三战三捷,胡宗南占领延安时那股不可一世的猖狂气焰,像泄了气的皮球一样,再也蹦不起来了。“一举消灭共军主力,把中共首脑赶过黄河”成为一枕黄粱。西北人民解放军在安塞真武洞召开了几万人的祝捷大会,部队就在这一带休整,我们分社同群众报社和新华社总社都靠得很近,我赶回群众报社,分社的随军记者也大都回到报社这个家,这是我们自延安撤退以后第一次大团聚,战友重逢,喜气洋洋。

这时,西北新闻社的名义取消,改称为边区群众报社和新华社西北分社,加上新华书店,是一个合三为一的统一体。在这期间《边区群众报》有时出四开四版、四开两版、八开两版,有时铅印、石印、油印,随着战时物质条件的变化而变化,采用各种方式坚持出版。由于西北战局全面转入反攻,后方比较安定,物质条件也较好,当时就在筹备把《边区群众报》改为《群众日报》。这个计划,在1948年1月10日终于实现了。为了继续满足广大群众的要求,

同时编辑出版了大众化的《边区群众副刊》，是32开的小册子。改出日报以后，则改为《群众日报副刊》，以后又改为16开本的《群众周报》，继承和发扬《边区群众报》通俗易懂的优良传统。

在祝捷大会以前，蟠龙战役快要结束时，我赶到总社发出蟠龙大捷的简短新闻。这时范长江同志正在撰写《新华社记者评蟠龙大捷》的述评。他在文章最后还写了一首打油诗：

胡蛮胡蛮不中用，延榆公路打不通，
丢了蟠龙丢绥德，一趟游行两头空！
官兵六千当俘虏，九个半旅像狗熊；
害得榆林邓宝珊，不上不下半空中。

这一篇评论给蒋介石的战略进攻下了一场瓢泼大雨。

只要分社和总社一靠近，我就会到总社去联系业务。同志们为了我的安全，要我带上警卫员，我都不带，一个人来来往往，习以为常。大概是这年12月，我又去总社，同志们说路很好走，骑马一两个钟头就到了。只要沿着后面一条大山沟，一直走到沟底，再翻一座山就到了。吃过中饭，我一个人拉着那匹大洋马就上路了。不知在哪里走错了路，老走不到沟底。等我从沟底翻到山顶，天已经黑了。

那时，我军和敌军的驻地常常是犬牙交错，相距很近。天黑了又看不清究竟走到哪里了。我把马拴在一棵大树上，一个人悄悄向前走，看样子，我是走在一排窑洞的脑畔上。我趴在地上伸着头往下看，下面是四孔窑洞，没有哨兵，断定是老百姓。静耳细听，很安静，我断定不是敌占区，如果有敌人，一定吵吵嚷嚷，打打闹闹，但我还是不敢贸然下去，耐心地趴在窑畔上观察动静。十多分钟

以后，听到下面有笑声，有一个娃娃唱：“鸡娃子叫来，狗娃子咬，当兵的哥哥回来了。”肯定是我们自己的地区，我才大着胆子拉着马下了一个小坡，到这户人家去问路。果然是边区的老乡，他们热情地让我喝了一碗水，告诉我走错了路，走偏了十几里，然后把我送到“四大队”住的村子。

到了总社，我把这场虚惊讲给他们听，大家都责怪我太冒险了，同志们东一句西一句，说得我真有点后怕。设想，如果真的误入敌区，当了俘虏，“一失足成千古恨”，我这一生，可能完全是另外一种样子了。

十三、用兵如神的彭老总

在陕北战争中，我们西北前线分社虽然经常同党中央靠得很近，却很少见到中央机关的首长。在我记忆中，我第一次见到毛主席，是在沙家店大捷以后，1947年12月底，党中央在米脂杨家沟召开会议的时候。

我先到新华总社，范长江同志向我传达了毛主席所作的报告《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内容，然后带我到杨家沟去看望陆定一同志。他曾是解放日报的总编辑，当时是党中央坚持留在陕北战斗的中央纵队的政委。

定一同志住在一间很小的窑洞里。门开在中间，两边架了两副门板作睡铺，就把这间小窑洞挤得满满的。我同长江坐在定一同志的对面，相距很近，真可谓促膝谈心了，定一同志也向我们介绍了毛主席讲话的内容和这次会议的重要意义。

正在谈话当中，毛主席从窑洞门口路过，同长江同志打招呼，我们都站起来请他坐。他站在门边，两手扶着门框，他的头都快顶上门楣了。当长江向他介绍我说：“这是胡绩伟同志，他是边区群众报的总编辑。”毛主席笑着说：“认得，认得。”他对长江说：“你的

打油诗,讽刺胡宗南,他真是一只又笨又蠢的大狗熊。”他哈哈大笑,说了一声“你们谈”就走了。

在延安时期,我同毛主席没有个人间的来往,他怎么说认得我呢?原来是延安文艺座谈会时,他曾主动走到周文同志面前同周文谈话,我正站在周文身边,周文曾把我介绍给他,他说:“哦,群众报,办得好,我们都喜欢。”

这次短短的见面,使我十分兴奋而又激动。当时,我对毛泽东的崇拜处在又一个高潮时期。经过十个月的陕北战争,我对他坚持留在陕北领导战争的宏伟气魄更是钦佩得五体投地,对他指挥战争的高超艺术,更是由衷地佩服。

毛主席在杨家沟会议上的报告《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由长江同志领导下的新华总社很快地播发出去,我们是最早的一批读者,这篇讲话是我们在战争中学习毛泽东人民战争理论的最好文件。

当时,我还作了学习笔记,写下了自己的三点体会:

一、学习毛泽东的人民战争的战略思想。这是一场依靠广大人民和人民子弟兵自己解放自己的战争,因而无论经过多少艰难险阻,人民终究要得到胜利。

二、学习毛主席指挥战争的高超艺术。主要是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变被动为主动,变劣势为优势,达到保存和壮大自己、削弱和消灭敌人的目的。

三、学习毛主席的统一战线的民主团结思想。主要在于:既坚决满足广大贫苦农民的土地要求,又努力防止和纠正侵犯中农利益、破坏工商业和把党外人士一脚踢开的偏向。

十个月来,我亲身体会到,由彭德怀和习仲勋所领导的西北人

民解放军,对毛主席的人民战争思想和指挥艺术,不仅充分掌握了,而且是创造性地运用了,从而赢得了一场又一场威武雄壮的战斗胜利。

我亲身体会到,保卫延安这场战争,确实是边区 150 万人民和几万人民子弟兵全体动员、全力以赴的生死斗争;人民是这场战争的決定力量,指挥员的杰出才华表现在善于创造性地发挥和运用人民群众的巨大力量。

陕甘宁边区在战前几次土改运动中,妥善地解决了农民的土地问题,团结了中农,切实避免了左的偏向。在这个基础上发动了轰轰烈烈的参军运动,壮大了正规军和民兵队伍。与此同时,又普遍改选了各级政府,首创性地实行了“三三制”(解放区的政治制度,共产党员在政权中所占的席位只能占 1/3,其余,进步分子和中间分子的代表各占 1/3),不断健全人民民主政权。这样,整个边区在进行延安保卫战之前,就形成了全民皆兵、团结一致的大好形势。在党中央决定主动撤出延安以后,延安全体军民都满怀着重仇大恨的必胜信心。

我军撤出延安时,边区人民进行了彻底的坚壁清野的战争准备,不仅没有给敌人留下一粒粮食,连一个碗一双筷子也不留给敌人。民兵游击队布置了地雷阵,使敌人进占延安后,在人民战争的天罗地网中,常常陷于惶惶不可终日的困境。敌人成了瞎子、聋子,毛主席的中央纵队常常就在附近,离敌人只有几里路远,可敌人却一点也不知道。

在我军撤离延安到收复延安的一年多时间里,我始终在前线,很多次在彭总身边,我除了赶写一些战争新闻以外,却没有写过一篇关于这次战争和关于彭总的通讯报导。因为受到机械的保密思

想的束缚,我把保密当成神秘,没敢留下任何可供写作的材料。今天,回过头来看看,我只是历史上的一个普通的匆匆过客。当时,在我们的前线记者中,我也只是一个很逊色的记者。有很多人比我优秀得多,特别是以后成为著名作家的杜鹏程同志,更是佼佼者。在50年后进行这段人生历程的回忆时,我感到有些茫然,也很歉然,毕竟这是无法挽回的事了。

每次重大战役的开始到结束,我常常跟在彭总的身边。他总是深入到前线的前沿阵地去观察和指挥。他走得很快,一溜烟就到了基层指挥所,我总是一路小跑着跟在他后面。敌人的子弹常常从我的头上呼啸着飞过。我这个文化人,在延安一住七年,没有经历战争的体验,有几次是他的警卫或参谋,突然把我按倒在地上,才躲过了飞来的子弹。当我站起来拍打身上的泥土时,只见彭总还是像山一样巍然矗立,或者仍然跨着大步一往直前。

初见彭总时,他一脸威严,令人望而生畏,但一接触,他常常是有说有笑,和颜悦色。到了战壕里,他总是对这个战士说两句,给那个战士擦擦脸上的灰土。到了指挥所,他耐心地听取基层指挥员报告敌情动向和征询意见,很少打断人家的话。在司令部,下级来请示,他总是有问有答,说完后总是问一句:“行不行?”或者“好吗?”有一次下雨,下级冒雨来到,他立即叫来人脱去湿衣服,把自己的棉衣给他们披上,让他们脱了鞋,到炕上暖暖身子。

彭总在前线睡得很少,吃饭也不定时。有几次在他那里碰到快吃饭时,他总是留我吃饭。他的饭菜很简单,似乎总是一小盘土豆丝,或者一盘野菜,加一小碟辣椒。他同战士一样,常拿着一个馒头或者一个窝窝头,一边啃一边工作。记得有一次是一纵队司令员张宗逊将军来,他留他吃饭,特别吩咐炊事班加了一盘炒鸡

蛋。只有在蟠龙大捷和宜川大捷时,我在他那里吃饭,正赶上会餐,大家都有肉吃,炊事班长才给他端来一碗红烧肉。打了大胜仗,下面送来缴获的肉罐头,彭总都吩咐送到医院去,还要批评两句,以后就很少有人敢给他送战利品了。

在指挥作战方面,彭总的确是充分运用和实践毛泽东人民战争思想的军事家。在陕北战争初期,蒋介石调集了39个旅、23万军队包围陕甘宁边区。这中间,胡宗南就有15个旅、14万军队从南面发起进攻,大军压境,来势汹汹。当时,西北人民解放军只有7个旅、2.6万人,敌军部队超过我军9倍,等于一个战士面对9个敌人。我军主动撤出,国民党军队进入空荡荡的鸡犬皆无的延安后,中央社竟胡吹什么:“经过七昼夜激战,于19日(1947年3月)晨占领共军总部延安,俘虏敌军五万,缴获武器弹药无数。”这种厚颜无耻的谎言,只能骗骗不知真相的蒋管区人民,边区军民对此嗤之以鼻。我们的战士和老百姓都明白毛主席的战略思想不在于一城一地的得失,而在于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我们撤出延安是让胡宗南背上一个大包袱,然后按照毛主席指示的:“采取蘑菇战术拖疲敌人,逐渐削弱它,各个消灭它。”彭总更是神机妙算,他说,要“按照我们预订的计划,把敌人引进我们预订的路线,在我们预订的时间,达到我们预订的地点,接受我们预订的歼灭”。

撤出延安以后,我军主力隐蔽在延安东北蟠龙一带。敌人经过四五天侦察,还是摸不清我军去向,只好分两路“扫荡”,寻找我军主力。彭总指挥一支小部队把一股主力引向西北的安塞。敌军的另一股主力于3月25日被我军引入布置好的蟠龙以南的青化砭地带的伏击圈,仅仅经过两小时的战斗,就全部歼灭敌人三十一旅全部,活捉敌旅长。4月14日,我军又诱敌进入蟠龙以北羊马

河的伏击圈，又消灭了敌军一三五旅一个旅，活捉代旅长。我到前线还不到一个月，就深深感到毛主席的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战术开始显灵了。

胡宗南吃了分兵扫荡的苦头，决定把两个兵团集合在一起，排成数十里长的“方形战术”，同宿同行。彭总指挥一小部分队伍迷惑敌人，且战且退，把敌人引向延安以北的绥德。敌人以为这是我军主力向北退却，就趁势沿着咸榆公路向绥德推进，企图在黄河西北地区消灭我军主力，或者逼迫我军主力过黄河向山西败走。从蟠龙到绥德本来只有三天的路程，敌人被我军和游击队一路阻击，竟走了六天，弄得人困马乏，疲惫不堪。

蟠龙是敌人武器物资供应补给站。我军主力在蟠龙附近地区休息四天以后，等敌人主力远离蟠龙接近绥德的时候，彭总指挥我军向早已包围起来的蟠龙发起攻击，经过两天（从5月2日到4日）的激战，我们又歼灭敌人一六七旅6000多人，缴获军服5万套、面粉1万多袋、子弹100多万发和很多药品。等到敌人从绥德掉转身来赶去蟠龙营救时，那里已是敌人的一座大坟场了。

使我惊异的是，彭总像是一个老练的记者，每次写战报时，他早已成竹在胸，对我口述战报的内容，我只要一记录下来，就是一条很简明扼要的新闻。在蟠龙战役之前，他还指示我发了两三条绥德地区的小战斗的新闻，还发了一条黄河沿岸的民兵游击队运粮支援解放军的消息。他对我说：“民兵用船运粮这句话，一定要写上。”我知道，彭总强调写上这句话，大概是有文章要做。果然，这句话引起了敌人的注意，他们的军事情报人员向上报告说，他们特派飞机到黄河边侦察，发现我军在几个渡口集中船只，说什么“敌军可能要东渡黄河”。彭总把这份情报给我看，冲我挤挤眼，

哈哈大笑说：“你看敌人蠢不蠢？”

退出延安还不到两个月，接连三场大战都赢得了胜利，大大刹住了敌人的威风，扭转和稳定了一度危急的陕北战局。

敌人打通咸榆公路，打算在黄河边吃掉我军的美梦破灭了。当敌人清醒过来，整顿队伍，再度寻找我军主力作战时，我们在安塞真武洞开了一个两万多人的军民祝捷大会，然后在这一带休整了一个月以后，彭总又指挥我军主力经过两天两夜的急行军，突然出现在陕甘宁边区西部的陇东高原。

当胡宗南从南线进攻边区时，延安西部陇东专区、西北部的三边专区和北面的榆林，蒋介石指挥马步芳、马鸿逵和邓宝珊的部队，趁机侵扰边区。在胡宗南三战三败的情况下，蒋介石指挥这二十多万杂牌军，配合胡宗南发起新的进攻。

彭总趁胡宗南在蟠龙地区整顿败军的时候，指挥西北人民解放军进军陇东，然后经三边到达榆林，打击这些杂牌军，把胡宗南孤立起来。同时，调动胡宗南主力部队在咸榆公路再来一次大游行。

在陇东黄土高原和三边沙漠地带急行军，是我一生中最难忘的，也是最艰苦的远程跋涉。

陇东黄土高原是十分贫脊的地区。高原上没有水源，种庄稼全靠天老爷，收获很少。老百姓饮水都是从高坡下到深沟去取水，一个人赶一头小毛驴，从天亮出发，到沟里驮上两桶水，到傍晚才能回到家。一般庄稼用水和牲畜饮水，都是靠收集雨水积成的窖水。由于高原缺雨，大路上都是厚厚的一层浮土，车马一过就是一片黄天昏地，烟尘弥漫。我们在高原上行军，最大的困难是缺水。当时，正是5月，赤日炎炎，热尘扑面，头发、眉毛、口鼻、耳孔都是

灰土。汗水早已烤干，口渴得嘴唇干裂，舌头起泡，连转动都不灵了。行军中，望眼欲穿地盼到有几户人家，前面的队伍早就把老乡家的水喝干了，连泡菜罐子里的酸汤也挤光了。有的同志把马尿接下来分给大家，我实在难于下咽。同志们劝我说：“你就把马尿当救命药吃吧！”想到小时候，母亲夸我什么苦药都能吃下去，于是下狠心，闭上眼睛，喝了几口。天呀！这又苦又涩又臭的马尿，真成了我的救命药了！

从三边沿着长城到榆林，要经过很长的断断续续的沙漠地区。刚刚饱尝了黄土高原缺水的奇苦，接踵而来的是沙漠奇苦，也就显得不那么惊异了。沙漠是软的，每向前一步，脚就陷到沙土里，腿用不上劲，走不了几步，鞋子里、袜子里灌满了沙土，越走越抬不了脚，起不了步，真可谓举步维艰。走不了多远，小腿大腿都像针扎一般的刺痛，脚板很快起了血泡，我们咬着牙，忍着痛，一步一步地挣扎着前进。太阳的直射和黄沙的反射，如履锅底，如进烤炉。大家嘴唇破裂，嗓子嘶哑，不少人流鼻血，头晕目眩，摇摇晃晃。沙漠里的艰苦，我觉得似乎比在黄土高原上还稍好一点，起码不是那样满头满脸、整个眉眼都黏糊着灰土，而且沙漠里还不时出现小块绿洲，稀稀拉拉地长着各种野草。实在渴得难熬了，还可以挖一条甘草根含在嘴里，还没到渴得不能不去喝马尿的地步。

经过两夜一天的沙漠行军，我们终于在长城边的草原上休息了一天，再继续向榆林前进。

从陇东、三边到榆林，这一路，敌人的战斗力很弱。听说解放军来了，没有经过多少激战就纷纷撤退。我们虽然收复了广大地区，却没有消灭多少敌人。

解放军突然沿着边区西北面包围榆林城，使蒋介石、胡宗南大

为恐慌。榆林是陕甘宁边区的后门,是国民党反动派多年经营的反共堡垒,是历代军家争夺的军事重镇。彭总这一天迂回的目的,就是想把龟缩在延安地区的胡宗南主力引出来,牵着它的鼻子沿着咸榆公路再大游行一次,以便寻找战机消灭敌人。这次,我军常常深夜行军,不断转移,迅速而神秘地变换位置,严密封锁消息,故意欺骗迷惑敌人,因此包围榆林,就像神兵天降一般,弄得胡宗南昏头胀脑,赶快派兵北上增援,达到了彭总调遣敌军大游行的目的。这次,我更深刻地理解和体验了彭总的“围城打援”的战作思想。在围城期间,彭总指示我发了几则攻城的新闻,故意把榆林说得岌岌可危,就是要引诱胡宗南忙忙慌慌地长途跋涉赶来增援。鱼饵下好了,等着大鱼来上钩。

实际上榆林的城防是相当坚固的。这场攻城战役,打得很激烈。每当夜幕降临,我跟随着彭总到前沿阵地。攻城夜战,实在壮观。当时还没有大的照明灯和探照灯,敌人用铁丝编成一个大铁笼,里面装满木炭,点然后,风一吹,就是一个个大火球。他们沿着城墙一段距离就挂一个这样的大灯笼,把整个榆林城照耀得通明雪亮。激战中,枪炮声像新年放爆竹一样,乒乒乓乓响成一片。夜空中飞来飞去的枪弹炮弹,有如流星一样拖着亮闪闪的长尾巴,像突然喷出一股钢水的钢花一般,交错着一阵阵的红绿色信号弹,将漆黑的夜空点缀得五光十色,绚丽多彩,真是壮观。此情此景,对我这个初上战场的书生来说,对战争,只想到了悲枪壮烈、生死拼搏、惊心动魄的一面,却未想到也有如此赏心悦目、令人神往的一面。建国以后,每当我站在天安门广场欣赏节日焰火的时候,我就回想起1947年8月这场榆林攻城战的夜景,引起对人生的无限感慨。

得知我军主力围攻榆林,蒋介石、胡宗南又惊又喜。喜的是终

于确定我军主力部队在榆林,而且得知党中央留陕纵队也在附近的米脂一带。蒋介石如获至宝,马上亲自飞到延安,部署一举消灭“中共总部”的大战役。蒋介石调遣在陇东的胡宗南三十六师连夜赶到榆林救援,又命令胡宗南两个军九个半旅沿咸榆公路北上作战。

我军在围攻榆林时,本来布置好先歼灭来援的三十六师。那师长钟松老奸巨猾,他看穿了我军围城打援的战役布署,命令三十六师在距离榆林很远的地方就停止前进,一转身从横山北出长城,绕到我军背后,使我军这次围城打援战役没有打成。我军只好停止围城,把主力向南靠近中央纵队,以便寻找战机,打击北上的敌军。

这时,敌三十六师经过几天几夜的急行军,供给奇缺,逃兵很多,十分狼狈。知道我军主力南下,正想在榆林休整一下,谁知上级命令马上南下尾追我军。这支疲惫之师,只好马不停蹄地向南进发。

逃脱我军虎口的三十六师,现在又送上门来。彭总布置好,准备将其一口吞下。果然,当三十六师进入米脂和葭县之间的沙家店地区,被我军重重包围,经8月18日到20日的激烈战斗,胡宗南三大主力之一的三十六师全部被歼灭。

这时,北上的胡宗南两个军赶快掉头南窜。我军一面乘胜追击,一面挺进敌后方,引诱敌军加快向延安南撤。这样,尾追敌人的我军突然包围清涧的七十六师,在10月11日将这个师全部歼灭,活捉了师长。

这样,胡宗南号称20万大军进攻边区,仅仅半年时间,就被我军歼灭和拖垮了一半。西北人民解放军从此由战略防卫阶段转入战略进攻阶段。

十四、民主的军队，民主的统帅

在西北战场由防御转向进攻的大好形势下，西北人民解放军进行了一个月的整顿。彭总在军队内部推行了一场意义深远的新式整军运动。毛主席为党中央起草了一个内部指示，高度评价这一整军运动为我军的“军队内部的民主运动”。毛主席还为新华社写了一篇社论，提倡在全国各地解放军中普遍推行这一新式整军运动。这样，在我国解放战争转入全面反攻的前夕，整个解放军中都进行了一场提高军队内部民主的新式整军运动，提高了我军士兵的思想觉悟和战斗力。这是彭德怀大将军对解放军所作的一项重大贡献。

这场新式整军运动是怎样开展起来的呢？在西北人民解放军一纵队三五八旅中，有一个“解放”战士，是俘虏过来不久的四川兵。他在一天深夜，一个人在野地里祭灵。他跪在地上，面对着写着他母亲名字的灵牌，边哭边诉说他母亲如何惨死的经过，倾吐了对国民党官员和恶霸地主的满腔仇恨，发誓要在人民解放军中奋勇杀敌，为母亲报仇雪恨。这时，连指导员听到了这个战士的哭诉，想到自己也同这个战士一样，也有同样悲惨的遭遇。他上前紧

紧地抱住了这个战士，两人抱头痛哭，互表决心，不打倒国民党反动派绝不罢休。这个连队就用他们的事例，召开了诉苦会。大多数来自贫苦家庭的战士，几乎每人都有一段伤心的血泪史，诉苦会得到广大士兵的共鸣与热烈响应，促进了战士的觉悟，大大提高了官兵同仇敌忾的战斗情绪。彭总对连队中这一诉苦活动十分重视，加以总结，在西北解放军中普遍推广。彭总在给中央的报告中强调，“诉苦大会开展以后，大会小会结合起来，一个人的痛苦就变为大家的痛苦”，促使大家认识到，“只有打倒国民党政府，消灭国民党军队，建立人民政府，才能解放自己，解放全中国”。战士的觉悟提高了，奋勇杀敌的信念增强了，很快，在军队中形成了“官教兵、兵教官、兵教兵”的互教互学运动。在这次运动中，既启发了广大战士的政治觉悟，又提高了指战员带兵作战的思想方法，特别是在检查批评我军政治思想工作、爱兵练兵、爱民助民工作和管理军队给养伙食工作的基础上，普遍进行了评比和推选基层干部，大大增进了部队的战斗力。

毛泽东同志把它提高到军队内部民主运动的高度，肯定在我军中发扬政治、经济、军事三大民主，是人民军队的本质。当时，我从实践上和理论上开始认识到：我们解放军不仅是人民的军队，也是民主的军队，是同旧式军队完全不同的军队，而且相信依靠这样的军队建立起来的政权，一定是人民的政权、民主的政权。

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就是彭德怀大将军不是一个专制的统帅，而是一个民主的统帅。旧军队的高级将领给人的印象大都是官架子十足、独断专横、粗暴野蛮、动辄骂人的大人物。在彭总身上丝毫看不到这种影子。在一个大战役之前，他召集作战会议时，提出几种方案，说明每个方案的优缺点，征求大家的意见。他鼓励

大家畅所欲言,提倡大家推翻原有方案,提出反对意见和新的方案,鼓励提出一些大胆的设想。在大家发言的时候,他常常静静地坐在墙角里,专心致志地倾听每个人的发言,很少打断别人的讲话;他常常提出一些问题,启发别人进一步阐明自己的意见,从未见到他打断人家讲话,自己长篇大论,不让人家讲话的场面。他说话虽然义正词严,还不自觉地带有“骂娘”一类的口头语,却很少见他骂人训人和横蛮地对待下级。

在每次战役总结会议上,彭总总是先检讨自己的失误。第一次在榆林围城打援时,让三十六师突出长城绕出了我军的包围圈,打援未成,他承认是自己的指挥失误。在沙家店后第二次围攻榆林,又未攻下,他检讨说,当时,12月寒冬,本应争取休整,可是,他却急于再次攻下榆林,结果围攻半个月也未攻下,只好停下来。他谦虚地检讨说:“我这人不满足于已有的胜利,但求之过急,优点就变成了缺点。”他摇摇头说:“我这个毛病屡戒屡犯,很不容易纠正。”在讨论中,彭总向参加总结会的各级指挥员袒露自己的内心。他说,当时只有米脂以北、长城以南、无定河以东、黄河以西一小块地方,方圆只有一两百平方里的地盘,是解放军能够自由活动的地区,党中央、毛主席就在这里。如果将榆林打下来,中央的安全就更有保证了,免得总是让人提心吊胆,所以总是急于去把这个钉子拔掉。我听他讲这些的时候,深深地感受到彭总肩上的千斤重担和他对党中央、对毛主席的赤胆忠诚,心情激动得难以克制,眼泪都几乎要流下来了。

彭总的民主作风,对西北解放军的各级指挥员,产生了普遍影响。在每次战役之前,各连队指挥员发动大家开动脑筋,献计献策;在每次战役之后,又动员大家总结经验,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这种民主作

风在西北解放军中已经成为习惯,形成一种优良的民主制度。

彭总爱民如父母,处处为群众着想,他统帅的部队是名副其实的人民子弟兵。西北解放军在陕北战争期间的爱民故事实在太多了,《边区群众报》几乎期期都有报道。彭总本人就是一个优秀的爱民模范。当时在部队和群众中都流传着彭总关于“菩萨和扫帚”的谈话,杜鹏程同志在《保卫延安》中是这样记载的:“彭总说……我们要像扫帚一样供人民使用,而不要像泥菩萨一样让人民恭敬我们,称赞我们,抬高我们,害怕我们。泥菩萨看起来很威严吓人,可是他经不住一扫帚打。扫帚虽然是小物件,躺在房间里并不惹人注意,但是每一家都离不了它。”

经过这次新式整军运动以后,西北解放军主力在米脂以南的延川、清涧地区度过了1948年的新年,于2月底,由内线作战转入外线作战,越过边区,挺进到蒋管区,于3月1日包围宜川。这里是蒋军长期袭扰边区的重要军事据点。彭总这次又成功地施展了一次“围城打援”的战术,3月1日到3月3日先是在瓦子街地区消灭赶来增援的敌军四个旅,然后于3月3日攻占宜川城,再歼灭敌人一个旅。这就为西北解放军开创了一次战役歼灭敌军五个旅的新记录。

经过一年来的作战,西北野战军也由原来两个纵队、2.5万人,增加到5个纵队、4.5万人。

这一胜利,使胡宗南部队胆战心惊。本来我们可以乘胜收复延安,但为了消灭敌军有生力量,彭总又指挥我军突然向西挺进,横穿陕西,攻占了彬州,截断了西(安)兰(州)公路。胡宗南惶恐万分,赶快撤出延安的两个旅,又从河南调回四个旅为西安保驾。这样,我军于4月21日收复了延安。算起来,从主动撤退到收复延安仅仅一年一个月零三天。这时,配合全国解放军的强大攻势,西

北解放军从劣势变为优势,大规模地展开了进军敌占区的外线作战计划。从此,整个西北战场的形势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延安收复,粉碎了蒋介石一举消灭共产党、八路军总部的迷梦,西北解放军胜利完成了“保卫延安、保卫边区、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的光荣任务。这是西北解放军的胜利,也是边区150万人民的胜利。彭总向全体官兵说:“陕甘宁边区是个穷地方,但它是我们铁打的江山。这里的150万人民,就是150万战斗员,这个‘兵力优势’,敌人永远也赶不上。”

从保卫延安到解放新疆一共两年多的时间里,陕甘宁边区人民支持战争所动员的民工就是330万人次,动员运输弹药给养的牲畜240万头次,缝制军鞋50万双。在这期间,边区人民吃糠咽菜,倾其所有支援战争,单是支援前线的公粮就是660多万担和草料5540多万斤。这几个简单的数字包含着千万个可歌可泣的支前拥军故事,是150万人火热的心所谱写出来的壮烈的英雄史诗。在这一年多的时间里,我们前线分社的记者侧重报道解放军的战绩,我们群众报的记者侧重报道边区人民这些动人的事迹。在艰苦的环境下,边区群众报的同志们坚持出报,忠实地记录了边区人民和解放军并肩战斗的光荣历史。

在我军向西兰公路挺进时,我们就估计到敌人很快就会从延安败退。西北局决定我结束前线分社社长的职务,准备随同西北局一起返回延安继续主持边区群众报的工作。这样,在这年4月底,我在欢送大军西进以后,告别了我敬爱的彭大将军。

一年来,在我经常同彭德怀同志的接触中,他在我心中树立起伟大的形象。而毛泽东同志的形象,比彭总更为伟大。他坚持留在陕北指挥全国的解放战争,正如周恩来所说:“毛主席是在世界

上最小的司令部里,指挥了最大的人民解放战争。”在我的印象中,陕北战争是在毛主席亲自指挥下节节胜利的。彭总决无贪天之功的念头,他总是把战争的一切胜利都归功于毛主席和党中央。全国的解放战争由劣势转入优势,由防卫转入反攻,由十几个解放区发展到解放全中国,都充分体现了毛泽东战略思想的伟大,体现了他指挥战争的高超艺术。在陕北战争中,我虽然只是见过他两次,只说过几句客套话,但我却从彭总口里知道他很多具体的情况,我还读过他若干篇在陕北写的文章和发表的讲话,还有很多关于他的艰苦的、机智的、惊险的生动传说,都不断加深了我对他的崇拜。

我在前一篇回忆中曾经内疚过,在陕北战争中,我觉悟低,没有想到日后能专门为彭总写些什么的打算,连一篇对他的通讯报道也没有写。这是我一生中的一大失误,一大遗憾。令人难以解释的是,1959年庐山会议以后,我的这一失误,却成了我的“侥幸”,因为在庐山会议和十年浩劫的反彭运动中,我没有因此受到牵连;反对“彭高习反党集团”时,我也逃过了株连。而我们的前线分社记者杜鹏程同志,因为写了一本《保卫延安》的小说,为此被整了近二十年,被整得九死一生。

记得在1951年,杜鹏程的母亲去世,他从新疆赶回陕西奔丧。那时我是西北局群众日报的总编辑,他特地来看望我。他把自己的创作意图和写作计划告诉了我,使我大为惊讶和佩服,没有想到我们前线分社竟然有这样一位目光远大、辛勤耕耘的了不起的记者,我这个社长对他的想法、抱负竟然一无所知,实在是相当官僚的了。我十分称赞和鼓励他把这本小说写出来。

1954年,杜鹏程九易其稿,把一个长篇报告文学终于改写成了一本长篇小说。小说记述了这场震惊中外的延安保卫战,重点描绘

了彭德怀等老一辈革命领袖人物的形象,受到上下一致的欢迎,小说销售了一百多万册,这在建国初期小说发行史上也是很突出的。作家协会副主席、文艺评论家冯雪峰同志称赞这本书说,“它描写了一幅真正动人的人民革命战争的图画。成功地写出了人民如何战胜了敌人的生动的历史中的一页”,“是够得上称为它所描写的这一次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有名的英雄战争的一部史诗的”。

可是,到了1962年北戴河工作会议和党的八届十中全会期间,毛泽东批评小说《刘志丹》说,“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活动,是一大发明。”1963年反对所谓“彭高习反党集团”以后,对《保卫延安》的批判又升了级。1963年9月,文化部指示各地新华书店对此书“停止发售”,四天后又发文指示,“就地销毁……不必封存”。

在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杜鹏程更是受到各种非人的摧残。“文革”结束以后,他身心都受到严重伤害,不幸中年夭折。

当我今天回忆起杜鹏程同志的一生遭遇时,我的心情是十分沉重的。他在战争年代做记者时,就产生了写作《保卫延安》的宏图大志。他深入前线采访,写了近二百万字的日记,为自己的小说写作作了切实地充分地准备。仅就这一点,就比我这个分社社长高明得多。待到他写出《保卫延安》的不朽著作时,我更是望尘莫及了。可是他却因此而惨遭迫害,英年早逝。而我,由于觉悟不高和严重失误,却平安无恙地留存下来。1992年,我在写作《报人生涯五十年》中,对邓拓同志和我作过对比,我曾这样写道:“我的战友和师长邓拓,在这场风暴(文革)中首先倒下了,他像‘玉’一样地‘碎’了,而我却如‘瓦’一般地活着。”现在,当我将杜鹏程与自己对比时,我再一次感受到杜鹏程同志是出自深山的晶莹夺目的一块宝玉,而我仍然是一块由泥土烧制的砖瓦而已。

十五、啊！延安，我们回来了

党中央决定离开陕北的时刻，我又一次见到了毛泽东主席。

1948年3月23日，毛主席率领党中央和解放军总部的机关，在吴堡县的川口东渡黄河，进入了山西地区，从此结束了共产党中央机关在陕北指挥各解放区军民抗击日寇、打退蒋介石进攻的前后共12年的漫长历史。

就在这个可纪念日子的两天之前，毛主席在米脂县的杨家沟召集“亚洲部”（中央纵队的化名）全体会议，宣布了中央机关开赴华北的决定，并决定把一部分人员和物资留下来。西北局叫我赶到杨家沟参加了这次会议，听毛主席离开陕北前的讲话，并迎接新华社总社和《解放日报》留下来的同志以及一批印刷物资。

面临着人民解放战争胜利在望的大好形势，我的心情十分激动。当时，因为通知参加会议的人不准作记录，对毛主席的这一番讲话，我们几个在场的同志会后又聚在一起回忆一遍，把大家脑子里记下来的凑起来，由我回到报社作传达。

时间过去了50年，在写这篇回忆录之前，我特地回到西安，和当年的老战友团聚了几天，畅谈那一段难以忘怀的珍贵岁月。毛

主席这次讲话的意思,大体上是这样:

主席说,中央机关决定离开陕北,转移到华北去。陕北是个好地方,我刚到陕北时,中央红军只剩下两万多人,现在人民解放军已经发展到300万。中央在陕北12年,我对陕北是有感情的,当然舍不得离开陕北。

主席说,延安保卫战刚满一年。仅仅经过一年的战争,西北人民解放军就由劣势变为优势,由内线防御转为外线进攻。眼看延安很快就会光复,整个陕甘宁边区就会光复,我们还会发展很多解放区。在这一年当中,全国各路解放战争的形势将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完全消灭蒋介石的反动军队,解放全中国的新时期很快就会到来。

主席说,随着全国形势的迅猛发展,党中央必须从陕北转移到华北,以便于领导这场最后解放全中国的伟大战争。

主席说,在中央离开陕北时,需要留下一批同志,一来是陕甘宁边区需要人;二来是中央在转移中也需要队伍精干,轻装前进。决定留下来的同志中,有人写信给中央,要求同中央一起转移,这种心情是可以理解的,我也舍不得同志们啊!

这时,主席幽默地说,我毛泽东离开陕北时,把所有干部都通通带走,将来到了华北,走时又把全部人员都带走,如果这样毛泽东越带人越多,走到哪里都带到哪里,这像话吗?(说到这里,把大家都说笑了!)

毛主席还说,陕北是个好地方,这里还是模范解放区,中央走后,还要把这里建设得更好。西北局和边区政府的林老(伯渠)、彭老总、贺老总、仲勋同志都欢迎留下来的同志,共同解放大西北,建设大西北。

这时,林老带头鼓掌,热烈欢迎“亚洲部”的一部分同志留在陕北。

我回到群众报社后,马上召开了一个欢迎大会,传达了毛主席的讲话,欢迎“亚洲部”留下来的同志们。留下来的几十位同志中,记得有林朗、丁济沧、张潮、普金、莫艾、李蕴辉、田方、马沛文、刘漠冰等人。群众报社一下增加了这样一大批富有新闻工作经验的同志,这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大事。这不仅为以后办好《延安群众报》和《西安群众日报》增加了主力军,而且对以后增强西北五省的新闻队伍也发挥了巨大作用。

这时,西北人民解放军已经挺进到大关中,截断了西兰公路,蒋介石、胡宗南十分恐慌,赶快把驻守延安的军队调来解救西安之危。眼看延安就要回到人民手中了。

1948年3月,我由新华社西北前线分社回到绥德霍家坪时,《边区群众报》早在三个月前,也就是1948年的1月时已经改为《群众日报》。西北局决定我不再去前线分社,留在后方,主持《群众日报》的业务工作,准备回延安办报。

这一年来,我虽然从前线回报社看过几次,却都是像回娘家一样,时间很短。这次回来,才比较具体地了解报社同志在这一年来的战斗历程。报社同志们的工作和生活十分艰苦,也十分英勇。

从撤出延安到回到延安这一年,报社的同志们承担了三项任务,这三项工作各自独立又紧密相联。边区群众报社坚持出报,由杜桴生、金照、林朗负责;随同我到新华社西北前线分社的记者跟随西北人民解放军总部采访写作,出版《新闻简报》,在全边区组织通讯网,对新华总社发稿,也对报社发稿;边区新华书店为报纸的出版和发行服务,同时印刷发行一些宣传品和书籍,由陶信镛同志

负责。在战争中,书店的同志们走到哪里,只要有一点停留时间,就把书籍从马背上卸下来,摆开地摊,向群众售书,作宣传。同志们的革命热情,像一团火一样,照亮了群众的心。

在这一年当中,报社同志在十分困难的环境中,紧紧跟随西北局在陕北打游击,不管条件多么艰苦,无论是油印、石印或者脚踏式的铅印;无论用的是马兰纸、麻纸或者晋恒纸;无论是出八开两小版、四开两版或者对开四版,始终保持这支新闻队伍在保卫延安战中所表现出来的顽强的战斗意志。

看一看下面这些文字短小的简单记载,就更具体地了解到群众报社这一年的战斗历程,是令人为之惊叹的。

1947年3月18日晚10点,报社五六十人,带着一台油印机离开延安。19日中午到达安塞县的真武洞,20日进驻附近的朱寨河村。我们是西北局机关的一部分,代号是五大队十二中队。

4月11日到19日,出版了六期试刊的油印报。4月21日正式出版了油印的《边区群众报》,四开两张,单面印刷。当时的印刷厂是四人的油印组,在半个破窑内,用玉米秆挡挡风雨。油印组的同志手冻麻木了,仍然坚持工作;油墨冻了不能印,只好烤一烤。刻写一张蜡纸只能印几百份,以后发报的份数不断增加,只好再刻写一张蜡纸。出一期报纸,弄得大家精疲力尽。同志们一面出油印报,一面派人去搞机器。

5月,从敌我争夺的地区,从我们原来的“备战点”,经过百般辛苦,秘密运回一部石印机和一些纸张油墨。5月12日,油印报改为石印报。

报社人员在朱寨河住了72天。5月31日,敌情紧张,大家经过两天两夜的急行军,于6月2日到达安塞县东北的子洲县,在皇

崾镇安营扎寨。先出版了三期油印报。6月6日石印机也从朱寨河运到,报纸又恢复为石印版。

经过八天的艰苦努力,同志们又从延安的山沟里,运回一部八开的脚踏圆盘机。从6月13日起,《边区群众报》正式改为八开四版的铅印报。这时,报社又有了自己的印刷厂和石印机,又有铅印的六副排字架。当时印刷厂铅字不全,临时手刻也赶不上用,只好用其他字号的字或者同音字来代替。这样印出来的报大小字都有,还有一些“黑屁股”(即缺字的黑空)。可是这毕竟是我们战争中建立起来的印刷厂,是战火中编印出来的报纸呀!看起来模样不大好看,可是读者得到这张报,仍然如获至宝,争相传阅。

在皇崾镇住了60天。8月2日,又转移到绥德县义和镇的豆子沟。在这里只出版了两期油印报。由于敌军接近绥德城,敌情紧急,报社人员只好东渡黄河,在山西陵县的碛口镇侯家台村住下来。这里是晋绥解放区比较稳定的后方,我们在这里不仅继续出版《边区群众报》,还由柯蓝、李季、闻捷、石鲁等同志组成了副刊组,编辑出版了一份专门刊登通俗化文艺作品的32开小册子《群众周报》。这四位同志在全国解放以后,都成为全国闻名的大作家、大画家、大诗人。

1947年11月1日,报社编辑部又西渡黄河,回到绥德义合镇的霍家坪村,直到1948年5月15日,才全部返回延安。沙家店大捷以后,我军节节胜利,敌军节节败退,霍家坪成了最稳固的后方,报社编辑出版人员在这里住了半年。工作和生活条件还是很艰苦的。印刷厂设在没有门窗的羊圈里,印刷机没有动力,靠几个年青人手摇。排字房常常冷得像冰窖一样,排字工人还是坚持把一个一个冰凉的铅字钉拣出来排成文章,排成报版,每天出四版报纸非

常辛苦。解放军打了大胜仗,还要赶着出号外,真是整天整夜加班工作。

就在这样紧张艰苦的工作条件下,报社同志仍然努力作好各项联系群众的工作。大家热情地帮助群众除草收割,拉碾推磨,担水铡草,扫街扫院,教群众读报认字,在墙上写标语、画宣传画。这年(1948年)春节时,报社还组织了宣传队,跳秧歌,演小戏,给烈军属拜年,走村串户,把周围几十里的村庄都带动起来,十分红火热闹。三四十年后,霍家坪的老年人还说,咱这山沟沟里,从古到今,再没有像群众报在时那样热火朝天。

1948年1月10日,《边区群众报》改为《群众日报》,就是在霍家坪的时候。沙家店大捷以后,边区的敌我形势开始发生质的变化,我们由劣势转为优势。一方面是后方比较稳固了,印刷条件好多了,可以放开胆子出报了;另一方面,眼看延安就要收复了,为正式出日报,早作具体准备,早日进行实际练兵。

在改为日报之前,我们请毛主席为日报写一个新报头。毛主席很高兴,马上拿起笔写了四幅“群众日报”,他看了看,自己圈了一个,说这个好。我们就是用这幅字,请印刷厂长曹国兴(边区特等劳动模范)在一块铅版上刻成新的报头。

在我回到霍家坪仅仅一个月,4月21日,延安就光复了。从我们在1947年3月18日撤出延安算起,仅仅一年一个月零三天,胡宗南和他的残兵败将就滚出了延安。

收复延安以后,先由副社长杜桴生带领一支先遣队回延安筹备出报,我留在霍家坪继续天天出报。等到延安已经出版了15天的试刊,工作正常以后,霍家坪才停止出报。编辑部在霍家坪住了七个多月,大家依依不舍地告别了霍家坪父老乡亲,全班人马回到

清凉山,结束了一年多在战争中坚持出报的游击生涯。

回到延安一看,她已被敌人破坏得体无完肤。解放日报和群众报在清凉山工作的地方,几乎成了一片废墟。社长博古和总编辑陆定一同志住的几孔窑洞全部被捣烂了。编辑部的两排石窑洞门窗全砸破了,好在拱门和拱墙还没有完全倒塌。我们先把这些修补好。可是一张桌子、一个凳子也没有。驻延安地区的记者从延安专署办公室要来几张桌子和几把木椅,编辑部工作又运转起来了。原来的印刷厂设在千佛崖的石洞里,敌人难于破坏,我们把机器搬来,就马上开动机器印报了。

最令人痛心的,是我们走时掩埋起来的报纸合订本、图书资料和印刷器材,完全被敌人挖走了。从报纸创刊到撤出延安的7年零22天中,《边区群众报》共出版了363期,全部不见了。(平均每期发行8000份)80年代,我同《陕西日报》的同志共同设法在全国各地图书馆寻找这363期报纸,结果只找到零零散散的一小部分,希望将来能够一张不少地搜集到整套报纸。

5月15日,我们全部人马离开霍家坪,经过3天的行军,18日晚上回到延安。在离开延安的一年多时间里,除了尽可能地每天出版《新闻简报》以外,《边区群众报》不定期地共出版了192期,1948年1月改为《群众日报》后,在霍家坪还出版了4个月的日报。这中间还出版了5期32开本的大众化的《群众周刊》。

离开延安时,报社只有五六十人,回到延安时,已发展成近二百人的队伍,主要是解放日报社和新华总社留下了一部分同志,从边区各地又陆续调来了一些人,我们的队伍在数量上和质量上都大大增强了。

回到延安以后,大家仍然像行军时一样,把破坏了的土窑洞打

扫一下,地上铺一点草,就是安身之地,大家一心一意地投入了出版报纸的工作。正如毛主席说的,人是世间最宝贵的,有了人就有了一切。我们继续发扬自己动手克服困难的精神,把机器修复安装起来,又千辛万苦地到新解放区去采办纸张油墨等印刷物资。至于办公用具和门窗、床板、桌凳,都是因陋就简,自己制作。当时既不可能从市场买到,也不可能从什么地方去调拨,只能就地取材,自己动手。大家既是木匠,也是泥水匠,人人变成了能工巧匠。真是神了,好像要什么有什么,但这不是念念有词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绞脑汁、沥心血、出大力制造出来的。我们还自己动手种菜、养猪、做豆腐……生活在改善,工作也日趋正常了。

一年当中,我虽然始终在前线,却没有拿过枪去冲锋陷阵,但我仍然受到战火的洗礼。火与血锻炼了我,仇和爱磨炼了我。正义终于摧毁了践踏正义者,人民终于战胜了人民的叛逆者。我这个文弱书生,身体锻炼得更能吃苦耐劳,头脑锻炼得更加能够明辨是非。

老实说,在这场战争的初期,我的必胜信心并不那么十分坚强。在我军主动撤离延安时,虽然肯定相信一定会回来,但没有想到会这样快!对于解放全中国,原来以为会是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根本没有想到在八年抗战以后,仅仅用三四年的时间就全面胜利了。重新回到清凉山以后,我心里所琢磨的和同志们所探讨的一个主要的问题,就是我们为什么能这样快得到这样伟大的胜利。

一年来延安保卫战的节节胜利,给我最大的教益,就是使我从理论和实践的密切结合上,更深切地认识到我们党的新民主主义政治纲领的英明正确,也更深切地体会到这一纲领确实是日益深入人心的。一场战争和一个党的胜败,决定于人心的向背,这是颠

扑不破的真理。

1947年秋,解放军发起全面大反攻时,党中央发表了一个“双十宣言”,对我们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政治纲领又作了一次阐明:“联合工农兵学商各被压迫阶级、各人民团体、各民主党派、各少数民族、各地区、海外华侨和其他爱国分子,组成民族统一战线,打倒蒋介石独裁政府,成立民主联合政府。”这就是我们人民解放军的、也是中国共产党的最基本的政治纲领,就是我们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政治纲领。

我们把国民党反动派政府的政治纲领概括为“一个主义、一个党、一个领袖”的独裁专制,因为蒋介石效法的是希特勒那一套,人们都称为法西斯主义的政治纲领。所以,人心的向背,就是共产党的新民主主义深入人心,国民党的法西斯主义丧失人心。

面对国民党先安内后攘外方针的失败以后,又积极推行反共内战和独裁专制的反动方针,我们这些革命知识青年,当然更热烈地拥护共产党的新民主主义。对广大的人民群众来说,他们更需要从切身的体验中来加深认识。在这次反共内战中,人民群众面对着国民党军队的烧杀抢掠,地方官员的敲诈勒索,高官要员的贪赃枉法,腐化堕落,无数血泪斑斑的惨痛事件大大增加了国民党、中央军的仇恨,也大大增加了对共产党、解放军的热爱。这也是我一年来耳闻目睹、亲身体会到的。人民的爱憎感染了我,教育了我,坚定了我的信念。

老实说,回到清凉山时,我已经是有10年党龄的共产党员,但我对马克思主义、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还是了解得很肤浅,我心目中的社会主义,实际上就是当时毛主席一再阐明的新民主主义。

面对清凉山的一片废墟,我们没有气馁,没有畏难,仍然意气

风发地开始了新的战斗。我们党的新民主主义的理论和实践坚定了我的信心：中国人民很快就会打败蒋介石，解放全中国！正如毛主席在《新民主主义论》的最后说：“新中国航船的桅顶已经冒出地平线了，我们应该拍手欢迎它！”站在清凉山上，我似乎已经很清晰地看见新中国航船的桅顶了！我不仅拍手欢迎它，而且更要加紧努力，促使它早日完全升出地平线！

十六、从编小报到编大报的转变

《边区群众报》改为《群众日报》，在我五十多年的编报生涯中，是一个阶段性的变化。

1947年从延安撤退以前七年所办的《边区群众报》，连同我在成都三年所主办的《星芒报》等，这十年所办的报纸，都是八开或四开的三日刊或周刊的小报。从1948年我回到延安主编《群众日报》起，开始了办大型日报的阶段，可以说是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从延安到西安，主编《群众日报》三年半，进而调到北京人民日报当副总编辑和总编辑，前后共达三十六年。在我从二十岁到近七十岁的五十年中，前十年可以说是办通俗小报的阶段，后三四十年是办大报、办日报的阶段。我的办报生涯就是这样一贯，这样单一，从未改过行，也从未离开过新闻岗位。

在回到延安之前，报社社长李卓然（兼西北局宣传部长）曾经对报社同志讲过，《群众日报》的主要任务，是帮助广大干部进行时事政策学习和实际工作经验的学习。他说，报纸的读者对象发生了变化，原来的《边区群众报》是办给识字少的基层干部和广大农民群众阅读的；改为《群众日报》以后，主要是办给中上层干部阅读

的。他说,中上层干部们担负着很实际的领导责任,需要各方面的帮助。许多读者都感到目前国内和国际的情况都很复杂,难以捉摸,希望在党报上能得到及时的指导,至于解放军在前线的胜利和胜利后的新变化,各解放区和全国形势的发展情况,自然也是他们感兴趣的,由此而产生的各种新问题,他们也希望能够从报上得到解答。他还说,在政策方面,读者不仅要求我们及时发表党和政府的各项指示、法令,而且希望在报上看到各地执行政策的情况、发生的问题和偏向以及如何解决和纠正的经验。

在延安办《群众日报》的一年(1948年5月到1949年5月)中,在政策宣传方面做得不理想,在时事宣传方面,却得到各方面的好评。

群众报改为日报后,最突出的变化就是对时事新闻的处理。过去是周刊或三日刊,对时事新闻是几天一报,现在是日报,必须天天报。过去在通俗小报上虽然也把时事宣传放在首位,但在整个报纸所占的篇幅比重不大,约占1/4左右。改为日报以后,时事宣传占一半以上,报社的主要领导力量和编辑力量,都必须放在编辑新华社电讯稿和研究国内外大事上,这就有个转变思想、安排干部和熟悉业务的问题。好在我们在思想认识上转变得很顺利,大家很容易认识到,国内战争形势和围绕战争的政治经济形势,是广大读者所关心的头等大事。八年抗日战争刚刚结束,一场全面的反共内战接踵而来。战争摧残了人民,也教育了人民,磨炼了人民,最终人民赢得了战争的胜利。特别是这一年来保卫延安的战争,提高了陕甘宁边区人民的作战能力,也增强了广大人民群众对战争形势和围绕战争的国内外形势的关注和分析能力。

时事宣传的第一位是战局宣传。在《解放日报》负责编辑时事

的几位同志留在了《群众日报》，这对于我们搞好时事宣传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我们是一边工作一边学习。编辑时事的同志努力学习《解放日报》的经验，不仅把敌我双方的战略布置、兵力配备，包括各路战场上军队的具体番号、兵员和装备、指挥员的名字等记得很熟，而且对各部队和指挥员的特点，以及作战态势和发展趋势等等，都尽可能地作详细的了解。看看编辑室墙上的战争态势图，对全国解放战争的情况一目了然。看着代表我军的小红旗在军事地图上日渐扩展，对编辑人员是很大的鼓舞。

在回到延安的一年里，党中央仍然处在战争环境当中，还没有一个安定的条件来出版党中央的报纸。我们是西北中央局的报纸，尽量刊登新华社发布的国内外新闻，党中央的指示决定，代表中央的社论和言论，体现中央精神的各种稿件，尽量满足广大读者及时了解全国战局和时局的要求。在《解放日报》停刊的日子里，《群众日报》努力继承和发扬《解放日报》的优点，使读者感到解放日报社好像还在延安。

当然，我们在好些地方不如《解放日报》。我们只是一个地方性的党报，我们必须把西北局领导的地区（当时主要是陕甘宁边区）的战局和时局，特别是这些新老解放区的医治战争创伤和各项建设情况的宣传，放在十分重要的地位。其中主要是宣传西北局党委的政策和这些政策的执行情况。

为了作好政策宣传，新华社西北总分社在陕甘宁边区的几个专区（关中、三边、陇东、绥德、黄龙专区）建立或加强了记者组，在离延安较远的地区增设了电台联络，在延安直属地区加强了采访组，还派出了十个记者参加土改工作团的采访。各地稿件很快由每月二百多件增加到一千多件。这样，我们不仅能从西北野战军

前线分社迅速地掌握西北各战场和新解放区的情况,而且对老解放区的恢复和土改、救灾、生产、工作等,也能作一些比较具体的反映。

这年的9月1日记者节时,报社邀集了延安机关的通讯员和本社全体工作人员,在边区参议会大礼堂举行了纪念会。边区政府林伯渠主席和西北局习仲勋书记都在会上作了很重要的讲话。

仲勋同志指出,改为日报以后,报社工作“在和党的当前任务结合,及时宣传党的政策这一点上,有很大进步。但今天检讨起来还作得不够”。他提出“报社必须使编辑工作和边区党政军各领导机关的研究工作结合起来”,才能在宣传报道上“克服没有中心、无系统和零散的现象”。他还提出:“应该加强对记者编辑和通讯员的政策教育,努力作到我们每一篇通讯、消息对于工作都应该是具有启发和指导作用的,就是以这个地区的工作启发那个地区的工作,从而达到交流经验、积极改进和提高工作的作用,不是为写稿而写稿。”

林老指出报纸在当前的作用,要求跟上迅速发展的新形势,他说:“我们党现在当政的地区,已经或者正在从农村进入城市。在这个时期,西北解放区必然由现在广大农村和部分城市,进入更大的城市。今后报纸应有意识有系统地介绍城市情况和报道城市工作经验,帮助我们干部由于长期处在分散的农村,缺乏城市工作经验,如何去开展新民主主义时期的建设工作。”

西北局领导的这些指示,不仅是当前办好《群众日报》的重要方针,也是地方党报如何正确处理全国性和地方性关系的一个原则问题。这是多年来地方党报很不容易解决的难题。关键在于全国性的稿件要真正符合全国广大群众的需要和爱好,不是把任何

中央的活动和全国性活动都照登不误,而且非放在首要地位不可;在地方性的稿件中,又要善于采写一些富有全国典型意义的稿件,又不是把凡是地方稿件,即使是零零碎碎、无关紧要的稿件,也凑满地方版,或者都放在重要的地位。

那时,还没有出现“为新华社办报”的“懒病”,就是每天只要把新华社播发的全国性稿件照搬上1版2版,甚至3版4版,用这种懒办法编报。那时的中央只管大政方针,不是统管一切,指挥一切,连地方大报的版面也要同中央“保持一致”,常常成为中央报纸的“翻版”,就平安无事了。那时中央的领导人都分到各主要战场,废寝忘食地忙于指挥解放全中国的战争,没有可能和必要泡在“文山会海”里,争着上报纸的头版。几十年后的今天,编地方大报第1版,越是重要稿件越不用细看,只要“对对版面和标题,就可万事大吉”。所以那时编报、特别是编第1版,不像现在这样省事。对每天发来的新华社电讯稿,国内版的编辑、主编和总编辑都要认真地一一看过,很多新事物和历史看不懂,一定要边看边翻参考书,大体弄懂了,然后根据读者需要,精选精编,独立制作标题,独立安排版面。如果地方稿件安排在第1版,更要发挥独立自主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既不能犯地方主义,盲目向前挤;也不能事事“中央至上”,把地方稿件都压在后面。落实到每天的版面,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几乎每天都在“上考场”。这一段的编报生活,为我以后三四十年的报人生涯,打下了科班训练的基础。

当时,我们在指导思想虽然比较清楚,但在实际工作中,做起来却比较难。老实说,在那种复杂多变的情况下,要作到“不犯重大政策性错误”并不是很容易的。这主要在于西北局的领导思想和群众观点相当强,对政策的掌握相当谨慎、稳重。要知道,当

时在全国范围内,在执行政策方面都出现了“左”的倾向,但西北局领导的头脑比较清醒,比较注意防止和及时纠正“左”的偏向。因而在《群众日报》的宣传中也比较认真贯彻西北局这种慎重的精神。记得毛主席当时曾经同意和推广过习仲勋同志关于新老区土改政策的意见和彭德怀关于新区工商业政策的意见。可见,当时西北局的作法是得到中央表扬的。”

改为日报以后,我们还是尽可能的坚持大众化的办报方针。在内容上虽然侧重中上层干部的要求,在文字写作上,我们仍然重视基层干部和广大群众的口味。除了在采用新华社电讯稿中,不能不沿用那一套不文不白的新闻腔调以外,报社编辑记者写的稿件还是强调要尽量写得通俗易懂。特别是在采访写作通讯上,办《边区群众报》时那种同广大群众密切联系的老传统,仍然始终如一的保持着。周文同志创建的“大众化新体系”继续健全和发展,起着十分可贵的作用。

在保卫延安的战争中,我们坚持出版通俗化的《群众报副刊》(32开本的杂志型)。收复延安以后,我们一面坚持出日报,一面又在7月开始出版《群众周报》,继承和发扬《边区群众报》的优良传统。这个“大众化新体系”的龙头仍然十分活跃。

当然,起决定作用的是报社的记者。他们不只是一个采访新闻的记者,还是大众通讯网的一个组织者。每一个通讯员不仅为报纸写稿,而且又是读报网的组织者。我们的记者队伍和通讯员队伍,真正深入基层,深入群众,同群众交朋友,听取群众的意见,他们把基层的真实情况和群众的知心话写成稿子送给报社。

记得当时,群众日报社曾经在报上用很大篇幅来介绍记者乔迁(以后是青海日报的总编辑)和汤洛(以后是延河杂志的主编)的

采访方法和采访作风。他们十分注意建立通讯网和读报网,热情地帮助通讯员写稿,带领他们进行采访,为他们修改稿子,帮他们进行读报活动。这样,他们不仅写出了质量优异的稿件,在当地群众中也受到欢迎和尊敬。

应当看到,这种“大众化新体系”,在文化落后的陕甘宁边区,对于提高干部和群众的文化科学知识和写作能力,都起过无法估量的作用。在全国解放以后,边区大批地方干部成为大西北地区和全国各地的骨干力量,他们的文化素养的提高,有好多人是得益于他们曾经是《边区群众报》的读者和通讯员。

50年后,也就是1997年4月,我回到西安,见到陕西省文联主席李若冰同志。他深情地对我说,他在十二三岁时参加了延安抗战剧团,从那时起,他学习文化主要靠读群众报和大众文库的小册子。他看了大众读物社编辑的《大众习作》,才开始练习写作,当报社的通讯员,给报纸投稿。他就是这样,经过几十年的努力,终于成为有成就的专业作家。

这是多么可贵的历史记载啊!

十七、延安九年半 报纸一千期

收复延安以后,西北人民解放军乘胜前进,浩浩荡荡,势如破竹,席卷国民党统治的西北地区,展开了解放大西北的强大攻势。这个攻势的第一个战略目标就是解放大西北的政治中心——古都西安。

群众日报编辑部回到延安以后,不是简单地恢复原来的工作,而是与此同时开始了为解放西安和解放大西北后,建立和出版报纸的各项准备工作。这是西北中央局的战略任务,也是我们群众日报社的战略任务。因为它是西北局的机关报,是西北地区新闻工作的核心力量。当时,群众日报社同时也是新华社西北总分社,也是西北新华广播电台,是三位一体的西北新闻工作中心。

当然,为迎接解放大西北的办报准备工作,首先是报纸内容的准备。随着全中国的逐步解放,党的工作重点将由农村转向城市,由城市领导农村,报纸的内容要作这样大幅度的转变,必须学会在城市办报。前面所说的如何正确处理新华社的全国性稿件和西北地方性稿件的关系,就是一项带根本性的办报原则。

在报纸的形式上,由于全国性稿件和西北地区稿件都不断增加,更为了适合更众多更复杂的广大读者的需要,每天四开四版的

小报,显然无法满足形势发展的需求。因而,从1949年3月1日起报纸改为对开四版。当时广播电台叫“西北新华广播电台”,也在1949年元旦开始向西北地区和全国播音。新华社西北总分社的分支机构,随着西北解放战争的进展,在各地逐步建立。

1949年4月,解放军已经逼近西安,守敌早已惊慌失措,解放西安指日可待。这时,群众日报社抽出一百二十多人组成西安报业接管组,进行具体的准备工作,特别是注意进行关于新区的城市情况和政策的学习。5月15日,接管组离开延安向西安进发。

西安在5月20日解放,我们的接管组也跟着进城,一方面开始对国民党统治的新闻单位进行接管;一方面出版《新闻简报》,及时报道最新消息。5月27日出版了对开两版的西安《群众日报》;6月1日正式出版了对开四版的大报。这时,留在延安的报社同志,决定留下一部分人在延安,于5月30日出版四开四版的陕北《群众日报》。延安《群众日报》于6月1日正式终止,大部人员分两批先后到达西安会合。

这样,我在延安从事群众报的工作一共九年半,至此结束。从1940年3月创刊起,一共出版了《边区群众报》363期;在保卫延安的战争时期,出版不定期的《边区群众报》192期。从1948年元旦改为《群众日报》,到1949年6月10日离开延安,又出版日报486期。概括地说:九年半1000期报纸,这就是我在延安地区从事新闻工作的总结。

在这三千四百多个日日夜夜里,群众报社的全体同志日以继夜地在这张报纸上灌注了自己的心血。报社最初不到十人,到群众日报社时增加到三百多人。我只是编辑工作中的一个主角。长期做副主编(或副总编辑)的是金照和谭吐。延安保卫战以前,景

昌之同志作过一个短时期的副主编。延安保卫战开始,我到前线分社,金照同志就担当起我的全部任务,将近收复延安时,增加了林朗做副主编。他们都是勤勤恳恳、埋头苦干、默默无闻的实干家。金照同志表现的特别突出。在抢救运动中,他被批斗得很厉害,但他没有一天停止过工作。有一次人们把他吊起来,逼他“坦白交代”,他还是轻言细语地解释几句。他重复的最多的一句话是:“我不是特务。”就在当天晚上,他还是咬着牙忍着痛工作到深夜。当时我想:“天下会有这样好的特务吗?”

群众报社是边区的特等文教模范单位,金照、柯蓝和我都受过奖励。1000期群众报是报社几百人共同奋斗的结晶。应该特别强调的是,报纸的编辑工作是整个报社工作的一部分。尽管是主要部分,但毕竟还只是一部分。整个报社还有另外一个主要部分,就是十分繁重的行政工作。它担负着报社几百人的组织、印刷出版、生活供应等一切后勤工作,保证编辑部顺利从事编辑工作。没有他们的千辛万苦,甚至是千难万险的工作,我们怎么可能一心一意地编辑出这1000期报纸和其他出版物呢?

在大众读物社时期,负责行政领导工作的是社长周文、副社长杜桴生、报纸科科长赵守一,还有历届担任秘书长职务的白彦博、余铮和陶信镛同志。

在延安保卫战以前,边区长期处在国民党反动派的经济封锁和军事摩擦的层层包围之中,物资供应十分困难,特别是印刷器材和纸张、油墨等更为缺乏。

撤出延安以后,边区群众报社由边区文协的直属单位变为西北局直属的一个独立单位。行政工作的任务繁重,责任重大。这时的报社社长由西北局宣传部长李卓然同志兼任。他不可能具体地主

管报社的行政工作,一切任务都压在副社长杜桴生同志身上。在战时,边区新华书店因为负责发行报刊工作,在行政上同群众报社合在一起。值得庆幸的是书店经理陶信镛同志调来任报社秘书长,成为杜桴生的得力助手。在他们的领导下,报社的行政部门保证行军,保证生活,保证出报,条件极为艰苦,常常冒着出生入死的危险在抢购抢运物资。收复延安以后,在一片废墟上重建《群众报社》,真是说不尽的艰难。在行政部门全体同志努力奋斗下,不仅保证了《群众日报》正常出版,扩大了版面,还大大扩大了发行,每期发行五六千份,这是多么不容易啊! 1949年5月,到西安去接管国民党新闻单位,筹备出版大型的《群众日报》,任务也极为艰巨。当时,我们接收的是国民党的《西京日报》、《建国日报》、《西北文化日报》、《正报》、《自由晚报》、《时代新闻报》等,这些都是出版几百份、千把份的穷报,连比较好的办公房舍和比较完整的印刷设备都没有。我们接管组东拼西凑,终于在一周之内保证了《群众日报》的正常出版。到今年年底,报纸每天发行一万多份,这也是难得的奇迹。

我这个副社长兼总编辑(1949年11月中旬,杜桴生调走后,我又兼任副社长),官僚主义严重,一头扎在稿子里,不仅行政部门的事务不管,连编辑内部的组织行政工作也很少过问。全靠杜桴生和陶信镛这样精明能干的杰出人物,把报社的行政工作全部承担下来,他俩是我一生中没齿难忘的老战友。

我和杜桴生是老相识,最早认识是1938年在成都。他是1925年入党的老地下党员。抗战前夕四川党组织恢复活动以后,他曾任成都市委书记、省委文化党团书记,是当时成都救亡运动的领导者之一。1938年我任星芒社支部书记,就在他直接领导下工作。抗战爆发后,他公开的职业是《四川日报》的总编辑。经他介

绍,我还到《四川日报》去作过两三个月的新闻版的夜班编辑。在成都,我们之间的交往是比较密切的。他不仅善于在很紧急仓促的时间内写作时事性评论,而且善于作上层社会的团结工作,在推动成都新闻界、文化界、文艺界的抗日救亡运动方面,起过很好的组织领导作用。1940年初,杜桴生一到延安,周文就请求中央把他调来大众读物社做副社长。这年年底,他又被调回四川作地下党的工作,延安保卫战前杜回到延安,西北局任命他为西北新闻社的副社长(社长是宣传部部长李卓然,一切具体领导工作都由杜负责),统管边区群众报社、新华社总分社,边区文化协会和边区新华书店。延安保卫战开始后,这几个单位的一切行军生活和业务领导,都由杜桴生同志负责。

1949年秋天,经过四个多月的努力,群众日报社在西安的工作逐渐走上正常。这时,西北野战军决定分出一部分人马从陕西秦岭沿着天险蜀道,进入四川北部,配合西南解放大军解放四川省城成都。杜桴生同志被派去随贺龙率领的大军挺进成都,先任成都军管会的秘书长,以后任川西行署秘书长和法院院长等重要职务。

可惜,“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在解放初期,我们党发动所谓“反地方主义”,实际上是排斥、打击地下党的革命势力。杜桴生是四川地下党的优秀领导者,说他主张“川人治川”,被打成“地方主义”、“反党分子”。从此,历次政治运动都要牵连到他。在十年浩劫中,他被列为所谓“三老会(老党员、老红军、老干部)反动组织”的成员,被整得死去活来,终于折磨致死。一个才华横溢、无私无畏的优秀共产党员,成为遍野冤魂中的一员,呜呼,哀哉!

杜桴生同志调走以后,我这个总编辑虽然在名义上接替他的副社长职务,但是我这个副社长名不符实,我还是埋头于编辑业

务,把一切行政工作都压在秘书长陶信镛同志头上。他从不推辞,任劳任怨,艰苦奋斗,实干苦干,领导行政部门为《群众日报》的顺利出版提供了良好的条件。他作风深入,同群众打成一片,真正作到吃苦在前,勇于站在战斗的最前线;他从未“享受在前”,也未“享受在后”,对一切享受他都再三推让;他公而忘私,舍己济人,始终保持节俭、朴素的生活作风。

1954年10月西北局撤消,《群众日报》从10月16日起改为《陕西日报》,成为陕西省委的机关报。信镛同志调到陕西省委工业部工作。“文化大革命”以前,曾任省委办公厅主任、基建部和工业部副部长、经委秘书长等职。“文革”以后,曾任省政府地震局局长、轻工局局长和一轻局局长、省科协党组书记、副主席等职。由于他为人正派,不搞邪门歪道,加上他心直口快,对同级对上级都敢于提出批评,因而得罪人较多,也很难得到上级的赏识,但他对个人提级升官这些事毫不在意,坚持党性原则,决不同流合污。

80年代前期,我到过西安两三次,他这个正局级的“首长”,仍然经常住在办公室,很少回家。在办公室里摆一张小床,硬板床上的被褥仍然像延安时期那样简陋。他多年积劳成疾,犯过几次心脏病。他住在医院,是有名的“模范病人”,经常帮助其他病号。据说,在他去世时,正好是农历春节期间,医生护士都放假,两层楼的病房只留一个医生一个护士值班。他楼上楼下帮助病友,已经很劳累了,他又打了几个电话,向老朋友们祝贺春节。这一天,他又辛苦又激动,心肌梗死发作了。他忍着忍着,不愿意麻烦医生。以后被护士发现,要叫医生,他又劝阻说,不要妨害医生在家过团圆年。结果延误了时间,以至不治。他去世后,据说全院医护人员和很多病人都伤心落泪。我得到他西去的噩耗时,十分悲痛。

十八、为大西北新闻事业奠基

杜桴生、陶信镛同志建立起来的勤俭持家、艰苦朴素的优良作风，在进入西安这个西北第一大城市以后，产生了明显的作用。

报社离开延安时近三百人，进西安又接收了二百多人。一个五百多人的大机关住进原来国民党省党部的旧址，真够气派！

其实，那时的国民党省党部并不阔绰，加上他们撤退时的破坏，我们接收的是一个相当破烂的旧摊子。进西安时，报社领导小组首先学习的文件，就是毛主席在七届二中全会上的报告，特别强调“提防糖衣炮弹”的警告。在讨论中，我们领导小组同意杜、陶的意见，力主不修新房，不买新家具，生活尽量节俭，坚决反对铺张浪费。

紧接着在我身上发生了两件大事，更加引起了我和大家的警惕。

进城后，领导上为报社领导人分配了一辆吉普车。我除了那次坐上车参加解放军入城式典礼的采访以外，很少用车。一次外出开会，司机是新手，把车开上了人行道，把一个行人撞倒了，吓得我目瞪口呆。等我醒过神来，只见那位被撞倒的人爬起来就飞快

地跑了。因为在国民党统治时,他们的汽车在大街上横冲直闯,撞倒了人还要骂人打人,被撞的人只要没有受重伤,都赶快跑掉,免得再挨打骂。

还有一件事是,我的警卫员发了一支新的驳壳枪,他高兴地到处显示,却未料到枪走了火,一下就把他的一位最好的朋友给打死了。人命关天,我只能同意把这个很勤奋的小鬼送进法院。从此以后,我更少用车,出门时尽量不带警卫员,更不准带枪。为这两件事我作了检讨。后来,领导机关决定把那辆吉普车换成一辆新的伏尔加轿车,我同陶信镛商量,决定用这笔钱买了三辆比较新的吉普车,报社留一辆,给快要分出去的新华社西北总分社和西北广播电台一家一辆。

当时,报社确实是个清水衙门。全国上下开展三反五反运动时,按照“有山必有虎,管钱必有赃官”的阶级斗争逻辑,我们也冤枉了几个好人,可还是没有打出上级所要求的若干只“老虎”。以后很快为他们平反恢复名誉。在陶信镛的陪同下,我一个一个地向受了委屈的同志赔礼道歉。

实际上,报社在增产节约方面的成绩是很大的。进城第一年领国家补贴就减少一半,第三年(1952年)报社就作到全部经费自给自足,报纸发行份数达到5万份。

对这些财物管理等行政工作,我基本上不闻不问,作用手掌柜。对于干部调配的组织人事工作,我是非管不可。因为当时摆在面前急待处理、必须保量保质负责搞好的一项战略大事,就是为大西北各省的新闻事业安排一个基本队伍,为各省的省报、省通讯社、省广播电台奠基,使他们能够在这个基础上去开拓一个新天地。

当时,群众日报这个三位一体的机构,已经面临分成三个独立机构的时候,分配干部已经出现了问题。随着西北大军解放兰州(1949年8月)、西宁(9月5日)和银川(9月23日),我们必须马上派出三支队伍,随军入城开辟工作。紧跟着,新疆和平解放(9月28日),我们只好要新华社西北前线分社派出人员去接管和主持乌鲁木齐的三个新闻机构。

群众日报5月进入西安,八九月就要派出三个省的新闻队伍共一百二十多位干部,确实是十分重要而艰巨的任务。我得仔细地翻阅他们的档案,同一些主要的领导骨干个别谈话,有的还要谈几次。有的同志很爽快,一谈就成,很顺利的接受了新任务。有的同志就很难办,一方面是确有客观困难,如身体有病,不适宜于高寒地区,有的家庭问题大,很难分开;另一方面是不少同志有思想认识问题,不愿到比较落后的边区省份去工作,因而分配方案几经变动才最后拍板定案。

当时,有的同志在私下责备我,说我“半夜吃桃子,先挑软的捏”。说我“谁组织观念强,好说话,就分配谁到最艰苦的地方去。”我在会议上公开承认这是事实。一来是最艰苦的地方需要革命意志更坚强更能干的干部;二来是最艰苦的地方,自愿去的人不多不踊跃,我只能劝说那些才德皆优的同志去担当最艰苦的任务。老实说,这些优秀的同志,都是在延安时期同我并肩战斗、同甘苦共患难的老战友,从感情上说,把他们派出去,我心里也是很难舍的。

也应当承认,在那样紧急的时刻,一下要派出那么多干部分到各地,差错失误是很难避免的。加上我在思想方法上存在主观主义,有些偏激、独断,在工作方法上也很不深入细致,听取本人意见、虚心考虑也很不够。还有很多人我也没有进行过个别谈话,强

制、勉强的地方在所难免。因而使一些同志在以后的工作上、生活上、身体上和家庭方面都产生了不同程度的麻烦和困难,对这一点,我在多年之内,仍然感到内心很不安。

1950年,留在延安群众日报的同志们大部分迁到西安,以这些同志为基础,在7月1日创刊了陕西省委机关报《陕西日报》。延安群众日报的小部分人仍然留在延安,主办陕北区党委的机关报《陕北群众日报》。1952年12月31日,《陕西日报》又同《西安群众日报》合并,确定《群众日报》既是西北局的机关报,也是陕西省委的机关报。1953年元旦,又创办了《陕西农民报》,继承和发扬《边区群众报》大众化通俗化的优良传统,专门办给识字少的基层干部和广大群众阅读。这个报由四开四版的周刊发展为周二刊,发行量增加到三十多万份,受到读者的喜爱。

随着形势的发展,新华社西北总分社和西北人民广播电台也先后从群众日报独立出去,成为同群众日报社平行的新闻单位。林朗任总分社社长,金照任西北广播电台的台长。1952年12月,当我调到北京人民日报任副总编辑时,曾经作为我的副手的三个副总编辑,也先后调到北京,金照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副台长,谭吐调到人民出版社任副总编辑,林朗先任新华社副总编辑兼国内部主任,后调到中苏友好报任总编辑,可惜的是,在反右派时,据说因为他反映了关于苏联和赫鲁晓夫的一些问题,被扣上“反苏、反社会主义的帽子”,被诬陷为什么“漏网右派”,几经折磨,英年早逝。

这样,群众日报为西北五省的新闻事业所进行的奠基工作,算是顺利完成了。五省新闻事业的开拓者们,在西北高原上鹏飞万里,大展才华。每当我看到五省的报纸,读到五省分社的稿件,听

到五省广播电台的播音,感到特别亲切。群众日报社为它们播下的种子在生根,在开花,在结果。队伍在壮大,战线在扩张,事业在发展,怎能不感到由衷地喜悦呢!

我曾经说过,在我们群众报社这个摇篮里,成长出一些很著名的作家、艺术家。还应该补充说,这还是极少数,而更多的是成长出一大批杰出的新闻记者(这是包括编辑在内的新闻专业人员的总称)。

文艺工作者同新闻工作者的关系自来是很密切的,很多新闻工作者兼任文艺工作者,很多文艺工作者也很乐于从事新闻工作。一般说来,优秀的文艺工作者知名度比较高,而优秀的新闻工作者则大多处于无名英雄的地位。其实,以他们对人民的贡献来说,都是相当显著的。

新闻记者的特点是写别人、写身外事物,很少写自己,影响他们的知名度。只要有人对他们的事迹、他们的战斗历程和他们的生平历史用文学形式加以描述,也是十分动人、十分令人崇敬的。《延安文学》(双月刊)1997年2—3期合刊上,登载了贾炳申同志撰写的《追求真理的战士——记新华社高级记者冯森龄》的中篇报告文学,我含着热泪一口气读完了这篇近4万字的人物特写,心情十分激动。

老冯是1938年到延安的。在延安中学毕业以后,先后在陕北几个县教书,当过教导主任和校长。在这期间他给《解放日报》和《边区群众报》写过很多稿子,有些稿子像《农林税试点情况的调查报告》、《红鞋女妖精》影响很大。1945年他任延安县委宣传部通讯干事时,调到群众日报做了正式记者。

1946年,边区群众报搬到清凉山,我兼任解放日报采访通讯

部主任,两个报的记者队伍合而为一,他也兼任解放日报的记者。1947年解放日报搬出延安,冯森龄留在边区群众报,我们一起转战陕北。西安解放三个月后,就解放了兰州。我们分配到兰州去的领导小组成员中就有冯森龄,他先任甘肃日报的采访通讯部主任,同时负责筹备新华社兰州分社,是第一任社长。从此,他成为新华社的得力干将,先后担任过银川分社、拉萨分社、南宁分社的社长。“文革”结束以后,1977年他调回陕西,任西安分社的社长,直到1986年他65岁时离休,仍然被推选为陕西省新闻学会的会长。到1992年他逝世之前,一直带病坚持采访和写作。

他先后在陕西工作近三十年,满怀着对陕北人民的深情厚谊。他在阔别30年以后回到陕西,怀着一颗赤子之心投入陕北人民的怀抱。他先后十几次深入陕北采访,写出了两个系列的报道,为他所热爱的革命民主圣地延安立了大功。一个系列是在1977—1978年连续报道了经过“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以后,陕北人民吞糠咽菜、上街讨饭的贫困惨状,引起了成千上万的老延安的震惊,终于促成了“陕北革命建设委员会”的建立,在国家财政十分困难的情况下,中央每年拨款5000万元,作为陕北老区的建设资金。《人民日报》在1978年11月30日的头版头条位置,用了大半版的篇幅刊登了冯森龄的综合报道。这对解放后奔赴全国各个地区、各条战线的老延安战士(他们大都是很重要的领导干部了),是一个多么巨大的鼓舞啊!

第二个系列报道,是从那篇著名的《陕北有煤海,优质易开采》的报道开始,十多篇稿件,二百多幅照片,报道了世界第八大煤田的特大喜讯,引起了国内外的重视,吸引了几十万建设大军,在那块荒无人烟的不毛之地,高速度地建设起一座巨大的煤城。由于

陕北天然气的优质高产,促进了从陕北铺设长达900公里的输油管道直达北京。即将完成的这项巨大工程,对首都建设是一个很大贡献。我们的冯森龄对此也是有功之臣。

贾炳申所写的这篇关于冯森龄同志的纪实文学,生动地描写了老冯情系陕北的英雄身影。老冯在西安分社任社长的八年中,走遍陕北33个老区县百分之八九十的乡镇。他钻深山,宿小村,访贫问苦,调查研究,取真拨假,寻根问底。他以老延安记者的求实精神,写出了陕北老区人民的爱国爱党的真情,也写出了他秉笔直书,顶风冒险,为陕北人民呐喊呼吁的英雄气魄。

我同老冯是几十年的老同志老朋友,如果不是读了贾炳申这篇文章,对于森龄同志这些艰苦奋斗的英雄行为和高贵品质,我是知之很少很浅的。

作为群众报十几年的主持者,我要说,冯森龄同志不愧为群众报记者中的佼佼者。像冯森龄式的优秀记者,在我们几百个编辑记者中不只是他一个,而是一大批。我们的记者不知描写了多少个英雄人物,可惜,却很少有人去写这些优秀的记者。我们需要更多的贾炳申式的同志,我们成千上万的优秀记者也需要有人去写,因为他们也是值得人民怀念和歌颂的优秀人物。

十九、第一次访苏,学习 真理报的办报经验

毛泽东曾说,中国革命之所以能够成功,是因为“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主义”。在革命成功以后,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当然苏联是最好的样板。“以俄为师”在建国初期的50年代,是一条重要的原则。

1950年初,党中央决定分别派遣一些专业代表团到苏联学习。第一批就有宣传工作代表团。这个团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周扬同志带队,我是团员之一。在1950年春节前的2月3日,我奉命到达北京,和代表团的其它团员们集中学习,作访苏的具体准备。前后学习了两个多月,4月下旬,坐了九天九夜的火车,经过漫长的西伯利亚,才到达莫斯科,参加了“五一”劳动节的红场阅兵式和群众庆祝活动。在苏联参观学习二十多天。回到北京以后,又集中在一起,大家相互核对笔记,翻阅材料,交流体会,准备回到本单位后进行传达。将近6月底,我才从北京回到西安。

活了35岁才第一次出国。一看当时的苏联,真是进入了一个崭新的世界,大为惊异。首先从房屋上看,就觉得这是一个很富有很新鲜的国家。过去,我只在华西大学读书时,见过一些“洋房”

(30年代,我们把西式建筑叫洋房,其他外来的都冠之以“洋”字,什么“洋油”、“洋火”、“洋布”、“洋服”等),这次从火车经过的沿途两侧的农村和城市,所见都是“洋房”,见不到我们那种破旧的茅草房、土坯房。到了莫斯科,更是满城的“洋楼”,那么多的汽车来往如梭,人们都穿“洋服”,商店里那么多见所未见的商品。第一眼的印象就是“苏联伟大”,“社会主义真了不起”。当时,我这个在中国偏僻的大西南和大西北活了35年的青年来说,无法将苏联同其他先进国家相比,也无法把资本主义同社会主义两种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来相比,是那么的孤陋寡闻,没见过大世面。

我们这个宣传工作代表团,包括文学、艺术、电影、戏剧、新闻等各方面的一些头面人物。我们几个大区党报总编辑的主要任务,是学习以真理报为代表的苏联报纸工作经验。

我们像小学生一样,似乎什么也不懂,都想了解,都有问题不懂,他们的一切介绍、一切资料、一切答复,几乎都使我们感到新鲜、可贵。“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真理报是我们(中国报纸)最理想的楷模”,这确实是我们当时一致的结论。

回到西安以后,我向西北大区机关干部作过访苏报告。在报社,我专门作了学习真理报经验的报告。“学习真理报”不是口头上说说而已,的确是诚心诚意地学。这次的学习报告不是单纯介绍情况,而是结合如何改进群众日报各项工作。这个报告的记录稿当时整理出来,印了一本小册子,可惜找不到了。现在我只能凭记忆简单介绍一下当时的学习心得和群众日报实际改进的情况。

首先是学习真理报深入实际、深入群众、贯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方针。这一方针同我们相似,我们当时只提“突出西北色彩”,还没有提“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在具体作法上,也只是强调组织

工农通讯员网,强调记者要深入基层,注意发展、团结和培养通讯员。真理报把一揽子的编辑部按业务不同分为工业部、农村部,我们马上就跟着学了。

值得提出的是,我们重视通讯员网,是从我们多年实际工作中逐步发展,一再改进,才走上比较系统比较全面的道路。学习真理报以后,明显的变化是使我们从理论上得到提高,减少盲目性,增加了自觉性;减少了随意性,增加了合理性和规律性。

当时,报社内部刊物《群众报人》上,刊登了我在学习真理报半年以后(1951年2月25日)所作的《如何改进我们的报纸》的总结报告。报告中提到关于加强通讯员网和记者工作的部分,就显得比较有一点理论色彩,或者说有一点学问。报告中说:“为了使《群众日报》具有鲜明的西北色彩,从什么地方开始呢?”

我说:“首先注重加强报纸和群众的联系,要组织群众中各方面的积极分子来参加报纸工作,就是发动和组织广大工农通讯员参加报纸工作。只有得到他们的支持,从各个岗位上给报纸写信写稿,报纸才能解决题材扩大和内容深刻的问题,才能解决报纸具有鲜明的西北色彩的问题,也才能解决报纸真正充分反映群众意见的问题。”

接着,我在“发展通讯员的新方针”一段中说:“发动和组织工农通讯员参加报纸工作,是一个十分重大的自觉性的群众政治活动。任何一个工农积极分子,如果他自觉地向报纸写一封信或者写一个稿子,报告一个新闻或者发表一个意见,这就不只是表示他自己对某个社会事物的关心,而且,他还想通过报纸来影响读者,引起共鸣,造成社会舆论,希望社会称赞他所认为值得称赞的事,或者批评他认为值得批评的事,或者采纳他认为值得采纳的意见。

加里宁曾经说过：‘写给报纸的来信……已经不是私人的信件，不是私人的控诉，而是一个文件；它的作者想用自己的来信作为政治活动，使社会注意他所知道的坏事，暴露出坏事的根源，并时常提供医治坏事的适当方法。报纸编辑部的责任，就是如何启发和提高工农积极分子这种自觉写作的政治活动，使各方面的积极分子自觉地把自已认为很好的材料，很值得注意的问题，很应该批评的事，写给报纸，这就是报纸丰富的题材和深刻的内容的取之不竭、用之不尽的源泉。’别卡索夫在《报纸编辑部怎样处理劳动者的来信》一文中，一开头就说：‘读者的来信——是一个无尽宝藏的源泉，从这个源泉里流溢出劳动者本身生动而有创造性的思想。依靠这种生气蓬勃的源泉，可以使我们的报纸丰富起来，可以使它成为富有生命的、战斗的和有力量的报纸。’

我在这个报告中谈到“记者的首要任务”时，是这样开头的：“我觉得目前编辑部内部的有组织能力和写作能力的编辑同志还是多了一些，还应该抽出一部分编辑同志派到西北各地去，负责团结和组织广大的积极分子，自己也进行必要的采访写作，更加加强报纸与西北人民的联系，吸引更多的积极分子来参加报纸工作，为改进报纸开辟一个可靠的稿源。这次讨论中在这方面也解决了某些同志认识不清的一个原则问题：就是记者的首要任务或基本任务问题。……列宁在1904年《给同志们的信》中就说过：‘要把机关报办得生动活泼，生气勃勃，不仅需要五个从事领导和经常写作的著作家（注：列宁这里指的著作家就是专业的编辑记者），而且需要五百个、五千个非著作家的工作人员。’所以记者的首要任务是组织积极分子，不是记者自己写不写稿子的问题，而是记者是不是应该与广大群众密切联系的问题。……只有如此，我们的记者才

能受到当地领导机关和广大群众的欢迎,他才能写出好稿子,也才能组织积极分子写出好稿子。……我们如果多派出一些这样的记者到西北各地去按照这种活动方法进行工作,我们的报纸和群众的联系是会大为加强,我们的报纸内容是会改进得更好的。”

对于如何使《群众日报》具有鲜明的西北色彩,那时我作过一个简要的概括。现在看来,仍然觉得是办好一个地方报纸的努力目标,同时也反映了我当时学习真理报后的认识水平。在将近五十年后的今天,有必要把它概要地介绍出来。

“群众报应该具有鲜明的西北色彩,要能充分反映西北当前的实际而又能推动西北当前实际。使读者每天翻开群众报,就有着很多这种富有西北色彩的稿件吸引着读者;群众报大部分篇幅应充满着这种稿件,无论是新闻、通讯、工作经验、言论等等,总要能及时地反映西北各地的新情况、新事件、新人物、新问题、新思想,通过这些稿件,要能使西北人民更了解西北,更热爱西北,更富有经验和信心来把西北建设不断地向前推进。”

“群众报应该充分反映西北广大人民的意见:他们衷心赞扬什么?他们认为有有什么缺点和错误?他们认为什么问题应引起注意?什么事情应该如何处理?每天的群众报都要能反映这些意见,并通过报纸使这种群众意见变成社会舆论和社会力量,使它产生应有的结果。群众报也要经常刊登这种群众舆论的效果,发挥人民参加治理国家的巨大作用。”

“群众报应该把时事和政策宣传深入到广大群众中去:对目前时局的各种问题,对各项政策法规,群众报都应该针对群众的认识和西北的实际情况,加以通俗明了的解释。这种通俗讲解时局和政策的文章,不只是可以使有普通能力的群众能够及时地了解时

局和政策,而且也可以供给基层干部和群众中的积极分子作为向广大群众及时宣传时局和政策的依据,提高群众的认识,打击谣言,解决疑难,为贯彻政策打下巩固的群众基础。”

“群众报应该帮助干部学习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报纸应该经常有文章来介绍和宣传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解释和发挥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观点,解答干部学习中的问题……”

老实说,恰恰在宣传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方法上,我所主持的群众日报作得很差。在传达学习真理报以后,群众日报社也专门设立了一个理论宣传部,而且在1951年8月,我也作了一个《加强报纸的思想性》的报告。这个报告虽然也讲得头头是道,记录稿洋洋洒洒三万多字,但是实际上改进的效果却很不理想。我负责编写的社论,理论色彩就差,我自己写了几篇学习文章,质量也低。关键在于我自己的理论水平很差。日常工作太忙,学习研究时间少,这虽然是客观原因,但主观上是我对一些马列的经典著作虽然读了却没有完全读懂,或者理解不了,或者接受不了。

在报纸上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方面,我们是作得比较好的,这是学习真理报加强思想性的一个很重要的方面,也是群众报多年来坚持不懈的优良传统。恰好,在1950年4月19日,党中央在学习苏联报刊经验时也特别强调在报纸上开展批评,专门作出了《关于在报纸刊物上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决定》。

记得我们在莫斯科学习时,对真理报强调办成一个“有牙齿的报纸”特别感兴趣。当时我们把《真理报》上刊登的萨斯拉夫斯基、奥维奇金等著名作家所写的小品文翻译出来,这些揭露和批评苏联社会官僚主义的文章十分精彩,我们读得津津有味,连声称赞。因为这些文章抓的问题十分重要,批评直截了当,一针见血,说理

深刻,针锋相对,文笔犀利,尖锐泼辣,妙趣横生。

传达学习以后,我们虽然写不出那样精彩的批评性的小品文,但在敢于抓重大问题和敢于进行尖锐批评方面,我们的勇气大大增加。

应该承认,我们在具体的批评实践中,之所以能够理直气壮,坚持真理,关键还是在于当时西北局的正确领导和积极支持。只要报纸批评在事实上是基本真实的,在批评的态度上是基本端正的,虽然受到某些高级领导干部的压制和打击,但西北局都是坚定支持和保护的。比如1951年初和年底两件重要批评,是我亲自处理的,配合发表的社论也是我撰写的(记不清楚,或者是我负责多次修改的),在事件调查过程中,特别是批评以后的反映中,都遇到了相当大的阻力。我曾几次向习仲勋同志汇报、请示,他对于我们个别事实没有调查清楚和个别词句过于偏激的缺点,虽然也进行了批评,但他的基本态度是肯定和鼓励的。

1951年初,《群众日报》(1月22日)刊登了青海省建设厅长压制批评的报道,年终(12月23日)又报道了西北石油管理局铜川转运站站长压制批评的稿件。发表前我们对事实作过反复调查核对,在稿件处理上,新闻和评论都突破了简单的是非批评,而是注重摆事实讲道理,提高到党性原则上来进行客观分析,表明压制批评和官僚主义对我们党的严重危害,这两次批评的实际效果是很好的。

配合这两次批评报道,《群众日报》发表了两篇社论,反复阐明中央决定中对报纸批评应该采取“热烈欢迎和坚决保护的态度”的道理。在批评铜川的社论中,还特别引用了马林科夫在苏共第十九次代表大会上的政治报告中的几段话。他强调批评和自我批评

是揭露和克服缺点与错误的主要方法,是“对那些损害党的健康肌体的缺点、错误和病态现象进行斗争时所使用的久经考验的武器”。“只有在每一个提出健康的批评的人,能够确实知道他可以得到我们组织的支持,确实知道他所指出的缺点会真正予以清除的时候,自下而上的批评才能展开和扩大。”“把那些阻碍对我们的缺点展开批评、压制批评及对批评者进行迫害与报复的人,当作党的死敌,与之进行无情的斗争”。这些引语大为增强了社论的说服力。

这篇社论的题目是《向压制批评的罪行进行坚决的斗争》。值得顺便提一下的是1953年我调到人民日报以后,恰好又以《压制批评是党的死敌》为题,写了一篇社论,

从总的方面来说,我们学习真理报的经验还是很有成效的。因为当时教条主义的毛病还很轻,我们还能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避之。

二十、在办好人民报纸道路上的 徘徊和前进

在西安办《群众日报》三年半，我虽然很辛苦很努力，可是报纸办得比较平稳，没有什么突出的特点，既没有编写出什么影响很深远的好稿好版面，也没有犯什么很突出很严重的错误。我翻阅了一些残缺不全的报纸，觉得没有什么特别的好坏典型和经验教训值得总结和记载。

在办报原则方面，给我留下最深刻的印象，是西北局对群众日报的领导使我经常怀念。我深深感到，西北局的领导不仅在政策方针上是正确的，在领导方法上是令人心悦诚服的，在领导作风上也是令人钦佩的。

在延安时期，西北局对边区群众报的领导也是很好的。西北局对报纸的领导，主要是政策方针上的领导，在日常工作上对报社的负责干部充分信任，放手让我们独立自主地去进行工作。报社同志的努力和进步，一再得到西北局和边区政府的表彰，使我们感到如鱼得水，自由游弋。在解放战争初期，中央宣传部部长陆定一同志虽然强调过党报“一个字也不能闹独立性”，但在学习讨论和具体操作中，大家都感到这只能从精神实质上去理解去贯彻，不能

从字面上去机械执行。当时已经有事实证明：党委对党报管得越紧，报社事事请示，稿子件件送审，其结果是报纸办得一派官气，群众不爱看，而且使报社的工作人员越来越失去自主自动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群众日报刚从绥德县霍家坪回到延安的初期，根据中央6月5日的决定，西北局宣传部部长兼报社社长的李卓然同志，曾经实行过“看大样”的制度。就是在每天的报纸经过排版、校对、打出清样（也叫大样）以后，在总编辑签字付印之前，先送李部长审阅，经过他对四个版通读一遍，再由他签字付印。结果，这个制度没有执行多久就停止了，原因是习仲勋书记觉得卓然同志年岁大了，每天深夜看大样，太辛苦了，他对卓然同志说：“看大样的决定中规定，由各地党委负责人看大样，也可以由党委指定其他同志代看大样。我看，以后就由报社的绩伟同志负责看大样就行了。”这个决定下达后，我还找出中央决定对卓然同志说：“中央决定这种审查党报的负责同志，必须是完全懂得党的原则和党的政策的，或者是严格注意和用心研究党的原则和党的政策的同志，我不符合中央规定的条件。”卓然同志说：“西北局已经考虑过你的条件，就这样定了。”老实说，当时我觉得中央这个规定的条件也太高，要求太严，事实上是很难执行的。另外一方面，在卓然同志看大样时期，无形中，降低了报社自己独立负责的精神，增加了对上级的依赖心理。

事有凑巧，当我1952年12月调到人民日报社做副总编辑时，分管总编室，负责夜班编辑工作，看大样的苦差事仍然落在我的头上。记得我刚开始看大样时，编辑部里流传着一个笑话，说以前有一位负责看大样的副总编辑，有一次被人们从睡梦中叫醒，他坐在床上看大样时，头脑还没有完全清醒过来，看后，他竟然在自己的

被子上用红笔签了“付印”两个大字。这一笑话引起我的警惕,夜班下班后我不回家,在办公室躺一躺,等到看完大样后,有时拖到早晨四五点钟才回家休息。过不多久,我对这项工作进行了改革,我先把重要言论、论文和新闻,包括标题和版样都先看过,等到大样出来,我就不再看了。当时的总编辑邓拓同志同意这一改革措施。看大样的工序提前进行了,夜班的编辑工作完毕后就可以早一点下班回家了。这当然是后话,但说说后事,可以说明解放初的看大样制度是缺乏实事求是精神的,而当时西北局的仲勋同志和《人民日报》的邓拓同志,对于执行中央的决定是比较注意从实际情况出发,实事求是地进行工作的。

在这一时期,群众日报之所以没有犯大的政策性的错误,最主要的原因就是西北局正确领导的结果。比如,解放初期,接管新城市时,群众日报没有宣传鼓动进行群众性的“阶级斗争”。因为在解放军发起解放大西北的攻势之前,西北局书记习仲勋同志在西北人民解放军党代表会议上(1949年1月17日)就明确阐述过:“我们入城之初,主要有三大工作,即接收、建立秩序和发动群众。这时发动组织群众,仍是为了更好地接收和建立秩序,不要急于进行各项社会改革,不要急于发动群众斗争。在秩序未很好稳定,情况未很好弄清之前,鲁莽地发动群众斗争,就会搞糟。”

比如,在解放军纷纷解放西北各大中小城市以后,群众日报一方面注意加强对城市情况和城市工作宣传报道的同时,丝毫也没有放松对新区农村情况和农村工作的宣传报道,因为对于如何贯彻执行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决议中关于“把工作重心从农村转到城市,并由城市领导农村”的总方针,西北局明确规定:在具体工作步骤上要采取实事求是的精神,指出“第一步要把城乡接管好,特别

要把城市接管好,这一步结束之后,就立即将全党的工作重心在一定时间内先放在农村,肃清土匪特务反革命残余势力,进行各种民主改革与社会改革,同时兼顾城市”。仲勋同志1949年8月在关中新区中共地委书记联席会上肯定地宣布:“从现在起的一定时期内,党的工作重心放到农村,但要同时兼顾城市。”

老实说,在解放初期,敢于和善于根据本地区的实际情况,坚持实事求是的精神,采取这种机动灵活的政策措施,是十分难能可贵的。

那一时期,西北局对群众日报,在领导方法上,处处体现充分信任的精神,很注意鼓励报社同志勇于独立负责地去开展工作。比如对重点宣传,西北局都及时进行原则性的指示。我记得,无论是仲勋同志,还是宣传部长张稼夫、组织部长马文瑞、财经委员会主任贾拓夫、统战部长汪峰等领导同志,有什么评论要写,常常直接找报社同志指示写作要点和解答我们不清楚的问题。我写好社论以后送给仲勋同志审阅时,他总是先一句一字地仔细看完,对一些重要段落他还要重看一遍,他只提出原则性的修改意见,让我自己去修改。对一些不通顺、不明确、不恰当的字句,他只用铅笔画一个记号,引起我的注意,他并不动笔去作修改,改后也不必再送他,就由我负责定稿。这种信任和放手的态度,使我感到自己的责任更为重大,总是拿回来一改再改,丝毫不敢懈怠。这对于提高我的写作能力和独立负责的责任心,都是很大的鞭策。

仲勋同志和西北局的其他领导同志经常到各地视察,常常叫报社派人一同深入基层,具体指示记者应该报道什么和如何写作。

仲勋同志平易近人,和蔼可亲。在他带领下,西北局的主要领导形成了一种平等待人、热情好客的优良风气。报社同志有什么

问题都很愿意很乐意去请教他们。我经常旁听西北局的常委会和西北军政委员会的例会,报社其他负责成员也分工参加各部门领导主持的重要会议。那时,西北局和西北军政委员会的警卫工作外松内紧,像我这样经常来往的人,警卫人员也熟悉了,我常常到西北局领导同志的办公室和住所去拜访,就像老朋友一样,没感到有什么拘束。

在全国解放初期,我们党所执行和贯彻的一系列新民主主义政策很得人心,可以说是党的正确政策的黄金时期。党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体现在每个党员干部身上的工作作风,也是最佳时期。当时,西北局在贯彻执行中央的方针政策方面,那种一切从实际出发的踏踏实实的精神,以及那种时时刻刻为老百姓兴利除弊、奋发图强的才能和干劲,都是深得人心的。广大人民群众将共产党实施的人民民主政权的治理同国民党几十年暴政统治相比,真是感到天壤之别。

1951年,大西北完全解放,刚刚从战争转入和平建设的时候,西北局作出决定,把1951年作为第一个群众工作大进步的一年,决心用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力量来做群众工作。《群众日报》为此发了两篇社论:《要用百分之九十的力量来做群众工作》(1951年1月14日1版)和《怎样贯彻做好群众工作的方针》(1951年2月9日2版)。相隔五十几年以后重新读读这些社论,仍然觉得很新鲜,很值得回味。

第一篇社论的开头说:“用百分之九十的力量来做群众工作,而不是做其他工作,比如,用百分之五十的力量——干部、思想、精力、时间,来坐在领导机关,今天开会,明天开会,今天发个指示,明天发个条例,源源不断地发到下边去,不多考虑下边的条件和执行

情况。这种严重的官僚主义作风,今天不仅要坚决反对,而且要进一步地依靠人民群众的力量来根治它。”我觉得,想想现在,领导同志天天开会、接见、念稿子,重复那些老话、套话、大话、空话,忙于不断地发指示、发条例、批条子,不多考虑下边的实际条件和执行情况,让下边没完没了地总结报告和填写报表,逼着下面弄虚作假,这不是比当年严重得多吗?

第一篇社论说,我们一年来为群众办了很多好事,受到群众称赞,“但是我们不能也不应该过高地估计我们的成绩,要了解这些工作,很多都是采取自上而下的简单的行政方式,而不是完全通过积极地提高群众觉悟和动员群众自己来完成的”。

社论引用毛泽东同志在1943年边区劳动英雄大会上所说的一段话,是多么亲切啊!他说,要使我们大家懂得,“如果我们做地方工作的同志脱离了群众,不了解群众的情绪,不能够帮助群众组织生产,改善生活,只知道向群众要救国公粮,而不知道首先用百分之九十的精力去帮助群众解决他们‘救民私粮’的问题,然后仅仅用百分之十的精力解决救国公粮的问题,那么,这就是沾染了国民党的作风,沾染了官僚主义的灰尘”。社论强调:“我们的群众工作,主要是依靠用政治说服和替群众办好事来进行的。”要把几百万、几千万的人民组织起来,不断提高他们的觉悟,要“非常注意培养人民群众中的积极分子,把这些人民中的诸葛亮都发现出来,而且积极地参加了人民的国家工作,那么,我们党和国家工作便获得了坚实的基础。……这就是我们努力争取的成就和奋斗目标”。我们国家的“工人、农民就真正成为我们国家不可战胜的力量的泉源”。

在《怎样贯彻做好群众工作的方针》这篇社论中,注重阐明必须深入基层深入群众进行不间断的宣传教育工作,提高群众的思

想觉悟,增强群众当家做主的主人翁意识。在这里,特别强调新闻工作要坚持群众性,新闻工作人员自己的思想作风要坚持群众化。

老实说,进入西安这个大城市以后,在坚持群众性的办报方针方面,也就是在“办好人民报纸”的方针方面,我在思想上产生过动摇。在这个关键性问题上,习仲勋同志对群众日报进行过十分重要的指示,几次提醒我们要坚持群众报通俗化、大众化的优良传统,坚持“群众报群众办”的办报方针,办一张为广大群众喜闻乐见的人民报纸。

群众报在延安虽然已经由三日刊改为日报,但毕竟还是在农村办报。到了西安,办报条件和读者对象都发生了变化,主要对象由农村基层干部和农民群众,变为中上层干部和城市市民,读者对报纸的要求,主要由增加知识变为及时了解国内外大事。国内外时事新闻的稿件和全国性的评论、理论文章,在整个报纸版面上所占的比重也大为增加。每天报纸的容量,由一万字左右增加到三万字左右,大部分的稿件不是我们记者和通讯员所写的专稿,是由新华社总社所发的通稿。而且新华社的稿子又大都是半文半白的“新闻体”,要改为通俗化大众化的文体,当然作不到,有很多稿件还不容许改编和缩写。加上西安解放以后,党和政府的指示多了,首长的讲话也多了,这些大都必须全文照登,是不容许报社改动的。

我当时虽然注意到这一变化,但却过分重视和夸大了这一面,因而在一小段时期内,我在思想上强调了这些方面,产生了消极情绪,反正一切照登,单纯“为新华社办报”,又省事又保险。而这,对于我们这批多年从事大众化工作的老报人来说,总是格格不入,或者犹豫徘徊。很多同志日渐感到这种消极情绪不对头,越来越认

识到这种错误的严重性。比如我们忽视了报纸是人民大众的报纸,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报纸,模糊了这个办报的根本方针;我把为群众办报和为干部办报完全对立起来,模糊了我们的干部是密切联系群众的干部,不是脱离群众的官员;我把报纸的新闻性和知识性对立起来,模糊了我们的干部总的说来文化水平并不高,大都要求从阅读报纸中增加知识,而广大群众,随着主人翁意识的增强,对国内外时事的关心也大大增强了。

经过一番徘徊动摇以后,我们仍然抓紧发展和加强群众通讯网的工作,注意培养工农兵通讯员。报上的“读者来信”、“读报常识”、“工作研究和讨论”等专栏仍然坚持联系实际和联系群众的方针。我们的记者和编辑自己写作的新闻通讯和评论,仍然注意保持比较通俗化的风格。以后,我们对新华社发的地方性的稿件在选择上更注意适合西北的情况和需要,对一些重要的时事稿件,注意选登一些资料,或者另外编写一些比较通俗的时事讲话,或者注意解答读者提出的问题。这样,使《群众日报》更适合群众,更接近群众。

1951年1月,西北军政委员会新闻局召开西北报纸工作会议。会前,仲勋同志为了准备在会上作报告,约我谈话,了解情况。我把群众日报在报纸群众性方针上的动摇和反复,向他作了汇报,并说,群众日报所遇到的这个问题有一定的代表性,在西北地区各省省报都存在这个问题,这引起他很大注意。他肯定了我们的经验,要我注意总结,在会上去作一个介绍。在这次会议闭幕时,仲勋同志作了一个题为《新闻工作就是群众工作》的报告,针对当时在办报方针上存在的问题,进行了理论联系实际的重要指示。

1月27日闭会时,新闻局还发表了一个《关于增强报纸群众

性》的决定,《群众日报》配合发表了《努力加强报纸的群众性》的社论。

仲勋同志的报告首先肯定,我们党的报纸应当力求成为群众的报纸。他说,“报纸名曰《人民日报》、《群众日报》,没有一个叫《干部日报》的”,而我们“在思想上对满足群众的要求和满足干部的要求的一致性认识不清”。他说:“今天干部最需要的,正是当时当地群众生活、群众运动的生动形象和真实情况……活动的发展趋势,存在问题,新鲜经验,这些就是指导工作的基础。这些又必须主要依靠办好报纸来解决。只有真正办好群众化的报纸,才能满足干部的要求。所以报纸群众化的方针,应该十分明确地在思想上肯定下来。”

紧接着,仲勋同志阐明“要使报纸群众化,就首先必须使新闻工作者的工作方法群众化”。他指出:“编辑人员要轮流到群众中去,记者要经常到群众中去。”“去了解群众,熟悉群众”。在群众中到处都要交几个知心朋友……成为社会活动家。“只有这样,记者和编辑才能写出好的报道和评论”。“凡是真正写出了群众的呼声,群众的热情,群众的力量,群众的创造,群众的要求,群众运动的经验……那么,不论是通讯还是评论,都具有真实的指导性。也只有这样的记者和编辑才能团结更多的写稿积极分子”。“这样,报纸才能办好,才能培养出群众爱戴的名记者、名编辑”。

仲勋同志特别强调要加强报纸的读者来信和通讯网的工作。他说,“读者来信、通讯网办好了,可以求得稿件来源面广、量多,而且可以系统地、深刻地反映群众运动”。《群众日报》在《努力加强报纸的群众性》的社论中,注重发挥了仲勋同志这一指示的精神,强调要真正做到“群众报群众办”的方针,只有“培养出一大批生长

在群众中的或者扎根到群众中的通讯员队伍,才能及时报道广大群众的真实情况,忠实反映他们的疾苦和呼声”。

为了切实推进这一工作,我们几个正副总编辑每天都要抽看一些读者来信和通讯员的来稿。1997年4月,我回到西安查找资料,从陕西日报社保存的残缺不全的报社内部刊物《群众报人》上,发现我在1951年8月给通讯员写了一封信,《群众报人》还写了一个“编者按”,把原来报社农村部写的回信和经我改写的回信一起刊登出来,希望编辑部同志对比加以研究。“编者按”提出要把回信写好,有两点值得注意:“第一,我们的回信一定要有很高的热情。不然通讯员以很大的热情为我们写信、写稿,而我们的回信却是冷冰冰的,这就必然要损害通讯员的写稿热情和积极性。第二,在向通讯员提出意见时,一定要设身处地为通讯员设想一下,根据通讯员的具体情况、实际水平来说明道理,使他们真正能在思想上受到启发,在实际中得到帮助。不然,空讲一些生硬的大道理,对他们的帮助是不大的。”

我们当时对开展工农通讯员工作是有成效的。在1951年西北报纸工作会议时统计,群众日报和五个省报的通讯员突破了1万名。这就使得我们这个西北局的机关报在突出西北地方色彩方面,也就是在联系西北广大群众方面有所改进,这是在报纸内容群众化方面的一大进步。

在报纸文风群众化方面,我们也在继续努力。仲勋同志在这次讲话的最后一部分,就谈到这个问题。他提醒我们:“必须认真学习,学习群众中、干部中那些富有智慧的生动的语言,来充实我们的作品。也就是说,用群众的语言写群众的东西;群众的报纸就要用群众的语言去办,那样群众就会欢迎了。”

这点,群众日报的老编辑老记者们可说是驾轻就熟的。但是报社增加了很多新人,特别是我们发展了那么多新的通讯员,对于如何在文字群众化方面还需要做很大的启蒙工作。在这次会议以后,就是4月18日,我在《群众日报》上发表了一篇《从糖炒栗子谈文章写法》的专文。几十年后翻出来看,还有些“自我欣赏”的得意。因为这个问题现在还存在,也还没有很好解决,所以我觉得还值得把它摘要介绍一下。

这篇文章的第一段讲到我们报纸群众化的根本方法是:“人民喜爱人民的报纸,喜爱它是人民的嘴,说人民要说的话;喜爱它是人民的眼,使人民知道很多新人新事新道理;喜爱它是人民的心,帮助人民了解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主张,帮助人民根据这些主张来分析一切问题。”

文章接着说:“办一张人民的报纸,和开一个人民的饭馆有一点相同的地方。人民要吃菜吃肉,我们就努力准备粮食,多种菜,多养猪;还应该好好研究人民的口味,把菜和饭做得更好吃。报社的同志现在比较懂得怎样多准备粮食,多准备菜和肉,但是还很不懂得怎样把饭菜做得更好吃。就是现在报上很多文章还写得不好,不通顺,不生动……太枯燥、太长、太深……一看就摇摇头,或者看几句就丢在一边。”

然后,这篇文章用糖炒栗子来比喻如何写文章,说:“毛栗子是好吃的,但是,它外面长了一层有刺的壳,好像刺猬,一看就怕人,要吃吗,先要剥去有刺的壳,不小心还会刺伤手;它里面还有一层硬壳,要用劲才能剥得开,再里面还有一层有毛的皮,要细心才剥得掉。好吃是好吃,就是太费劲。卖毛栗子的人,就想出了办法,先把有刺的壳去掉,用河沙一炒,加上一点糖,做成糖炒栗子,又好

剥壳剥皮,又甜又香,大家更爱吃。办报的人,也应该把很多文章加一点糖,炒它一下,使读者更喜爱。”

这篇专文在下面从五个方面去讲解如何把文章“炒”好。文章最后说:“我们写文章是为了叫人家看……是给成千上万的人看的。看的人越多,作用就越大,多花点功夫,是很应该的。”结尾的时候,我还引用了毛泽东的一小段话:共产党员如果真想作宣传,就要看对象,就要想一想自己的文章、演讲、谈话、写字,是给什么人看,给什么人听,否则就等于下决心不要人看,不要人听。

现在想起来,我们的报纸,天天老话、套话、大话、空话,啰啰嗦嗦的话,枯燥难懂的话,实在太多了。难道不“等于下决心不要人看,不要人听”吗?

总起来说,在西安办报三年半的时间里,无论在为人民拥护爱戴的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方针方面,还是在为人民喜闻乐见的大众化的办报方针方面,群众日报同西北局之间关系都是同心同德、紧密无间的。那时,按照苏联的提法,称党报的品质是党性、群众性、战斗性和组织性,以后我们简称为党报的党性和人民性。在西安时期,我深深感到党报的党性和人民性之间是一致的、协调的,没有发生突出的分歧和矛盾。对那个时期的《群众日报》,党委(西北局)称赞是自己的党报,办得还好,还满意。广大人民群众认为是人民的报纸,办得还好,比较满意。西北局感到《群众日报》党性较强,没有向党委闹独立性的毛病;群众日报感到西北局民主作风很强,没有向群众日报施加专制主义的毛病。完全没有想到,在建国以后40年之中,党报的党性和人民性的矛盾问题,竟会那样严重。

这里要指出的,西安办报时期,同以后各历史时期作比较,作为群众日报的总编辑,我对西北局的领导,特别是习仲勋同志的领

导,由衷地钦佩。在我的办报生涯中,这一段时光,也是我心情最满意和最舒畅的时期。

1952年,党中央决定撤销几个大区的中央局,还决定从各中央局的党报中抽调得力干部到人民日报,加强中央党报的力量。西北局决定由我带领群众日报十几位同志到北京。1952年底我离开了西安,结束了我在陕西12年的报人生涯。

我在成都办报3年,初上笔阵,猛冲猛打,意气风发,这是我办报的幼年时期。陕西办报12年,在报纸业务上走向比较成熟,但在政治上相当幼稚,这是我办报的青年时期。即将开始的北京办报30多年,在报纸业务上相当熟练,但在政治上从幼稚到成熟,从单纯到老练,从盲目到自觉,摇摇摆摆,犹豫彷徨,左顾右盼,时而混沌,时而清晰,到老时才算真正觉悟。我曾说自己是老时醒,醒时老。当然,这是后话,留在以后去叙述了。

二十一、有情人终成眷属

从1939年底,我告别了成都到延安,1949年在解放战争胜利的前夕,我从延安进入西安,负责编辑中共西北局的机关报《群众日报》三年,在这将近十三年的艰苦奋斗的革命生涯的末尾,终于得到党委的批准和关怀,和二姐胡德辉(到延安后她改名为胡一哉)结为夫妇。可是,我们真正有了—一个家庭,有了朝夕相聚的美满生活,还是在1952年12月我调到北京人民日报社担任副总编辑以后。这年,我已经36岁,二姐也年届40了!总算老天不负有情人!经过20年的苦恋,我终于和二姐组成了幸福家庭,有了一个可爱的女儿。

(一)

1943年夏天,二姐通过四川地下党组织的安排和护送,到达了延安。那正是延安整风运动中进入所谓“抢救运动”的紧张阶段。和二姐一同来的同志们,大都被送进了党校,二姐被分配在党校五部接受政治审查。我通过多方交涉,才被允许到党校去看望

她。一见面,我俩虽不能抱头痛哭,但也泣不成声,简单地诉说着别后的情况。三年不通音讯的思念,那是短短的十几分钟的会晤所不能表达的。

从1934年二姐同黄觉民结婚后,逐渐发现自己与黄觉民之间,在对待婚姻、家庭、人生、事业上存在着严重分歧,他们的感情发生裂痕,逐渐发展到难以共处的地步。

二姐是个女权主义者和事业型的妇女。她主张男女平等,女人和男人享有同等的学习和工作的权利,女人不能依赖男人生活,不做男人的玩物和社会的花瓶,应当有独立生活的权利和能力。1938年她加入中国共产党后,从事妇女救国会的工作。为了谋生,除了忙于教学以外,她的全部业余时间都为抗日救亡和妇女解放而奔走呼号。她整天忙于工作,并不看重家庭生活,而她的丈夫所需要的却是一个贤妻良母式的女性和一个温馨的小家庭。这种分歧引起的争论和争吵在增加,分手的念头一触即发。

1940年夏天,黄奉命去延安(黄已于抗战前后入党),这时二姐刚生下第二个女儿不久。分别前,二姐与黄正式表态,她对黄说:“我们结婚几年来的事实证明,我不能成为你希望中的那种贤妻良母。你到延安以后,你完全有自由再找一个合乎你理想的人恋爱结婚,我绝不干涉。两个孩子,由我和我妈妈负责养大,你不必有什么顾虑。”黄说:“老实说,你和我分手以后,我再找一个并不难,可是你又带着两个孩子,再结婚就不容易了!你理想中的丈夫是什么样的人呢?”二姐是个勇敢的女性,她毫不隐讳地回答:“我就是找一个像三弟这样尊重女性的男人!”黄一听,冷笑着说:“你想得太简单了!在咱们这个社会里,亲叔伯的堂兄妹、堂姐弟之间,是根本不允许结婚的,你死了这条心吧!”二姐也冷笑着回答:

“如果我找不到三弟这样的男人，我宁愿一辈子不再结婚。”

黄走后，二姐一个人带着两个孩子回到家乡界牌场一带，靠亲友的帮助找一些临时性的工作，幸亏有大伯母的接济和照顾，终于逃脱了国民党特务的追捕，熬过了白色恐怖的威胁。1943年，她在重庆找到了邓颖超大姐，才被安排去延安。这时儿子力追已经七岁，交给姐姐德如照料，她带着三岁的女儿威威来到了延安。没想到，一到延安就被视为可疑的国民党派遣的特务分子，关在党校里接受审查。

在延安的抢救运动中，由于极“左”思潮的抬头，竟然将四川地下党诬蔑为“红旗党”，地下党员们被咬定是打进来进行破坏活动的特务分子。二姐是1938年春节前后经赵世兰大姐介绍入党的，一直从事妇女救国会的工作。入党后的历史，党组织是很了解的。1934年她与黄结婚后一同去北平，想进入大学读书，由于经济条件限制，她的读书愿望未能实现，一个人先回到成都。为了谋生，叔公胡素民将她介绍到国民党四川省党部当了两个月的文书。这两个月的历史和家庭关系就更增加了“红旗党”的可疑因素，前后审查了一年多，到1944年夏才算告一段落，分配到离延安几十里外的子长县中学教书。

(二)

1944年，审查结束后，二姐向组织上递交了要求与黄觉民离婚的报告。

事前，二姐征求我的意见，向我讲述了她与黄婚后几年来共同生活中所出现的种种矛盾。我劝她最好不要走离婚的路，能维持

下去还是维持下去好,毕竟和黄已经有了一双儿女。对于我们之间的关系,在成都时,我们双方都曾经明确表示过,我们之间这种亲叔伯堂姐弟之间的血缘关系,于礼于法,都是不可能结为夫妇的。二姐希望我能找到一个意中人,我希望她与黄消除矛盾,各自都能建立美满的家庭生活,以此来淡化和消融我们之间的感情。我到延安三年,这一段“叛逆的恋爱”,竟把我推上了与二姐难解难分的境地,常常使我魂牵梦绕。但我总算是个颇为理智的青年,虽然也曾考虑过另择佳偶,偏偏未遇到一位可以代替二姐在我心中地位的女子;而她又将结束与黄之间的婚姻,这引起了我心中的一系列的彷徨、犹豫与不安。二姐是个意志坚强、爽朗明快的女性,她坦率地对我说:“我不是为了你,才决定和黄离婚的;更不是为了在和黄离婚之后,能和你结婚,你不要抱什么幻想。这完全是我自己的事。这是我人生道路上的一大难关,不冲过这一难关,可能会葬送我的前途。”

二姐离婚后,我的内心却产生了十分复杂的矛盾和冲突。一方面我为她高兴,她终于摆脱了痛苦的婚姻枷锁,使我们的结合有了希望与可能;另一方面,要达到与二姐结合的目的是很困难的,增加了我的苦恼。二姐为我介绍了几个对象,我身边也有女同志对我表示好感,可是我都觉得她们不如二姐好。今天回想起来,我觉得我当时有一种奇怪的感觉,我觉得那些比我年轻的女孩子并不可爱,反而对那些比我年长的成熟的女性感兴趣!这也许是二姐给我留下的印象太深了的缘故。我在延安生活了将近十年,又是一个单位的首长,对身边的女同志从未动过心。

1944年秋,二姐结束了与黄的婚姻关系,按照组织分配,到子长县中学教书去了。子长县离延安三四十里路,隔上一两个月,她

回一次延安,探望一下留在延安保育院的女儿,也到清凉山来看看我。二姐是个富有魅力的女性,她穿着一身当年延安流行的浅灰色的双排扣的列宁装,腰间束一条宽宽的皮带,一头齐耳的短发,一双闪闪发光的大眼睛。每当我的目光一接触到她那双会说话的眼睛,就有一股身不由己的爱意自心底涌出,催促我去亲近她,拥抱她。但是,我们双方约定的淡化我们之间的爱情,强化我们之间的亲情,又制约我循规蹈矩地做她的弟弟。对二姐的爱,使我幸福、陶醉,也使我苦恼、伤感。

1945年8月,日本天皇宣布投降,八年抗战结束,人民得到胜利,延安军民沉浸在欢乐之中。二姐也由子长县回到延安,参加欢庆胜利的活动。延安到处张灯结彩,锣鼓喧天,鞭炮齐鸣,秧歌队、腰鼓队,从清早到夜晚,从杨家岭到宝塔山,人们欢歌狂舞,如醉如痴。胜利了!今后将是一个新的历史时期的开始!对于每一个离开了家乡,离开了学校,离开了原来的志趣和爱好而来到延安从事抗日活动的青年革命者来说,将开始新生活的一页。人们对未来充满了希望,憧憬着和平、幸福和理想目标的实现。

胜利,也使我和二姐之间的关系发生了一个重要转折。在她到子长县中学教书的这一年,尽管有些男同志追求过她,对她表示好感;也尽管有些关心我的同志们为我介绍几位条件相当的女同志,可是我和二姐都把感情深深地埋藏在心里,一直未能找到一个可以代替彼此的对象。我们之间仍然在对方的心灵圣地上占据着一块最重要的宝地,只有她(或他)才是自己惟一的最喜爱的最愿意结为终身伴侣的人!在抗战胜利的狂欢日子里,我们两个都感到不久的将来离开延安之后,有了结为夫妇的可能,我们的爱情会有一个美好的结局。在对未来充满幸福的希冀下,我们再一次

冲破了理智的束缚,热烈地拥抱在一起。

在延安那种男多女少的特殊环境下,只要男女之间在一起散步,谈谈心,有些个别接触和单独往来,人们就会以敏感的目光来评判:他们在恋爱了!我和二姐之间的姐弟关系,既掩护了我们经常往来的爱情关系——没有人怀疑我们姐弟之间会发生恋爱,也为我们的频频接触提供了不惹人注意的方便条件。我们严肃地、反复地讨论了我们的未来,讨论了为什么叔伯兄妹不能结婚,而姑表、姨表兄妹却可以结婚,其道理何在?应该说,当时我们已经是三十岁上下的成年人了,我们已经有了有一定的社会生活经验和分析处理问题的能力,也可以说,我们已经摆脱了幼稚的盲从时代,走向自觉地工作和生活的时代。我和二姐反复研究了这条叔伯兄妹不能结婚的传统习俗,认为这是以男子为中心的社会意识的反映,是一种封建主义的东西,却不完全懂得血缘关系太近在遗传基因上的不利因素。每次见面,每次讨论,越来越坚信我们的结合是合情、合理、合法的。从合情来说,我们青梅竹马,患难与共,产生了感情,又一起入党追求进步,共同走上抗日斗争的道路;从合理来说,表兄妹可以结婚,而堂兄妹却不可以结婚,是旧社会的以男子为中心的封建陋习,不能成为破坏我们幸福的障碍;至于合法问题,国民党的法律对我们陕甘宁边区无效。毛主席说过,我们是无法无天。而我们的边区政府,也还未有婚姻法,我们为什么要受这种传统观念的束缚而放弃自己应有的幸福呢?新的认识武装了头脑,争取幸福的信心大大增强了。

抗战胜利的到来,为适应时局的新发展引起了党的工作的一系列的变化。首要的是组织延安的干部大队开赴东北和华北去收复失地,建立新政权。1946年夏,二姐接到组织通知,回延安集

中,准备到华北去。

这时,蒋介石背信弃义,单方面撕毁国共停战协定,从大后方调兵遣将,向各抗日根据地和解放区大举进攻。《边区群众报》是西北中央局党委的机关报,自然是和边区领导机关在一起。二姐一走,战争发展形势如何?何时才能团聚?都难以预料。我提出现在是否可以向组织上提出结婚的要求,借此将二姐留下来,她不同意,她渴望工作,渴望干一番事业,愿意跟随干部大队到华北去。二姐是个意志坚强的人,在她的信念中,女性独立是最重要的,为婚姻为家庭放弃自己的理想和事业,是绝对不可能的。我留不住她,这一年的秋末冬初,二姐离开了延安。分别的前夜,我向她说:“我一定等着你,等到我们团聚和结婚的那一天!”

(三)

二姐走后,我害了肺病,住进了安塞县的一个医院疗养。1946年冬,在国民党大举进攻解放区的战争环境下,当时对肺病是无药可医的,只能在伙食上增加些营养,多休息,靠自身肌体的抵抗力来战胜疾病。我真是“命大”,经过两个多月的疗养终于康复了。

解放战争初期,华北与延安之间,还保持有军邮往来,从二姐来信中得知她怀孕了!二姐离开延安,在奔赴华北的行军途中,她感受到身体的变化,月经没有按时来潮,恶心、呕吐出现了,她知道这是怀上了我的孩子。她一方面为我们终于有了爱情的结晶,感到十分惊喜;另一方面感到忧虑,这对于她的革命事业和前途又是一个危险的障碍。她反复思考,权衡轻重,终于下了狠心,打算悄悄地把胎儿弄掉。她奔跑、跳跃、蹚水、负重,冷了热了都不管,只

想让腹中这个小生命离开她。可是,越是折腾,胎儿越是牢牢地依附在母亲腹中,她从邯郸写信给我,要把孩子打掉。

我收到信后,也是又喜又忧。喜的是我们有了孩子,强化了我們正式结婚的意志和信心;忧的是当时的战争环境,生活艰苦,流动性大,生育儿女自然会给她带来许多困难,况且她们母女身边还没有一个合法的丈夫和父亲!可是,孩子是宝贵的,环境可以逐步改善。而且我和二姐都是三十岁以上的人了!我将每天的日记写成给她的信,劝她千万珍惜我们的爱情果实,绝不能毁坏她。我一再向她说,我们会很快打败蒋介石的进攻,会很快地团聚,会很快地有个幸福的家庭,希望她能坚持,能把孩子生下来。

孩子在腹中一天天长大。二姐在邯郸的华北妇联工作。当时,中央妇委和她们相距很近。妇委的领导同志赵世兰大姐是她的入党介绍人。二姐将她和我之间的前因后果都向赵大姐一五一十地诉说了,征求她的意见。赵大姐非常理解、同情二姐的处境,劝她把孩子留下来,就说孩子的父亲在西北前线,不能到后方来探望她们母子。1947年4月,我们的女儿飞飞出世了。两三个月后,二姐将孩子寄养在邯郸的老百姓家里,直到1950年飞飞才回到母亲的身边。

1947年3月中旬,边区群众报编辑部随同党中央和西北局一同撤出延安,在陕北转战一年,1948年4月,西北人民解放军收复延安,我又回到延安。在战争中,我和二姐断了音讯。回到延安后,才得知她一直在邯郸工作。1949年初,打败蒋介石的胜利在望,实现和平建设的目标近在眼前,我和二姐的婚事,也应该有个归宿了。我给西北局宣传部长李卓然和组织部长马文瑞同志写了一封信,将我和二姐的恋爱的前前后后,以及我们现在已经有了一

个两岁的女儿等等,全部报告给党组织,请求组织上批准我与二姐正式结婚。1949年4月,马文瑞代表组织给我写了一封回信,同意我们结婚。马文瑞同志在信中写道:“绩伟同志:你关于个人婚事之信,前几天曾转给我看了一下(原信梅行拿走)。事情本有不妥之处,但又照顾到你俩过去的关系程度和特殊情况,遂予以同意,请你即代拟一给中组部调她之电报,交我批发,以便将她调来,成全你们的事情。”

1949年春,北京和平解放后,二姐随同华北妇联进入北京,分配在北京市妇联工作。5月25日,西安解放,我也随同群众日报的同志们进入西安,接收西安的新闻单位,担任西北局机关报《群众日报》的总编辑。没想到,调她到西安来的电报出了一个笑话,调令上说:“调胡一哉到西安来结婚。”大家说,孩子都两三岁了,怎么才去结婚?只好加以解释,说是调她到西安来与爱人团聚。二姐不愿意来,拖到1950年初,我参加中央宣传工作代表团去苏联参观访问,出国之前在北京集中学习了两三个月,这时我才以丈夫的身份住在二姐的宿舍。那时,我们没有举行婚礼,没有休息一天假,没有游山玩水,却度过了我们最珍贵的“蜜月”。这时,我才见到了我们的小女儿飞飞,学着施展一下父亲的疼爱 and 享受一点天伦之乐。

(四)

虽然1949年4月组织上就批准了我与二姐的婚姻,可是,由于我们这些立志献身于革命事业的人,一向是抱着工作第一,个人生活第二,一切服从工作需要的人生理念,我和二姐都一直是两地

分居,直到1954年的夏天,我们才在北京有了一个安定的家,才算建立了温馨幸福的家庭生活。

访苏归来,我一个人孤零零地回到了西安。这年,我已经34岁,人到中年了,希望有个家。1950年的北京,刚刚回到人民手中,百业待举,百废待兴,特别是将这样一个在反动政权统治下历经沧桑的文化古都,改造为充满生气的人民当家做主的新中国的首都,多少事等待这些刚刚进入城市的革命者们去做啊!身为北京市妇联秘书长的二姐,工作更是繁忙。她说:“我的工作刚刚起步,去西安的事,过些日子再说吧!”这年6月,我又一次依依不舍地离开了她。

1951年春节前,我突然病倒了。一天夜里,在睡梦中我感到呼吸困难,像是被人扼住了喉咙,我叫不出声,翻不了身,我拼命地挣扎着从床上爬起来,迷迷糊糊地摸到玻璃窗前,用拳头将玻璃砸碎,向室外呼救。在院中巡夜的保卫人员听到玻璃破碎落地的响声,立即跑来,撞开房门,见我倒在地下,满脸满手都是血,昏迷不醒,立即喊来医生抢救。西安的冬天很冷,当时又无暖气设备,屋内靠生炭火盆取暖,我中了煤气,幸亏被人发现得早,不然,这条小命就算终结了!

常年的夜班生活,白天还常常主持和参加编辑部各类会议,工作的劳累,精神的紧张,生活又缺少规律和亲人的照顾,再加上我自幼体质较差,身体每况愈下。经医生诊断,认为我身体虚弱,中了煤气后,发生了神经错乱,需要休养一段时间。这样,二姐才请假赶来西安,照料看护我这个病人。

经过这一场风波,二姐才答应到西安来。1951年的四五月间,她调来西安,被分配到咸阳去筹建西安国棉一厂。从青年时代

起,二姐就立志走“实业救国”的道路,她读的是女子实业学校的化工专业,一心想通过工业化的道路使中国富强起来。现在她的愿望实现了。她欣喜若狂,只在西安住了四五天,就赶到咸阳(离西安30里左右)上班去了。我们订了一个“君子协定”,实行过“礼拜六”制度,这个星期六她到西安来,下个星期六我到咸阳去,保证不影响双方的工作。这时,大姐德如带着两个孩子(大姐的女儿世坚和二姐的儿子力追)也来到西安,二姐就将小女儿飞飞一并交给大姐照料,在报社的宿舍里安排了两间房子。我仍住在办公室内,到吃饭时才回去看看孩子们。

好事多磨。我们这种“革命式”的家庭生活,过了一年多点,又面临天各一方了。1952年底,中央已经准备撤销大区的中央局,各大区的党报也将随之停办。中央决定把五个大区党报的负责人和主要骨干力量调到《人民日报》,充实中央党报的编辑力量,我也将被调去北京。二姐筹建的国棉一厂正日夜加紧建设,她不能脱身随我一同进京。直到1954年夏天,西安国棉一厂建成正式投入生产后,二姐才离开西安,再次进京,分配到北京市纺织工业局任副局长,担负起北京棉纺厂和毛纺厂的筹建工作。从这时起,我们才算有了一个正常的家庭。

二十几年来,我们这一对叔伯姐弟间的叛逆的恋爱和历经艰难曲折的婚姻,到这时才算有了一个完美的结局,建立起一个比较安定的家庭。一家人,一个儿子和两个女儿,还有大姐和她的小女儿,我们和和睦睦,亲亲爱爱,算得上是一个美满的家庭。

我们的恋爱是叛逆的:一对叔伯姐弟,从少年时期就青梅竹马,开始相爱。

我们的婚姻是不寻常的:经过几次反复的漫长的道路,才争取

到有情人终成眷属。我们没有举行过婚礼和任何结婚仪式,甚至没有请朋友们吃点花生、红枣和喜糖,也没有拍一张结婚照。

我们的家庭是很幸福的。但不是那种夫唱妇随、父慈子孝的传统家庭,在50年代初来说,这是革命式的家庭,孩子们都住宿在学校和幼儿园里,二姐上白班,我上夜班,只有到了星期日和节假日,我们一家人才团聚在一起。即使用今天改革开放的新眼光来看,我也认为这是最理想的家庭生活。

